

中州大学学报

ZHONGZHOU DAXUE XUEBAO

双月刊

《中州大学学报》编辑委员会

主 任 甘 勇

副 主 任 杨庆年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丰连海 王 琦 王文武 甘 勇 冯明新 吕 村

吕志远 仲 岩 刘海燕 汤丽萍 孙振营 苏 玉

李 欣 李玉玲 杨庆年 张帅旗 范红军 周万春

周晓莉 姚 虹 郭 琰 曹发军 崔 勇

主 编 杨庆年

执行主编 曹发军

副 主 编 刘海燕 李玉玲

封面题字 陈 云

执行编辑 李玉玲

中州大学学报

双月刊

第42卷 第6期

2025年第6期(总第185期)

目次

· 文艺学与文学评论 ·

郑彦英《太阳》的文本、转载与传播	李勇军(1)
一幅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画卷 ——读《叶圣陶日记全集》	金欣欣(8)
赋的气象,论的肌理:《过秦论》的“破体”美学	张博均(14)

· 经济与管理 ·

长三角地区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空间关联网络研究	孙鲁云,周本达(19)
新发展格局下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問題与对策	王中亚(30)

· 政治与法律 ·

数智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常态化宣传教育的机理、困境与实践路径	黄治国,王雪可(36)
论居住权对抗强制执行的审查标准与程序路径	李刚,张聪(45)
社会本位理念下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优化研究	王建权(54)

· 社会与历史 ·

抗战时期新疆的共产党人与女性解放述论	贾秀慧(59)
胶东抗日根据地公安机关工作探究	刘志鹏,张红鑫(66)

2025 年 12 月 20 日出版

家国情怀:抗战诗歌中的黄河书写 李晶柯,吴朋飞(72)

· 传媒与艺术 ·

流动·混杂·共情:近年来美国华裔电影中的情动景观 林 萌,徐若寒(78)

《彩云追月》的创作特征与演奏诠释研究

——基于民族音乐元素的钢琴化重构 刘 玥(84)

· 教育与教学 ·

思政课教师践行立德树人思想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 谭笑风(91)

基于“四全培育”框架的高校教师协同育人能力提升整合路径研究 罗亚莉(96)

融媒体时代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创新路径研究 韩燕飞(102)

基于新标准的逆向工程与 3D 打印实践教学改革探析 王凤梅,邬向伟,赵佳旭,李鹏飞,孙 瑞(107)

黄河流域古代军事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价值与路径研究

——以古代郑国军事文化为例 罗 强(114)

· 数理工程技术研究 ·

等离子体银纳米材料的合成及光电化学性能研究 张文敏,刘子玥,张 琳,张栋玺,孙亚豪(118)

基于深度学习的郑州地区降水预测分析 李兴业,李顶顶,刘 松,李沂衡(124)

JOURNAL OF ZHONGZHOU UNIVERSITY

Bimonthly Vol. 42 No. 6 2025 (Serial No. 185)

MAIN CONTENTS

The Text, Re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Zheng Yanying’s *The Sun* LI Yongjun(1)

A Historical Picture of Modern Chinese Society: A Commentary on *The Complete Works of Ye Shengtao’s Diaries* JIN Xinxin(8)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Association Network of Urban All-Dimension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SUN Luyun, ZHOU Benda(19)

Mechanism, Dilemmas and Paths of Digital-Intelligent Empowerment in Regular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for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HUANG Zhiguo, WANG Xueke(36)

On the Review Standards and Procedural Paths of the Right of Habitation against Compulsory Execution LI Gang, ZHANG Cong(45)

Memb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Xinjiang and Women’s Emancipation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JIA Xiuhui(59)

A Study on the Work of Public Security Work in the Jiaodong Anti-Japanese Base Area LIU Zhipeng, ZHANG Hongxin(66)

Flowing, Hybridity and Empathy: The Affect Spectacle of Chinese-American Films in Recent Years LIN Meng, XU Ruohan(78)

The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for Teacher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Implementing the Principle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TAN Xiaofeng(91)

Integrating the Four-Comprehensive Cultivation Framework to Enhanc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al Competence Among University Faculty LUO Yali(96)

Study on Synthesis and Photoelectrochemical Properties of Plasmonic Silver Nanostructures ZHANG Wenmin, LIU Ziyue, ZHANG Lin, ZHANG Dongxi, SUN Yahao(118)

《中州大学学报》2025 年总目次

· 文艺学与文学评论 ·

周大新《香魂女》的改编与传播	李勇军(1-1)
“匪祸”的创伤性记忆书写	
——对徐玉诺文学特质的解读	潘 磊(1-7)
中国当代阐释学之于生产性批评理论建构的意义	刘芳兵(1-13)
亲子关系与儿童成长的深度思考	
——论孙惠芬的儿童小说《多年以后》	郝 璐(1-19)
李佩甫《败节草》的文本、版本与“跨文本”传播	李勇军(2-1)
通往精神高地	
——墨白《通往青藏高原的道路》研讨会纪要	刘宏志,马 骧(2-8)
“他者”的旅行	
——凌叔华《古韵》跨文化书写中的性别叙事	刘一昕(2-14)
刘震云《塔铺》的文本、版本与影视剧改编	李勇军(3-1)
《芸斋小说》中的诗学及文化政治	程 燕(3-7)
朱光潜融会中西的现代翻译美学思想及其影响	房凯歌(3-12)
论金圣叹的欧阳修词批评	
——兼及陈廷焯对金圣叹词评的批评	刘 芳(3-17)
乔典运《满票》的转载、改编与传播	李勇军(4-1)
生态叙事、地方经验与女性书写	
——论青青的散文写作	朱鹏杰,肖瑞雪(4-6)
域外共鸣:论《北征》在古代朝鲜诗论中的诠释维度	赵与栋(4-12)
田中禾《五月》的文本、转载与传播	李勇军(5-1)
不一样的“他者”	
——论康拉德小说中的“他者”形象	李文军,苏 磊(5-6)
郑彦英《太阳》的文本、转载与传播	李勇军(6-1)
一幅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画卷	
——读《叶圣陶日记全集》	金欣欣(6-8)
赋的气象,论的肌理:《过秦论》的“破体”美学	张博均(6-14)

· 经济与管理 ·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结构评价体系研究	王 艳(1-24)
河南省数字乡村建设的现实约束与突破路径	李 敬(1-30)
乡村振兴视角下我国农村绿色物流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高 博,谢震宇,张亚茹(1-37)
数据技术应用、知识流动与企业知识产权产出	任丙超,杜思源(2-20)
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及区域差异	金亚亚(2-29)
数字经济发展与省域绿色创新:赋能还是削弱	郭子煜(2-39)
基于多方法耦合的“五维协同”人才吸引力评价模型构建	杨建坡,康旋子(3-22)
农民职业分化、经营规模与农业生态效率	
——基于县域数据的 Tobit 回归分析	李庆利,陈中伟(3-30)

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测度及区域差异分析	陶 鹤,朱万里(3-37)
新质生产力与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度融合	陈柳钦(4-18)
从“赛博空间”到“元宇宙”:河南非遗数字化保护路径探析与反思	刘鹏昱(4-27)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张彩虹(4-35)
人工智能在经济管理领域的应用与前景展望	武 蕴(4-40)
城市发展与生态平衡	
——郑州东区鸟类多样性现状及栖息地保护策略	李长看,赵浩辰(5-12)
基于超效率 DEA 模型的绿色经济发展效率评价	李许卡,祝月明,苗 领(5-18)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财富分配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周 迪(5-23)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与经验证据	王海霞(5-29)
长三角地区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空间关联网络研究	孙鲁云,周本达(6-19)
新发展格局下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問題与对策	王中亚(6-30)

· 政治与法律 ·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多维探赜	钱燕娜(1-42)
脱敏数据侵权的法律救济规则选择	
——以“卡—梅框架”为分析视角	王雯灏(1-51)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中医药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指向	张 忠,陈第华(2-47)
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二个答案”的逻辑基础和实践路径	张书霞(2-53)
行政处罚视域下重复越级信访行为的法律适用	
——(2020)浙 03 行终 467 号判决评析	边品三(2-59)
新时代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的现实意义及路径	王 凤(3-43)
算法价格歧视反垄断法规制因应	师煜淋(3-48)
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生成逻辑、知识建构与实践转换	
——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中心的分析	陈华森(4-45)
人工智能治理的比较法简析	栗 鑫(4-55)
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的基因根脉、演进历程及当代回响	李开庆,林少婷,陈珍萍(5-38)
备案审查中比例原则适用问题研究	王潇阳(5-45)
数智能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常态化宣传教育的机理、困境与实践路径	黄治国,王雪可(6-36)
论居住权对抗强制执行的审查标准与程序路径	李 刚,张 聪(6-45)
社会本位理念下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优化研究	王建权(6-54)

· 社会与历史 ·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人民观的展开逻辑及现实启示	张 文,陈旭辉(1-57)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对化解历史虚无主义的借鉴	陈元明(1-64)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规则的历史演进与启示	江 虹(1-71)
严肃、严明、严格:红军长征途中的纪律教育	丁俊萍,李秉鸿(2-66)
红色文化视域下的河南与长征	韩洪泉(2-72)
论红军长征中的医疗卫生保障工作思想	
——以《红星》报为核心资料的考察	裴恒涛(3-55)
毛泽东在长征中领导地位确立的历史必然、应然和实然	
——以红军将士为中心的考察	胡安徽,张 可(3-62)

战役下的战“疫”

——论解放大西南时期的疟疾疫情应对	温金童,孟柏辰(4-60)
中央苏区时期党对医务人员政治认同的建构及其成效探析	曾芳莲,曾新华(4-66)
“邕钦”“廉玉”盐道史迹与风俗探微	庞广仪,陆一萍(4-72)
新中国成立前宁夏党组织建设:工作历程、核心策略与当代启示	张玉梅(5-52)
非正式权力正式运作:民间传统文化复建的生产动员	

——以安徽合肥 T 氏宗谱编修过程为例	陈 继(5-58)
小三线建设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以上海八五钢厂为例	李 云,朱孟远(5-66)
抗战时期新疆的共产党人与女性解放述论	贾秀慧(6-59)
胶东抗日根据地公安机关工作探究	刘志鹏,张红鑫(6-66)
家国情怀:抗战诗歌中的黄河书写	李晶柯,吴朋飞(6-72)

· 传媒与艺术 ·

新时代以来电视剧中妇女主任形象的呈现形态与建构策略	梁园园,金守波(1-76)
本土实践、叙事快感与文化症候	

——论近期国产悬疑影视中的孤勇者形象	董 鑫(1-83)
新时代粤剧“出海”新路径探索	李永秀(2-80)
论国产犯罪电影中的“东南亚”空间	黄诗娴,周佳佳(2-89)
基于耗散结构论的文化折扣价值特征与结构要素分析	陈文泰,王丹妮(3-69)
论社交媒体平台中网络道德教育分众化的算法干预效应	张怀重(3-74)
儿童绘本数字化出版中的情感体验层次构建	

——以 ARpedia 数字绘本为例	刘岩妍,刘艺璇,袁 毅(4-80)
新媒体时代提升黄河文化精神与价值引领力路径探讨	陈春梅(4-85)
《黑神话:悟空》的跨文化传播探赜	王起扬,潘钰霖,孔 瑞(5-72)
黄河文化在短视频领域的传播策略研究	许 萌(5-78)
流动·混杂·共情:近年来美国华裔电影中的情动景观	林 萌,徐若寒(6-78)
《彩云追月》的创作特征与演奏诠释研究	
——基于民族音乐元素的钢琴化重构	刘 玥(6-84)

· 教育与教学 ·

“两个结合”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探究

——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为例	张 培(1-89)
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大思政课”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进路	王 鹏(1-95)
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教育的路径研究	宋晓霞,吴冠磊(1-99)
新时代高校“大思政”育人体系探析	何艳冰(1-104)
跨学科协同育人模式在课程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李丽华,马 媛(1-109)
“大思政课”视域下应用经济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	惠 孟(2-96)
黄河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	程典子,罗会宇(2-102)
基于知识图谱的 Python 数据分析课程改革实践	刘秋菊,王仲英,黄继海(2-106)
“专创融合”理念下 Python 程序设计课程教学改革路径探索	杨颖辉,段明雪,姚明宇(2-112)
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的四维向度	杨 丽(3-80)
高职跨境电商国际化人才“四位一体”培养模式研究	任方军,侯若旭,杨可冰,贺蓓蓓(3-85)
人工智能提升高职院校足球课堂学生参与度的策略研究	张 帅(3-91)

以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高校美术设计教育的探索	张 鹏(3-100)
AI 赋能的智慧课程在化工类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中的实践与探索	秦肖雲,赵建波,贾春晓,谢 冰,王焕新,李玉玲(3-106)
高校思政教改双螺旋式模式的创新与实践探析	王苏琪(4-91)
焦裕禄精神融入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意蕴与机制构建	武香俊(4-97)
研究性教学与课程思政“同向而行”的教学路径探索	聂亚昕,胡贵新,白慧云(4-103)
——以“随机过程”课程为例	聂亚昕,胡贵新,白慧云(4-103)
新工科背景下新形态教材建设研究	杨庆年,王永伟,张彩霞(4-108)
——以“基础工程”课程为例	杨庆年,王永伟,张彩霞(4-108)
研究生波谱分析课程的现代教学实践策略	郑 昕,时梦红,秦洁琼,韩丹丹,李玉玲,徐翠莲(4-113)
试论经典学术文的教育策略	杨道麟,徐昌才(5-83)
新工科背景下高校数学建模教学中课程思政的挖掘与应用	庞进丽,徐自立,李文龙(5-92)
成长母题叙事电影在大学生思政教育中的价值与应用	王安然(5-98)
大学化学课程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究	王焕锋,李玉玲,王利平,李晓静,赵建波(5-104)
“岗课赛证”融通背景下商务英语专业育人模式研究现状与热点分析	刘 改(5-109)
——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	刘 改(5-109)
思政课教师践行立德树人思想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	谭笑风(6-91)
基于“四全培育”框架的高校教师协同育人能力提升整合路径研究	罗亚莉(6-96)
融媒体时代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创新路径研究	韩燕飞(6-102)
基于新标准的逆向工程与 3D 打印实践教学改革探析	王凤梅,郭向伟,赵佳旭,李鹏飞,孙 瑞(6-107)
黄河流域古代军事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价值与路径研究	罗 强(6-114)
——以古代郑国军事文化为例	罗 强(6-114)

· 数理工程技术研究 ·

三角实对称矩阵与 Pascal 三角形的关联性及谱性质分析	王励冰,豆铨煜(1-114)
某桥梁病害检测与加固设计	祝红丹,王永伟,刘成才(1-119)
地下水位上升对建筑安全使用的影响 ——以郑州市区域为例	赵 亮,殷顺达,孙广欣(1-123)
隧道注浆介子掺和料改良机理及防渗性能研究	郝文彬(2-118)
柠檬酸三甲酯绿色增塑剂的合成与性能研究	钟 俐,韦尚华,姚 宁,于淑萍,王 勇(2-124)
紫薯山药酒发酵工艺优化及品质分析	冯 冲,刘亚旭,龙佳慧,范伟林,吴祖宇,王照涵(3-113)
异斯特维醇衍生物抗肝癌活性的研究进展	刘从军,承岩岩,陈旭珂,郭玲燕,陈 涵(3-117)
铝空气电池液态电解质研究进展	宋 微(3-122)
条件随机场的特征函数产生机制及量化研究	于江德,黄继海,刘秋菊(4-118)
基于尖点突变理论的矿柱失稳预测研究	赵雯雯,龚 剑,焦华喆,杨柳华(4-124)
酰亚胺型 COFs 的合成及其对阳离子染料吸附性能探究	张 琳,李玉玲,赵晓坤,李 瑶,穆鹏飞(5-117)
原位法制备 PW ₁₂ -SBA-15 催化合成尼泊金丁酯	王少鹏(5-124)
等离子体银纳米材料的合成及光电化学性能研究	张文敏,刘子玥,张 琳,张栋奎,孙亚豪(6-118)
基于深度学习的郑州地区降水预测分析	李兴业,李顶顶,刘 松,李沂衡(6-124)

郑彦英《太阳》的文本、转载与传播

李勇军

(郑州大学出版社,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郑彦英是“中原作家群”中的一位重要小说家。中篇小说《太阳》发表时,他还是一位青年作家。《太阳》最早刊发在《萌芽》1984年第3期,随后被《中篇小说选刊》1984年第4期转载。其最早的单行本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编入《文学作品活页文选》,于1984年7月出版。1988年6月,小说集《太阳》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系“萌芽丛书”之一种。根据《太阳》改编的电影《秦川情》1985年在全国公映,引起广泛关注;同年,根据这部作品改编的淮剧《奇婚记》亦大获成功,创造了“奇”迹。每一次改编,其实既是对原作的演绎和阐释,也理应是“二度创作”和升华。

关键词:郑彦英;《太阳》;改编;《秦川情》;《奇婚记》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6.001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6-0001-07

郑彦英是一位“多栖”作家,他出版有长篇小说《从呼吸到呻吟》《拂尘》等九部、作品集《太阳》《在河之南》等十二部,被搬上银幕的电影剧本有《秦川情》等三部,被搬上荧屏的电视连续剧有《石瀑布》《彭雪枫将军》等六部。散文集《风行水上》曾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而他最重要的创作成就还是在小说领域。本文仅就中篇小说《太阳》的发表、转载与改编的脉络,来探讨郑彦英小说的文学内涵、艺术特色及其本身所具有的“多义性”。

一、初刊本

郑彦英的中篇小说《太阳》发表在《萌芽》杂志1984年第3期。

小说的故事背景是陕西省泾河岸边。这是一个午后,葫芦湾村传出惊人的消息:桩桩喝农药了!到底啥原因?“还不是年轻的媳妇容不下他!”于是淳朴的村民们不约而同地赶来,让桩桩惩罚准备私奔的榆钱儿和大喜……

榆钱儿是个身世坎坷的女孩,几年前(后来在电影《秦川情》中确定为“1976年”),她从河南老家随父亲一路逃荒到关中,父亲不幸身染重病奄奄一

息,恰遇上四十多岁的光棍庄稼汉桩桩……桩桩帮着安葬了榆钱儿的父亲,并答应将她收留下来,但是队长表示只能以桩桩媳妇的身份才能落户,等她长到十八岁再圆房。随着农村政策的变化,村民们的日子开始好起来。守寡多年的二嫂给儿子结婚摆下酒席,喝多了酒的桩桩晚上回家强行要与榆钱儿“圆房”,榆钱儿在反抗中扭伤了脚,这让桩桩悔恨不已。村里的大喜是一名高中生,在他的提议下,二嫂、金凤、桩桩几家一起承包了水塘养鱼。榆钱儿已经十八岁,她的思想却在发生着变化,她越来越感到自己与桩桩是父女般的感情,她与大喜相爱了。两人决意出走,但走到塬上,念起当年桩桩的救命之恩,她又回到家中。桩桩经过痛苦的选择,决定喝农药自杀来成全他们……桩桩终于被抢救了过来,他以长辈的身份认可了一对年轻人的婚姻,同时也收获了二嫂的爱情。

《太阳》发在当期刊物的头题,配有施大畏的四幅插图;当期还配发了朱小如的评论文章《情者文之经》,作者认为,小说中所反映的农村生活虽然时间跨度不大,但高度集中地体现了我国农村那几年发生的深刻变化:昔日的农村——那一度“被爱情

收稿日期:2025-10-06

作者简介:李勇军(1970—),男,河南兰考人,郑州大学出版社人文分社社长、编审,研究方向:新时期文学版本、期刊史等。

遗忘的角落”，随着物质文明的不断发展，相应地、普遍地引起了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对精神文明的渴望。然而，我们又无法回避这样一个现实：今天的生活毕竟是过去生活的延续，新的和旧的，发展的和遗留的，仍然会产生一系列的矛盾冲突。但是，其祸端却并不在于今天的新的的发展，而在于旧的灾难的遗留。该文还重点强调了小说贯穿始终的“情”字：

以“情”感人这是篇小说艺术魅力的闪光点。当然，这是与作者敢于和注重写“情”，写符合本民族特点的质朴的农民的喜怒哀乐之情，写各种不悖天理的人之常情因素在人物思想感情深处的互相交织、反复纠葛、矛盾冲突之情，写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并能体现一定的社会内容、时代意义的真善美的感情分不开的。^[1]

众所周知，《萌芽》是以培养青年作家、服务青年读者而闻名全国的一份文学刊物。其时，31岁的“青年作家”郑彦英已是《萌芽》杂志的“老作者”，他发表在该刊1983年第10期的《秦川雨》还获得该刊1983年度“文学创作荣誉奖”。该年度共有5部小说获此奖项，其中竟有两篇（《那山 那人 那狗》《船过青浪滩》）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可见“《萌芽》奖”在当时的影响力。《萌芽》1984年第4期刊出了郑彦英等十位获奖作者的照片及简历，并配发刘锡诚的评论《深入事物的灵魂——一九八三年〈萌芽〉优秀小说概评》。



图1 《太阳》首发于《萌芽》1984年第3期

二、转载本

据作家郑彦英讲，巧合的是，他在黄山参加上述奖项的颁奖活动期间，得到了《中篇小说选刊》拟转载《太阳》的消息。随后该刊1984年第4期（出版时间：7月14日）转载了《太阳》。文后附有“作者简介”：

郑彦英，男，陕西省礼泉县人，1953年

6月出生，1972年高中毕业，1973年参军，曾任广州军区空军政治部创作组创作员。1983年转业后到河南省委《党的生活》编辑部任编辑。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河南分会。发表的主要作品有：《秦川雨》《二八月，云飘飘》《和风丽日里的大火》《皂角树下三家人》等，《秦川雨》获《萌芽》1983年度文学创作荣誉奖。^[2]

虽然字数不多，但信息量较大。再对比一下《萌芽》1984年第4期的“作者简介”：

郑彦英，31岁。河南省委《党的生活》杂志编辑。72年中学毕业。次年入伍，81年转业。75年开始文学创作，83年起在《萌芽》发表作品。^[3]

《中篇小说选刊》有个惯例：在转载作品时要请作者就作品本身写一篇文章，郑彦英这篇谈“体会”的文章题为《关于〈太阳〉给编辑部的信》。作者说，他是读了日本作家横光利一的中篇小说《太阳》之后有所触动：难道人对太阳就应该占有吗？由此，他对“中国农民的伟大的奉献精神”有了一次深刻的反思：“我的面前出现了很多淳朴、无私的农民的形象，他们的永恒的奉献精神，可以与永恒的太阳相媲美！”思想有了，人物有了，他便开始苦苦地寻找着“更好的表现形式”。

就在这时，我们省话剧团的李静谷、郭怡同志看了我的短篇小说《秦川雨》，想将它搬上话剧舞台，就将小说读给她们的老导演听，这位令人尊敬的老导演听了以后，半晌无语，最后吐出了一个字：“美！”少顷，又说：“听了这个小说，我想起我的老家，一个老头娶了一个还不懂事的女娃，等这个女娃长大了，懂事了，却与一个青年恋爱了，最后双双出走，丢下老头一人在家，老头悲情难忍，没过几天就蹬腿死了。”李、郭两位同志便将这个故事讲给我听，这个悲剧性的故事深深地震撼了我。很快，我的脑海里跳出一个念头，何不让我的几个人物走进这个故事，改变这个故事，进而在这个故事中表现我的人物及他们的思想呢？

此后，我寝食不安了，桩桩、榆钱儿、大喜、金凤、二嫂等人物不断地在我的眼前活动，用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意志在指导着他们的行动。经过十多天的反复思考，一个较完整的构思在我胸中形成了。一旦形成，他们就在心中拱着我，要我立即写出

来,我感到不是我在表现这几个人物,而是这几个人物在强烈地要求我把他们的思想及行为记录下来。于是,原来的一些设想在写的过程中改变了,这是作品中的人物及作品所表现的时代要求我改变的,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4]230}

这就是一位小说家真实的创作心路,它让我们真切地领会到“艺术高于生活”,“面粉”是如何变成“面包”的。

郑彦英讲,他最喜欢小说中的两个人物,一个是“在有些人看来,可能还有些窝囊”的桩桩,另一个就是榆钱儿。“从感情上讲,我真想让这两个可爱的农民相结合,可现实生活与发展着的时代又明确地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4]231}



图2 《太阳》被《中篇小说选刊》1984年第4期转载

三、单行本、文集中本

中篇小说《太阳》最早的单行本,是作为“《文学作品活页文选》第2期”,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于1984年7月出版的。该“活页文选”基本上是“白皮书”的形式,体量很小,32开本,大多只有薄薄的几十页,但品种较多,当年就出版了十几种,包括《祖母绿》《法官落网记》等。

这套“活页文选”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封面有醒目的阅读提示。《太阳》的封面上是几行这样的文字:

谁要把《太阳》看作是写三角恋爱的,那就错了。作者所提出的人生课题是十分严肃的,它有待你去思考、去排解……愿你带着同情、关注和悬念,走向“太阳”!^[5]

1988年6月,郑彦英的同名小说集《太阳》作为“萌芽丛书”之一种,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该集收入《太阳》《月亮》《合欢峰》《伏牛山上的柳絮儿》四篇作品,并附作者的一篇《跋》。

“萌芽丛书”当年在全国读者——特别是青年

读者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后来成为该刊主编的著名作家赵长天曾撰文回忆,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外延形象》就是作为“萌芽丛书”出版的。这里有必要对该丛书做一次回顾:

1979年起,“萌芽丛书”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恢复出版,第一批推出五种,即中篇小说《春鸣》(晓明,1979年9月)和短篇小说集《羊城一夜》(陈国凯,1979年11月)、《山地笔记》(贾平凹,1980年1月)、《无花果》(叶文玲,1980年2月)以及长篇小说《梨园谱》(吴因易,1980年2月)。

其实,该社(当时还叫新文艺出版社)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与《萌芽》杂志社合作出版过丛书(当时标注的是“萌芽小丛书”),如:《花蕾集》(诗歌第一辑,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3月);“萌芽小丛书”更早的还有《星期日的上午》(戏剧曲艺第一辑,上海文化出版社,1956年12月)、《一只停表》(戏剧曲艺第二辑,上海文化出版社,1957年2月)等。

另外,1965年前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还出版过“萌芽丛书”数种,如《彩色的田野》《高高的山上》《前站》《蓝天展新翅》等。

1982年起,“为适应八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一代文学新军的崛起”^[6],《萌芽》杂志社除继续与上海文艺出版社合作出版该丛书之外,又与重庆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进行合作。其中,重庆出版社第一批推出的是长篇小说《非生理性癌扩散》(王亚平)、散文集《热土》(王英琦)和诗集《珊瑚》(赵丽宏)。

但是,仅短短数年间,新时期文学就经历了出版业市场化、纯文学“边缘化”等严峻考验:1980年初,该丛书的《山地笔记》首印10万册;到1988年6月《太阳》出版时,首印已降至不足2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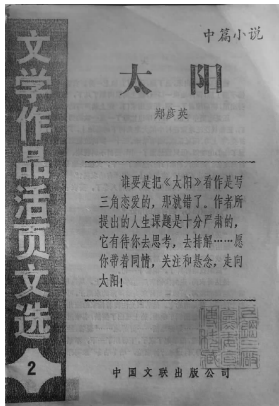


图3 《太阳》单行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7月版



图4 《太阳》文集中本,重庆出版社1988年6月版

四、被改编为电影《秦川情》

根据小说《太阳》改编的电影《秦川情》于1985

年在全国上映。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这部电影在当时颇受瞩目：该片导演黄祖模此前因执导《庐山恋》蜚声海内外；而就在这一年，主演吕晓禾凭借《高山下的花环》（饰梁三喜）获得第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和第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奖。

电影《秦川情》无论是主要情节还是叙事结构，基本上都还是忠实于小说原作（作家郑彦英本人担任编剧），包括采用倒叙的手法：开头也从桩桩买了一瓶农药，想以死来成全榆钱儿与大喜的恋情，淳朴的乡亲们群情激愤地放火烧秸秆垛，并把两个年轻人“押”到桩桩面前让他发落这一情节“入戏”。影片的结尾也是接续了上述情节，做到“首尾呼应”。

电影改编的过程总是在力求“源于小说，高于小说”——不论是做“加法”还是做“减法”。

我们看到，电影文学剧本对小说进行了必要的加工和修改。比如，桩桩在酒后，感情冲动地强行要与榆钱儿“圆房”，榆钱儿躲避时脚踝扭伤；可是不久之后，当他背着榆钱儿过河时，小说中写道：“当她的柔软的身子一贴上他的背，他浑身忽地一热，脚也不稳了……”类似的描写在小说中还有四五处。这种心理描写在改编过程中都被删去了。

同时，电影拍摄也没有完全遵从于电影文学剧本。

小说中有几处描写大喜与榆钱儿的两性吸引，比如：“大喜下意识地伸了一下舌头，又在那好看的脸蛋儿上瞄了一眼。她那黑黑的长发未及扎好，湿湿地拢在一起，从左肩垂向胸前。”在电影文学剧本中，也有这样的场面描写：

榆钱儿回身锄地。桩桩看着她的背影。她那被汗水湿透的衣服，勾出了成熟的少女的曲线，一根乌溜溜的大辫子垂在背上。

桩桩发呆的眼睛。

榆钱儿一回头，下意识地吧贴在胸前的汗衫往下扯了扯。^[7]

上述这些内容，在电影拍摄过程中又被删去。同时，却增加了榆钱儿和大喜一起学习和生活中自然产生爱情的情节内容，这样为后面的感情发展做了有层次的铺垫。

榆钱儿对桩桩也有过“以身报答”的想法，甚至在她决定与大喜私奔之后。“你若再有那天酒后的胆量，我今晚会上依从你，作为对你的报答，然后再离开你，心里也就安稳一些了。”在电影中则被拍成这样的画面：被窝里榆钱儿的脚无意中碰到了桩桩的手，桩

桩的手迅速避开，榆钱儿的脚稍停了一下，才慢慢缩回……其中既有感情的升华，也表现了人性之美。

“耍社火”是关中地区十分隆重的民间盛会：“哪吒闹海”“天女散花”“天仙配”“白蛇传”……表现这样的场景，相较于小说语言，电影画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电影《秦川情》中，这样的场面则主要服务于表现人物的情感和内心世界：在观看“社火”时，因听到对“老夫少妻”的议论（一老汉说：“是不是你爹在叫你？”另一人回答：“这老汉胡咧咧啥？人家眼看就是两口子啦！”），榆钱儿的窘迫、桩桩的怅然、大喜的激愤……那剪不断、理还乱的内在情绪，在这特定的场景中充分展现在观众面前。

相较于小说原作，电影中多处出现“眉户”“眉户曲”，如：

新房里笑语阵阵，有人唱眉户曲子——“河北有个女啊女娃子，梳着一根大辫子，下了花轿没影子，媒人揭开花被子……”这是在二怪的新婚之夜；桩桩回到家，“春风又送来隐隐的眉户曲声”“大喜背着渔具，由土塬下坡，唱着眉户曲——‘泾河水九十三道湾，清水粼粼流得欢，鸳鸯塬上红花开得艳，有一朵开在我心间……’”

眉户戏，是陕西省的主要戏曲剧种之一。现代眉户在关中分东、西两路。东路眉户盛行于华阴市和华县，民间流传有“同州的梆子合阳的线，二华的眉户天下传”的说法；西路眉户最早盛行于眉县、户县（今西安市鄠邑区）。其曲调委婉动听，又称“眉鄂”或“迷糊”。眉户也流行于河南西部、甘肃等地，尤其是晋南一带。2010年，由山西省临汾市申报的“晋南眉户”还入选了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电影改编如何在小说原作的基础上“做加法”？仅举两例：

（一）树上，喜鹊欢叫着。大喜教榆钱儿写字。榆钱儿擦掉“喜”字下半部，剩下“十”字，灵机一动，顺笔把它写成“大”字，小黑板上写有“大喜”二字……

（二）“七月七”这天，草庵里，大喜思念着榆钱儿，画报上是一幅带有户县特色的农民画：喜鹊在银河上架桥，牛郎织女正在相会。村口，灯光下七个姑娘围着方桌在唱“七巧歌”——“七月七，七巧来，棉花疙瘩送宝来，巧姑娘，你下来，瓜桃梨枣等你来。”

院里，榆钱儿在抚弄七巧芽（豌豆加水培育而成）。桩桩让她端出去给大家看看（谁的最好就被称为“巧姑娘”），她说：

“这是姑娘们的事,我……”将盆放在原处,对着墙角,垂头不语。

至此,大喜与榆钱儿这一对恋人的心思表达得淋漓尽致。上述两个情节,都是在小说基础上的“二度创作”。

其他如“长命和金凤丈夫在下土方”“村里老少则收工或放学回来”“狗伸头狂吠”“鸡惊飞”“榆钱儿的照片,镜片粉碎在地”“几只鸡在啄剩饭”等,都是基于“电影语言”而增加的细节或画面。

还有一处明显的修改:“老头背着老太太,跌跌撞撞赶得忙”——小说中是大喜在唱,电影中却是二怪在唱,这样处理更符合人物的性格和身份。

无论是“社火”还是“眉户”“七巧芽”这些鲜明的地域特色文化元素,导演黄祖模都有着自己的理解:要让广大农民观众,尤其是陕西关中农民承认“就是俺这地方的人和事”(导演阐述)。

最后要补充说明的是这部电影的片名也有一个“改编”的过程:《电影新作》1985年第1期首次发表、被《电影选刊》1985年第4期转载的电影文学剧本,题目均为《太阳》;《时代电影》1985年第8期的介绍文章、《上影画报》1985年第9期的相关介绍(剧情、彩色剧照),仍然是《太阳》,但在公映时却改为《秦川情》。该剧本的单行本1986年12月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时,也名为《秦川情》——其时已是电影公开上映之后。



图5 电影文学剧本《太阳》,《电影新作》1985年第1期 图6 电影文学剧本《秦川情》,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五、淮剧《奇婚记》大获成功

正如河南地方戏除豫剧之外还有曲剧、越调、宛梆等剧种一样,江苏地方戏除昆曲之外还有锡剧、扬剧、淮剧等。

淮剧,又名江淮戏、淮戏等,发源于今淮安市以及盐城市里下河一带,也曾名为“江北戏”。

《太阳》的作者郑彦英出生在“八百里秦川”,却

长期工作、生活在中原大地,是“中原作家群”中的一位重要小说家。小说《太阳》以泾河岸边为背景,它被改编为淮剧《奇婚记》却大获成功,这本身就是个“奇”迹。

1984年底,在上海举行的全国第三届戏曲现代戏年会上,江苏省淮剧团的《奇婚记》首次面向全国观众演出。1985年11月,这部淮剧现代戏又极其难得地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戏曲观摩演出,此次观摩演出全国仅有十三个剧种的十四个剧目入选,其中现代戏只有两台(另一台是中国评剧院的《高山下的花环》)。更为难得的是,《奇婚记》一举夺得多个奖项:演出奖(大戏一等奖)、剧本奖(大戏一等奖)、导演奖(大戏二等奖)、音乐设计奖(大戏一等奖)、乐队伴奏奖(大戏奖)、舞美设计奖(大戏一等奖)、绘景奖等;在表演奖中,男女主角均获主演一等奖,另有两位演员获得配演一等奖……从此,该剧成为江苏省淮剧团当之无愧的保留剧目。

此次改编注定是一次难度极大的“移植”、一次创造性的“二度创作”。改编者首先将主题确定为:通过“不是夫妻的夫妻”秋萍和大憨在爱情上的纠葛,以及矛盾的最终解决,形象地反映社会生活深处发生的急剧变革,生动地展现人们心灵深处出现的崭新气象。

该剧演出节目单上的“剧情简介”是这样的:

大千世界多变幻,一年奇事出海滨。一个十二岁的姑娘,竟托婚给一个近四十岁的老光棍。同室八年,这一对“夫妻”竟无半点夫妻之情;年轻的“儿媳”竟与本家“侄儿”谈情说爱,誓结生死同心……这桩桩件件,皆非有谁故意猎奇,畸形的年头,奇事不断;崭新的年代,当奇闻流传。此中酸甜苦辣,道它奇也不奇……^[8]

人名、地名的改编体现出人物形象和地域特色的需求。淮剧《奇婚记》的故事发生地是苏北海滨一个叫田家湾的小村。全剧分为“承照应 日久情愈重”“盼同心 心声难相通”“惊噩梦 苦情诉与谁”“察相知 爱深眼亦深”“拆鹊桥 银河泛波涛”“忆旧情 去留两断魂”六场,前有“序幕”,后有“尾声”。这里为了叙述方便,我们且将改编前、改编后的主要人物列表如下:

桩桩——田大憨;
榆钱儿——秋萍;
大喜——田雨春;
二怪——二楞;
二嫂——二婶。

除了故事发生背景的“时空变化”之外,剧作者还从结构上做了较大调整:一是拉大了时间跨度,故事开始于“文革”中期,但它仅作为“序幕”,从第一幕开始就是“八年后”;秋萍的年龄为12至20岁,田大憨的年龄是38岁至46岁。二是所有的重要情节均集中在“八年后”加以描绘和表现,而不像小说中寒来暑往的故事推进。借鉴传统戏曲的常见手法,该剧设计了一个重要的道具——银锁片,秋萍的父亲(瞎爹)临死前托付女儿:今天就请这位大叔(指老田埂)为媒,这银锁片为证……到结局,则是“大憨将银锁片挂于雨春颈上”。

“老田埂”这个重要的配角,改编自小说中的老队长,但也是改动最大的一个人物。这种改动来自剧作者对当地生活和社会现实的理解:在剧中,他虽然不再是村干部,但还有一个更厉害的角色——老族长,他是宗法势力的代表、旧势力的坚定维护者。第一场,当他听到田雨春喊“秋萍”的名字时,当场教训道:“这名字是你叫的吗?”“当你憨叔的面,向你憨婶赔个礼。”春兰刚要帮着辩解,他马上训斥:“小春兰,到城里学了几天裁缝,就不晓得天高地厚啦。连尊卑长幼都不分了,还了得!”当雨春、秋萍的恋情被公开时,他呼天抢地:“唉,天哪,天哪。我作了什么孽啦!真把祖宗八代的脸都丢光啦!”(小说中的队长是个正直、善良的角色,是桩桩没出五服的三伯,六十一岁了,“文革”开始他被革了职,但这两年造反派管得松了,乡亲们仍把他当队长,什么都听他的。)

田大憨、秋萍之间复杂而微妙的感情,在不同的场次得以充分展开。

第一场,田大憨下地干活回来,秋萍打水让他洗洗:“快洗吧,这里有肥皂。(帮大憨擦身子)鼻子上,耳膛根,背脊后……”活泼,开朗,甚至有些顽皮。这一切二嫂都看在眼里,她送来一碗饺子,心里惦记的是大憨,但是大憨舍不得吃,他与秋萍你谦我让,最后各人一半,大憨又借口要酱油,趁机又从碗里拨拉几个饺子给秋萍。剧作者新加的这些富有生活气息的细节,将两个女人与一个男人之间微妙的感情在舞台上生动地表现出来。二嫂对大憨的感情是真正的“知冷知热”:“大憨胃里有毛病,一吃山芋就要疼”“热身子,凉水洗了会生病”——如果说秋萍与大憨之间更像父女情的话,那么二嫂与大憨才真正般配、知心。

第二场,由雨春牵头,几家人一起承包鱼塘养鱼,在雨春的启发下,秋萍希望多学些知识。这天大憨高高兴兴地赶集回来,给秋萍买了几件新衣服,“春秋衫紫色小花粉底,夏装买的涤确丝……”当

秋萍问道,让他买的书呢?他掏出来的却是一本小人书《猪八戒吃西瓜》(让人不由得联想到杨白劳与喜儿父女的场景)。

第三场,喝醉酒的大憨要强行与她“圆房”,秋萍情急之下,甩手打了对方一个嘴巴,然后是戏曲程式化的表演,拊掌、托掌、抖掌……似乎在问自己:我怎么打人了?但也深刻揭示出秋萍的内心:她潜意识里一直把大憨视作父辈!

这一情节是全剧的转折,“夫不夫妻不妻四行泪水各自垂”,大憨内心深处的善良与厚道仿佛一下子被激发出来,“怀中掏出银锁片,物归原主你收回”。剧中的春兰(二嫂的儿媳)在小说里是连正式姓名都没有的人物,剧中却成为两代人情感发展的关键人物,一方面她鼓励与她基本属同代人的秋萍和雨春大胆追求真正的爱情:“上一代人的悲剧,你们还想重演吗?”另一方面又大胆点破二嫂隐藏二十多年的真情:“有情不敢脸上露,有话不敢冲出口。当着人面装笑脸,背着人处悲泪流。”时代在变,上一代人也要找回自己曾经的“青梅竹马”。

淮剧《奇婚记》通过两条感情线索,展现出的是人情美、人性美。这一点与电影《秦川情》有相似之处:始终贯穿一个“情”字,同情之心、感恩之情、爱慕之情,在不同的人物关系中得以充分展现。



图7 淮剧《奇婚记》演出
节目单,1985年11月



图8 电影剧情介绍,《上影画报》
1985年第9期(当时仍名为《太阳》)

六、余论

从现有资料来看,电影《秦川情》与淮剧《奇婚记》各自独立完成,不存在交叉或相互借鉴。其实这也是另一种遗憾。

虽然“最电影化的东西和最小说化的东西……是不可能彼此转换的”^[9],但是每次改编从理论上而言,“在思想性、艺术性上都有一定的提高”^[10]。

电影《秦川情》的结尾,没有明写二嫂与桩桩的“大团圆”,而是采用了一种更加开放的表现形式:

墩上土路,榆钱儿扶着抢救生还的桩桩,像当年扶着病危的生父一样。大喜拉着架子车向前走。

身边的二嫂为大喜擦汗。

金凤、金凤丈夫、队长随车下坡。

草庵前小路。大喜拉着车,众人跟着前行。

(主题歌:太阳呀,一出呀……金格灿灿照地亮……春风吹醒古老的土地……幸福来到我们身边……)

一轮红日喷薄欲出,金光四射。^[11]

这就使得该片远远超越了“情感剧”的容量,它生动而深刻地展现了在那厚重的黄土地上,广大农民的淳朴、真挚、善良,还有他们像黄土地一样厚重的人间情怀。

戏剧改编,一是基于剧作者对小说原作的理解、对现实生活的理解,二是基于舞台表演的艺术需求。比如,女主人公的父亲被改编为“瞎爹”,无疑增加了舞台上的视觉冲击力。

小说和电影中都有“二怪”这个人物,但在电影中他是二嫂的儿子,他的新婚妻子叫“玲儿”,基本上没有“戏份”。戏曲中增加了一个与二怪有关的重要人物——春兰,她是二婶(电影中的二嫂)最终下定决心敞开心扉与田大憨(电影中的桩桩)走到一起的重要“关节”。

无论是戏剧改编,还是电影改编,都会“衍生”出新的艺术作品。比如,电影文学剧本可以视为可独立存在的另一种形式的“文学作品”,另外,像电

影连环画也可以视为小说原作和电影之外的“独立存在”。笔者注意到,朝花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美术向导》第19册(出版时间:1989年3月)封二刊登了电影宣传画《秦川情》(作者:张元鹏),它也是一幅与电影相关联独立的美术作品。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看,每一次改编既是对原作的演绎和阐释,同时也理应是“二度创作”和升华。在此意义上,我们真诚呼唤并期盼着中篇小说《太阳》的秦腔、豫剧或其他艺术形式的重新改编。

参考文献:

- [1] 朱小如. 情者文之经[J]. 萌芽, 1984(3): 22.
- [2] 作者简介[J]. 中篇小说选刊, 1984(4): 231.
- [3] 作者简介[J]. 萌芽, 1984(4): 8.
- [4] 郑彦英. 关于《太阳》给编辑部的信[J]. 中篇小说选刊, 1984(4).
- [5] 郑彦英. 太阳[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4: 封面.
- [6] 王英琦. 热土[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2: 编辑例言.
- [7] 郑彦英. 秦川情[M].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6: 34-35.
- [8] 一九八五年全国戏曲观摩演出: 淮剧《奇婚记》节目单[Z].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1985.
- [9] 乔治·布鲁斯东. 从小说到电影[M]. 高骏千, 译.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2: 69.
- [10] 黄祖模, 沈佳良. 实践与探索: 《秦川情》导演手札[J]. 电影通讯, 1986(3): 19.
- [11] 《秦川情》电影完成台本: 油印本[Z]. 上海: 上海电影制片厂, 1985: 113.

(责任编辑 刘海燕)

The Text, Re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Zheng Yanying's *The Sun*

LI Yongjun

(Zhengzhou University Press, Zhengzhou, Henan 450001, China)

Abstract: Zheng Yanying is an important novelist of the “Central Plains Writers Group”. When his novel *The Sun* was published, he was still a “young writer”. *The Sun* was first published in the third issue of *Sprout* in 1984 and was later reprinted in the fourth issue of *Selected Medium-length Novels* the same year. Its earliest standalone edition was included in *Literary Works Loose-leaf Anthology* by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Publishing Company and was published in July 1984. In June 1988, a collection of the same name was published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which was part of the “Sprout Series”. The film *Love of Qin Chuan* adapted from *The Sun* was released nationwide in 1985 and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In the same year, the Huai Opera *A Strange Marriage* adapted from this work was also achieved great success, creating a “miracle”. Each adaptation is actually both an interpretation and explanation of the original work and should also be a “secondary creation” and elevation of it.

Key words: Zheng Yanying; *The Sun*; reproduction; *Love of Qin Chuan*; *A Strange Marriage*

一幅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画卷

——读《叶圣陶日记全集》

金欣欣

(人民教育出版社 辞书编辑室, 北京 100081)

摘要:著名教育家、文学家叶圣陶先生的日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长期以来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叶圣陶先生的日记到现在为止仅出版、发表过其中一部分。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叶圣陶日记全集》(2024),是叶先生日记的第一个全本。叶先生日记主要有真实性、史料性、学术性、文学性、可读性等特点,对于中国现代史、文学史等方面的研究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叶圣陶;日记;《叶圣陶日记全集》;人民教育出版社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6.002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6-0008-06

叶圣陶先生(1894—1988)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出版家,人民教育出版社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2024年10月,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74周年之际,叶先生的《叶圣陶日记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终于正式出版了。这部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叶圣陶研究会组编,叶永和、蒋燕燕两位学者整理,共10卷700多万字^①。此次共出版了前六卷(1910—1965年),约460万字^②;后四卷(1966—1988年)随后也将出版。以下谨对《全集》略作评述。

一、《叶圣陶日记全集》是叶圣陶先生日记的第一个全本

叶先生的日记,以往至少有6个出版社出版过篇幅、规模不同的选本:

1.《日记三抄》,署名叶圣陶,花城出版社1982年出版,收入“花城文库”。此书选取了叶先生3段经历的日记。叶先生在1980—1981年为这3段日记分别写了前记。全书共10万字。

2.《我与四川》,署名叶圣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此书中的第二辑选取了叶先生5段经历的日记(与《日记三抄》有重复)。叶先生在1982—1983年为这5段日记分别写了前记。此书

日记部分共9万多字。

3.《叶圣陶集》第1版,25卷本,署名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江苏教育出版社自1987年起陆续出版,至1994年出齐。该社后于2004年出版了这套书的第2版。这一版不仅对第1版做了适当补充、改动,还增加了第26卷(传略和索引)。其中,第19—23卷(共5卷)为叶先生日记。限于当时的条件及一些情况,这5卷日记只是叶先生全部日记中的重要内容的选取,但已是《全集》出版前内容最丰富、规模最大的选本了。

4.《叶圣陶日记》,署名乐齐编,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收入陈漱渝、李文儒主编“中国现代作家日记丛书”。此书选取了叶先生11段经历的日记(与《日记三抄》《我与四川》有重复)。全书共29.2万字。

5.《旅途日记五种》,署名叶圣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出版,收入“三联精选”文库第五辑。此书选取了叶先生5段经历的日记(与《日记三抄》《我与四川》《叶圣陶日记》有重复)。全书共16.3万字。

6.《叶圣陶日记》,3卷本,署名叶圣陶著、叶至

收稿日期:2025-08-26

作者简介:金欣欣(1965—),男,北京人,文学博士,人民教育出版社资深编辑、编审,研究方向:汉语音韵学、辞书学。

善整理,商务印书馆 2018 年出版,收入“商务印书馆同仁日记丛书”。日记的内容同于上述《叶圣陶集》第 19—23 卷,同时还收入了这 5 卷日记原附的叶先生为《日记三抄》(3 段日记)、《我与四川》(5 段日记)所写的 8 篇前记。另选收《叶圣陶集》原附叶至善先生撰写的 5 篇相关说明文字。

以上 6 种叶先生日记选本,前两种在叶先生生前出版。《叶圣陶集》第 1 版的编纂工作始于 1986 年年末,该版本在叶先生生前仅出版了第 1—4 卷,其日记部分则未及编辑出版^{[1]451-454}。此外,在《叶圣陶集》出版前,叶先生的部分日记曾在《新文学史料》等刊物发表。《叶圣陶集》出版后,叶永和、蒋燕燕两位学者曾在《出版史料》《叶圣陶研究年刊》等期刊、辑刊上整理发表了《叶圣陶集》中除 5 卷日记以外的部分日记。

由此可见,《叶圣陶日记全集》作为首次出版的叶先生日记全本,意义很大。当然,对比已发表的叶先生部分日记,该书整理者出于避免误会等方面的考虑,对个别表述略有删节。但对于借助叶先生日记探讨中国现代某些方面历史的研究而言,这少量删节并不会产生什么实质影响。

二、学术界对叶圣陶先生日记的评价

关于叶先生日记的价值,叶先生后人和有关学者都曾做过评价。

(一)叶先生后人的评价

叶先生长子叶至善先生,在为叶先生 1946 年 2 月—1949 年 1 月于上海的日记所作的“按语”写道:“当时,我父亲在开明书店主持编辑部的工作,又代老舍先生主管文协的总务,跟文艺界、学术界、教育界、出版界的人士有许多交往;上海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民主运动,我父亲大多参加了,在日记上留下了记录。读者凭借这些简略的记录,也许可以印证一些资料,发现一些线索。”^{[2]346}

叶先生的孙辈叶永和、蒋燕燕两位说:“爷爷的日记中包括了七十多年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辛亥革命、北伐战争^③、国共合作、抗日战争、全国解放、解放后的历次重大运动,只要是他知道的,他参与的,在日记中都有记载。他的日记反映了当代历史的一个侧面,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历史记录。”^[3]

这些评价都是实事求是的。当然,叶至善先生的评价还过于谦虚了。

(二)学者的评价

学者们对叶先生日记也给予了高度评价。比如,叶圣陶研究权威商金林教授,就叶先生抗战时期的日记指出:“在我国现代作家中,像叶圣陶这样记

有较完整的抗战日记的不多,所以《西行日记》^④显得格外珍贵,是我们阅读和研究抗战历史、抗日统一战线、抗战文艺、战时教育,以及作者生平、思想与创作的不可多得的史料,既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来欣赏,也可以作为‘民国史’‘流亡史’来研读。”^{[4]358}

三、叶圣陶先生日记的写作目的

鲁迅先生曾对人们写日记的动机做过评论:有些人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这是日记的正宗嫡派”;另一些人则是“以日记为著述”,“不像日记的正脉”^[5]。毫无疑问,叶先生写日记的目的正属于前者。

(一)叶先生写日记的初衷

先看看叶先生自己是怎么说的。

叶先生在 1910 年 11 月 2 日(农历十月初一)满 16 周岁(虚岁 17 岁)的次日,在写下人生第一篇日记前,先作一篇“志”^⑤。从这篇小序看,叶先生写日记的初衷有两个:其一,“日来于百事之动静变迁,以及师长之朝训夕诲,每清晨卧思,若有所会”,但往往随后就忘记了多半。“因思古来贤哲皆有日记,所以记每日所作所思所得种种。我于是亦效之而作日记。”其二,“我过失孔多,已而察之,志之日记;已而不察,人或告之,亦志之日记,则庶以求不貳过也。”当然,这只是叶先生的初衷,体现出叶先生青年时期的单纯、自律、力求上进的品格。

(二)叶先生写日记的目的

叶先生曾说:“日记本来是只备自己查考的(其实也未必查考),所以记个大略就够了,来龙去脉自己心里有数,用不着多写。”^{[6]35}这一观点在叶先生日记中也有体现。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是叶先生晚年对自己日记的总结性评价^⑥,更值得重视。

叶至善先生曾就叶先生 1910 年日记小序评价:“小序说得很明白,写日记为的是修身,似乎得每天写一篇检讨了,其实并非如此,记的还是学习、生活、工作、交游等等。”^{⑦[7]155}

总之,叶先生写日记既有修身的初衷,更有便于学习、生活、工作的查考目的,因而其真实性无可置疑。

(三)叶先生对自己日记的态度

叶先生对自己的日记很珍视。“文革”期间,他曾与当时唯一保持来往的老友王伯祥先生,聊起他全家在抗战胜利后,从四川乘木船,历时一个多月,东归上海的往事。事后他在翻看当时的日记时,“忽然想起何不把这一个月半的日记抄下来,让伯祥先生卧游一番呢,反正大家无事可干,于是找了个本子抄起来”^{[6]34}。以旧日记供老友排遣寂寞,说明叶先生对自己日记的珍视与自信。当然,叶先生日记所记乘船东归的往事,王伯祥先生的两对女儿女

婿(分别带着孩子)都是亲历者。叶先生日记经得起当事人的检验,足见其内容之真实。

四、叶圣陶先生日记的特点

叶先生日记主要有真实性、史料性、学术性、文学性、可读性等特点。

(一)真实性

真实性是日记区别于其他日记体文学作品的重要特征,也是评价叶先生日记价值的重要基础之一。上文已涉及叶先生日记的真实性,这里不多谈。

(二)史料性

日记是对个人生活经历的如实记录。叶先生不仅是文学家、教育家、出版家,还是名副其实的社会活动家。他经历了清代、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3个时代,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就叶先生现存日记涉及的经历——抗战期间任进步刊物《中学生》杂志社社长,抗战胜利后任开明书店总编辑;新中国成立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领导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与出版工作,领导编纂了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辞书《新华字典》;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讨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国旗、国都、纪年;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1949年)、教育部副部长(1954年)、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1980年)、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83年)、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主席(1984年)。由于叶先生的人格魅力,无论是旧时代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都与一大批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工作者有广泛交往,所以他的日记记述范围广、内容丰富。叶至善先生说:“在父亲的日记中,可以查到各本书稿的简要档案。”^{[1]234}当然,这只是叶先生日记中的众多方面史料之一。此外,他的青年时期(民国成立前后)的日记,如叶至善先生所说,对于社会现实与青年的思想面貌“有不少零星而具体的记载”^{[7]156}。抗战时期他举家西迁,在四川生活长达八年,这段时间的日记生动细致地记述了当地的社会生活。商金林教授说,叶先生抗战时期的日记“堪称‘民国史’”^{[4]356}。

以下谈谈笔者为搜集《新华字典》史料,研读叶先生日记相关记载的体会和收获。《新华字典》第一版是在叶先生领导下,由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教育家魏建功教授主编,新华辞书社编纂。这部书在我国的文化教育等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所以,总结历史、研究其编纂过程是很有必要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上以往人们对《新华字典》第一版的编纂过程缺乏详细记录,仅仅是《新华字典》的编写者、著名辞书学家刘庆隆先生等少数学者有过一些回忆和研究文章。

就笔者所知,最早通过叶先生日记研究《新华字典》的学者是龚明德先生。他的《〈新华字典〉创编史况》^[8]采用叶先生日记的记述,对《新华字典》的编纂过程做了研究。此后,谢仁友先生的《〈新华字典〉与人民教育出版社》^[9]对叶先生日记中的相关史料做了进一步研究。笔者在以上两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叶先生日记中的有关资料再做梳理。比如,对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新华字典》3个版本(1953、1954、1955年版)的总印数考证^[10],对《新华字典》第一版的编写、审读、修订、编辑加工、出版等过程的梳理^[11-12],对《新华字典》第一版未参加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评选活动原因的考证^[13],关于《新华字典》的编纂机构新华辞书社的情况等^[14]。所以,对于叶先生日记的史料性,笔者是深有体会的。

(三)学术性

叶先生日记虽然主要记录的是“学习、生活、工作、交游等等”内容^{[7]155},但却不乏学术性。当然,由于是日记,其体裁特点与书写目的使得叶先生日记的学术性相较于其史料性要略逊一筹。但叶先生在日记中记述的对于一些学术问题的思考,仍然可以给读者许多启发,即使是对一些学术活动的记述也是这样。比如:

叶先生的《成都近县视学日记》记述了他在四川省教育科学馆任职期间^⑧,于1940年独自调查成都市附近4个县国文教学时的情况。叶先生1983年为这段日记所作前记说,当时“每到一所中学,我总是听老师讲课,还向老师要一二十本学生的作文本来看看。这种调查方法实在不高明,可见我那时候没有经验。真正有效的调查应该多花些时间,应该从接触学生入手,看他们是否真有所得,听课看作文本只能作为辅助手段”^{[15]155}。叶先生的这篇前记虽然不是日记原文,却与日记构成密不可分的整体,是通过日记研究叶先生学术思想等的重要文献;叶先生在40年后对这一调查工作的进一步思考,虽然篇幅不多,但是给人的启发是很大的。

又如,关于汉字字典的检字法。辞书检索是实用价值很大也十分烦琐的问题。古代学者做了很多探索,大致涉及字形检索(如《说文解字》的540部首)、字音检索(如《广韵》的206韵)、词义检索(如《尔雅》的19义类)。近代以来,卢懋章、林语堂、高梦旦、王云五、黎锦熙等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做了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学者们提出的检字方法达100多种^[16]。在此背景下,《新华字典》作为新华辞书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一个国家级辞书编纂机构)出版的第一部小型字典,其检字法在

当时(当然也包括对后世)自有重要影响。《全集》记录了叶先生与魏建功先生等就《新华字典》第一版(1953版)、部首排列本(1954版)关于检字表设计、部首设立等问题的讨论。记录虽然简短,却包含着丰富的学术性。现以《新华字典》第一版为例:

1953年8月22日:“晨间看魏建功、萧家霖二位所编之检字表,将刊于字典者(字典按声音次第排列,故须另附检字表,供不谙拼音字母之人翻检)。此检字表分点、划、直、撇四类,每类之字之排列,亦依笔顺之点、划、直、撇为序,翻检手续麻烦。又以仍顾及部首,属彼属此不易遽定,须碰机会。说明亦甚噜苏,恐为读者所不耐。只得搁置一旁,俟与魏、萧二公面商后再说。”^{[17]261}

1953年8月28日:“会毕,至建功、家霖所,商量字典检字表之编排问题。二君因余提出意见,谓所定编排法不便,已商量改进办法。大致仍依笔形按笔顺次第编排,唯一律从左上算起,改去从前间或从右下算起之办法。其易于致惑者,则取互见之办法。谈一时许,余觉较胜于前,因请再作研究,务以便于读者为主。此法以字之笔形、笔顺排先后,犹如英文字典以abcd排先后。唯汉字之各笔结构成一体,不若abcd之自左而右横排易于辨认。建功谓我辈固觉其不太方便,初识文字者习染不深,殆无所谓。余谓恐未必然。”^{[17]263}

由此可以看出,《新华字典》第一版的检字表是魏建功、萧家霖两位先生负责设计的,叶先生提出过重要修改意见;其编纂的核心原则是便于读者检索。

著名辞书学家程荣研究员指出:《新华字典》第一版检字表“参考黎锦熙先生创制的‘四系七起笔新部首’编制”,“是按照现代汉字字形设立的。此后《新华字典》各修订版的部首法虽然与此大不相同,但始终保持了这种立足于现代汉字字形的风格特点”^[18]。可见,《新华字典》第一版检字表虽有所本,却不是简单地沿用底本。编者立足于新时代的既定读者对象,坚持简便、实用的原则,对初稿方案做了充分讨论与修改。它虽存在一定的缺点,但却为以后版本检字表的设计思路确定了方向,影响和意义都很大。叶先生日记记述了当时讨论修改的主要情况,这对于人们更好地把握当时的设计原则、总结经验,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文学性

叶先生作为文学家,其日记无论是早期的文言文,还是后来的白话文,记述清楚、文笔流畅。他的一些日记更具有文学性。

比如1942年5月23日日记,记述了叶先生与

傅彬然先生,从成都乘车前往桂林途中,经过贵阳市,游览花溪的情景:“坐一时许,遂为游行。四望山色颇佳。贵州之山,草多而树少,而此处则有丛生高树者。山围之中,平原旷畅,大于贵阳市数倍。花溪贯之,东北流至贵阳城南,即南明河。溪有石堰数道,水面均相差五六尺,冲激下流,遂成瀑布,飞雪泻玉,轰雷喧鼓,颇为壮观。小山之上,新建筑杂立,茅亭精舍,或合式,或与环境至不相称。盖经营时无整个规模,不以审美观念为基点也。马路曲折回环,随步可通。野花之香,时时拂鼻,不知其名。野蔷薇方盛开。自入贵州境,即见野蔷薇,朵大,烂漫于山跗或路旁。在成都已开过一个月矣。”^{[19]270}

限于日记的体裁、篇幅,这段文字虽然简练,但景物描绘生动,线索清楚,层次分明,间以作者的评价,记述了花溪独特的风景,实为一篇游记的雏形。

(五)可读性

虽然叶先生的部分日记具有文学性,但是其日记的可读性并不全是因此所致。

叶先生自1910年写日记以来,日记是连贯的,只是由于一些原因,部分日记(比如1916年5月15日—1939年4月30日的日记)未保存下来;当然也有漏记日记的情况。叶先生为人真诚,这一人生态度体现在文字上,其平实、真切的内容让人愿意读下去;加上他作为散文家,文笔细腻、观察细致、见地深刻、思想敏锐,所记述的内容无论是重大事件还是日常生活琐事,都能引起人们的阅读兴趣。

五、叶圣陶先生日记的价值

以上谈了叶先生日记的几个特点,其主要价值也正蕴含于这些特点之中。

由于叶先生独特的人生经历,其日记如上所述,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内容也很丰富,很难将其简单划归到某一个或几个领域。在笔者看来,叶先生的日记堪称一幅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画卷。

当然,对叶先生日记价值的评价,不仅有认识逐步加深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记的史料价值等也在切实地增加。这里有必要提及叶先生父子三人对叶先生早年日记的评价。

叶至善先生说,他与叶至诚先生在抗战胜利后回到苏州的旧宅,找到了叶先生自1910年11月2日至1916年5月14日,共“五年六个月零十三天”的日记。改革开放后,“《新文学史料》编辑部听说父亲最早的日记还保留着,要求供给他们发表。我们弟兄俩商量,这五年半的日记大约有五十万字,全部发表,恐怕大多数读者没有兴趣看;即使耐着性子看完了,结果也得不到什么”。于是决定“摘出一段

比较重要的来发表”，即1911年8月至1912年8月，叶先生从中学生到成为小学教师这段经历的日记，以帮助读者了解辛亥革命前后中学生与小学教师的生活情况，以及当时青年的思想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叶先生的态度：他“不大赞成发表这一段日记，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太幼稚，二是用的是文言”^{[7]153-156}。

现在读叶至善先生的这段文字，笔者感觉，在叶先生父子一贯的谦逊品格因素之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叶先生早年日记的史料价值确实在增加。原因至少有两个：第一，那个年代的亲历者都已过世，所以叶先生日记中的相关史料记载愈来愈显得珍贵；第二，关于那个年代，较叶先生相关日记更重要的文献资料，都基本整理完毕。因此叶先生这部分日记的整理工作也随之提上日程。

叶先生早年的日记具有多方面价值。比如，叶先生1913年2月11—14日的日记，记述了他与顾颉刚、陆慰萱两位同学在上海“观剧”^⑨“三日间观剧凡五回”^{[20]256}（1913年2月13日）的经过：在“大舞台”观看七岁红的《挑华车》（按，也作《挑滑车》）、贾璧云的《占花魁》（2月11日）；在“群舞台”观看女京剧演员的表演^⑩（2月12日午后），在“丹桂剧院”观看白玉梅的《堂倭详梦》、周桂宝的《李陵碑》、十三旦的《游龙戏凤》、十三旦等的《洛阳桥》（2月12日晚）；在“新新舞台”观看普通京剧演员的表演^⑪（2月13日上午），在“大舞台”观看七岁红的《金钱豹》、贾璧云的《红梅阁》、反映辛亥革命内容的《鄂州血》（2月13日晚）。

叶先生的日记不仅记录了观看的主要剧目，还择要记述了演员表演的情况及评价，以及个别剧场的情况、观众的上座情况等。这些对于研究民国初年上海的京剧史无疑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甚至具有更大的史料价值。

六、叶圣陶先生日记中的不准确记述

当然，叶先生日记也难免存在记述的错误。以下就历史事件与个人生活的记述各举一例。

（一）历史事件

1939年5月6日：“闻人言重庆不第三日被炸，四日及昨日亦俱遭空袭，热闹市街毁十之六七，死伤殆至五六千人，电厂、水厂俱被破坏。”^{[20]563}以上叶先生日记记述了日军于1939年5月3日、4日两次空袭重庆所制造的惨案的情况。由于是听别人传说，所以叶先生在日记中误记重庆在5月5日也遭受敌机轰炸。据研究，在1939年5月4日的轰炸后，日军再次轰炸重庆是1939年5月12日^[21]。虽然日记存在不准确的地方，但是可以看出叶先生并

无主观夸大的意图^⑫。乐山距离重庆仅300公里，但是叶先生全家从重庆乘船到乐山竟然用了6天时间（1938年10月23日早上至29日晚8时）^⑬，可见20世纪30年代四川交通之不便利。叶先生日记中记述的传闻不全准确，是很正常的事情；当然，在使用叶先生日记相关内容时要注意进一步核对。

（二）个人生活

1939年8月19日，日军空袭四川乐山。此时叶先生正在成都讲学，但他家其他6口人都在乐山，险遭不测。叶先生8月20日的日记补述了他的家人和当时正在他家的其他6人逃生的经过：由于敌机轰炸，他家的房屋起火，人们往后门逃，但是后门却由于被叶先生新铺地板所挡（旧式的两扇门，向内开），打不开。叶先生日记写：“小墨（引者按，指叶至善先生）知地板必不能骤去，用力将门抬起，使其枢脱于臼，门与墙遂有极狭之一缝。大家皆庆得生，陆续钻出。”^{[20]603}

这段历险经过，叶至善先生也曾记述：“我看到大门的木枢跟它插进的石窝之间，有三寸多距离，要大家一齐用力，把左边那扇大门抬高，使木枢的下端脱离石窝，再把门向左边推；果然在左右两扇门之间，出现了一斜条可以挤出一个人去的缝隙。”^{[1]204}显然，办法是叶至善先生想出的，将门抬起则是他和其他几人（当时还有几位先生从他家后门逃出）一起完成的，不是他一人所为。此事原本不是大事，也不是叶先生不严谨——他是在全家居住的房屋被烧毁、借住在朋友家的窘迫情况下，听家人叙述情况并记在日记中，略有出入也在所难免。笔者想提醒的是，引用叶先生日记时需要核对，特别是日记中引述的内容。

注释：

- ①见《叶圣陶日记全集》（图书介绍），人民教育出版社网站，2024年12月3日。
- ②见《人教社2个项目被确定为2025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人民教育出版社网站，2025年5月15日。
- ③引者按：叶先生20世纪20年代的日记未保存下来。
- ④商金林教授说：叶先生把“从抗战之初携家入川开始记起，直至抗战胜利离开重庆为止”的这段日记取名为《西行日记》。（《江苏历史文化名人传·叶圣陶》，第356页）
- ⑤原文作：“庚戌十月初一日未记日记前志”。（《全集》第一卷，第3页）叶至善先生称之为“小序”。（《七十年前的日记》，第155页）本文亦称为小序。
- ⑥叶圣陶研究权威郭戈研究员指出：叶先生是“有大才、大德、大识的‘圣人’”。叶先生“人格高尚、大家风范，严于律己、待人宽厚。”（郭戈：《叶圣陶：新中国教材事业领导

人的不二人选》,《中小学教材教学》2022年第7期,第5、6页)叶先生是一位真诚的长者,笔者深信叶先生自己总结的真实性。

⑦叶先生1940年5月16日日记:“余之名义为该馆专门委员”,“将由省府派余视察学校国文教学”。(《全集》第二卷,第37页)1940年7月22日日记讲,这一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四川省国文教学的不足地方及改进对策。(《全集》第二卷,第58页)

⑧起因是:“诤刚谓沪上听歌……余亦欣然,乃相约明晨以早车赴沪上。”(1913年2月10日,《全集》第一卷,第254页)

⑨叶先生的评价是:“群舞台”“虽屋舍不及其他之舞台”,但是表演的女京剧演员“认真则过之,价尤廉也”。(1913年2月12日,《全集》第一卷,第255页)

⑩叶先生日记中记录的演员是“名角”。《洛阳桥》一出,日记谓“名角多重”。(1913年2月12日,《全集》第一卷,第255页)

⑪叶先生的评价是:“入之观剧,则座客殊稀,伶人演剧,多无精采,较昨日之坤角,天渊之判矣。此亦有故,一以名伶四五人,日间皆不登台;一以伶人见客少,遂亦敷衍将事,于是乃竟不足观矣。”(《全集》第一卷,第255页)

⑫重庆市在日军1939年5月3—4日的两次大轰炸中,死伤人数高达6314人(《未曾谋面的屠杀:“重庆大轰炸”研究》,南京出版社,2019年,第85页),远多于叶先生日记所记“五六千人”。

⑬见“嘉沪通信第一号”,叶先生1938年11月4日致王伯祥先生等上海友人信。(《我与四川》,第77—78页)

参考文献:

[1]叶至善.父亲长长的一生[C]//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叶圣陶集:第2版,第26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

[2]叶至善.《在上海的三年》按语[C]//叶至善,等编.叶圣陶集:第2版,第21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

[3]叶永和,蒋燕燕.叶圣陶未刊日记(一)[J].出版史料,2010(2):31.

[4]商金林.江苏历史文化名人传·叶圣陶[M].南京:江苏

人民出版社,2020.

[5]鲁迅.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C]//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鲁迅全集:第3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21:165.

[6]叶圣陶.《东归江行日记》小记[C]//叶至善,等编.叶圣陶集:第2版,第21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

[7]叶至善.七十年前的日记[C]//叶至善,等编.叶圣陶集:第2版,第19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

[8]龚明德.《新华字典》创编史况[J].出版史料,2005(3):31—32.

[9]谢仁友.《新华字典》与人民教育出版社[J].中国出版,2008(5):55—57.

[10]金欣欣.《新华字典》1953、1954、1955年版实际印数考[J].衡水学院学报,2021(2):124—128.

[11]金欣欣.《新华字典》第一版的编辑出版等史实考述[J].大连民族大学学报,2021(4):349—355.

[12]金欣欣.叶圣陶日记所见《新华字典》第一版编纂、出版史料考述[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22(1):92—99.

[13]金欣欣.叶圣陶为何不让《新华字典》参加评奖[J].书屋,2021(12):42—44.

[14]金欣欣.新华辞书社的成立经过与主要成就[J].衡水学院学报,2023(2):120—128.

[15]叶圣陶.我与四川[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16]陈燕.国语运动与汉字检字法改革[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6):18—20.

[17]叶圣陶.叶圣陶日记全集:第四卷[M].叶永和,蒋燕燕,整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

[18]程荣.《新华字典》部首法研究[J].中国语文,2019(6):749.

[19]叶圣陶.叶圣陶日记全集:第二卷[M].叶永和,蒋燕燕,整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

[20]叶圣陶.叶圣陶日记全集:第一卷[M].叶永和,蒋燕燕,整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

[21]唐润明.未曾谋面的屠杀:“重庆大轰炸”研究[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9:85.

(责任编辑 刘海燕)

A Historical Picture of Modern Chinese Society: A Commentary on *The Complete Works of Ye Shengtao's Diaries* JIN Xinxin

(Dictionary Editorial Department,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 diary of the famous educator and literateur Mr. Ye Shengtao has important historical and academic value, and has long been highly regarded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Due to various reasons, only a portion of Mr. Ye Shengtao's diaries has been published or released to the public to date. *The Complete Works of Ye Shengtao's Diaries* (2024) published by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is the first complete edition of his diaries. These diaries have mainly features about authenticity, historical value, academic significance, literary quality and readability. The diary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research in many aspect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Key words: Ye Shengtao; diary; *The Complete Works of Ye Shengtao's Diaries*;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赋的气象,论的肌理:《过秦论》的“破体”美学

张博均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摘要:《过秦论》的经典之处,不仅体现在“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一深刻史识上,更在于其“以赋为论”的文体风格,创造性地实现了“赋的气象”与“论的肌理”的融合。“赋的气象”,是指通过铺陈夸张的修辞、空间化的叙述以及磅礴的语言气势,营造出宏大的历史场景;“论的肌理”,则是指隐藏在华丽辞藻背后的严密逻辑,以“攻守之势”为骨架,以对比蓄势为论证手法的缜密思路。二者并非简单结合,而是形成了“气象滋养肌理,肌理支撑气象”的共生关系。这种“破体”手法,既是汉代文体互渗的早期典范,也是一种巧妙的说服策略。它使理性的历史结论在感性的审美体验中得以成立,最终铸就了其不朽的文学与思想价值。

关键词:《过秦论》;“破体”;文体学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6.003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6-0014-05

贾谊的《过秦论》被鲁迅先生誉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1],历来被视为中国古典政论散文的典范。作者于篇末所下断语“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总结了秦朝骤兴速亡的历史教训,奠定了其在史学和思想史上的地位。然而,一个值得深究的文学现象在于:这篇政论文最为后人称道的艺术特质,并非全然来自其思想的深刻,反而更多源于其“笔势纵放”“恢宏恣肆”的磅礴文气与审美感染力^[2]。

对此,学界已有诸多洞察。梁晓东在其《“破体”解》中明确指出,《过秦论》实为“以赋为论”的典范,并借唐人“破体”之说,精当地概括了其打破文体常规的写作实践^[3];刘雪艳等学者进一步阐述了其“赋”与“论”互洽的文本特征,认为这种结合增强了文字的表达效果与说服力^[4];在美学层面,张亚文的论述颇具启发性,他将文章比作“泼墨山水画”,认为其叙述、议论与语言共同蕴含了一种“山水之美”,行文如“江河奔腾”,气势磅礴^[5],这已触及文本的“气象”层面;而在结构上,刘国良所赏析

的“三奇”之一,即“叙而不论,通篇蓄势”,则精准地揭示了其论证的非同寻常之处——理性的结论根植于感性的叙事洪流之中^[6];进一步追索其思想内核,王胜杍指出,贾谊的论证逻辑建立在“重势”的思想基础上,对秦政的批判核心在于“策”其不能随“势”而变^[7];而把梦阳的研究,则将《过秦论》置于西汉“过秦”思潮与儒者“王霸之辩”的宏大思想史背景中,揭示了其从诸子论政传统向儒家经义之学过渡的复杂面向^[8]。此外,程建从接受美学视角梳理了《过秦论》从“史学经典”到“文学经典”的经典化历程,论述了不同时代的读者如何从文本中解读出政治诉求与文学价值^[9]。

既有的研究清晰地勾勒出《过秦论》在文体、美学、结构与思想等维度的“破体”特征,但多侧重于现象描述或单向度的特征分析,对于“赋”与“论”这两种异质文体元素如何具体、有机地融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审美整体,其内在的共生机制为何,尚缺乏系统性的理论阐释。

鉴于此,本文试图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气象—肌理”二元分析框架,对《过秦论》的“破

收稿日期:2025-09-18

作者简介:张博均(1990—),女,河南南阳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学科教学。

体”美学进行系统性阐发。所谓“赋的气象”，意指文章通过赋体特有的铺张扬厉、空间化叙事与情感律动所营造出的宏大历史场域与整体美学氛围；所谓“论的肌理”，则指潜藏于华丽文表之下，以“攻守之势”为核心哲学思辨、以对比与蓄势为结构逻辑的严密理性内核。《过秦论》的不朽魅力，正源于“气象”与“肌理”二者间所达成的深度交融与相互赋能：“气象”以其感性的磅礴之力，为“肌理”的理性结论奠基蓄势；而“肌理”则以其深邃的逻辑之思，为“气象”的感性渲染定向立骨。二者共同构成了《过秦论》“破体”写作的美学核心，也使其成为文体互渗史上一个卓绝的典范。

一、“赋的气象”：铺陈中的历史画卷与情感势能

贾谊的《过秦论》凭借其赋体化的书写，营造出一种雄浑壮阔、席卷一切的“气象”。这种气象并非虚浮的辞藻堆砌，而是一种精密的文学建构，它通过空间化的历史构图、戏剧化的人物阵列与磅礴的语言律动，将抽象的历史进程转化为可感的视觉图景与磅礴的情感势能。这种势能不断蓄积，为篇末“仁义不施”的理性论断积蓄了坠落力量。

（一）空间铺陈：帝国崛起的视觉图谱

贾谊深谙赋体“体物写志”的精髓，其笔下的历史并非线性的时间叙述，而是一幅幅空间化的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动态地图。首先是据“点”。文章开篇便以“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起笔，勾勒出秦国立足于险固地理的初始版图，这是一个清晰的战略据点。继而扩“面”。随后，笔锋如游龙，描绘其扩张之势：“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四个方位词南、西、东、北的并置，并非单纯的地理罗列，而是以典型的赋法，在读者脑海中构建了一个由中心向四面辐射、不断延展的帝国形象。这不再是枯燥的史实陈述，而是一种空间征服的动态可视化呈现。最终成“体”。及至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最终完成了对一个三维、立体、无远弗届的绝对权力空间的塑造。张亚文将此比作“泼墨山水画”，可谓切中肯綮。贾谊正是以文辞为笔墨，渲染出一幅帝国由雏形至鼎盛的宏大画卷。这种空间叙事，其目的远非告知，而在于“震慑”。它让读者在视觉想象中亲身“见证”秦帝国的庞大与强固，从而为后文中这个庞然大物的轰然倒塌，预先设下最大的悬念，蓄积了第一重情感势能——对绝对力量的惊叹。

（二）心志渲染：排比句群的心理压强

在勾勒外部空间的同时，贾谊更以密集的排比

与同义叠句，深入挖掘并放大秦统治者的内在心志，给读者施加一种强大的心理压力。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对秦孝公野心的描绘：“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席卷”“包举”“囊括”“并吞”四词意涵相近，“天下”“宇内”“四海”“八荒”皆指代全域。这种“一意叠出”的笔法，正是赋体“铺张扬厉”的典型特征。梁晓东在论及此文“破体”特征时，便精准地指出，此种重复“盖极言秦有虎狼之心，非一辞而足也”^[3]。从信息传递的角度看，这或许是冗余的，但从情感与势能积累的角度看，这却是必要的。通过语言的重复与盘旋，作者将秦孝公那种抽象的野心反复强化，转化为极具冲击力的文本意象。

（三）人物阵列：力量对比的戏剧张力

《过秦论》中的人物并非个性鲜明的个体，而是作为力量符号被编排入一场盛大的历史戏剧中，其出场方式极具赋体的仪式感与阵列感。反衬之阵：在描绘九国合纵攻秦时，贾谊不惜笔墨，罗列了以“四君子”为首的庞大人才阵容——“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吴起、孙臏……之伦制其兵”。这份冗长的名单构成了一场人才的“盛大阵列”。其目的正是“先扬后抑”，写九国阵营之盛正是为了反衬能击败他们的秦国，其实力是何等可怖。这是通过对比蓄积势能的经典手法。

对陈涉的描写：“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同样是从出身、职业、身份多个角度进行铺陈，却是为了将其卑微和渺小刻画到极致。金圣叹评此“最是疏奇之笔”。这极度的“卑微”与秦帝国极度的“强大”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几乎荒谬的落差。这个落差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情感悬念和势能张力，从而将阅读期待推向极致。

（四）语言节奏：文势奔涌的情感律动

“气象”的生成，亦离不开语言本身的节奏与律动。贾谊大量使用结构整饬的排比句与对偶句，使文章形成一种奔腾向前的“文势”。如写秦始皇：“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一系列强有力的动词（振、吞、履、执）鱼贯而出，音节铿锵，语气急促，模拟了秦统一天下的迅猛进程与不可一世的气势。这种语言节奏本身就是一种情感动员，它让读者在语言的洪流中感受到历史车轮碾过的隆隆巨响。刘雪艳等指出，这种整散结合的句式“如铁骑江湖般汹涌澎湃”^[4]，正是对此种语言势能的生动描绘。

《过秦论》中“赋的气象”，是一个由空间构图、心志渲染、人物阵列与语言节奏共同作用生成的多

层次的美学系统。其根本目的在于构建一个感性、宏大、充满张力的历史世界,在此过程中,持续地多维度地蓄积情感的势能——惊叹于秦之强,困惑于其亡之速,震撼于强弱对比之荒谬。这些感性的铺垫并非文章的终点,而是其理性锋芒得以完美显露的必不可少的前提。这股磅礴的势能,最终将在篇末论点处寻得突破口,转化为一击即中的说服力。

二、“论的肌理”:叙事下的逻辑骨架与理性深度

倘若“赋的气象”构成了《过秦论》波澜壮阔的血肉与面容,那么“论的肌理”便是支撑其屹立不倒的骨骼与灵魂。贾谊的卓绝之处在于他并未让感性的铺陈沦为虚浮的夸饰,而是将其牢牢锚定于一套严密、深刻的理性框架之内。这套“肌理”,潜行于叙事帷幕之下,通过“攻守之势”的哲学思辨、多重对比的论证结构与“叙而不论”的蓄势辩证法,编织成一张无形的逻辑之网,最终将读者引向那个无可辩驳的结论。

(一)“攻守之势”:统摄全篇的逻辑脊柱

《过秦论》的理性肌理,首先体现为其拥有一个统摄全篇的核心逻辑脊柱——“攻守之势异”的深刻历史哲学观。这一思想红线不仅贯穿于秦从“攻”势(秦孝公至秦始皇)到“守”势(二世以降)的阶段性划分,更通过揭示“其道不易,其政不改”的统治悖论,直指政权存续的根本规律。作为统领全文的理论基石,它既确立了历史叙事的阶段框架(如何划分攻守之“势”),又构建了批判分析的价值维度(为何“势异”需“术变”),形成“阶段划分—矛盾揭示—规律提炼”的三层逻辑结构,为后文“攻与守的阶段性特征”与“异”的本质批判提供了严密的理论统摄。

“攻”与“守”的阶段性划分:文章的上篇,看似在铺陈秦之兴盛的辉煌史诗,实则每一笔都在为“攻”势张本。从秦孝公“据崤函之固”以求扩张,到秦始皇“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其成功皆源于“兼并者高诈力”这一“攻”术。而“守”势阶段,则始于天下已定、“南面而王”之后。贾谊敏锐地指出,此时“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民心向背已成为“安危之本”,治国之术应转变为“贵顺权”,即施行仁义。

“异”的本质与批判的锋芒:秦朝最大的悲剧与过失,正在于“其道不易,其政不改”,在“守”势阶段错误地延续了“攻”势的方略。王胜枰对此的解读极为精当,他指出贾谊论证的重心在于“施政方略是否适应社会发展趋势”,即“策”必须随“势”而变。因此,“仁义不施”是“过”的具体表现,而“攻守之势异”却不知变通,才是“过”的深层根源。这一逻辑

链条,使得文章的批判超越了道德谴责的层面,进入了历史哲学的高度,构成了全文最坚实的理性骨架。

(二)多重对比:编织精密的论证网络

在核心逻辑脊柱之上,贾谊通过精心设计的多重对比,编织了一张密不透风的论证网络,使其观点在事实的强烈反差中不证自明。纵向对比——秦自身之兴亡,这是最核心的对比。文章以绝大部分篇幅渲染秦从崛起至统一的不可一世,与其“一夫作难而七庙隳”的迅速崩溃形成巨大反差。这巨大的命运落差,本身就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论据,它强烈地暗示:在“兴”与“亡”之间,存在一个决定性的变量,从而引导读者探寻其背后的因果律。横向对比——陈涉与九国、秦朝的对比。贾谊不厌其烦地对比陈涉与九国在地位、武力、谋略、军队等方面的悬殊,其结果却是“成败异变,功业相反”。这组违背常理的对比,构成了全文最大的逻辑悬念,它彻底否定了将秦亡归于军事实力不足的浅见,迫使读者跳出物质层面的比较,去思考更深层次的属于“守天下”范畴的治国之道——仁义。这正是其论证肌理的精妙之处。

(三)“叙而不论”:隐于幕后的蓄势渲染

《过秦论》在结构上最独特的“肌理”,在于其“叙而不论,通篇蓄势”的辩证艺术。全文直至篇末才亮出核心论点,此前近乎纯以叙事呈现。蓄势作为论证,并非论证的缺席,而是一种更高明的论证。刘国良将其概括为“三奇”之一,正在于其“通篇皆在蓄势”。贾谊通过对历史事实极具倾向性的选择与排列,如极力渲染秦之强与陈涉之微,将理性的分析与判断隐含于感性的叙事之中。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已被作者的叙事逻辑所引导,情感与认知的“势能”不断累积。

当所有铺垫完成,强弱兴亡的戏剧性反差已达极致时,“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论断,便不再是外来的说教,而是读者心中呼之欲出的共同结论,是蓄积已久的情感与理性势能的必然宣泄口。宋人李耆卿云:“文字有终篇不见主意,结句见主意者,贾生《过秦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是也。”这正是对其蓄势辩证法的最佳注脚。论点置于篇末,非为仓促,实为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过秦论》的“论之肌理”,是一种深藏不露的理性力量。它以“势”的哲学为核心,以对比网络为框架,以蓄势叙事为策略,共同构成了一套严密的内部逻辑系统。这套系统确保了文章在拥有“赋的气象”所带来的巨大感染力的同时,始终保持思想的深度与逻辑的刚性。“肌理”与“气象”并非割裂,而

是互为表里——感性铺陈为理性结论蓄积了势能，而理性骨架则为之赋予了灵魂与方向。

三、理的锋芒：文眼辩证中“势”与“政”之思

《过秦论》“破体”的价值，不仅在于形式的创新，更在于其通过这种形式所承载的深刻历史洞见，这集中体现于其文眼——“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一句的精微辨析上。对此主旨句的解读，关键在于虚词“而”的语法关系。若视作因果关系，则易生疑窦：秦在“攻”取天下时，同样“不以仁义”，凭“诈力”成功，何以独在“守”天下时因“不施仁义”而亡？这显然触及了论述的核心。

此句“而”字应作转折解。秦国依法治国、不施仁政的策略是一以贯之的施政国策，其在攻势阶段固然有效。但“攻守之势异也”点明了历史条件的根本性变化，而“仁义不施”则道出了统治策略的僵化不变。二者构成一对尖锐的矛盾。最佳的理解方式是将其顺序进行逻辑上的调换，解为“攻守之势异也，而仁义不施”：正是由于攻守之势已然改变，然而（秦朝）却仍不施行仁义，故而灭亡。这一解读，与贾谊在《过秦论》（中）篇的论述深度契合：“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

由此可见，《过秦论》的写作意图远不止于以秦亡为鉴。清代方苞点明：“秦始终仁义不施，而成败异势者，以攻守之势异也。”贾谊真正倡导的是一种“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的社会历史观。他将“势”与“理”的动态关系，通过一个“而”字的转折巧妙地编织于文眼之中，这使得《过秦论》超越了就事论事的史评，升华为一种关于国家治理的哲学思考，并对后世如“独尊儒术”等政治理念的转向产生了潜在影响。其“破体”之论，也因此具备了穿越时空的思想价值。

四、气象与肌理的融合：“破体”的美学实现与说服策略

“赋的气象”与“论的肌理”在《过秦论》中并非简单的并列或叠加，而是在“破体”这一创造性实践中达成了深度的互渗与共生。二者的关系，恰似中国画论中的“气”与“骨”——气象赋予作品以生命神采与情感温度，肌理则铸就其挺拔风姿与思想硬度。这种融合不仅是一种文体学的越界，更是一种高明的说服策略，它使得理性的历史洞见在感性的审美震撼中得以确立，最终成就了其“西汉鸿文”的永恒魅力。

纯粹的逻辑论证往往因枯燥而难以深入人心。贾谊的卓绝之处在于他先以“赋的气象”为读者铺设了一条感性的通道，即从“认知”到“体验”的转换

通道——当读者沉浸于贾谊所构建的由空间铺陈、人物阵列与语言律动共同交织的宏大历史画卷中时，他们对秦朝的理解便从史书上的知识转化为一种可感的审美体验。进而让结论从读者自己的审美体验与情感逻辑中自然生长出来。

《过秦论》寓论于赋，理在情中，这正是其“破体”美学的实践归宿。对于汉初的统治阶层，尤其是带有楚文化背景、审美上偏好宏丽文风的刘邦集团而言，这种兼具赋之壮美与论之深邃的文章，比纯粹的儒家道德说教或法家的严苛条文更具吸引力与感染力。它首先是一场美的征服，而后才是一场理的渗透。同时，此文体巧妙地调和了汉赋“劝百讽一”的内在矛盾。在《过秦论》中，“赋”的铺陈（劝）是手段，是吸引，是蓄势；“论”的批判（讽）是目的，是内核，是点睛。它实现了“劝”不掩“讽”，“讽”因“劝”彰的效果，其最终指向是深刻而尖锐的政治谏言。最终，读者获得的是一种浑然一体的阅读体验。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名家名篇，往往破体，而文体亦因以恢宏焉。”^[10]它打破了“论”与“赋”的文体壁垒，创造了一种新的政论书写的典范，其成功之处在于深刻理解并驾驭了感性 with 理性在读者接受心理中的辩证关系。

五、结语：文体互渗的典范与文学史的回响

《过秦论》一文表明，深刻的思想可以借助最富感染力的艺术形式来传达，而文体在这种“破格”中得以拓展与深化。其“以赋为论”的笔法，直接开启了后世“论”体文学化的先河。“破体”实践的文学史意义不仅在于提供了“如何说”的修辞范本，更在于确立了“说什么”的思想高度——当赋的铺陈不再是辞藻的炫耀，论的严谨不再是逻辑的桎梏，二者便共同熔铸出兼具审美张力与思想锋芒的“大文章”气象。

从文体发生学视角看，《过秦论》的“破体”绝非偶然的文学实验，而是汉代“大一统”语境下文体融合趋势的必然产物。西汉初期，政论散文尚处在从诸子语录体向专题论文的转型阶段，而赋体则凭借其“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特质成为最具表现力的文体。贾谊以政治家的敏锐与文学家的才情，洞察到两种文体的互补性——赋之“体物”可使抽象政见具象化，论之“析理”能让感性叙事逻辑化。这些融合在《过秦论》中，形成奇妙的“化学反应”——当“席卷天下”的赋笔描摹秦之强盛时，已暗含“攻守之势异也”的论辩伏笔；当“陈涉瓮牖绳枢之子”的对比展开时，理性判断已在感性冲击中悄然完成。

这种文体创新对后世的影响呈现出清晰的谱系

特征。魏晋时期,陆机《辨亡论》直接承袭其“述兴亡之理,寄讽喻之旨”的写法,同样以吴之兴亡为线索,先铺陈孙权“任才尚计”的盛景,再剖析孙皓“昵近小人”的衰象,结尾点出“地利不如人和”的论点,其“叙事一对比一论断”的结构与《过秦论》如出一辙。唐代杜牧《阿房宫赋》则将“以赋为论”推向极致,全文以赋体铺写阿房宫的奢华,在“五步一楼,十步一阁”的绵密描写中,始终贯穿着“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的理性批判,最终以“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的论断收束,实现了“赋形”与“论骨”的完美统一。至宋代,苏洵《六国论》更将这种传统发扬光大,其“弊在赂秦”的核心论点,正是通过“暴霜露,斩荆棘”的赋化叙事与“胜负之数,存亡之理”的精密辨析共同建构而成。在当代文学研究中,《过秦论》的“破体”美学仍具启示价值,譬如,当我们讨论“跨文体写作”时,贾谊早已提供了经典范例——文体的边界不是僵化的壁垒,而是流动的疆域,关键在于能否找到内容与形式的“黄金分割点”。

回望《过秦论》的经典化历程,其启示是深远的。优秀的作品往往诞生于对既定规范的深刻理解与大胆超越之中。贾谊不仅是一位深谙治道的思想家,更是一位洞察文学与人心之微妙关联的艺术家。他打通了“赋”的感召力与“论”的理性说服力,让历史教训在审美共鸣中直抵人心。在学术表达日趋专业化甚或模式化的今天,《过秦论》依然以其磅礴的

文体之美提醒我们:真正的经典在于思想与文采的相得益彰。

参考文献:

[1] 鲁迅. 汉文学史纲要[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25-30.

[2] 范晔. 狱中与诸甥侄书:第6卷[M]. 北京:中华书局, 1974:1829-1831.

[3] 梁晓东. 贾谊《过秦论》之“破体”解[J]. 兰州工业学院学报, 2014(3): 80-82.

[4] 刘雪艳, 陈燕. 《过秦论》“赋”与“论”互洽的探本溯源[J]. 语文天地, 2024(11): 17-20.

[5] 张亚文. 《过秦论》何以成为“西汉鸿文”:兼论《过秦论》山水之美与写作艺术[J]. 新西部, 2024(10): 88-90.

[6] 刘国良. 千古奇作奇在何处:《过秦论》“三奇”赏析[J]. 语文天地, 2007(21): 9-10.

[7] 王胜枰. 章法、主张、动机:解读《过秦论》逻辑理路的三个维度[J]. 中学语文, 2025(7): 74-77.

[8] 把梦阳. 西汉“过秦”风潮与儒者的“王霸之辩”[J]. 社会科学, 2022(6): 53-62.

[9] 程建. 由《过秦论》经典化进程看接受美学在中国的意义[J].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4): 98-100.

[10] 钱钟书. 管锥编:第3卷[M]. 北京:中华书局, 1986: 888-891.

(责任编辑 刘海燕)

The Grandeur of Fu and the Texture of Argumentation: The “Genre-Breaking” Aesthetics in *On the Faults of Qin*

ZHANG Boju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0, China)

Abstract: *On The Faults of Qin* is classical status not only from the profound historical insight embodied in the thesis that “the failure to practice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altered the balance of power between offense and defense,” but also from its unique stylistic characteristic of “adopting the fu (rhapsody) form for argumentation” and its creative integration of “the grandeur of fu” and “the texture of argumentation”. The “grandeur of fu” refers to the creation of vast historical tableaux through hyperbolic rhetoric, spatialized narration, and a majestic linguistic momentum. The “texture of argumentation” denotes the rigorous logical framework underlying the ornate diction, and it is structured around the “dynamics of offense and defense” as its framework and employs contrast and cumulative force as its argumentative techniques. These two elements do not merely combine, but form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where the grandeur of fu nurtures the texture of argumentation, and the texture of argumentation supports the grandeur of fu; This approach to “genre-breaking” writing serves not only as an early paradigm of stylistic cross-fertilization in the Han dynasty but also as an ingenious persuasive strategy. It enables rational historical conclusions ultimately forging the work’s enduring literary and ideological value.

Key words: *On The Faults of the Qin*; stylistic transgression; stylistics

长三角地区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空间关联网络研究

孙鲁云, 周本达

(皖西学院 金融与数学学院, 安徽 六安 237012)

摘要: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以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作为网络节点,运用基于制度距离修正的引力模型构建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空间关联网络,通过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和面板回归模型,对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网络结构特征及其效应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2022—2024年间,长三角地区城市间数字化转型联系愈发紧密,网络结构呈现网络密度、网络关联度和网络效率上升,网络等级度下降的趋势;(2)网络节点特征存在明显异质性,不同城市在全域数字化转型进程中,资源汇聚、控制和交流能力存在差异,块模型分析进一步将城市划分为四大功能板块;(3)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空间关联的网络密度、网络关联度和网络效率,能够显著提升区域整体数字化转型水平及其空间均衡性,城市在网络中的中心性地位对个体全域数字化转型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数字中国;空间关联;复杂网络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6.004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6-0019-11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突飞猛进,数字技术持续渗透到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1],重塑了其运行模式与发展轨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体现了党中央对数字化建设长期战略的进一步深化。早在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数字中国战略目标;随后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并指出打造智慧城市;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标志着数字中国建设步入全面推进的新阶段。在此进程中,城市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的核心单元,是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综合载体^[2]。2024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深化智慧城市发展 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对智慧城市发展提出“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新要求,明确到2030年全国城市全

域数字化转型要取得全面突破。随着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推进,不同城市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的联系日益紧密,逐渐形成了复杂的空间关联网络。深入研究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空间关联网络,对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实现数字中国建设目标意义重大。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一体化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实践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具有典型的研究价值。2023年,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总量达到30.5万亿元。长三角地区仅占全国国土面积的4%,人口占比近17%,却贡献了全国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总量。其中,数字经济增加值突破12万亿元,占GDP总量的40%以上,约占全国数字经济增加值的30%^[3]。同时,长三角地区城市间的经济联系紧密、产业协同程度高,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空间关联网络更为复杂且具有代表性,能够充分体

收稿日期:2025-09-12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基于复杂网络的数字乡村韧性治理研究”(2024AH051995);安徽省高校中青年教师培养行动项目(YQYB2024056);皖西学院大别山绿色发展研究中心招标课题重点项目“合肥六安产业一体化水平测度、模式选择与推进策略”(WXZB202101)

作者简介:孙鲁云(1989—),男,山东东平人,博士,皖西学院金融与数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经济统计、农业经济。

现不同规模、不同产业结构城市之间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相互作用。因此,以长三角地区为样本探究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空间关联网络特征及其效应,对于充分发挥数字化转型的空间辐射效能、推动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文献综述

当前,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正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相关研究主要围绕概念内涵、效率测度、推进路径、具体应用场景等方面展开,这些研究对于深入理解和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至关重要。在概念内涵方面,众多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阐释。国家数据局数字经济司司长吴晓宁强调数据作为核心资源,在城市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指出通过数据的融通与开发利用,可重塑智慧城市技术架构、变革城市管理流程,进而推动产城融合与城市高质量发展^[2]。这一解释突出了数据要素在城市数字化转型中的核心地位,为后续从数据驱动角度研究城市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汤志伟等(2024)认为,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就是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对城市全领域进行系统性、整体性改造,其核心在于提升城市治理、经济和社会服务水平^[4],着重强调转型的全面性和系统性。综合来看,这些观点均强调数据、技术、系统性改造以及多领域协同发展在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性,为后续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效率测度方面,任宗强等(2023)发现长三角地区数字化转型效率整体波动幅度较大,呈现“上升——下降——上升”的趋势,并强调了转型过程中技术进步的重要性^[5]。

推进路径研究对于实现转型目标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霍春辉和何地(2024)认为,发挥数据要素作用、壮大城市数字经济、筑牢数字安全屏障对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至关重要,从关键要素、经济支撑和安全保障等方面提供了方向^[6]。高国力(2024)提出要坚持城市智慧化发展和数字化转型相互促进,注重城市发展动能和发展空间的协同创新,强调了转型过程中的协同发展理念^[7]。然而,不同城市因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支持、数据资源与技术应用等方面存在差异,在全域数字化转型的空间关联网络中所处地位与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这种差异使得各城市在实施推进路径时,面临的挑战各不相同。因此,准确把握数字化转型的空间关联网络,对于有针对性地选择和优化推进路径至关重要。

事实上,城市数字化转型具体场景下的空间关联网络研究已然兴起,其涵盖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数字治理、数字贸易等多个关键领域。数字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为其他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技术支

撑。田秀杰等(2024)认为,数字技术作为全新的绿色生产要素,不仅能显著促进城市碳减排,而且其空间关联网络呈现良好的发展格局^[8]。数字经济的发展则是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经济动力。我国数字经济的空间关联网络呈现典型的“中心——边缘”结构,东部省份对中、西部省份产生虹吸效应^[9-10]。数字治理是实现城市高效管理和服务的核心,数字贸易拓展了城市经济的发展空间。已有研究表明,我国数字治理水平和数字贸易发展不平衡现象明显,且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11-12]。以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对象,Chu等(2023)发现城市间数字经济的空间网络已初步形成,但网络密度较低,城市间数字经济联系仍有较大提升空间^[13]。徐梦周等(2022)认为,虽然长三角地区城市间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关联逐渐紧密,但关联网络仍不稳定,反映出该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还在不断变化^[14]。

在研究方法上,引力模型被广泛应用于空间关联网络的研究,例如在京津冀、珠三角等地区^[15-16]。这些研究通常通过引力模型测算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空间结构以及城市群内部的等级关系。为更好地反映城市间的复杂联系,一些修正的引力模型也逐渐出现^[17-18]。还有研究引入了时间距离变量替代传统的物理距离,以更准确地考虑交通便利性和成本^[19]。事实上,由于信息技术和交通技术的发展造成了“时空压缩”^[20],传统的地理距离已不能全面刻画区域间各要素流动所面临的实际阻碍和影响。在新的技术环境下,物理上的空间距离在一定程度上被有效缩短,行政壁垒、制度差异等因素构成了一种更为复杂的制度距离^[21]。不同城市在数字经济相关政策、法规、标准等方面存在差异,这导致某一城市的数字资源和产业要素在向其他城市扩散时会发生不同程度的衰减或变形,进而改变城市间数字要素的流动方向和效率,最终影响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空间关联关系。

综合来看,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区别于经济、社会、治理等具体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它具备更强的系统性和综合性,是一个持续动态的协同演进过程。已有研究在城市数字化转型具体领域的空间关联网络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然而,针对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这一整体概念的网络特征研究较少。此外,仅依靠传统地理距离构建空间关联网络模型,已无法准确反映现实中城市的空间联系状况,迫切需要纳入制度距离等更多维度的距离因素,以提升空间关联网络构建和分析的科学性与有效性。这为本研

究以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对象,运用基于制度距离修正的引力模型开展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空间关联网络研究提供了契机和方向。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区域

长三角地区地处中国大陆东部沿海,是长江汇入大海冲积形成的平原区域,覆盖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与安徽省,共计 41 个城市。2019 年 12 月,《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印发,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在长三角地区,形成了六大都市圈,分别为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合肥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宁波都市圈以及苏锡常都市圈(表 1)。这些都市圈以具有强大辐射影响力的超大城市或大城市作为中心,构建起高效的 1 小时通勤圈,成为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产业集聚的关键区域以及政策协调的核心载体,在推动长三角地区经济协同发展、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表 1 长三角六大都市圈基本情况

都市圈名称	包含城市(地级市及以上)
上海大都市圈	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嘉兴、宁波、舟山、湖州
南京都市圈	南京、镇江、扬州、淮安、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
合肥都市圈	合肥、淮南、六安、滁州、芜湖、马鞍山、蚌埠
杭州都市圈	杭州、湖州、嘉兴、绍兴、衢州、黄山
宁波都市圈	宁波、舟山、台州
苏锡常都市圈	苏州、无锡、常州

(二)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研究聚焦长三角地区的 41 个城市,将其作为网络节点,对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空间关联网络进行实证研究,样本期覆盖 2022 年至 2024 年。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旨在推动城市全领域、全方位、全过程的系统性变革。在衡量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水平时,本文选用了新华三集团数字中国研究院开发的城市数字化发展指数^[22]。该指数的编制参照《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新型智慧城市评价指标》等相关文件,涵盖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数字生态 5 个一级指标,下设 15 个二级指标以及 54 个三级指标,能够从多个维度对我国城市数字化转型水平与运营成效进行全方位评估。该指数自 2022 年起开始定期发布,为研究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科学、可靠的数据支持。

(三)研究方法

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空间关联网络是城市间全域数字化转型相互关系的集合。各城市是网络的“点”,各城市之间在全域数字化转型上的空间关联关系是网络中的“线”。由这些点和线构成了全域

数字化转型的空间网络结构。构建空间关联网络的关键是刻画各城市之间的空间关联关系。根据已有文献,确定空间关联关系的方法主要有修正的引力模型、VAR 格兰杰检验、时滞相关系数等^[23-25]。本文选择修正的引力模型确定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空间关联关系,主要基于以下考量:相较于其他两种方法,该模型能够更为稳定地揭示城市间的空间关联结构,且对数据时间跨度的要求宽松,非常契合本文的研究数据条件,同时其分析结果可为后续探究网络结构的动态演变提供基础。

1. 修正的引力模型

引力模型已成为研究城市空间联系的常用模型,其基本形式为:

$$R_{ij} = k_{ij} \frac{M_i M_j}{D_{ij}^r} \tag{1}$$

式中, R_{ij} 为城市 i 对城市 j 的全域数字化转型联系强度,称为全域数字化转型联系量; M_i 、 M_j 为城市 i 、 j 全域数字化转型水平,即城市数字化发展指数,并采用广义指数法,将百分制标准化至 0 到 1 之间; D_{ij} 表示城市 i 和城市 j 之间的距离; k_{ij} 为引力系数; r 称为摩擦系数,通常取值为 1。考虑城市 i 和城市 j 数字化转型联系的不对称性, k_{ij} 的公式如下:

$$k_{ij} = \frac{M_i}{M^+ M_j} \tag{2}$$

城市间距离 D 的改进。随着高铁等区域交通运输网络不断完善,都市圈与城市群在地理空间维度上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使得地理距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分割效应逐渐减弱^[20]。尽管物理距离通过技术的进步被有效缩短,但行政壁垒仍然存在,制度建构下的区域边界构成了制度距离。它反映的是地方制度差异对跨界要素流动产生的影响^[26-27]。因此,采用引入制度距离的综合距离测度方法更为合适。这种方法不仅考虑传统的地理距离,还纳入制度距离的因素,从而能够更全面地评估和理解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互动和一体化程度。

修正后的距离公式如下:

$$D = w_1 D_1 + w_2 D_2 \tag{3}$$

其中, D_1 为地理距离,用两城市政府所在地经纬度计算的球面距离来表示; D_2 为制度距离,采用边界制度距离来衡量。综合考虑行政区划边界(刚性的区域划分)和都市圈边界(非刚性的区域划分),制度距离的具体定义如下:1 = 同省份,且属于同一都市圈;2 = 同省份,但不属于同一都市圈;3 = 不同省份,但属于同一都市圈;4 = 不同省份,且不属于同一都市圈。由于都市圈规划范围的动态变化,

两城市之间的制度距离可能因年份不同而有所不同。假定地理距离和制度距离对城市间联系的制约程度相等,设定 w_1 和 w_2 均取值 0.5。

D_1 和 D_2 均通过广义指数法进行标准化处理,具体公式如下:

$$D' = \frac{D}{\max D} \quad (4)$$

依据公式(1)一(4),本文计算出长三角地区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水平之间的引力矩阵,以此反映城市间的关联关系。为减少相对微弱的关联关系影响网络的整体分析,选取阈值对引力矩阵进行二值化处理,以构建最终的全域数字化转型空间关联网络。为使结果的跨期可比,以样本考察期内引力矩阵元素均值为阈值。引力值高于该阈值记为 1,表示该行城市对列城市的全域数字化转型水平有关联;低于阈值则记为 0,表示不存在关联。

2. 复杂网络分析

(1) 网络结构特征

网络密度(Network Density)为网络中实际拥有的关联关系数量与整个网络最多可能拥有的关联关系数量之比,取值范围为[0,1]。该指标反映了网络中各城市(节点)之间关联关系的疏密程度,其计算公式为^[24]:

$$ND = \frac{r}{n(n-1)} \quad (5)$$

式中, ND 为网络密度, r 为网络中实际拥有的关联关系数量, n 为网络中节点的数量。

网络关联度(Network Connectedness)反映了网络自身的稳健性和脆弱性^[28],可用网络中任意两个节点之间直接或间接可达的程度表示,取值范围为[0,1]。该指标越大,表示网络的可达性越强,网络关系越稳健。计算公式为:

$$NC = 1 - \frac{m}{n(n-1)} \quad (6)$$

式中, NC 为网络关联度, m 为网络中不可达的点对数, n 为网络中节点的数量。

网络等级度(Network Hierarchy)反映了网络中城市之间非对称可达的程度,取值范围为[0,1]。该指标越大,说明网络中城市之间的等级结构越森严,越多的城市在空间关联网络中处于从属和边缘的地位。计算公式为^[29]:

$$NH = 1 - \frac{K}{\max(K)} \quad (7)$$

式中, NH 为网络等级度, K 为网络中对称可达的城市对数, $\max(K)$ 为网络中最大可能的对称可达城市对数。

网络效率(Network Efficiency)反映了网络中要素流通以及应对外界干扰的响应能力,采用网络的全局效率来衡量^[30],其计算公式为^[31]:

$$NE = \frac{\sum_{i \neq j \in G} \frac{1}{d_{ij}}}{n(n-1)} \quad (8)$$

式中, NE 为网络效率, n 为网络中节点的数量, d_{ij} 为城市 i, j 之间的最短路径。网络效率定量反映空间关联网络中各城市之间交换信息的平均效率,取值范围为[0,1]。该指标越大,说明网络中城市之间存在更多的连线,城市间的关联越复杂,空间网络越稳定,信息交换效率越高。

(2) 网络节点特征

点度中心度(Degree Centrality)描述各城市对外辐射和接受外界辐射的程度。在有向图中,边具有方向性,因此节点的连接情况需要从两个方向考量,点度中心度可分为入度、出度。其中,出度是指从该节点出发的边的数量,数值越大,表明该节点的影响力和辐射范围越大;入度是指从其他节点指向该节点的边的数量,数值越大,表明该节点接受外界辐射的程度越高。计算公式为:

$$C_d = \frac{l}{n-1} \quad (9)$$

式中, C_d 为点度中心度, l 为网络中与某城市直接关联的城市数量, n 为网络中节点的数量。

中介中心度(Betweenness Centrality)测度的是一个城市在多大程度上处于其他城市的“中间”位置,即描述该城市对其他城市间关联的控制程度。该指标取值范围为[0,1],数值越大,说明该城市对其他城市的控制作用越强,核心地位越明显。计算公式为:

$$C_b = \frac{2 \sum_j \sum_k \frac{g_{jk}(i)}{g_{jk}}}{n^2 - 3n + 2} \quad (10)$$

式中, C_b 为中介中心度, $j \neq k \neq i$,且 $j < k$, g_{jk} 为城市 j, k 之间的捷径数量, $g_{jk}(i)$ 为城市 j, k 之间经过城市 i 的捷径数量, n 为网络中节点的数量。

接近中心度(Closeness Centrality)描述的是一个城市与其他城市的直接关联程度,即该城市在网络中“不受其他城市控制”的程度。该指标数值越大,说明该城市与其他城市的直接关联越多,捷径距离越短,在网络中越可能成为中心行动者。计算公式为:

$$C_c = \frac{n-1}{\sum_{j=1}^n d_{ij}} \quad (11)$$

式中, C_c 为接近中心度, d_{ij} 为城市 i 和 j 之间的捷

径距离, n 为网络中节点的数量。在有向图中, 可分别从“出”和“入”的角度考量节点的接近性, 因此接近中心度分为出度和入度。

(3) 网络群特征

块模型分析最早由 White et al 提出^[32], 为社会网络分析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该方法通过对网络中的节点进行分类和描述, 揭示网络结构中的角色与位置关系。一个块模型会将网络中的节点划分到不同位置, 每个位置内的节点具有结构对等性, 因此块模型属于位置层次的研究。Burt 对位置进行了分类研究, 其分类法既考虑关系是否主要出现在某个位置内部, 也考量这些纽带是否由其他位置指向该位置^[33]。在 Burt 研究的基础上, Wasserman & Faust 改进了位置的分类^[34]。假定在整个网络中有 g 个经济主体, 其中在位置 B_k 上有 g_k 个经济主体, 那么位置 B_k 各成员在整个网络中的所有可能关系总数为 $g_k(g-1)$, 位置 B_k 各成员内部的所有可能关系总数为 $g_k(g_k-1)$ 。据此, 可预期某个位置内部的关系占该位置全部关系的比例为: $\frac{g_k \times (g_k - 1)}{g_k \times (g - 1)} = \frac{g_k - 1}{g - 1}$ 。基于位置内部以及位置之间的关系, 可以给出四种位置的分类, 分为主收益、经纪人、孤立者、谄媚者^[34], 具体见表 2。

通过块模型分析, 能够反映空间关联网络的群特征, 揭示板块之间的关系及联结方式。处于主收益类型的城市, 往往既能高效吸纳外部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各类资源, 又拥有紧密的内部协作体系

来推动自身数字化转型进程; 孤立者类型的城市, 块内部协作紧密程度较高, 但接收外部数字化转型资源的比率较低, 在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方面与外界的互动交流相对较少; 谄媚者类型的城市, 通常块内部协作紧密程度不高, 同时接收外部数字化转型资源的比率较低, 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相关资源更多向其他板块的城市转移, 类似“讨好”外部优势城市; 经纪人类型的城市, 接收外部数字化转型资源的比率较高, 但块内部协作紧密程度不高, 善于在不同城市的全域数字化转型主体之间充当桥梁和纽带, 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信息流通共享, 助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工作的协同推进。

表 2 四种位置类型

位置内部的关系比例	位置接收到的关系比例	
	较小	较大
$\geq \frac{g_k - 1}{g - 1}$	孤立者	主收益
$\leq \frac{g_k - 1}{g - 1}$	谄媚者	经纪人

三、长三角地区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

(一) 网络结构特征

通过基于制度距离修正的引力模型, 确定长三角地区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空间关联关系, 并建立关系矩阵。为了直观展示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关联网络的结构形态, 利用 Matlab 绘制 2024 年的网络图(图 1)。可以看出, 长三角地区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空间关联呈现较为典型的网络结构形态, 各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在空间上普遍存在溢出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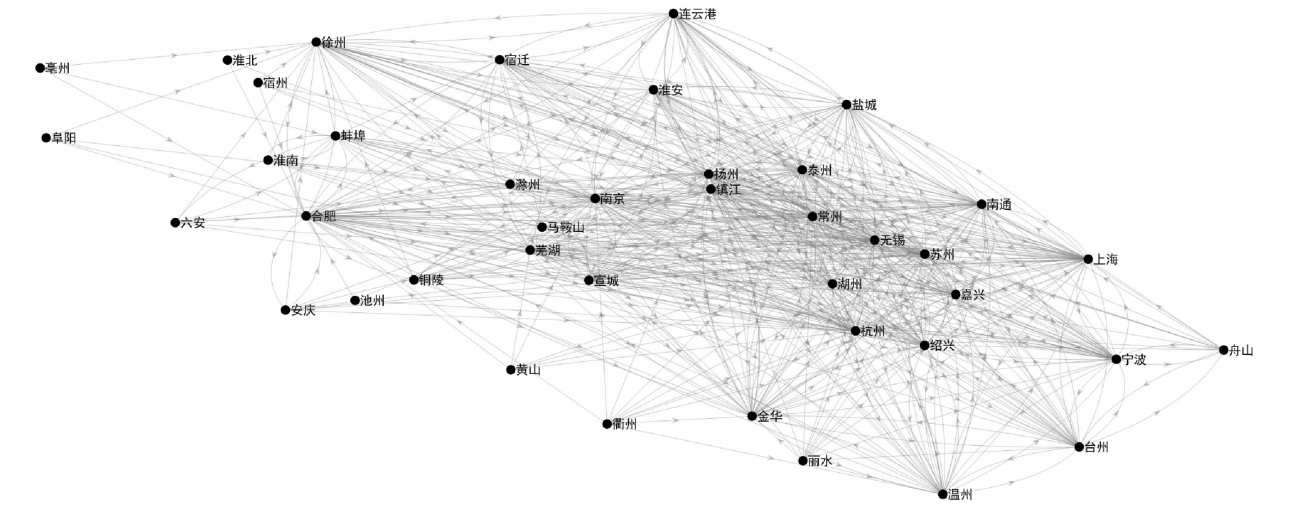


图 1 2024 年长三角地区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空间关联网络

表 3 给出了样本考察期内长三角地区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空间关联网络特征表现。从表 3 看出, 2022—2024 年间, 长三角地区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空

间关联的网络密度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从 2022 年的 0.362 上升到 2024 年的 0.411。这一趋势表明, 长三角地区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空间关联愈发密切。

表 3 整体网络结构特征

年份	网络密度	网络关联度	网络等级度	网络效率
2022	0.362	0.780	0.220	0.564
2023	0.392	0.854	0.146	0.612
2024	0.411	0.805	0.195	0.598

网络关联度、网络等级度与网络效率等指标可以共同衡量网络自身的稳健性 (robust) 和脆弱性 (vulnerability)。结果显示,网络关联度从 2022 年的 0.780 上升至 2023 年的 0.854,2024 年降至 0.805。2023 年网络关联度大幅上升,说明该年度城市间数字化转型的相互作用显著增强,各城市的数字化发展更具关联性,协同效应更为明显;2024 年虽有下降,但仍保持较高水平。网络等级度反映城市在数字化转型网络中地位的差异化程度。2023 年网络等级度下降,意味着长三角地区城市间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地位差异有所缩小,各城市数字化发展更趋均衡;2024 年网络等级度出现回升,说明长三角地区城市间的地位差异有所扩大,但总体趋势向好。网络效率衡量数字化转型信息或资源在城市间传递的便捷程度。2023 年网络效率提升,表明该年度长三角地区城市间数字化转型相关的信息、资源等流通更为顺畅,这可能得益于基础设施的完善、政策的优化等;2024 年网络效率虽有下降,但整体仍处于较高水平。这些变化共同表明,长三角地区 41 个城市在数字化转型方面,整体呈现联系愈发紧密、相互影响不断加深的态势,尽管在发展均衡性和信息传递效率上存在一定波动,但总体趋势向好。

(二)网络节点特征

通过计算点度中心度、中介中心度、接近中心度等指标开展网络中心性分析,揭示长三角地区各城市在数字化转型关联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表 4 给出了 2024 年的计算结果。

(1)点度中心度。从入度来看,长三角地区 41 个城市的点度中心度(入度)的均值为 0.411,高于这一均值的城市有 23 个。其中,入度较高的城市有南京(0.975)、杭州(0.950)、合肥(0.925)、上海(0.850),这些城市是区域内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资源汇聚中心,能够有效吸引区域内其他城市的数字化转型要素向其流动,在数字化转型资源集聚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入度为 0 的城市有衢州、丽水、淮北、黄山、阜阳、宿州、亳州、池州,这些城市缺乏吸引外部数字化转型资源的关键因素,因此很少有城市将数字化转型资源(如数字化技术、数字化人才等)辐射到这些城市。从出度来看,长三角地区 41 个城市的点度中心度(出度)高于均值的有 25 个。其中,较

高的城市为南京(0.625)、合肥(0.625)、杭州(0.600)等,这些城市在长三角地区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成果输出、技术扩散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出度较低的城市为阜阳、淮北、亳州、池州,这些城市对长三角其他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带动作用有限。

表 4 2024 年长三角地区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
空间关联的网络中心度

城市	点度中心度		中介中心度	接近中心度	
	入度	出度		入度	出度
上海	0.850	0.550	21.677	0.022	0.015
南京	0.975	0.625	89.683	0.024	0.016
无锡	0.825	0.600	22.546	0.021	0.015
徐州	0.650	0.375	21.579	0.019	0.012
常州	0.750	0.600	14.888	0.020	0.015
苏州	0.825	0.550	17.141	0.021	0.015
南通	0.725	0.525	8.157	0.020	0.014
连云港	0.475	0.500	2.198	0.016	0.014
淮安	0.475	0.525	4.714	0.016	0.014
盐城	0.525	0.550	3.905	0.017	0.015
扬州	0.675	0.550	11.370	0.019	0.015
镇江	0.575	0.550	6.619	0.018	0.015
泰州	0.675	0.600	10.386	0.019	0.015
宿迁	0.375	0.475	7.176	0.015	0.014
杭州	0.950	0.600	53.530	0.024	0.015
宁波	0.650	0.475	27.582	0.019	0.014
温州	0.550	0.450	2.520	0.017	0.013
嘉兴	0.550	0.500	2.853	0.017	0.014
湖州	0.475	0.525	4.066	0.016	0.014
绍兴	0.700	0.475	6.314	0.019	0.014
金华	0.675	0.500	6.088	0.019	0.014
衢州	0	0.275	0	0	0.012
舟山	0.050	0.300	0.063	0.011	0.010
台州	0.475	0.450	15.693	0.016	0.013
丽水	0	0.350	0	0	0.011
合肥	0.925	0.625	217.499	0.023	0.016
芜湖	0.625	0.550	58.891	0.018	0.015
蚌埠	0.150	0.350	81.845	0.013	0.013
淮南	0.025	0.175	0	0.009	0.011
马鞍山	0.100	0.375	3.532	0.013	0.013
淮北	0	0.075	0	0	0.010
铜陵	0.075	0.350	0.146	0.013	0.012
安庆	0.025	0.200	0	0.012	0.011
黄山	0	0.175	0	0	0.011
滁州	0.150	0.425	7.847	0.013	0.014
阜阳	0	0.100	0	0	0.010
宿州	0	0.125	0	0	0.011
六安	0.025	0.175	0	0.009	0.011
亳州	0	0.075	0	0	0.010
池州	0	0.075	0	0	0.010
宣城	0.300	0.525	11.495	0.015	0.014

(2)中介中心度。长三角地区 41 个城市的中介中心度均值为 18.098,排名前五的城市是合肥(217.499)、南京(89.683)、蚌埠(81.845)、芜湖(58.891)、杭州(53.530)。这些城市是长三角地区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信息和资源流通的重要节点,

在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要素的传递过程中起到不可或缺或中介作用,对数字化转型资源的流动路径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中介中心度为 0 的城市有淮北、黄山、丽水、衢州等 11 个。这些城市的中介中心度较低,表明它们在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信息和资源的传递路径中处于相对边缘或孤立的位置,在数字化转型资源整合方面几乎没有话语权。

(3)接近中心度。长三角地区 41 个城市的接近中心度(入度)均值为 0.014,排名靠前的城市包括南京(0.024)、杭州(0.024)、合肥(0.023)、上海(0.022)。这表明这些城市能够以较短路径或者较少环节获取其他城市的数字化转型信息和资源,处于数字化转型信息和资源“供应圈”的中心位置。接近中心度(入度)为 0 的城市为丽水、衢州、黄山等 8 市,它们在快速获取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信息以及整合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资源方面处于相对弱势的位置。就接近中心度(出度)而言,排名靠前的城市为南京(0.016)、合肥(0.016)、杭州(0.015)、上海(0.015)等。这些城市在传递最新的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技术成果、产业政策变化等信息时,比接近中

心度(出度)低的城市更及时、更便捷;同时,对于城市数字化转型所需资源,这些城市可以主动输送到其他城市。而接近中心度(出度)较低的城市有淮北、亳州、池州等,它们在主动信息扩散能力和资源输出主导性方面相对落后。

(三)网络群特征

通过块模型分析揭示 2024 年长三角地区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关联网络的空间聚类特征,采用 Concor 方法将 41 个城市划分为四个板块,相同模块内的城市具有结构对等性,即同一板块中的城市与其他板块城市之间具有相似的关系模式。其中,第一板块包含 20 个城市,分别是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淮安、盐城、扬州、镇江、泰州、宁波、温州、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舟山、台州、丽水、宣城;第二板块包含 7 个城市,分别是南京、杭州、合肥、芜湖、徐州、连云港、宿迁;第三板块包含 7 个城市,分别是衢州、蚌埠、马鞍山、铜陵、安庆、黄山、滁州;第四板块包含 7 个城市,分别是淮南、淮北、阜阳、宿州、六安、亳州、池州。各板块之间的溢出效应如表 5 所示。

表 5 2024 年长三角地区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关联板块的溢出效应

板块	接收关系数(个)				板块 成员数(个)	接收板块外 关系数(个)	溢出板块外 关系数(个)	期望内部 关系比例(%)	实际内部 关系比例(%)	块接收 比率
	板块 I	板块 II	板块 III	板块 IV						
板块 I	307	97	2	0	20	146	99	0.475	0.756	0.217
板块 II	99	42	9	0	7	157	108	0.150	0.280	0.233
板块 III	46	34	4	2	7	16	82	0.150	0.047	0.024
板块 IV	1	26	5	0	7	2	32	0.150	0	0.003

结果表明,板块 I 和板块 II 均为主收益类型,这主要得益于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构建的紧密空间关联网络。随着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城市间联系愈发紧密,数据、技术、人才、资金等关键要素突破地域限制,在城市间实现高效流动,不同城市的产业在数字化驱动下形成协同创新的良好格局。板块 III 属于经纪人类型,其与板块外城市保持紧密联系,但板块内部尚未构建起高度紧密的协同网络。在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中,这些城市扮演区域资源整合者的角色,在不同板块之间搭建沟通桥梁,是信息和资源流通的关键枢纽。板块 IV 属于谄媚者类型,其板块内合作较少,自身数字化转型关键要素更多被板块外发达城市获取,却难以接收到发达城市在数字化产业方面的辐射带动。

基于各板块之间的关联关系,进一步计算板块的密度矩阵。经测算,2024 年长三角地区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空间关联的整体网络密度为 0.411。在四大板块中,如果某一板块的网络密度高于 0.411,表明该板块的数字化转型联系集中度高于整体水

平,因此将板块网络密度大于整体网络密度的情形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得到像矩阵。像矩阵能够更清晰地显示各板块之间的溢出效应,密度矩阵和像矩阵的具体内容详见表 6。结果显示,在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中,板块 I 的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其内部和板块 II;板块 II 的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其内部和板块 I;板块 III、板块 IV 的溢出效应则主要作用于板块 II。

四、长三角地区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空间关联网络效应分析

结构往往决定属性数据的表现,更具有分析价值。在对长三角地区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运用面板回归模型进一步剖析该网络结构对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相关属性数据的影响效应。网络结构可从整体和个体两个层面考察,影响效应则体现在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水平及城市间差异两个方面。首先,对整体网络结构的效应展开分析。鉴于样本量,以长三角地区六大都市圈为分析对象,被解释变量分别为都

市圈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水平的均值和标准差,解释变量分别为网络密度、网络关联度、网络等级度、网络效率。其次,对个体网络特征的效应进行分析。以 41 个城市为分析对象,被解释变量为各城市的全

域数字化转型水平,解释变量分别为各城市的点度中心度(入度、出度)、中介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入度、出度)。

表 6 2024 年长三角地区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空间关联板块的密度矩阵和像矩阵

板块	密度矩阵				像矩阵			
	板块 I	板块 II	板块 III	板块 IV	板块 I	板块 II	板块 III	板块 IV
板块 I	0.808	0.693	0.014	0	1	1	0	0
板块 II	0.707	1.000	0.184	0	1	1	0	0
板块 III	0.329	0.694	0.095	0.041	0	1	0	0
板块 IV	0.007	0.531	0.102	0	0	1	0	0

注:像矩阵中 1 表示存在行指向列的关联关系,0 表示没有关联关系。

(一) 整体网络结构的效应分析

基于 2022—2024 年六大都市圈的面板数据,建立整体网络结构的效应分析模型,模型估计结果如表 7 所示。模型(1)—(4)以全域数字化转型水平

为因变量,模型(5)—(8)以全域数字化转型水平的标准差为因变量。稳健的 Hausman 检验结果表明,对于模型(1)—(8),随机效应模型比固定效应模型更能准确估计模型参数。

表 7 整体网络结构效应的回归结果

模型	(1)	(2)	(3)	(4)	(5)	(6)	(7)	(8)
常数项	0.627 *** (0.035)	0.610 *** (0.043)	0.683 *** (0.036)	0.614 *** (0.038)	0.152 *** (0.020)	0.196 *** (0.032)	0.118 *** (0.016)	0.190 *** (0.030)
网络密度	0.068 *** (0.021)				-0.022 * (0.012)			
网络关联度		0.073 ** (0.036)				-0.077 * (0.043)		
网络等级度			-0.073 ** (0.036)				0.077 * (0.043)	
网络效率				0.078 *** (0.027)				-0.081 * (0.047)
R ²	0.394	0.198	0.198	0.334	0.170	0.166		0.154
稳健的 Hausman	0.121	0.002	0.002	0.005	1.637	0.002	0.002	2.509
FR/RE	RE	RE	RE	RE	RE	RE	RE	RE

注:模型(1)—(4)的因变量为全域数字化转型水平,模型(5)—(8)的因变量为全域数字化转型水平的标准差;***、**、* 分别表示 1%、5%、10%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误。

(1)整体网络结构对全域数字化转型水平的影响效应。根据表 7 模型(1)—(4)的回归结果,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空间关联网络的网络密度、网络关联度、网络等级度、网络效率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068、0.073、-0.073、0.078,且分别通过了 1%、5%、5% 和 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表明,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对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水平具有显著影响,其中网络密度、网络关联度和网络效率起显著促进作用,网络等级度则呈显著负向影响。产生以上结果的原因在于:第一,较高的网络密度和网络关联度,意味着各城市在全域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的联系更为紧密。这种紧密联系为城市间的知识共享、技术传播搭建了便捷桥梁,使城市能够高效交流数字化转型中的先进经验、创新技术及前沿理念,加速新知识、新技术在区域内的传播扩散。同时,紧密

的网络联系有利于整合区域内的各类资源,推动数据、技术、资金等关键要素在城市间合理流动,为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提供强大资源支撑,进而有力推动转型进程。第二,高效的网络能够让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参与主体更迅速地获取各类信息,加快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迭代速度。在数字化技术交易、知识产权合作等领域,高效网络还能有效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交易成本,营造更加公平、透明的合作环境,从而激发更多创新合作活动。第三,显著的网络等级结构可能引发资源过度集中于少数高等级城市的问题。在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资源分配中,高等级城市凭借经济实力、政策支持、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优势,吸引大量资金、人才、技术等关键资源,导致周边低等级城市资源相对匮乏,制约其全域数字化转型能力,进而阻碍整体转型水平的提升。

(2)整体网络结构对全域数字化转型水平城市间差异的影响效应。根据表7模型(5)——(8)的回归结果,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空间关联的网络密度、网络关联度、网络等级度、网络效率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22、-0.077、0.077、-0.081,且均在10%的水平下显著。这一结果表明,网络密度、网络关联度和网络效率能够显著降低城市间的差异,使得城市间的全域数字化转型水平更加均衡,而网络等级度与城市间差异呈显著的正向关系。产生以上结果的原因在于:第一,较高的网络密度和网络关联度,促使知识、技术等关键转型要素能够在城市间更均衡地流动。在这样的环境下,先进的数字化技术和转型经验不再局限于少数发达城市,而是可以更广泛地传播到各个城市,让更多城市能够从中受益,实现全域数字化转型的共同进步,进而有效缩小城市之间在全域数字化转型水平上的差距。第二,高效的网络有利于城市间协同创新机制的建立。各城市在全域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能够凭借高效的网络,实现转型所需资源的共享,包括宝贵的数据资源、先进的创新平台等。通过资源共享,原本在资源储备上存在差距的城市,可以站在更接近的起跑线上,低水平城市能够借助共享的资源快速提升自身能力,高水平城市也能够协同创新中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从而有效缩小城市间差距。第三,显著的网络等级结构可能导致资源向高等级城市过度聚集。大量的资源不断流入高等级城市,使其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持续加速,进一步拉大与周边低等级城市的差距。而低等级城市由于资源被剥夺,在数字化建设方面面临诸多困难,转型速度缓慢,城市间差距不断扩大,影响区域整体的协调发展。

(二)个体网络结构的效应分析

基于2022—2024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面板数据,建立个体网络结构的效应分析模型。在样本考察期内,长三角地区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水平平均值为0.624,标准差为0.146,最小值为0.385,最大值为0.937。就2024年而言,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水平最高的5个城市为上海、杭州、苏州、南京、无锡,指数分别为0.937、0.931、0.838、0.837、0.819;水平最低的3个城市为黄山、池州、淮北,指数分别为0.430、0.425、0.418。面板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8所示。稳健的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模型(1)——(3)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比随机效应模型更能准确估计参数。回归结果显示,三类中心性指标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城市在网络中的中心性地位对其全域数字化转型水平

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表8 个体网络结构效应的回归结果

模型	(1)	(2)	(3)
点度中心度(入度)	0.146 *** (0.031)		
点度中心度(出度)	0.246 *** (0.039)		
中介中心度		0.002 *** (0.000)	
接近中心度(入度)			10.234 *** (1.990)
接近中心度(出度)			31.028 *** (8.538)
F	65.103 ***	32.489 ***	161.641 ***
R ²	0.619	0.214	0.732
稳健的 Hausman	34.263 ***	3.370 *	39.333 ***
FR/RE	FE	FE	FE

注:***表示在1%水平下显著,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误。

点度中心度反映城市的资源汇聚能力与信息优势。入度的回归系数为0.146,即入度每提高1%,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水平就会提高0.146%。入度高意味着城市能吸引更多外界关键转型要素,为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支撑。出度的回归系数为0.246,即出度每提高1%,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水平提高0.246%。出度高代表城市与外界建立联系的主动性强,既能扩大城市区域影响力,又能借助反馈机制优化自身转型能力。中介中心度反映城市的资源控制能力与传递优势。中介中心度高的城市在数字化转型空间关联网络中,处于信息和资源传递的关键节点,如同“桥梁”连接其他城市的转型交流。这类城市能控制知识、技术和资源在不同城市群体间的流动,通过整合和中转关键转型要素获取更多发展机会,还能优先接触多样化转型理念和前沿技术,为自身全域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撑,进而促进转型水平提升。接近中心度反映城市的高效交流能力与协同优势。入度高的城市在接收其他城市转型资源时更高效,能以低成本、短时间获取外部资源,减少信息损耗和延迟。出度高的城市在向外输出转型成果时更高效,有利于转型成果在区域内快速传播应用,提高成果影响力和价值,同时加强与其他城市的合作关系,进一步提升自身全域数字化转型水平。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2022—2024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数据,从网络结构视角探究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主要研究发现如下:(1)2022—2024年间,长三角地区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空间联系愈发密切,网络稳健性持续增强、脆弱性逐步降低。具体表现为:整体网络密度从0.362上升至0.411,网络关联度从

0.780 提升至 0.805,网络等级度从 0.220 下降至 0.195,网络效率从 0.564 上升至 0.598。(2)点度中心度层面,南京、杭州、合肥、上海等城市是区域内数字化转型资源汇聚中心,而衢州、丽水、淮北、黄山等城市缺乏吸引外部数字化转型资源的关键条件;南京、合肥、杭州等城市在转型成果输出、技术扩散等方面发挥核心作用,阜阳、淮北等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带动作用有限。中介中心度层面,合肥、南京、蚌埠、芜湖等城市是转型信息和资源流通的重要节点,对资源流动路径的控制能力强;淮北、黄山、丽水等城市处于相对边缘或孤立位置,对资源流动缺乏控制能力。接近中心度层面,南京、杭州、合肥、上海等城市处于信息资源“供应圈”的中心位置,丽水、衢州等城市获取信息和整合资源的能力较弱。(3)长三角地区 41 个城市划分为四大板块,板块 I(上海、苏州等)和板块 II(南京、杭州、合肥等)为主收益类型;板块 III(衢州、蚌埠等)为经纪人类型;板块 IV(淮南、淮北等)为谄媚者类型。(4)从整体网络结构效应来看,网络密度、网络关联度和网络效率对全域数字化转型水平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同时对城市间转型水平差异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从个体网络结构效应来看,城市在网络中的中心性地位对其全域数字化转型水平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到如下启示:第一,强化长三角地区区域协同合作。打破行政壁垒,深化城市间全域数字化转型合作,进一步提高网络密度和网络关联度。充分发挥中介中心度高的城市的“桥梁”和“枢纽”作用,带动周边城市协同发展。第二,优化长三角地区数字化转型网络结构。重视网络等级问题,避免资源过度集中在少数高等级城市。通过政策引导,增强政策公平性和普惠性,促进资源向低等级城市合理分配。第三,提升城市中心性地位。各城市要结合自身实际,因地制宜制定提升城市中心性地位的策略,实现城市中心性提升与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1]张鹏飞,李勇坚.我国数字经济现状及发展趋势[J].中国国情国力,2021(8):10-13.

[2]刘园园.四部门印发《指导意见》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N].科技日报,2024-05-21(2).

[3]张敬波.去年长三角数字经济增加值突破 12 万亿元[N].安徽日报,2024-11-22(1).

[4]汤志伟,方臻,张龙鹏.我国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意蕴与价值创造研究:以深圳龙华全域数字化转型为例[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

105-117.

[5]任宗强,矫丽娜,王振宇.长三角城市群数字化转型效率测度及评价:基于 DEA-Malmquist 模型[J].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6(6):104-114.

[6]霍春辉,何地.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助力数字中国建设[J].中国网信,2024(9):56-59.

[7]高国力.准确把握战略性、系统性、协同性特征 全面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实施[J].中国信息界,2024(7):3-5.

[8]田秀杰,孙瑞琦,鹿传磊.数字技术空间关联网络对城市碳减排的影响:基于网络节点中心性视角[J].环境科学,2025,46(10):6185-6197.

[9]杜传甲,王成军.我国省际数字经济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统计与决策,2023,39(4):106-110.

[10]孙亚男,王艺霖.我国数字经济的空间关联网络研究[J].统计研究,2024,41(6):44-56.

[11]李俊霞,逯苗苗.城市数字治理的空间关联关系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J].统计与管理,2024,39(4):122-128.

[12]邵林,梁桂香,杨玉波,等.中国数字贸易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及其驱动因素[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7(1):55-71.

[13]CHU H, NING Y, QIE X. Measurement and spatial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J]. Sustainability, 2023, 15(18):13329.

[14]徐梦周,朱永竹,杨大鹏.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关联与协同治理: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J].治理研究,2022,38(5):102-112,128.

[15]WANG Z, CHEN Y. Exploring spatial patterns of interurban passenger flows using dual gravity models[J]. Entropy, 2022, 24(12):1792.

[16]WANG F, REN J, LIU J, et al. Spatial correlation network and population mobility effect of regional haze pollu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in China[J].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2021, 23:15881-15896.

[17]李梦程,王成新,刘海猛,等.黄河流域城市发展质量评价与空间联系网络特征[J].经济地理,2021,41(12):84-93.

[18]高宏旭,张明善,李楠新.乡村振兴发展动态的空间关联网络特征[J].统计与决策,2024,40(19):55-60.

[19]LIU D, WANG Y, WANG L, et al. Analysis of spatiotemporal changes in the gravitational structure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Xinjiang based on a gravitational model[J]. Land, 2024, 13(1):29.

[20]贺灿飞,毛熙彦.尺度重构视角下的经济全球化研究[J].地理科学进展,2015,34(9):1073-1083.

- [21] 王雨,张京祥.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机制与效应:基于制度距离的空间发展解释[J]. 经济地理,2022,42(1): 28-36.
- [22] 新华三集团数字中国研究院. 城市数字化发展指数(2022—2024)[R/OL]. [2025-08-22]. https://www.h3c.com/cn/About_H3C/Home/Faq_White_Paper/.
- [23] 刘华军,刘传明,孙亚男. 中国能源消费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及其效应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2015(5): 83-95.
- [24] 李敬,陈澍,万广华,等.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关联及其解释:基于网络分析方法[J]. 经济研究,2014,49(11):4-16.
- [25] LIU J B, ZHENG Y Q, LEE C C.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regional air quality index of Yangtze River Delta based on complex network theory[J]. Applied Energy, 2024(357): 122529.
- [26] 韩佳容. 中国区域间的制度性贸易成本与贸易福利[J]. 经济研究,2021,56(9):124-140.
- [27] 王雨,张京祥,周子航. 从地理距离到“制度距离”:区域一体化的影响机制与空间效应测度[J]. 城市发展研究, 2022,29(12):112-121.
- [28] EVERETT M G, KRACKHARDT D. A second look at Krackhardt's Graph Theoretic Dimensions of Informal Organizations[J]. Social Networks,2012,34(2):159-163.
- [29] KRACKHARDT D. Graph theoretical dimensions of informal organizations[C]//Carley K, Prietula M. Computational organizational theory[M]. Hillsdale: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1994:89-111.
- [30] VRAGOVIC I, LOUIS E, DÍAZ - GUILERA A. Efficiency of informational transfer in regular and complex networks[J]. Physical Review E,2005,71(3):036122.
- [31] LATORA V, MARCHIORI M. A measure of centrality based on network efficiency[J]. New Journal of Physics,2007(9):188.
- [32] WHITE H C, BOORMAN S A, BREIGER R L. Social structure from multiple networks I blockmodels of roles and position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6,81(4):730-780.
- [33] BURT R S. Positions in networks[J]. Social Forces,1976,55(1):93-122.
- [34] WASSERMAN S, FAUST K.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394-423.

(责任编辑 刘成贺)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Association Network of Urban All-Dimension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SUN Luyun, ZHOU Benda

(School of Finance and Mathematics, West Anhui University, Lu'an, Anhui 237012, China)

Abstract: Urban all-dimension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an important engine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Taking 41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s network nodes,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spatial association network for urban all-dimension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with a gravity model revised by institutional distance. Through complex network analysis and panel regression model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network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effects of urban all-dimension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1) During 2022-2024, the connection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mong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close. The network structure shows trends of increasing network density, connectivity, and efficiency, while decreasing hierarchy. (2) The analysis of network node characteristics indicates that, during the process of urban all-dimension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ifferent cities vary in their capabilities of resource aggregation,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The Block-model analysis further divides the cities into four functional blocks. (3) The network density, connectiv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spatial association network of urban all-dimension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overall region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level and its spatial equilibrium. The centrality position of a city in the network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its own all-dimension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level.

Key words: urban all-dimension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igital China; spatial association; complex network

新发展格局下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问題与对策

王中亚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商业经济研究所, 河南 郑州 451464)

摘要:国家中心城市是我国城镇体系的“塔尖”,要在服务国家战略实施、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承担起引领带动、主体支撑与示范探索的使命责任。近年来,郑州市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国家中心城市建没蹄疾步稳,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有进、进中向好”的良好态势。新发展格局下,郑州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面临着一些新问题,如首位度不高、创新能力不强、国际化水平偏低、城市承载力较弱等。面向未来,郑州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扩大内需战略,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坚定不移提升国际化水平,持续增强城市综合承载力,确保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没提质进位,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再建新功。

关键词:新发展格局;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郑州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6.005

中图分类号:F29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6-0030-06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外部环境变化作出的重大决策。2017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郑州要努力建设具有创新活力、人文魅力、生态智慧、开放包容的国家中心城市。国家中心城市是我国城镇体系的“塔尖”,具有区位枢纽性、服务综合性、发展引擎性、创新引领性等功能特征,要在服务国家战略实施、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挑大梁、担重任,承担起引领带动、主体支撑以及示范探索的使命责任。近年来,郑州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惠民生、保稳定、防风险等各项工作,国家中心城市建没蹄疾步稳,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有进、进中向好的良好态势。本文在梳理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没新进展的基础上,剖析新发展格局下其面临的新问题,提出推进高水平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没取得的新进展

(一)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近年来,郑州市强化有效投资关键作用,通过项目建设夯实综合实力——建立市级领导分包重大项目机制,实施重点项目集中攻坚行动,形成“项目牵引、投资驱动”的新发展格局。同时,以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为抓手,持续开展“醉美·夜郑州”系列消费活动,充分释放消费基础效能。2024年,郑州市地区生产总值完成14532.1亿元,增长5.7%,增速在9个国家中心城市居于前列^[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5884.6亿元,增长4.7%;货物进出口总值5565.8亿元,增长0.8%;财政收支方面,全年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55.0亿元,下降0.9%,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525.7亿元,增长0.4%,见表1。2025年1—4月,经济运行开局向好,主要指标领跑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6%(高于全国2.2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4%(高于全国1.4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6.7%(高于全国1.6个百

收稿日期:2025-08-20

作者简介:王中亚(1978—),男,河南商丘人,博士,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商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产业经济。

分点),延续了稳中有进的发展势头。

表 1 2018—2024 年郑州市经济发展主要指标

年份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亿元)	进出口总值(亿元)
2018	10670.1	4863.9	1152.1	1763.3	4105.0
2019	11586.4	5324.4	1222.5	1910.7	4129.9
2020	11850.3	5076.3	1259.2	1721.3	4946.4
2021	12538.0	5389.2	1223.6	1624.4	5892.1
2022	12735.8	5223.1	1130.8	1456.4	6069.7
2023	13617.8	5623.1	1165.8	1519.6	5522.3
2024	14532.1	5884.6	1155.0	1525.7	5565.8

资料来源:《郑州统计年鉴 2024》及郑州市统计局网站相关信息。

(二) 创新引擎动能强劲

国家中心城市肩负着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使命,其创新引领作用将为企业合作创建搭建良好平台^[2]。在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郑州创新引擎动力澎湃,为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2024 年,郑州市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为 13.7%,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高 3.2 个百分点,专利授权量 3.88 万件,技术合同成交额 803.7 亿元。2024 年末,郑州全市共有省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050 家,见表 2。据赛迪顾问城市经济研究中心

发布的《科技城百强榜(2024)》,郑州中原科技城在全国 348 个科技城(科学城)中综合竞争力和发展潜力排名第 15 位,比 2023 年跃升 4 个位次。据河南省科技厅发布的《河南省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 2024》显示,郑州综合科技创新水平全省第一,郑州都市圈协同创新发展成效显著。2025 年 1—4 月,郑州全市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30.3%,高于全省 5.7 个百分点。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5.2 倍。

表 2 2018—2024 年郑州市科技创新主要指标

年份	高新技术企业数(个)	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	专利授权量(件)	技术合同成交额(亿元)	省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家)
2018	1323	12.4	31585	82.3	361
2019	2048	10.9	33679	127.5	361
2020	2918	12.7	50224	212.8	600
2021	4130	26.5	62853	306.5	718
2022	5189	14.0	52031	509.3	854
2023	5700	17.2	40200	654.8	1020
2024	5800	13.7	38800	803.7	1050

资料来源:《郑州统计年鉴 2024》及郑州市统计局网站相关信息。

(三) 产业支撑更加坚实

促进产业发展是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最可靠的支撑和动力^[3]。近年来,郑州以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抓手,不断夯实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基础,三次产业协同发展态势良好。一是加快先进制造业高地建设,新型工业化顺利推进。郑州市制定实施元宇宙、量子科技、传感器、卫星等 20 条重点产业链三年行动方案,建立健全“一链一专班一研发机构一图八清单”推进机制。2024 年,郑州市第二产业增加值实现 5483.1 亿元,增长 8.0%;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5%,增速位列 9 个国

家中心城市首位。二是第三产业快速发展,重点行业表现活跃。2024 年,郑州市第三产业增加值 8857.8 亿元,增长 4.3%,见表 3。2025 年 4 月,郑州全市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13.4%,高于全国 7.1 个百分点,限额以上单位中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34.1%,连续 8 个月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三是农业生产形势稳定,畜牧业快速发展。2024 年,郑州市粮食总产量 151.8 万吨,同比增长 7.1%。2024 年,郑州市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 1.3 : 37.7 : 61.0,既保持了制造业合理比重,也实现了产业结构优化调整。

表 3 2018—2024 年郑州市产业发展主要指标

年份	第二产业增加值(亿元)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第三产业增加值(亿元)	粮食总产量(万吨)	三次产业结构
2018	4335.2	6.8	6183.9	157.3	1.4 : 40.6 : 58.0
2019	4540.8	6.1	6904.4	149.7	1.2 : 39.2 : 59.6
2020	4662.9	6.1	7016.1	146.4	1.5 : 39.3 : 59.2
2021	4910.4	10.4	7441.4	135.3	1.4 : 39.2 : 59.4
2022	4936.7	4.4	7615.3	137.8	1.4 : 38.8 : 59.8
2023	5373.4	12.8	8072.2	141.8	1.3 : 39.4 : 59.3
2024	5483.1	10.5	8857.8	151.8	1.3 : 37.7 : 61.0

资料来源:《郑州统计年鉴 2024》及郑州市统计局网站相关信息。

(四) 改革开放持续深化

关键领域改革取得重大成效。自 2017 年挂牌以来,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片区累计形成制度创新成果 394 项,其中全国首创 56 项,全省首创 113 项,12 项在全国复制推广。2024 年 9 月,郑州市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实践,入选国家数据局发布的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2024 年 11 月 1 日,第二届“郑州企业家日”活动成功举办,以城市之名向企业家致敬,营造关爱、尊重企业

表 4 2018—2024 年郑州市开放发展主要指标

年份	货物进口总值(亿元)	货物出口总值(亿元)	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个)	国际机场货邮吞吐量(万吨)	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万人次)
2018	1527.9	2577.1	82	51.5	2733.5
2019	1451.6	2678.3	85	52.2	2912.9
2020	1997.6	2948.8	101	63.9	2140.7
2021	2339.3	3552.8	133	70.5	1895.5
2022	2473.4	3596.3	73	62.5	922.2
2023	1953.2	3569.1	107	60.8	2535.8
2024	2014.8	3551.0	152	82.5	2851.1

资料来源:《郑州统计年鉴 2024》及郑州市统计局网站相关信息。

(五) 绿色发展加快推动

城市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阵地,要把绿色低碳理念贯穿城市建设各个方面和全过程。近年来,郑州市大力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着力推进黄河湿地生态保护修复,沿黄生态廊道持续提升。2023 年,郑州市绿化覆盖面积 41821 公顷,同比增长 3.9%,园林绿地面积 36800 公顷,同比增长 4.5%,公园绿地面积 14042 公顷,同比增长 4.3%,见表 5。2024 年,郑州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

表 5 2018—2023 年郑州市绿色发展主要指标

年份	绿化覆盖面积(公顷)	园林绿地面积(公顷)	公园绿地面积(公顷)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平方米)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2018	25065	21544	8928	14.30	40.80
2019	26795	23194	9704	14.47	41.05
2020	37417	32594	12509	14.70	41.50
2021	39181	34169	13058	15.27	41.63
2022	40262	35203	13462	14.62	39.34
2023	41821	36800	14042	15.32	41.72

资料来源:《郑州统计年鉴 2024》及郑州市统计局网站相关统计信息。

(六) 人民福祉不断增进

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切实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推进共同富裕。2018—2024 年,郑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39042.15 元增至 50494.30 元,年均增长 4.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1651.82 元增至 31932.50 元,年均增长 6.7%,城乡收入差距呈逐步缩小态势。2024 年,郑州市每万人本专科在校学生数 1094 人,卫生技术人员数 154100 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678.2 万人,见表 6。2024 年,郑州市

家的良好氛围。2024 年 11 月 16 日,河南中牟新区正式揭牌。高水平开放巩固提升。240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落地实施。2024 年,郑州机场旅客吞吐量 2851.1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82.5 万吨,见表 4。内陆地区首个国际公路运输集结中心建成,中欧班列开行 3601 班。跨境电商交易额 1450 亿元,跨境电商综试区跻身全国 10 强。截至 2024 年 10 月,郑州已经与日本埼玉市、美国里士满市、罗马尼亚克鲁日·纳波卡市等 14 个城市建立了国际友好城市关系。

善,优良天数 231 天,比 2023 年增加 5 天。水环境质量持续提升,7 个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全部达标,南水北调“一渠清水永续北送”。土壤环境质量稳定,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得到有效保障,国家“无废城市”中原样板初具规模,建成“无废细胞”260 余个。能源结构方面,郑州全市清洁能源发电装机占全市发电装机的 28.3%。绿色制造方面,创建省级以上绿色制造体系 162 家,国家级绿色工厂 63 家。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5994.20 元,增长 5.0%;市民出行条件持续改善,全市新增公共停车泊位 10.09 万个,新开公交线路 10 条、优化公交线路 30 条;居民休闲健身空间持续拓展,市区建成区新增公园游园 33 个,新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 296 处。

二、新发展格局下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面临的新问题

(一) 首位度不够高

与其他国家中心城市相比,郑州市经济发展实力仍需提升,其对全省经济发展的带动与引领作用相对有限,这直接影响郑州国家中心城市高水平建

设与郑州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活力。2024 年,郑州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14532.1 亿元,同期河南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为 63590.0 亿元,据此计算郑州的经济首位度为 22.9%。而同为国家中心城市的西安(37.5%)、成都(36.3%)、武汉(35.2%),经济首位度均显著高于郑州,差距较大。从人口首位度看,

表 6 2018—2024 年郑州市民生事业主要指标

年份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每万人本专科在校学生数(人)	卫生技术人员数(人)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2018	39042.15	21651.82	824	114920	450.2
2019	42087.40	23535.50	873	121189	491.8
2020	42887.10	24782.90	920	133549	568.3
2021	45245.80	26790.30	1000	136742	603.9
2022	46286.50	28236.97	1037	143359	627.6
2023	48739.69	30382.98	1072	148769	648.3
2024	50494.30	31932.50	1094	154100	678.2

资料来源:《郑州统计年鉴 2024》及郑州市统计局网站相关统计信息。

表 7 2024 年我国部分省会城市首位度

城市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经济首位度(%)	年末常住人口(万人)	人口首位度(%)
长春	7632.2	53.1	908.5	39.2
西安	13317.8	37.5	1316.8	33.3
成都	23511.3	36.3	2147.4	25.7
武汉	21106.2	35.2	1380.9	23.7
兰州	3742.3	28.8	443.7	18.0
长沙	15268.8	28.7	1061.7	16.2
沈阳	9027.1	27.7	924.3	22.2
合肥	13507.7	26.7	1000.2	16.3
福州	14236.8	24.6	850.1	20.3
杭州	21860.0	24.3	1262.4	18.9
郑州	14532.1	22.9	1308.6	13.4
南昌	7800.4	22.8	667.0	14.8
广州	31032.5	21.9	1897.8	14.8
太原	5418.9	21.3	551.5	16.0
石家庄	8203.4	17.3	1124.7	15.2
济南	13527.6	13.7	951.5	9.4
南京	18500.8	13.5	957.7	11.2

注:因四舍五入,部分数据与统计公报数据略有差异。

(二)创新能力偏弱

2023 年,郑州研发经费支出为 369.8 亿元,研发投入强度为 2.72%,在 9 个国家中心城市中居第 8 位,与北京的 6.73%、西安的 5.23% 相比,研发投入强度差距显著(见表 8)。2023 年,郑州拥有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14 家,而同期北京拥有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77 家,广州拥有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22 家。截至 2023 年底,驻郑两院院士为 32 名,同期在广州院士活动中心服务的在穗全职院士达 65 人。2024 年 1 月 28 日,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中国城市科技创新发展报告(2023)》,郑州科技创新总指数为 0.2797,在全国城市排名第 26 名;与排名靠前的北京(0.7309)、深圳(0.6572)、上海(0.6099)、广州(0.4211)等城市相比,指数差距较大,且在 9 个

2024 年底郑州常住人口为 1308.6 万人,同期河南全省常住人口为 9785 万人,郑州人口首位度为 13.4%;对比西安(33.3%)、成都(25.6%)、武汉(23.7%)等城市,郑州人口集聚能力仍有明显差距,见表 7。

国家中心城市中处于末位。

表 8 2018 年和 2023 年国家中心城市研发投入强度对比

城市	研发经费支出(亿元)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研发投入强度(%)	
	2018 年	2023 年	2018 年	2023 年	2018 年	2023 年
北京	1870.8	2947.1	33106.0	43760.7	5.65	6.73
上海	1359.2	2100.0	36011.8	47218.7	3.77	4.45
天津	492.4	582.5	13362.9	16737.3	3.68	3.48
重庆	410.2	746.7	21588.8	30145.8	1.90	2.48
成都	392.3	824.1	15698.9	22074.7	2.50	3.73
广州	600.2	1043.0	22859.4	30355.7	2.63	3.44
武汉	477.7	761.2	14928.7	20011.7	3.20	3.80
郑州	185.3	369.8	10670.1	13617.8	1.74	2.72
西安	426.1	628.2	8499.4	12010.8	5.01	5.23

资料来源:各市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

(三)国际化水平偏低

根据全球化与世界级城市研究小组与网络(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Study Group and Network, GaWC)的权威排名,香港、上海、北京、广州、台北、深圳属于世界一线城市,而成都、天津、南京、杭州、重庆、武汉、长沙、厦门、郑州、沈阳、西安、大连和济南属于世界二线城市。当前,郑州市国际友好城市和友好交流城市分别达到 14 个、34 个,而北京市区两级国际友好(交流)城市高达 287 个,差距明显。从全国千万级机场旅客吞吐量来看,2024 年上海浦东机场客流量 7678.70 万人次,广州白云机场 7636.48 万人次,北京首都机场 6736.74 万人次,位列全国前三;郑州新郑机场以 2851.09 万人次的客流量,在全国排名第 16 位。在领事馆数量方面,上海、广州优势显著:上海地区共有 76 个领事馆,位居全国首位;广州以 65 个领事馆紧随其后,排名第二;成都、重庆、沈阳分别拥有 20 个、12 个和 8 个领事馆;而郑州的领事馆片区目前仍停留在规划阶段,尚未有实际落地的领事馆机构。

(四)城市承载力不足

城市是人口高度聚集的区域,也是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的重点区域,更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集合点,因此城市可持续发展是新发展格局下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必须面对的重大战略问题。截至2024年末,河南常住人口为9785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22%,较2018年的51.71%提升7.51个百分点。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郑州在土地、水、能源、交通等关键领域及生态环境方面的承载力矛盾日益突出。以水资源为例,郑州地处内陆,属于典型的缺水城市。相关资料显示,郑州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98立方米,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500立方米“极度缺水”警戒线,水资源短缺问题严峻。再以土地资源为例,2024年郑州常住人口城镇化率81.0%,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822.30平方公里,当前国土开发处于“存量挖潜”与“增量建设”并存的阶段,土地资源日益短缺与部分存量土地利用效率不高的双重问题十分突出,对城市扩容与产业升级形成制约。

三、新发展格局下郑州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新对策

(一)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将创新摆在发展的逻辑起点、现代化的核心位置,坚定走好创新驱动发展“华山一条路”。一是完善创新体系。将创新作为“一号工程”,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带动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与业态创新;将创新要素投入、新兴产业发展、创新主体引育、科技成果转化等指标纳入领导干部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全力建设国家创新高地与人才高地。二是搭建创新平台。持续深化河南省科学院重建重振、中原科技城、国家技术转移郑州中心“三合一”融合发展;依托中原医学科学城,打造医学科学创新高地;加快推进大科学装置建设,构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4]。三是培育创新文化。在全社会弘扬科学精神,营造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开放包容的创新氛围;鼓励更多青年才俊投身科研事业,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注入新鲜血液。四是厚植创新沃土。实施更加积极开放的人才政策,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确保青年人才“来得了、留得下、发展得好”;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在科研黄金期突破关键技术、干出突出业绩。

(二)矢志不渝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充分发挥内需拉动作用,深入实施“消费与投资良性互动、相互促进”的扩大内需政策,强化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与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5]。一是建立完善

扩大消费长效机制。全面落实就业优先战略,通过稳定就业夯实消费基础;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完善分配制度,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稳定并扩大餐饮、住宿、文化、旅游等传统消费,培育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等新型消费;积极拓展乡村消费市场,激活农村消费潜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畅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全链条,规范流通环节管理,建设现代化流通体系,降低物流成本。二是精准发力扩大有效投资。坚持“项目为王”理念,压茬推进“三个一批”(签约一批、开工一批、投产一批)项目建设;围绕农田水利、新型基础设施、现代综合交通等重点领域,谋划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支撑性的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优化供给结构。三是充分释放城乡内需活力。深入实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推动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加快郑州都市圈建设步伐,培育壮大副中心城市与区域中心城市,形成“核心引领、多点支撑”的内需格局;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投入乡村建设;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释放农村内需潜力。

(三)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立足郑州产业基础与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开辟发展新赛道、拓展新领域,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以新质生产力激活国家中心城市高水平建设的新引擎。以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为引领,依托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一是推动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做大做强电子信息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智能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培育一批带动效应显著的产业链链主企业,通过“做强链主、做长链条、做优链环”,加快建成链群完整、特色鲜明、融通发展的产业链生态。二是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聚焦量子信息、元宇宙、卫星等科技前沿领域,争创国家未来产业先导示范区;全力建设“量子之城”“中国元谷”,打造“卫星+”产业发展高地与创新应用标杆城市,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先机。三是推动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加快现代食品、铝精深加工、服装家居、新型耐材等优势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融合化方向发展,有效支撑制造业比重保持基本稳定,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郑州制造在全国乃至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与竞争力。

(四)坚定不移提升国际化水平

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进一步扩大制

度型开放,提升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质量与效率。坚持“枢纽+开放+产业+平台”的发展路径,着力构建国际航空客货运“双枢纽”,大力培育现代服务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家内陆开放新高地:一是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积极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国际贸易规则,加快建设《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示范区,推动开放型经济制度创新。二是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大力发展口岸经济,强力推进“口岸+产业”“口岸+物流”建设,加快内陆综合性大口岸提质升级;持续拓展延伸对外开放通道,深入实施“班列+产业”行动,推进国际合作与产业技术应用示范中心落地,推动“运输—贸易—产业”联动发展。三是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充分发挥郑州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竞争优势,培育和引进跨境电商头部企业,将郑州打造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跨境电商之都”;依托河南及全国中华老字号资源,在郑州筹建“中华老字号一条街”,吸引河南本地及省外优质老字号入驻;以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为内核,为郑州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注入新内涵,增设文字文化、根亲文化、姓氏文化、商业文化、民俗文化、哲学思想、艺术传承等特色板块。

(五)持续增强城市综合承载力

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是工业化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对郑州城市承载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需从多维度提升综合承载效能:一是增强土地承载能力。科学编制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专项规划,实施低

效建设用地减量化行动;充分发挥政策导向和激励倒逼作用,完善“亩均论英雄”政策体系,提升土地利用效率。二是增强生态承载能力。统筹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三生”分布,有效破解人地矛盾、人水矛盾;构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双评价”体系,为城市生态保护与开发提供科学依据。三是增强资源承载能力。强化对水资源、森林资源等关键资源的动态监测与评估,健全完善资源资产保值增值机制;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强废弃资源再生利用与循环利用,提升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化水平。四是增强环境承载能力。坚决贯彻落实河长制、湖长制、路长制,明晰各级责任主体的权责边界;开发环境污染风险评估与智能预警系统,实时监测环境污染风险,完善环境污染应急预案与分区预警机制,提升环境风险防控能力。

参考文献:

[1]何雄.郑州市政府工作报告[N].郑州日报,2025-02-13.
[2]王巍,师婷婷,姜智鑫.国家中心城市的创新引领作用:来自企业异地合作创新的证据[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24,39(1):19-35.
[3]熊若愚.夯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产业支撑[J].先锋,2017(7):27-29.
[4]安伟.众志成城拼经济 奋勇争先挑大梁[N].郑州日报,2025-02-11.
[5]金梦迪,段雨晨,李彬.扩大内需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研究[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4,15(3):145-158.

(责任编辑 刘成贺)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Zhengzhou National Central City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WANG Zhongya

(Institute of Business Economics, He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Zhengzhou, Henan 451464, China)

Abstract: The national central city is the “tower top” of China’s urban system, which should assume the mission responsibility of leading, supporting and demonstrating in serv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strategies and construct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n recent years, Zhengzhou has adhered to the general tone of seeking progress with while maintaining stabil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entral cities has been advanced steadily, an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as shown a steady and progressive trend.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Zhengzhou’s national central city is facing some new problems, such as low primacy, weak innovation ability, low level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weak urban carrying capacity. Facing the future, Zhengzhou should further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accelerate the cul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nhance the level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continuously enhance the comprehensive carrying capacity of the city, ensure the quality and advancement of Zhengzhou’s national central city construction, and strive to write a new chapter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Central Plain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national central cit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Zhengzhou

数智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常态化 宣传教育的机理、困境与实践路径

黄治国,王雪可

(河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随着国家数字化战略的深入实施以及智能技术在文化传播领域应用的持续拓展,数智技术在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常态化宣传教育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数智化传播、智能交互等技术手段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工作的常态化推进和落实提供了坚实支撑。当下,数智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常态化宣传教育面临着多重困境,如基础设施与应用能力区域失衡、内容与思想深度不足、算法茧房与数字鸿沟所致的边缘化风险等。为此,应通过加强数智基础设施建设、突出内容的思想性和精准性、构建协同合作机制以及完善评估反馈机制和防范风险等举措,充分发挥数智技术的优势,使其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常态化宣传教育的强大技术后盾,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数智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机理;困境;路径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6.006

中图分类号:D64;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6-0036-0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在此聚焦。”^[1]这一重要论断科学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实现民族复兴伟业中的根本性、战略性地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精神纽带,是应对风险挑战、凝聚磅礴力量的思想基石,将其铸牢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强调“要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2]。面对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上升的复杂形势,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常态化宣传教育是浸润思想、凝聚共识、巩固认同的关键路径。然而,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常态化宣传教育工作仍存在不少困难和挑战,例如覆盖面不足、吸引力不强、长效机制不健全以及精准性不够等,这些问题迫切要求宣传教育工作在基础设施、内容、形式、方法、机制上进行深刻变革与创新突破。

与此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智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应用在社会各领域中,赋予时代鲜明的智能属性与数字基因,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讲好中华民族故事,大力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新涉民族宣传的传播方式。”^[3]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新兴技术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常态化宣传教育提供了全新的途径^[4]。数智赋能,即深度融合数字智能技术与宣传教育工作全链条,不仅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选择,更是提升中华民

收稿日期:2025-09-10

基金项目:2025年度河南工业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数智赋能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常态化教育的机理与路径研究”(JXYJ2025090)

作者简介:黄治国(1979—),男,河南郑州人,博士,河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王雪可(1995—),女,河南周口人,河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精准性、吸引力、覆盖面和持久性的关键突破口和迫切需求。

一、数智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常态化宣传教育的机理

(一)知识学习机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认知的知识根基

数智技术重构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知识的学习生态,使其从“阶段性教育”转向“日常化习得”。在线教育平台构建了系统化知识体系,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为学校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提供了数字支持。具体来看,该平台通过建立系统化的数字学习资源库,收录党史学习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优秀传统文化等众多内容,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持续深化对“五个认同”的理解;开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专题课程,涵盖历史脉络(如各民族共同开发边疆)、理论内涵、实践案例(如东西部协作帮扶)等内容,支持同步学习与异步回看;学习强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答题赛,通过高频次、互动性强的答题活动,引导人们深入学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知识。

智能学习工具通过趣味化设计提升学习效果:动画短片《石榴籽的故事》采用拟人化手法,生动讲述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互动式知识卡片则通过“拖拽匹配”“答题闯关”等形式,让用户在沉浸式游戏体验中掌握“中华民族发展史”等核心知识。这些创新举措将原本严肃的理论知识转化为鲜活有趣的学习内容,使学习过程更加生动有趣,记忆更加深刻,让民族文化不再被“束之高阁”,而是“触手可及”^[5]。

数字技术更构建了“常态化学习机制”。利用通勤或者午休等碎片化时间,浏览1—3分钟的民族知识短视频就能进行学习;大数据会根据每个人的浏览记录,自动匹配内容难度,如对青少年推送的是图文结合的故事,干部群体则推送政策解读和相关案例;通过积分、勋章、排行榜等方式,激励用户形成“每日学、持续学”的习惯。数智技术将单一化、碎片化的文化基因进行建构重组,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一次次点击中悄然扎根。

数智技术的系统化供给、趣味化呈现与常态化机制设计,为知识学习机理、知识的内容生产、文化的内涵表达及传播提供了全新路径,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习融入日常生活场景,为常态化宣传教育提供了“低门槛、可持续”的学习保障^[6]。

(二)文化认同机理:增进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的联结机制

数智技术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传承与认

同构建了全新路径。以数智化实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多维内容表达,在传统性与流行性中创新解读模式,持续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感召力,进而不断增进各民族成员的身份认同与情感归属^[7]。

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博物馆行业积极探索“云展览”“数字博物馆”等形式,从“云端”延伸至线下、从传承迈向创新发展,“数字+”“智能+”与“博物馆+”深度融合,孕育出大量的新实践^[8]。譬如,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与SUMG·新华文创合力打造的“AR数字探寻龟兹文化遗产之美”数字导览体验,重现了龟兹民俗服饰、文化故事以及古乐器、乐舞等艺术内容,让文化遗产“立体重现”,帮助观众更深刻地理解壁画背后的故事和深层次的文化内涵;西藏布达拉宫的VR漫游项目,让全球用户足不出户即可体验藏式建筑艺术与宗教文化中的共同体元素。这些数字化举措不仅减少了文化遗产的实体损耗、降低了永久流失风险,更打破了地域限制,提升了中华文化传播效能,使各民族文化成果成为全民共享的精神财富,最终合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文化体验游戏则通过互动参与强化认知:少数民族系列小游戏中,玩家可对中国少数民族服饰自由搭配,搭配后可触发文化背景解读,从中理解不同文化的特色与共性;AI驱动的“文化拼图”工具,能自动生成融合多民族服饰、建筑、饮食元素的创意图像,直观展现“多元一体”的文化特质。

情感计算技术的应用进一步深化了情感联结:通过分析用户在浏览文化内容时的停留时长、点赞、评论等数据,平台可精准识别引发共鸣的元素——如各民族共同抗击灾害的历史片段、当代跨民族互助的感人故事等,进而定向推送相关内容,激发个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豪感,以及对民族内部情感的共情理解。人工智能在文化创新中的作用同样显著。《唐宫夜宴》运用5G+AR技术,让虚拟国宝文物展现在现实舞台上,实现古今鲜活的互动。该作品通过数字化复原文物,打造出沉浸式感知历史文物的体验,完美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让观众在欣赏中感受到文化的魅力,在共鸣中凝聚成“文化共同体”。AI绘画生成的“56个民族共庆丰收”数字艺术作品等,这些创新成果既保留了文化个性,又凸显了共同价值,促进了文化认同的自然生长。

数智平台打破了时空壁垒:黔东南的“非遗云村”项目,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文创产品的溯源确权,构建起传承人、设计师、消费者之间的价值共享网络;腾讯文旅开发的“云上贵州”小程序,通过AR技术让用户指尖触碰马尾绣的经纬脉络;“民族故

事分享圈”更是允许各民族群众在数字化场域中重构超越地域边界与文化差异的共同体身份认同,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一家亲”的集体叙事^[9]。情感共鸣作为文化认同的核心驱动力,其常态化培育形式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基础,当各民族群众在数智空间中持续感受文化共鸣、情感共振时,共同精神家园的构建便有了日常化的情感滋养。

文化认同机理通过数智技术支持下的数字化保护、互动体验与情感赋能,深化了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共性认知与情感归属,为常态化宣传教育提供了“强粘性、深认同”的情感支撑。

(三)信息传播机理:拓宽宣传教育覆盖范围的技术支撑

数智技术将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智能技术融为一体,涵盖了数据融合、机器智能和人文智慧三重维度,其核心在于通过技术赋能实现传播效能的系统性升级^[10]。具体而言,数智技术借助大数据分析重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的信息传播范式,实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信息的精准识别与动态适配。例如,针对青少年群体,推送更具有趣味性和互动性的动画短视频;针对边疆地区群众,可侧重推送各民族共同守卫国土的历史故事与现实案例;针对专家学者,则推送深度研究文章、学术讲座视频等。

同时,多模态呈现方式融合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元素,使信息更加生动、形象、直观,能够满足不同受众群体的差异化认知偏好。在增强信息吸引力和感染力的同时,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由静态资源转为动态展示、空间想象转为沉浸体验。例如,短视频平台以微故事呈现民族团结典型案例,适配移动端碎片化认知节奏;汉魏洛阳故城博物馆采用VR技术还原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客家人南迁、汉魏洛阳城胡人市集等历史场景,通过情节体验化提升情感渗透率,让受众沉浸式感受共同体发展脉络;广西博物馆推出微信H5互动页面游戏“大礼包”,鼓励用户从信息接收者转为文化生产者。这些形态创新使抽象的共同体理念转化为具象化的感官体验,降低了跨群体理解门槛。

社交媒体的广泛普及和强大传播力也为信息传播提供了重要平台。它打破了传统媒体单向传播的模式,形成了多节点、网状化的传播结构。用户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是信息的传播者,可以通过点赞、评论、转发等方式快速扩散信息,扩大信息的传播范围。而且社交媒体上的互动交流能够增强受众的参与感和认同感,使他们在传播过程中进一步加深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解和认同。微信社群中,

民族地区教师自发分享的“家乡的民族团结故事”被家长群体二次传播;由中华文宣平台主办的“一起奔腾吧”直播活动在抖音平台首播,并通过UGC内容生产发起挑战,形成千万级曝光量。这种基于社交关系的传播,使信息从“官方传播”延伸至“民间互动”,推动了从“覆盖”到“渗透”的转变。

信息传播机理通过数智技术的精准推送、多模态呈现,以及社交媒体的传播,实现了信息的广泛覆盖、精准触达和高效传播,为常态化宣传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受众基础和信息流通保障,确保宣传教育能够在更广泛的人群中持续开展。

二、数智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常态化宣传教育的现状与困境

(一)现状分析

1. 顶层设计日趋完善

在数智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中,顶层设计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引领和规范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11]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实施文化数字化战略,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提出要构建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与服务平台;同年10月,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为常态化宣传教育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要运用数智技术创新传播方式,并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形成宣传部、网信办、国家民委等多部门联动格局。地方层面形成政策创新实践,如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出台培育数据标注产业十二条措施,构建“空间+金融+服务+人才”支持体系,通过政策引导推动数字技术与民族文化融合。广西南宁推进“互联网+民族团结”行动,探索数字技术赋能民族工作的本地化路径,形成“国家战略引领、地方实践创新”的良好发展态势。

2. 基础设施广泛覆盖

推动数字基础设施的广泛覆盖和平台载体的多元化发展,是数智赋能的前提和基础,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我国已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在多个领域技术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截至2022年底,行政村通宽带比例达到100%,通4G比例超99%,为偏远民族地区顺利连接数字世界、共享教育资源和文化产品打通了“最后一公里”^[12]。在此基础上,一批功能多元、特色鲜明的数字化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打造的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资源中心”“道中华”等云平台,整合了线上博物馆、虚拟展厅、精品课程等资源,实现了宣传教育资源的“一站式”便捷获取。各级地方政府和民委部门积极利用政务新媒体(含微信小程序)、短视频平台(如抖音、快手)等,以各族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如直播、动漫、VR体验)生动讲述民族团结故事,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

3. 内容形态创新表达

通过数字化手段将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和法律法规、民族文化符号、历史事件和场景等转化为数字信息,利用数字技术对其进行采集、生成、存储和转化,为宣传教育提供强大的数字资源支撑^[13]。如国家博物馆推出线上沉浸式数字展厅,将文物通过3D视效呈现,让用户宛如置身于真实的展厅之中;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创设的“三星堆沉浸式数字展厅”,运用了裸眼3D动画与文物全息投影等数字展示技术,让用户沉浸式体验三星堆文明;河南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线上虚拟体验馆,通过黄河、根亲等具有中原文化表征的元素进行外化串联,充分展示轩辕黄帝、甲骨文、豫剧、木版年画、唐三彩等河南优秀文化符号,引导各族群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数字主题馆打造八个展厅并搭建微信小程序,通过图文、3D投影、VR虚拟漫游、音视频及互动体验等方式,宣传展示柳州市近年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成果。这种基于数智技术赋能民族文化的创新表达,有效增强了各族人民的认同感与凝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一家亲”^[14]的集体叙事。

4. 主体协同初步形成

将数智技术与民族文化相结合,通过远程教育和在线互动等方式,打破时间、空间等因素的限制,为各族群众学习和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知识提供了更多机会,推动各民族资源整体性共享、系统性共享和精准化共享的实现^[15]。如敦煌的“数字藏经洞”国际版通过多语种呈现和VR技术,突破了语言和物理空间的限制,不仅强化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认同感,更构建起跨越国界的文化共鸣,推动了共同体意识的全球性传播;故宫博物院“全景故宫”多语种版本的海外传播,每年吸引海外用户在线访问超过1亿人次,构建起内外联动的宣传教育生态系统,强化了海内外华人的文化凝聚力;青海治多县两所中学与四川广元树人中学和辽宁沈阳翔宇中学的学生,在同步互动课堂中进行跨区域交流互动。通过分享本民族的传统节日、民族服饰

与饮食等多种文化习俗,不仅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了解,更在思维碰撞中深化了友谊。不同民族文化在数字空间中进行文化交融互鉴,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广泛传播,共同绘就中华民族文化多元共生、美美与共的绚丽画卷。

5. 精准传播开始探索

数智技术的引入显著提升了宣传教育的覆盖面与渗透力,突破了时空限制,使偏远民族地区的群众、海外华裔等群体能够便捷获取相关内容,提高信息的到达率和接受度;传播形式从单一的文字、图片向直播、互动游戏、虚拟体验等多元形态拓展,对青少年群体更有吸引力;通过用户行为数据分析,宣传教育的精准度不断提高,能够针对不同群体的认知特点调整内容供给策略,推动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被动接受”向“主动认同”转变,营造健康的舆论环境,不断提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教质量,真正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工作走进千家万户。

(二) 现实困境

1. 基础设施与应用能力的区域失衡

由于各地在资源条件和重视程度上的不同,数智技术在赋能宣传教育过程中往往存在着应用深度不足、覆盖面不全的情况。其一,区域数字化发展不均衡。我国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前沿技术应用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乡村偏远地区与城市地区在数字化发展上存在着巨大落差。发达城市利用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中的情绪捕捉与情感识别技术,持续激活并不断强化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反之,一些偏远民族地区由于基础设施薄弱、数据采集与算法训练资源匮乏,智能应用困难,甚至因“数据盲区”形成治理盲点,阻碍了主流价值观的数字化传播^[16]。其二,技术应用深度不足。基础设施与应用能力的区域失衡,进一步加剧了“技术赋能”与“意识培育”的脱节。一些欠发达地区尽管已配备基础数字设备,但在宣传教育中也多限于简单的信息罗列与单向灌输式推送。比如,部分民族地区的政务公众号仅局限于发布政策文件,未借助大数据技术分析不同民族群体的认知特征与信息需求,导致内容供给与受众期待存在偏差,使得数智技术在增强代入感、深化情感共鸣方面的潜力未被充分挖掘,宣传教育难以实现从信息传递到受众内心并引发深度认同。

2. 深度融合不足与思想性弱化风险

数智技术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拓展了形式创新的空间,但在内容层面,却面临着深度

融合不足与思想性弱化风险的双重困境。

第一,宣传内容与数智技术的结合存在表面化问题。虽然一些地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活动中引入了VR(虚拟现实)、大数据分析、AIGC(智能内容生成)等数智技术,但大多数只是将传统的宣传内容简单地“嫁接”到数智平台上,未能与数智技术真正的优势深度结合。例如,一些利用虚拟现实制作的宣传视频,仅仅是将民族历史事件和民族文化场景借助数字化技术进行呈现,缺乏对技术特性的深度挖掘与创造性转化,导致内容与形式脱节,难以触及受众内心深处。

第二,宣传内容在数智化传播形式中思想性被弱化。在追求流量“爆款”、形式生动、沉浸式特效的过程中,部分宣传教育内容缺乏对民族历史文化资源的深度挖掘,娱乐化、庸俗化、碎片化成为传播的主题,甚至以感官刺激代替价值阐释,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涵被稀释、简化为符号化、口号化的表达,忽视了其背后的历史逻辑、文化根脉与政治意义。从而造成数智技术在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常态化教育时,思想深度与历史厚度被严重削弱。例如,一些VR(虚拟现实)展馆仅对实体进行复制展现,未利用数智技术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微观细节进行叙事逻辑重构^[17]。

第三,宣传内容的精准化适配存在不足。宣传方借助数智技术基于用户画像技术进行精准推送,以实现分众化传播,但当前宣传内容与不同地区民族群体的文化背景、认知习惯等未能充分契合。例如,针对老年民族群体的宣传,未能结合其对传统叙事形式的偏好,宣传方仅依赖短视频等新兴载体推送内容,导致代际话语隔阂加剧;面向青少年群体的内容,虽采用了游戏化设计,却未将民族英雄事迹转化为可参与的剧情任务,导致思想引导与青春话语的衔接断裂。

3. 数据壁垒与跨域联动困境

数智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效能高度依赖跨部门、跨地域的深度协同与数据融通。然而在当前实践中,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协同存在明显不足,具体表现为数据壁垒与跨域联动困境。

从纵向来看,各部门之间的协同机制尚未健全,形成“数据孤岛”现象。宣传、教育、网信、民族事务等部门的宣传教育数据属于不同的系统,数据标准不一,数据共享机制难以有效建立,使得各部门无法全面掌握宣传教育的整体态势,最终导致数智技术在精准施策上的优势难以发挥,宣传教育内容与形式的针对性大打折扣,也导致宣传效果评估难以形

成统一标准,削弱了整体效能。

从横向来看,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民族构成、文化特色存在差异,其数智化建设进程中也呈现出不平衡状态。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已建成较为完善的宣传教育数据平台,这些平台能够实现对本地受众行为数据、反馈数据的实时采集与分析;而一些欠发达地区的数智化基础设施相对薄弱,数据采集的广度与深度有限。更关键的是,地区之间的数据资源共享不足,发达地区的先进算法模型、数字内容库难以向一些民族地区或其他欠发达地区有效输出,制约了宣传教育的均衡发展。

这种“纵断横隔”的格局,使得数智赋能难以形成全国一盘棋,不仅影响了宣传教育资源的统筹调配,也导致对整体宣传教育效果的评估缺乏全面、客观的数据支撑,难以科学衡量不同地区的工作成效,也难以准确识别存在的共性问题,进而制约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常态化宣传教育的协同推进。

4. 算法推荐导致的“信息茧房效应”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蕴含的价值共性表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共识机制的构建,使各民族在交流交往交融的实践中实现最深层次的价值认同。然而,智能算法根据受众偏好(如习惯、价值观、话语模式等)实现个性化内容精准匹配与推送,容易使用户长期处在同质化信息环境中,可能陷入“信息茧房”的困境。这导致不同信息圈层的受众之间产生割裂,使得各民族群众在数字空间的互动不断被削弱,既阻碍了共同价值共识的形成,也不断强化了价值偏见。

一方面,数字用户长期身处单向度信息建构的“数字环境”中,会习惯于接受符合自身心理预期的信息,亦即接受与其生活环境、文化生态更契合的本民族相关信息,疏忽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蕴含的共性知识,最终造成他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逐渐走向片面化和浅显化,难以整体、客观地认识与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涵与价值^[16]。

另一方面,算法对“流量优先”的追逐,还导致具有共同性的历史叙事、政策解读等内容不同程度被边缘化。如关于“各民族共同抗击外来侵略”的历史内容,其推送优先级远低于单一民族的文化娱乐内容。信息内容的娱乐泛化,掩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容的政治性语义和本质,不利于构建整体性的国家记忆。

同时,AI的应用催化了文化偏见和群体极化,导致传统“中心化”内容审核模式难以有效应对,这就容易造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宣传基础薄

弱,进而形成“传播虽广却未能触及深层认知”的困境。人工智能的算法分类通过对不同社会群体进行不公平区分,将引发结构性的社会偏见,进而侵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诠释力。例如,一些数字文化程度高、数据资源丰富的地区和人群持续受益,而弱势群体则被进一步边缘化。此外,算法推荐机制的滥用,可能被用于定向放大特定意识形态,甚至塑造扭曲的舆论环境、伪造民意,成为引发社会群体事件的潜在隐患^[18]。

5. 数字鸿沟对特殊群体的边缘化效应

“数字鸿沟”是指“新兴信息通信技术在普及和应用方面的不平衡现象”^[19]。在我国,公共服务数字化发展存在显著的不均衡现象:城乡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差异显著;区域之间(特别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与西部边远民族地区)在5G基站密度、智能终端普及等方面差距较大;同时老年人口、低学历人群以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等群体的互联网使用状况也相对滞后。首先,边远民族地区因地理位置偏远、地形复杂,部分地区网络覆盖不足以及数字硬件设施相对落后,导致当地群体在获取和使用高清云课堂、沉浸式虚拟展馆等高质量数字资源时面临显著障碍,形成实质性的“物理隔绝”。其次,部分老年群体因操作界面复杂、交互逻辑与他们的认知习惯存在差异而放弃使用官方APP或小程序,形成“技术排斥”;再次,少数民族语言数字平台存在内容供给不足、语音识别精度不高等问题,降低了少数民族群体的数字参与度,进一步弱化了他们的在线参与感与归属感;此外,数字素养差异带来的“信息偏食”现象,即部分群体因信息甄别能力不足,易受算法茧房与网络谣言影响。总而言之,数字鸿沟不仅放大了既有的社会不平等,更在认知层面持续固化“中心——边缘”结构,从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民化、常态化传播构成了深层挑战。

三、数智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常态化宣传教育的实现路径

(一) 加强数智基础设施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全球范围看,媒体智能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我们要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不断实现突破,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20]数智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常态化宣传教育,需要充分把握数智技术发展新机遇,加强核心技术攻关,强调数字基础设施的普惠、安全、可持续。

一是推进基础设施的普惠化。受地理条件制

约,我国西部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获取信息资源方面处于先天不利地位^[21]。对此,政府与企业共同合作,设立专项研发基金,吸引顶尖科研人员投身适合民族地区应用场景的数智技术研究,推动相关技术在民族地区的应用。在偏远地区与少数民族聚居区,加大网络覆盖建设的投入,通过政策倾斜吸引通信企业参与合作,避免技术发展区域失衡产生“信息化洼地”,持续缩减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各民族地区内部的信息鸿沟,实现资源优势互补,促进区域间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保障各族人民平等获取数智化宣传教育资源,全面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响力与传播力。

二是提升基础设施的智能化水平。通过引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宣传教育平台、文化场馆、公共服务终端等基础设施的智能化升级,实现内容个性化定制、覆盖范围广泛化、受众需求精准化、互动体验优化,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更加科学精准、高效务实。

三是强化基础设施的安全性及可持续性。建立安全防护体系,通过加密技术、防火墙、访问控制等手段保障数智宣传教育平台的数据安全,防止信息泄露,维护各民族群众的隐私。同时,注重基础设施的可持续发展,在规划建设时充分考虑技术迭代升级需求,预留扩展空间,保障长期稳定运行。如定期对数智基础设施进行技术评估,根据技术发展趋势及时更新硬件设备,优化软件系统,力争数智基础设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能够持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常态化宣传教育提供坚实支撑。

(二) 优化宣传教育内容与形式

数智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常态化宣传教育的关键在于提升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不断优化宣传教育的内容与形式。

一是坚持“内容为王”与“技术为用”的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内容永远是根本,融合发展必须坚持内容为王,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22]数智是手段,核心是优质、深刻、有感染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容。通过优化信息内容,从而有效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力和实效性。具体而言,一方面在数智赋能过程中,要坚持以主流价值引领内容生产,深挖文化内涵和价值观,确保推荐的内容既符合用户的兴趣,又能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容供给发挥好价值引领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引入大数据画像、算法推荐、人工智能生成等前沿技术,建立“精准识别——智能推送——动态反馈——持续优化”的全链路技术体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常态化宣传教育奠定坚实的支撑。

二是开发适合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的宣传教育内容与产品。充分考虑当地的文化特点和公众需求,提高宣传教育的精准性。实施智能技术普惠共享战略,积极推动不同群体(年龄、职业、阶层)及不同区域的技术教育平台建设与生成式人工智能资源共建共享,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教育,强化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教育。此外,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更好地赋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有效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力、引导力及影响力,确保数智赋能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常态化宣传教育中发挥实效。

三是利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打造沉浸式宣传教育体验。通过模拟现实场景,将单纯、直白的文字讲解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沉浸式虚拟场景,通过“还原文物风华、再现历史原貌”进一步增强宣传思想文化活动的吸引力^[23]。鼓励用户生成内容(UGC)和社群互动,增强参与感和主人翁意识,通过建立线上社区、话题讨论、作品征集等手段,进行常态化运营,推动更多公民自觉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忠实的信仰者、坚定的追随者和自觉的传播者。此外在数字技术和智能媒介的助推下,通过图像编制和场景构建来创设具象情境,把“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核心概念转译为共享的视觉符号与情感意象,让“四个与共”“五个认同”共同体理念不再停留于语言文字的抽象叙事,而以数字化、日常化、情感化的感性叙事融入各族群众的生活场景之中,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转化为可感、可知、可再创造的三维记忆。

(三)构建常态化协同合作机制

长效协作机制为数智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常态化宣传教育提供了坚实保障。通过深化各部门、机构间的协同联动,构建起宣传教育的聚合效应,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的常态化开展注入持久动力。

一是加强政府部门彼此之间、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常态化宣传教育工作中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重要作用,但单靠政府部门的力量往往难以实现对全社会的覆盖,因此需要借助社会组织、企业等多方主体力量开展合作,搭建多元主体参与协同平台。在这一过程中,明确各方的职责与分工,政府部门可以设立专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专项基金”,制定宣传教育的总规划,确保宣传教育的方向正确;社会组织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少数民族

协会、公益基金等,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企业则利用自身资源和优势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推动宣传教育产品“破圈”传播。同时,要建立健全的沟通协调机制,定期召开由各方参与的联席会议,及时交流工作进度、解决遇到的问题,形成工作合力。

二是建立跨部门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机制。打破各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并建立统一的数据共享平台,明确各部门数据共享的范围、方式和责任,实现人口信息、民族文化资源、宣传教育活动开展情况等相关数据的互联互通,推进平台的开放共享功能建设。此外,要加强数据安全管理,建立健全数据安全保障体系,确保共享数据的安全和隐私。同时,要建立业务协同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鼓励各部门积极开展协同工作,提高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责任感。

三是推动区域协同,实现数智资源与宣传教育经验的共享。加强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沟通与合作,定期组织开展数智资源与宣传教育的经验交流活动。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的应用程序和平台,将数智技术与民族文化相结合,通过远程教育和在线互动等方式,打破时间、地点等因素的限制,使各族群众更便捷地了解和学习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知识,实现各民族资源共享和交流合作。

(四)完善评估与反馈机制

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是衡量和检验事物发展成效的“标尺”。就民族工作而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有效提升,必须完善常态化创新评价机制,通过实时监测、动态评估、智能反馈,为检验效果、总结经验、不断优化宣传教育方法提供数据支撑^[24]。

一是建立科学的宣传教育效果评估指标体系,定期对数智赋能宣传教育工作进行评估。

科学合理的评估指标体系,包括传播效能、内容渗透、行为转化、社会影响等多个维度。通过强调评估指标定量(如覆盖率、点击率、停留时间、转发量)和定性(如认同感、知识掌握度、情感共鸣度)相结合的方式,全面评估数智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常态化宣传教育的实际成效,为优化宣传策略、提升数智化应用水平提供科学依据。

二是建立反馈渠道,及时收集各民族群众的意见与建议,不断优化宣传教育工作。通过定期开展问卷调查、调研与专题研究等方式,广泛收集公众的意见和建议,进而科学评估宣传教育工作的实际成效,深入剖析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25]。

三是以过程数据实时监测与结果成效量化评估为双轮驱动,实现全链路、全周期的闭环管理与评

价。利用舆情监测系统、学习平台行为分析、在线反馈渠道等数智技术对宣传教育进行常态化、动态化的效果追踪和用户反馈收集,而非仅依赖阶段性评估,使宣传教育的内容、形式、渠道、策略能够根据反馈和数据持续迭代更新。

(五) 防范风险与弥合鸿沟

在数智技术广泛应用的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常态化宣传教育必须正视其双刃剑属性,既要善用技术势能,更要警惕算法偏见催生的信息茧房、数字鸿沟加剧的认知分化等潜在风险。这就要求在宣传教育中不仅要善用数智技术赋能,提升传播的精准性与覆盖面,更要通过系统性设计消解技术应用的负面效应,共同营造良好的信息传播生态环境。

一是优化算法设计。在数智时代,算法是信息技术的核心驱动力,同时也是防范风险的重要技术支撑。一方面在算法中引入“信息破茧”机制,可以设置关于民族团结一家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节庆习俗等内容的权重,使各族用户在常规兴趣推荐之外以可控频率接触相关内容,在多元可信的内容流中持续获得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另一方面,在算法训练数据的采集环节,广泛且深入地收集各民族在历史、文化、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数据,确保数据的全面性与代表性,避免因数据偏差导致算法推荐出现文化认知偏差。

二是强化技术监管与内容审核机制。习近平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26]。营造清朗的数智宣传教育空间,需要明确治理的目标:既要营造清朗空间,也要抵制错误思潮、维护共同体意识,而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过滤。一方面,开发专门针对民族宣传教育内容的AI审核系统,实时监测数智平台上发布的信息,对敏感、错误导向内容进行自动过滤,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数智空间治理的最高标尺,实现从“技术过滤”到“价值引领”的升级。另一方面,加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风险防控体系,既要避免意识形态工作的“泛化”或“虚化”,也要前瞻性评估数智技术带来的潜在风险和影响,确保传播内容的方向性。同时加强对个人数据安全与隐私的保护,防止个人身份泄露,做到“可用不可见”。

三是弥合认知认同与技术应用鸿沟。一方面,着力提升各族群众数字素养,提高对信息真实性和潜在意图的辨别能力,培养批判性思维,增强在数字环境中的自主决策与选择能力,以提升各族群众的数字应用和信息识别能力^[27]。另一方面,优化数智

技术在民族地区的应用场景与适配性。充分考虑民族地区的特殊需求、文化特色和发展条件,对用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的数智平台、软件等进行本地化改造。此外,实施“数智包容”策略,提供适老化、无障碍及民族语言适配的数智服务,切实增强其数字应用能力,确保老年人口、低学历人群以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等群体都能平等、便捷地获取、理解和利用信息,从而有效弥合技术鸿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四、结语

数智赋能作为优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常态化宣传教育的重要路径,能够有效拉近共同体理念与个体认知之间的距离,通过技术赋能实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关的多元信息、实践案例及社会共识素材的高效整合与精准识别。与此同时,数智技术的赋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常态化宣传教育带来了新的生命力,但同时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因此,以数智赋能常态化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也是一项战略工程,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能急于求成。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立足全局、着眼长远,积极应对数智时代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的新态势、新课题、新挑战。在信息技术迭代加速、数字文明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坚持“久久为功”与“润物细无声”的民族工作理念,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充分激活数智技术赋能效应,丰富传播内容,拓宽传播渠道,创新传播方式,实现宣传教育从“云端”到“指尖”再到“心尖”的常态化、长效化的深层渗透。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22:246.
- [2] 习近平出席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 新华网, (2021-8-28) [2025-5-25]. https://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1-08/28/c_1127804776.htm.
-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 2024-02-01(01).
- [4] 秦梦琪, 胡飒. 数智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素养提升的困境及对策研究[J].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学报, 2025(3): 32-38.
- [5] 孙瑶. 民族博物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解构与实践创新[J].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25(3): 51-59.
- [6] 杨珊, 蒋晓丽. 数智时代主流媒体建设中华文化新质传

- 播力理路研究[J]. 编辑之友,2024(12):21-27.
- [7] 雷文宣,解学芳. 从封存式到活态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智化创新[J]. 出版广角,2023(19):11-18.
- [8] 张艳国,陆嘉豪. 数智技术赋能“两创”的时代走向及其价值意蕴[J]. 学术研究,2024(11):1-7.
- [9] 齐瑞. 关于数智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考[J]. 理论视野,2025(3):60-66.
- [10] 王紫潇,熊峰. 数智技术赋能红色经典的多重图景与规制路径[J]. 南京社会科学,2025(6):149-160.
- [1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2023-10-29(01).
- [12] 李芃达. 因地制宜建设数字乡村[N]. 经济日报,2023-04-19(006).
- [13] 陆冰. 以数智技术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N]. 广西日报,2024-08-30(007).
- [14] 刘川,马燕城. 数智时代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样态[J]. 产业与科技论坛,2025(16):11-13.
- [15] 李玉雄,王封琴. 数字化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挑战和实践路径[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2):1-9.
- [16] 程丽琴. 智能算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技术图景、潜在风险与优化策略[J]. 宁夏社会科学,2023(6):51-59.
- [17] 王独仙.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文化强国建设的三维透视[J]. 福州党校学报,2025(2):41-48.
- [18] 张玲. 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5(4):73-76.
- [19] 胡鞍钢,周绍杰. 新的全球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J]. 中国社会科学,2002(3).
- [2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18.
- [21] 冯剑侠,李兴睿. 数字鸿沟:我国少数民族妇女与汉族妇女互联网使用的差异分析[J]. 民族学刊,2017(4):39-44.
- [22]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 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69.
- [23] 李忱阳. 科技赋能文化遗产保护[N]. 人民日报,2023-06-07.
- [24] 孟凡丽,周贝贝.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的学理阐释[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35-42.
- [25] 马桔红. 甘肃省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探析[J]. 甘肃理论学刊,2023(6):31-39.
- [26]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47.
- [27] 邓斯雨,王展鹏. 数智化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变革逻辑、风险审视与纾解路向[J]. 兵团党校学报,2024(5):97-105.

(责任编辑 谢春红)

Mechanism, Dilemmas and Paths of Digital-Intelligent Empowerment in Regular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for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HUANG Zhiguo, WANG Xueke

(School of Marxism, He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n-dep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digital strategy and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digital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empowering the normalization of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With its digital intelligence communication, intelligent interaction and other technical means, it provides a solid support for the normalization, promo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At present,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enabled normalized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s facing multiple difficulties, such as regional imbalances in infrastructure and application capabilities, insufficiency in content and ideological depth, and the risk of marginalization caused by algorithmic echo chambers and digital divide. Therefore, 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by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infrastructure, highlight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recision of content, building a collaborative cooperation mechanism, improving the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mechanism and preventing risks, so as to make it a strong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normalized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s ethnic work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number intelligence empowerment;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mechanism; dilemma; path

论居住权对抗强制执行的审查标准与程序路径

李刚,张聪

(河南大学诉讼法研究中心,河南开封475000)

摘要:居住权既具有物权的一般特征,又具有自身独特的属性。当案外人居住权受到强制执行侵害,应通过案外人执行标的异议程序寻求救济,该程序应坚持“形式审查为主、实质审查为辅”的原则。尽管居住权属于不动产权,但在审查时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5条第五项,将其作为“其他权利”进行审查。居住权在强制执行中存在被侵害的风险,需通过执行救济程序予以保护。对于以合同方式设立的居住权,若未完成登记,则居住权未设立,此时不得以居住权期待权主张排除执行,应严格限制物权期待权排除执行的适用范围。在居住权合同纠纷诉讼中,法院作出的给付判决、确认判决均不具备排除强制执行的效力。以生效法律文书设立居住权应限缩解释为仅包括形成判决,而我国目前尚未规定设立居住权的形成诉权。

关键词:居住权;执行救济;案外人执行标的异议;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6.007

中图分类号:D9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6-0045-09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的颁布施行,居住权作为新增用益物权得以正式确立。《民法典》作为实体法,虽明确规定了民事主体的权利义务,但其规范效力需通过程序法予以实现。唯有在诉讼中适用法律条文,方能使纸面上的法“转化为现实中的法”^[1]。若实体权利缺乏程序法的有效保障,相关条文将沦为空洞的权利宣言。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作为实体法实施的核心保障机制,亟需与《民法典》构建体系化衔接框架,尤其需针对居住权这一新型用益物权的程序法实现路径展开系统性研究。当前司法实践中,居住权登记效力的认定标准、执行程序中权利冲突的化解机制以及执行异议之诉的审查规则等关键问题存在规范缺位与适用分歧,亟待通过法解释学路径弥合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价值鸿沟,实现两法在权利保护维度上的协同共振。此项研究不仅关涉民事权利救济体系的完整性,更是破解民法典时代“纸面权利”困境、推

动实体法治理念向程序法治转化的关键突破口。就实体法而言,尽管居住权系《民法典》新增权利,但学界对其探讨并非始于法典颁布之时。此前研究多聚焦于立法论层面,而法典实施后则转向解释论视角。就程序法而言,虽然相关司法解释不断完善,但居住权在执行救济程序中的适用仍存在争议。居住权具有独立性且可对抗执行已成共识,但其具体审查标准与排除执行效力的认定尚未形成统一规则。实践中,因理论指引不足,不同设立方式的居住权在执行救济中的审查标准与裁判尺度存在显著差异。本文旨在厘清居住权对抗执行的审查要点及程序衔接规则,为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一、居住权概述

为了研究居住权与执行救济程序的衔接问题,有必要先厘清居住权的性质。为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的要求,《民法典》专门规定了居住权这一用益物权。这一权

收稿日期:2025-09-2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中国审判与社会变迁研究”(19ZDA212)

作者简介:李刚(1979—),男,河南商城县人,法学博士后,河南大学诉讼法研究中心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事诉讼法、中国近现代法制史。

利认可并保护民事主体对住房的灵活利用安排,能够满足特定人群的居住需求。作为新增的权利类型,居住权在《民法典》中条文较少,仅有第366条至第371条共6个条文予以规范,且多为原则性规定。因此,理解居住权不仅需要从条文本身进行文义分析,还需要结合其所在编章体系及民法基本原则,从体系解释的视角进行综合解读。

(一) 居住权的性质

从体系解释视角看,居住权制度位于《民法典》物权编用益物权分编项下。作为新型法定权利,居住权在展现独特属性的同时,仍具备物权与用益物权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是探讨相关程序问题的基础。在分析案外人执行救济程序中的居住权问题前,须先厘清其本质属性与规范特征。

从物权视角分析,居住权的核心物权属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居住权具有物权的支配权属性及排他效力。所谓支配权,是指权利人依其意思对权利客体进行管领或处置,且实现权利完全无需他人意思或行为介入^{[2]326}。相较而言,租赁权作为债权,虽亦包含对他人房屋的占有使用权能,但其权利实现有赖于出租人积极履行义务,若缺乏出租人协助,承租人权益难以保障。其次,居住权具有物权的对世权属性,与债权存在本质区别。从权利效力来看,债权关系仅具相对效力,债权受侵害时,债权人仅得向债务人主张权利,无权向合同关系外第三人提出请求;而物权具有对世效力,当物权遭受侵害时,不论侵害者与权利人之间是否存在特定法律关系,物权人均可依法向侵害者主张权利。例如,在执行程序中,案外人可基于居住权人身份直接对抗申请执行人,而非仅能向所有权人主张权利。最后,居住权具有优先效力。“通说认为,所谓物权的优先效力,一方面意味着物权具有优先于债权的效力;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同一物上多项物权并存时,其相互间的效力有所不同。”^{[2]327}居住权不仅优先于普通债权,更可对抗在后设立的抵押权等物权性权利。在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判定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的实体权利能否排除强制执行,关键在于该权利相较于申请执行人的债权是否具有优先性^{[3]691}。例如,在强制执行程序中,普通债权人申请对不动产采取拍卖、变卖等执行措施时,其执行行为须受制于既存居住权的物权效力。

从用益物权视角看,居住权作为他物权具有特定规范构造。首先,居住权客体指向他人所有的住宅,这决定了所有权人无法在自有住宅上为本人设立居住权。需特别指出,所有权人或共有人虽天然享有对住宅的占有使用权能,但此权能源于所有

权的权利内容,并非《民法典》所规定的具有独立物权地位的居住权。司法实践中存在共有人援引居住权主张排除强制执行的案例,该案外人所主张的“居住权”实质系所有权派生的房屋使用权能,而非《民法典》意义上的居住权。此类案例中,法院保留共有人在执行款中的应得份额以保障其居住权益,同时依法作出准予继续执行涉案房产的裁判。其次,居住权具有独立性,其效力不因住宅所有权转移而受影响,但该性质在强制拍卖中会受到相应限制:若居住权的存在阻碍了顺位在前的担保物权或其他优先受偿权的实现,则该居住权可能被依法除去。

此外,《民法典》第366条明确居住权的核心功能系满足权利人生活居住需要,第368条、第369条的规范内容进一步凸显了居住权的人役权属性,表明我国现行制度框架下的居住权更倾向于属于具有伦理价值的生活保障型权利。《民法典》对居住权制度的构建呈现鲜明的实践问题导向,该制度的确立为“以房养老”等以所有权与居住权分离为特征的新型财产配置模式提供了规范基础,也为民事主体自主灵活配置不动产权利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 居住权的设立

作为物权,居住权的设立须符合法定要件。根据《民法典》第367条、第371条规定,居住权可通过书面合同或遗嘱方式设立;对《民法典》第229条进行体系解释可知,居住权亦可基于生效法律文书而设立。其中合同设立与遗嘱设立属意定设立,法律文书设立则属法定设立^{[4]454}。在案外人提起的执行救济程序中,居住权的设立方式不同,审查重点也存在差异。针对不同设立方式实施分类审查,既能保障裁判的公正性,又能实现法律适用的统一性。

1. 意定设立

居住权的意定设立包含合同设立与遗嘱设立两种形式。《民法典》第368条确立“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的核心规则,明确登记为居住权设立的生效要件。我国物权变动采用债权形式主义模式,要求物权设立须同时具备债权合意与法定公示程序。作为不动产物权,居住权的设立需严格遵循登记生效原则。《民法典》第367条规定,当事人设立居住权,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居住权合同。该条明确了居住权的合同设立方式。但需注意,物权的设立生效还需履行法定公示程序,若仅订立居住权合同而未完成登记,则居住权尚未设立。

《民法典》第371条规定,以遗嘱设立居住权的,参照本章规定。这实际上明确了居住权可通过遗嘱设立。作为物权体系中唯一明确允许通过遗嘱设立的物权类型,其创设呼应了立法旨在解决特定

群体居住保障问题的初衷。遗嘱设立居住权主要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居住权的设立是否需要登记?二是居住权产生对抗效力是否需要登记?尽管遗嘱设立与合同设立同属意定设立范畴,但遗嘱设立居住权属于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根据当然继承主义原则,通过遗嘱设立的居住权自继承开始时即自动发生物权效力,无需继承人作出接受继承的意思表示,也无需履行登记程序,其权利设立时间与继承起始时间点完全重合。关于遗嘱设立的居住权是否应当采用登记生效主义,需结合登记生效与登记对抗的分类逻辑展开讨论。两者的分类基础是物权的类型与性质,而通过遗嘱设立居住权所导致的权利变动与权利外观分离现象,与物权的类型、性质并无关联。因此,无论遗嘱中分配的是居住权还是所有权,都应严格遵循当然继承主义原则,不能认为遗嘱中设立的居住权应当采取登记对抗主义。

2. 法定设立

居住权的法定设立可通过《民法典》物权编第229条的体系解释得出,即居住权可经生效法律文书设立。法定设立与遗嘱设立均属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自法律文书生效时即完成权利设立,无需履行登记程序。需注意的是,形成判决固然具有直接引致物权变动的效力,但给付判决与确认判决能否依据第229条产生同等效果,尚存理论争议。若将该条文中的“法律文书”限缩解释为仅指形成判决,则法定居住权设立将因缺乏实体法上对应的形成诉权规范而仅存于理论层面——毕竟现行实体法并未规定可直接设立居住权的形成诉权类型。

二、居住权人提起的执行标的异议

(一)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前置程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解释》)第303条明确将执行异议作为案外人异议之诉的前置程序,该条规定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应当满足“案外人的执行异议申请已被人民法院裁定驳回”的法定条件。根据该规定,若案外人未先行提出执行异议,或者异议申请获得法院支持,则无权启动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结合《民事诉讼法》第236条、第238条的规范体系,此处的“执行异议”特指第238条规定的案外人执行标的异议。因执行行为异议被驳回后,当事人应通过复议程序寻求救济。唯有执行标的异议被驳回后,案外人方可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由此可知,案外人执行标的异议是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法定前置程序,具有不可逾越性。

学界对执行标的异议前置程序的制度设计存在争议,核心争议点在于执行异议程序的非讼属性与

实体权利争议解决的适配性矛盾。具体而言,执行异议审查采用形式化、效率优先的非讼程序,审查重点仅为权利外观的初步核实,无需双方充分举证、质证;而案外人主张的实体权利争议(如居住权排除执行),本质是对抗性纠纷,需通过诉讼程序组织双方举证、质证,进行实质审理。将非讼程序作为诉讼程序的前置要件,被部分学者认为构成对当事人诉权的不当限制,有剥夺当事人诉权之嫌。我国执行标的异议前置程序的立法经历了逐步完善的过程: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208条首次确立案外人执行标的异议制度时,未区分执行的实体错误与程序错误,仅将其作为单一救济途径,反映了立法初期对执行救济制度功能的认知局限。2007年、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订时,新增执行行为异议与执行异议之诉制度,但立法者仍保留了执行标的异议作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前置程序。其制度存续的理由在于:通过非讼程序过滤无实质争议的案件,既能利用非讼审查的高效性实现案件分流,又能通过前置审查固定争议焦点,进而提升后续诉讼程序的审理效率。

但该制度的正当性始终面临理论挑战:反对论者指出,前置程序可能导致诉讼效率拖延,增加当事人的救济成本。在比较法视野下,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普遍采用直接起诉的立法模式,通过诉讼程序解决实体权利争议,避免因前置程序空转造成的效率损耗。因此,反对论者主张废除执行标的异议前置程序,采用直接起诉模式。同时,也有学者提出折中观点:案外人执行标的异议具有独特功能,既能为案外人提供及时的临时性救济,又能合理分配案外人与债权人的权利风险,因此应当保留该程序,但需将其调整为与案外人异议之诉并行的救济程序,而非作为其前置程序^[5]。这一观点对于居住权这一具有伦理属性的用益物权而言,具有合理性。居住权的核心价值在于保障权利人对特定住宅的居住利益,此种利益往往无法通过金钱补偿实现完全救济。多数居住权人已在特定住宅内形成长期稳定的生活状态,一旦因执行错误导致居住权益灭失,即便通过执行担保获得经济赔偿,亦难以弥补其丧失特定居所所引发的非财产性损害。居住权以特定的物为客体,其所要保障的并非抽象的生存居住的权利,而是在特定的住宅内居住的权利。

(二) 案外人执行标的异议的审查

1. 实质审查和形式审查

将执行异议作为案外人异议之诉前置程序,是基于执行效率优先原则的考量。其旨在提高执行效率,防止债务人履行拖延,促进债权及时实现。同时,异议程序作为非讼程序,原则上应对执行异议适

用形式审查。然而,形式审查标准在制度运行中面临这样的矛盾:若执行阶段与异议审查均采用同一形式标准,则异议审查的结论必然与执行程序中对权属的判断完全一致,如此便会导致程序空转。这一结构性矛盾催生出“实质审查具有必要性”的主张,该主张认为,唯有通过实质审查,方能真正发挥异议程序过滤无争议案件的功能。

在形式审查标准下,对执行标的进行权属判断主要依据物权公示原则和权利外观主义。物权公示原则作为权利外观主义在物权领域的制度映射,要求在形式审查中针对其权利外观,严格遵循登记公示效力。依此原则,未经登记的用益物权在形式审查层面视为不存在,已经登记的则应以登记簿记载情况为判断依据。但需注意,我国物权体系中存在若干例外情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地役权等特定用益物权自合同生效时设立,登记仅具有对抗效力;通过遗嘱、生效裁判等非法律行为设立的居住权,亦不依赖登记即发生物权效力。

单纯依赖公示原则进行形式审查,导致该制度面临现实困境。若在审查居住权时忽视遗嘱设立等非登记变动方式,或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等特殊物权机械适用登记标准,必将引发审查结论与实体权利状态的背离。案外人在非讼程序中无法通过提交证据、进行辩论等方式展现其真实权利状态,为维护真实权利,仍将被迫启动异议之诉,致使前置程序的过滤功能形同虚设。为解决审查标准适用困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异议复议规定》)第25条确立“形式审查为主、实质审查为辅”的复合审查原则。^{[6]347}该规则以登记、占有等物权公示方式为基础审查依据,但在执行标的缺乏法定公示要件时,允许结合合同文本、权利凭证等实质证据综合判定权属关系。此种审查标准的二元化设计,既维系了执行效率的价值取向,又为特殊情形下的实体权利救济预留了裁量空间。

根据《异议复议规定》第24条之规定,针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法院应当审查三项要件:案外人是否属于适格权利人、权利基础是否合法真实以及权利是否具备排除执行的效力。需特别指出的是,虽然第25条确立了“形式审查为主、实质审查为辅”的审查原则,但该条明确指出所载五项审查标准仅适用于判断案外人是否为适格权利人。就《异议复议规定》第24条第二项关于“权利合法性与真实性”的审查要求而言,实质审查标准的适用与案外人异议审查“形式审查为主、实质审查为辅”的原则存在内在张力。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异议复议规定》第25条明确其审查标准仅用于判断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但将该条所体现的审查原则作为案外人异议程序的整体审查标准,具有合理性。究其本质,此类审查原则的确立源于案外人异议制度的功能定位与程序特质,第25条实为该项原则的规范载体而非创设依据。质言之,形式审查主导原则是案外人异议程序效率价值与执行程序安定性双重考量的必然产物,其规范表达虽载于第25条,但制度根源在于该程序的特殊功能定位。在案外人异议程序本身的目的与特点所形成的客观限制下,在“形式审查为主、实质审查为辅”原则的指导下,《异议复议规定》第24条第二项所规定的“权利合法性与真实性审查”,实际上成为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司法实践数据也能印证这一点:在执行实践中,近76%的裁定对居住权是否合法有效未予实质审查,仅经形式审查即作出是否支持排除执行的裁定。这种情况表明,至少在居住权相关的案外人执行标的异议审查中,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存在相当程度的脱节。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多样,但归根结底仍是案外人异议程序难以完全承载实质性审查的任务。《异议复议规定》第24条第一项和第三项的内容,均可在“形式审查为主、实质审查为辅”原则的指导下开展审查并作出判断,而第二项关于“权利合法性与真实性”的规定,不宜作为案外人执行标的异议的审查内容,而应在案外人异议之诉中进行审查。

2. 居住权审查的规则适用

居住权的客体为他人住宅,属于不动产物权。对其审查时可依照《异议复议规定》第25条第一项和第五项进行判断,其内容分别为“已登记的不动产,按照不动产登记簿判断;未登记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按照土地使用权登记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相关证据判断”和“其他财产和权利,有登记的,按照登记机构的登记判断;无登记的,按照合同等证明财产权属或者权利人的证据判断”。但究竟应当适用第一项还是第五项,这就涉及如何理解该条第一项和第五项规范的对象。此处存在两种理解:第一种理解为,第一项所规范的对象为不动产物权,即不仅包括不动产所有权,而且包括设立在不动产上的用益物权;第五项的规范对象为除不动产物权、动产物权、股权之外的其他权利,并不包括用益物权。第二种理解为,第一项的规范对象仅为不动产所有权,并不包括设立在不动产上的用益物权;第五项规定的“其他财产和权利”则包括了设立在不动产上的用益物权。本文认为采第二种理解为宜,具体理由如下:首先,若依第一种理解,

设立于不动产上的用益物权应当适用第一项进行审查判断。依据第一项的前半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地役权等登记仅为对抗要件的权利,若未登记,将会因缺乏权利外观被法院认定物权不存在,无法依照第五项的规定进入实质审查。其次,第一项后半句中“未登记的”其后宾语为“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显然不能将其理解为包括未登记的用益物权,并且紧随其后作为“相关证据”的是“土地使用权登记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很显然,后半句规定的是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对于其建造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所有权的实质性审查。正在建造过程中的不动产无法进行登记,已经建造完成的不动产也可能尚未登记,但这些不动产并不因未办理登记就成为无主财产。根据《民法典》第352条,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建造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所有权属于建设用地使用权人。虽然物权已经存在,但因未办理登记,所以需要进行实质性审查,本条亦体现“形式审查为主、实质审查为辅”的审查原则。最后,在第一种理解下,用益物权在被第一项前半句的形式性审查否定后,也无法被后半句的实质性审查容纳,不以登记为设立要件的用益物权将会被形式审查拒之门外。若后半句的内容是对已产生所有权但未登记的不动产进行实质审查,则前半句所规定的理应对不动产所有权的形式审查,如此才符合逻辑。按照第二种理解,应当认为该条第一项的规范对象仅指不动产所有权,而设立在不动产上的用益物权,应当适用该条第五项进行审查和判断。在有登记时以登记内容进行判断;在无登记时,地役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些以登记为对抗要件的权利以及非基于法律行为所取得的物权,也能够通过相应的证据进入实质审查。这一适用路径更契合此类物权的设立规则与权利保护需求。

在对居住权进行审查的具体过程中,还需要注意下列问题:对于已登记的居住权,应当根据登记簿记载内容确认案外人是否具有权利人资格。若案外人主张登记权利人与实际权利主体不一致,或因居住权合同无效、撤销引致权利消灭等情形,此类争议应纳入案外人异议之诉的审查范围,通过诉讼程序判定案外人是否具有居住权人身份。相对于诉讼程序,非讼程序缺乏相应的程序保障,其既难以完全胜任实质审查任务,亦无法确保审查结果的正确性。即便获得正确结论,案外人执行标的异议裁定因欠缺既判力,亦不能对后续案外人异议之诉的审理产生拘束效力。若越俎代庖,不仅会导致程序空转降低执行效率,更与立法者期望通过案外人执行标的

异议制度提升执行效率的初衷相悖。对于未办理登记的居住权,应当依照《异议复议规定》第25条第五项后半段规定,依据合同等证明财产权属或权利主体的证据对案外人的权利人资格进行实质审查。需特别指出,当案外人提交有效居住权合同主张权利时,应当注意居住权作为登记生效的物权类型,在欠缺登记公示要件的情形下,即便合同效力成立,亦不得直接认定案外人具有居住权人法律地位。对于未完成登记的居住权,因物权设立要件尚未成就,仅凭有效合同认定合同相对方具有居住权人地位,不符合实质审查原则。实质审查旨在权利表象与真实权属发生背离时探究权利实质状态,而居住权未经登记时,权利表象与真实权属均处于未设立状态,二者具有一致性。若径行依据合同确认物权归属,既违反《民法典》关于居住权登记生效的规范意旨,亦混淆了债权效力与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只有当案外人举证证明存在遗嘱继承等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情形时,方可认定其居住权人身份。

三、居住权人提起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案外人异议之诉作为执行救济程序,其制度价值在于阻却执行程序对案外人实体权益的不当侵害。作为执行依据的生效裁判,其效力仅及于诉讼当事人,对未参与诉讼程序的案外人不产生拘束效力。执行程序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以效率优先为价值取向,旨在迅速实现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民事权利。但效率追求不得以牺牲公正为代价,执行救济制度通过赋予案外人实体权利争议的诉讼解决途径,在效率与公正之间构建平衡机制,确保执行程序符合实质正义的法治要求。

在案外人执行异议程序中遵循形式审查优先原则,系执行效率价值的内在要求。公示公信原则作为权利外观正确性的推定依据,在多数情形下确实能保持权利表象与真实权属的一致性,通过形式审查即可有效过滤相当一部分异议申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作为诉讼程序承担实质审查职能,通过诉讼程序查明事实适用法律,全面查证权利真实状态。执行程序虽以效率优先为基本取向,但通过异议之诉构建的救济机制恰能实现对执行公正的补强。准确把握两类程序的制度定位与功能边界,实现程序协同与价值平衡,方能确保民事执行程序效率与公正达到理想状态。

(一)理论前提与法定条件

1. 居住权人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理论前提
当强制执行措施可能侵害案外人实体权利时,执行异议之诉是其重要救济程序。应当厘清的是,强制执行程序在理论上是否可能对居住权构成侵

害,以及居住权是否具备排除强制执行的实体权利属性。讨论该问题,需从物权效力维度考察居住权与所有权的关系。居住权具有独立性特征,在所有权因买卖等法律行为发生变动时,已合法设立的居住权不因所有权转移而受到影响。即便标的物所有权经交易发生变更,基于物权对世效力及登记公示原则,经合法登记的居住权仍可对抗新的所有权人。因此,原则上强制执行导致的所有权变更并不会影响居住权的实现,但居住权在强制执行过程中仍然有受到侵害的可能性。首先,强制拍卖与私法关系中的合同买卖在行为性质上有所不同。关于司法拍卖的性质,理论上存在公法说、私法说与折中说三种学说,当前公法说已成为主流观点。在此理论框架下,强制拍卖被界定为具有公法属性的司法行为,其核心特征体现为法院可以依据职权除去拍卖标的物上的权利负担。基于此,居住权作为附着于不动产的权利类型,在强制执行过程中面临被依法除去的潜在风险。其次,若居住权的权利外观与其真实权属状态不符,导致法院并不知晓居住权的存在,则执行行为必然会侵害案外人的居住权。因为居住权的实现依赖于对住宅事实上的占有使用,而对于不动产的执行会与居住权产生直接的冲突,此时居住权也面临着被侵害的风险。综上,虽然居住权具有独立性,但在执行程序中的特定情况下,该权利依然存在被侵害的可能性。

2. 居住权人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法定条件

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303条规定,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须同时满足以下要件:其一为《民事诉讼法》第122条确立的起诉一般要件;其二为该条特别增设的三项程序性要件。若案外人未能满足上述任一要件,法院将认定其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依法裁定驳回起诉或不予受理。关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起诉条件,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注意。诉的利益构成起诉的核心要件,《民事诉讼法》第122条第一项通过“直接利害关系”要件对诉的利益作出规范。就居住权人提起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而言,诉的利益需以执行行为实质影响其权利存续为判断基准。若执行程序采取“带居拍卖”方式且未损及居住权行使,则居住权人与执行结果无实质性关联。在此情形下,居住权人因欠缺诉的利益而不具有起诉资格。当法院未通过审查识别居住权存在,进而导致居住权行使受阻,或虽确认居住权存续却裁定除去该权利实施拍卖时,执行行为已构成对居住权人实体权利的实质侵害,此时,案外人因实体权利受损与执行结果形成直接利害关系,具备诉的利益,可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主张权利救济。

(二) 居住权排除执行的一般规则

居住权作为附着于不动产的用益物权,对不动产所有权而言是一种权利负担。关于执行标的物权利负担的处理模式,理论界存在承受主义与涂销主义的分野:前者要求拍定人概括承受既有权利负担,后者则旨在使标的物以无负担状态移转。然而,在民事执行实务中,单独适用某一学说均难以兼顾债权人、债务人及案外人的利益诉求。因此,我国针对权利负担的不同类型及具体情况的差异,采取差异化处理方式。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以下简称《拍卖变卖规定》)第28条,用益物权原则上不因拍卖而消灭。然而,若其影响顺位在先的担保物权或其他优先受偿权的实现,则应依法除去该用益物权;反之,若用益物权顺位在先,或虽顺位在后但不影响在先权利的实现,则法院不得除去该用益物权。这里的“担保物权”“其他优先受偿权”,其实主要指向担保物权中的抵押权,因为除了《民法典》规定的抵押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51条规定的优先于房地产抵押权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优先权外,其他的担保物权及优先受偿权均不可能设立于住宅之上,亦即不会与居住权的客体发生重合。综上,居住权在强制执行中原则上不因强制拍卖而消灭,但在特定情形下可能被法院依法除去。法院除去居住权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其一,居住权顺位之前存在抵押权;其二,顺位在后的居住权影响了该抵押权的实现。

物权顺位的先后主要涉及物权优先效力的问题。物权的优先效力主要体现为:物权具有优先于债权的效力,以及设立顺位在先的物权优于顺位在后的物权。当同一物上存在两个以上性质不冲突的数个物权时,确定各个物权效力位阶的依据是权利产生的时间和公示的方法。关于居住权与债权的冲突,居住权作为物权,优先于普通债权。根据《拍卖变卖规定》第28条的文义解释,居住权始终优先于普通债权。只要住宅上存在居住权,无论其与债权的设立时间先后,申请执行人依据普通债权申请强制执行时,均不得对抗居住权,只能采取“带居拍卖”的方式,且不得影响居住权的存续;即使因“带居拍卖”导致流拍或债权无法全部清偿,亦不得除去居住权。关于居住权与抵押权的冲突,二者作为可共存于同一物上的他物权,其优先效力取决于设立时间的先后顺序。

居住权阻碍抵押权的实现,是物权优先效力实际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居住权通过对他人住宅的实际支配和居住使用得以实现,而抵押权则通过获取不动产的交换价值得以实现。通常情况下,即使

抵押权的顺位优先于居住权,也不会妨碍居住权人行使权利。此时,尽管抵押权具有优先效力,但这种优先效力并未实际发挥作用。然而,在设定权利负担的不动产面临强制拍卖时,唯有居住权不因强制执行而消灭,方能保障居住权人的权利继续实现。相比之下,抵押权的实现需将住宅拍卖所得价款优先用于清偿其担保的债务。不过,居住权的存在往往会增加流拍风险,导致住宅难以变价,进而阻碍抵押权的实现。在此情形下,顺位在先的抵押权因其优先效力,将产生对抗居住权的效果,即为实现抵押权而依法除去居住权。当然,若顺位在后的居住权不影响抵押权的实现,两种权利在拍卖中得以并存,抵押权人与居住权人的利益均能得到保护,这无疑是最理想的结果。但若权利实现发生冲突,优先保护具有优先效力的权利亦属正当。综上,若顺位在后的居住权影响顺位在先的担保物权实现,法院应依法采取“除居拍卖”方式;除此之外的其他情形,法院均应采取“带居拍卖”方式。

(三) 合同设立居住权的审查

以居住权合同设立居住权,属于基于民事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此种物权变动,除须具备合法有效的居住权合同外,还需完成登记方可产生物权效力。对于仅订立居住权合同但未办理登记的情形,应认定居住权未设立。既然居住权未设立,自然无法排除执行。然而,亦有理论主张,在特定条件下,即使居住权未登记,仍可能产生对抗执行的效力。有观点认为,居住权合同所产生的物权期待权能够排除强制执行。^[7]另有观点认为,案外人可凭借居住权合同纠纷的生效裁判文书主张其居住权存在,并以此排除强制执行。有必要对上述两种观点进行深入探讨。

1. 居住权期待权

有观点认为,即使案外人仅持有合法有效的居住权合同而未办理登记,基于其享有的物权期待权,仍可排除强制执行。该观点的理论依据为《异议复议规定》第28条和第29条,其中规定了无过错的不动产买受人及商品房消费者的物权期待权。从具体内容来看,该条规定了特定不动产买受人在满足一定条件时享有不动产物权期待权,并赋予其排除执行的效力。该观点支持者认为,上述法条为其他不动产物权期待权排除执行提供了空间,并主张在满足特定条件时,居住权合同亦可产生居住权期待权,从而排除强制执行。从立法目的而言,上述法条旨在保护弱势群体利益,以实现实质公平并维护社会稳定。居住权作为一种兼具伦理性和社会性的权利,与该条所保护的利益高度契合,因此应对其给予特殊保护。本文并不赞成这种观点,具体理由如下:

《异议复议规定》原文并未规定居住权的物权

期待权排除执行的相关条文。既然缺乏明文规定,将仅适用于特定情形的司法解释参照适用至居住权并不妥当。该司法解释在《民法典》通过后进行修正时,并未因《民法典》设立居住权而新增居住权期待权,可见此种观点未被其采纳。此外,《异议复议规定》第28条和第29条本身已备受争议。鉴于我国国情,在一定条件下赋予不动产买受人物权期待权并赋予其排除强制执行的效力,虽具有一定合理性,并对社会稳定具有积极意义,但此种将特定债权优先于其他债权的做法,已对《民法典》的法律秩序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干扰^[8]。物权期待权排除强制执行的适用范围应严格限制,而非通过类推适用扩大其适用范围至相似情形。

除符合司法解释明文规定的情形以外,认为案外人在特定条件下享有居住权期待权,是对司法解释的扩张适用,不符合我国司法解释关于不动产物权期待权的立法目的。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德国的物权期待权只有在受让人的法律地位稳固、第三人无法随意破坏的情况下才能产生。其要件为物权合意生效、登记同意表示已经作出且受让人已经提出申请登记,其保护的是登记进行期间受让人的利益。德国的不动产物权期待权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我国的不动产物权期待权亦如此。尽管两者均属不动产物权期待权,但其成立要件及目的存在显著差异。我国司法解释规定的物权期待权成立要件包括“法院查封前已签订合法有效合同”及“买受人已按合同约定支付部分或全部价款”。对比两国不动产物权期待权的成立要件可知,德国旨在保护已具备稳固法律地位但因登记过程面临不确定风险的买受人,要求买受人已提出登记申请;而我国则更侧重于保护已支付相当比例价款的买受人,这与我国的期房制度及居民住宅消费现状相适应。家庭资产中不动产往往占据较大比例,但由于合同履行与登记完成并不同步且通常间隔较长,买受人虽已支付相当比例价款,却可能因未完成登记而面临住宅被强制执行的风险。此种情形下,家庭在支付大量价款后仍无法取得房屋所有权,可能导致房财两空的局面。若放任此类情况发生,将严重威胁社会稳定。因此,司法解释通过不动产物权期待权排除执行的方式,保护已支付一定比例价款的不动产买受人。

由此可见,居住权并无必要通过物权期待权予以保护。居住权作为一种伦理性较强的不动产物权,通常设立于亲属之间且原则上为无偿,即使是有偿居住权,其支付对价亦远低于不动产购买价款。有观点认为,债权向物权迈进的过程中必然存在一个点,在此点上能够成立物权期待权。但事实并非如此,司法解释规定物权期待权,旨在保护特定利

益,并非债权向物权的转化进程达到一定程度即自动产生不动产物权期待权。因此,在实践中应严格遵循司法解释规定的条件,限制不动产物权期待权的适用,避免其范围不当扩大。在司法解释与实体法均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居住权合同不能当然产生居住权期待权,自然也不具备排除强制执行的效力。

2. 居住权合同纠纷判决的效力

在我国当前有关居住权合同纠纷的判决中,若法院审查后认定存在合法有效的居住权合同,通常作出支持居住权的判决,并同时要求对方当事人配合办理登记。此类判决对当事人居住权的支持,有时表述为“确认某某对某地房屋享有居住权”。从表述上看,法院似乎通过确认判决认定当事人享有居住权,但事实并非如此。确认之诉的目的在于明确权利义务关系,法院作出确认权利存在的判决,其前提是查明该权利已实际存在。然而,在某些居住权合同纠纷案例中,居住权并未登记,仅存在合法有效的居住权合同,此时原告提出确认享有居住权的诉讼请求,法院仍可能作出确认当事人享有居住权的判决,但问题是,此时居住权尚未登记,即居住权事实上并未设立。即使法院在判决中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该判决亦非确认判决,而只能理解为对合同纠纷的一种裁判。根据我国《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与居住权相关的民事纠纷案由分为两类:一类是物权纠纷项下的居住权纠纷,另一类是合同纠纷项下的居住权合同纠纷。后者显然属于债权纠纷而非物权纠纷。因此,即使法院针对居住权合同纠纷作出“确认享有居住权”的判决,也应理解为法院确认的是当事人依据居住权合同所享有的债权请求权(即请求对方配合办理登记的权利),而非居住权这一物权本身。被判决“享有居住权”的一方当事人,仍需通过行使债权请求权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要求对方当事人配合办理居住权登记;否则,仅凭该胜诉判决仍无法取得具有物权效力的居住权。依据《异议复议规定》第26条,案外人持此类仅确认债权的生效法律文书请求排除强制执行的,法院不予支持。

(四)遗嘱设立居住权的审查

由于我国对遗嘱设立物权采用宣告主义,通过遗嘱设立的居住权自继承开始时即已设立,无需以登记为生效要件。在审查以遗嘱设立的居住权时,需重点关注以下问题:首先,尽管《民法典》居住权一章明确书面合同为居住权设立方式之一,并规定遗嘱设立居住权参照适用合同设立的相关规定,但遗嘱与合同存在本质差别——遗嘱属于单方法律行为,其形式效力应优先适用继承编的规定。因此,即便是未采用书面形式的口头遗嘱,只要符合《民法典》对口头遗嘱的效力性规定,同样能够产生设立

居住权的效力^[9]。对遗嘱内容的解释,应秉持“尊重遗嘱人真实意愿”的核心原则。遗嘱属于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而“居住”作为高度生活化的用语,遗嘱人通常使用日常语言表述,难以精准运用“居住权”“所有权”等法律规范性术语。因此,在解释遗嘱时,不应强求遗嘱人使用准确的法律术语,亦不能仅以未明确提及“居住权”为由,否认其设立居住权的意思。具体解释时,应依据《民法典》第142条第二款的规定,结合遗嘱人的家庭关系、财产状况、生活需求等背景,作出符合其真实意愿的合理解释。其次,应就遗嘱所涉及的继承是否已开始进行审查。若继承尚未开始,遗嘱中记载的任何内容均不发生法律效力,居住权亦不存在;若继承已开始,且遗嘱合法有效,则居住权自继承开始时即告设立。此外,在审查居住权是否具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效力时,若居住权与抵押权发生冲突,法院应依据《拍卖变卖规定》第28条处理。如前文所述,遗嘱设立的居住权无需以登记为设立要件,也不因未登记而丧失对抗执行的效力。因此,在继承已经发生且遗嘱合法有效的前提下,仅需依照前文所述的一般规则进行判断即可。也即继承开始日期和抵押权登记日期的先后,以及该居住权是否影响了设立在先抵押权实现。至于该居住权是否登记,并不影响遗嘱设立的居住权对抗强制执行的效力。若案外人持遗嘱纠纷中法院支持其依据遗嘱享有居住权的判决书,主张以居住权排除执行,应明确该判决书属于对居住权权属的确认判决。依据《异议复议规定》第26条,若该居住权能够排除执行,法院应对该请求予以支持。

(五)法律文书设立居住权的审查

依据《民法典》第229条,物权可因生效法律文书直接变动而无需公示,该条款继承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现已废止)第28条。有观点认为,尽管《民法典》未明确规定居住权可通过生效法律文书设立,但实践中普遍存在此类情形。例如,赡养纠纷中判决赡养义务人向被赡养人提供住宅以供居住,或离婚诉讼中判决为有特殊需求的一方设立居住权等,均属于通过生效法律文书设立居住权的情形。但本文不认同该观点,主要理由如下:我国《民法典》第229条的适用范围存在争议。就立法本意而言,该条的适用范围包括给付判决及裁定、确权判决及裁定以及形成判决及裁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在《民法典》释义中采用了这一解释^{[10]272}。然而,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在《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理解与适用》中认为,给付判决和确认判决并不能直接导致物权变动,仅有形成判决具有使物权直接发生变动的效力。这一理解限缩了该条的适用范围,将其范围限制在形成判决

之内^{[10][275]}。依照这一解释,前文所述两个案例中的法律文书均不具备直接设立居住权的效力,因其性质上属于给付判决。胜诉当事人所享有的仍为一种请求权,需依赖对方当事人履行或法院强制执行来实现其权利。从诉讼原理来看,确认判决与给付判决均不具有直接导致物权变动的效力,仅有形成判决具备此效力。因此,本文赞同后者的观点,即仅有形成判决属于可直接设立物权的法律文书,而给付判决与确认判决不在此列。

形成判决具有直接变动法律关系的效力,并且唯有行使法律明确规定的形成诉权,方可产生该效果。然而,我国《民法典》并未规定能够设立居住权的形成诉权。因此,即使实践中法院在判决中认定居住权归属于某一方,其性质仍属给付判决或确认判决而非形成判决。实体法未规定相应的形成诉权,该判决亦不具备形成力。例如,在离婚诉讼中,法院将居住权判决给有特殊需求的一方时,本质上是对双方财产争议的裁判。法院对财产分配的判决产生的是请求权,而非直接变动物权关系。离婚诉讼的形成效力仅及于婚姻关系这一身份关系,并不涉及双方的财产关系。因此,法院关于居住权归属的判决并不具备形成力,也不属于通过法律文书设立居住权的情形。此类判决所产生的仍为一种请求权,而非直接导致居住权的设立。当案外人持此类判决书主张享有居住权并请求排除执行时,若居住权尚未登记,应依据《异议复议规定》第26条第二

项,对其请求不予支持。

参考文献:

[1] 张卫平. 民法典的实施与民事诉讼法的协调和对接[J]. 中外法学, 2020(4): 933-950.

[2] 王利明, 杨立新, 王轶, 等. 民法学[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20.

[3]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最高人民法院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下)[M]. 北京: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22.

[4] 曹凤国. 执行异议之诉裁判规则与理解适用[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22.

[5] 黄忠顺. 案外人排除强制执行请求的司法审查模式选择[J]. 法学, 2020(10): 107-124.

[6] 江必新, 刘贵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理解与适用[M]. 北京: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5.

[7] 何马根, 吉卓桦. 居住权排除强制执行的实证分析和规则构建[J]. 法律适用, 2022(5): 66-74.

[8] 刘颖. 物权期待权排除强制执行规则之再审视[J]. 当代法学, 2023(4): 130-141.

[9] 焦富民. 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参照适用”规范之适用[J]. 政治与法律, 2024(10): 100-112.

[10] 崔建远. 物权: 规范与学说[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1.

(责任编辑 刘成贺)

On the Review Standards and Procedural Paths of the Right of Habitation against Compulsory Execution

LI Gang, ZHANG Cong

(School of Law,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0, China)

Abstract: The right of habitation not only possesses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real rights but also has its own unique attributes. When the right of habitation of a third party is infringed upon by compulsory execution, the third party should seek relief through the procedure. This procedure plays a unique role in promptly protecting the rights of the third party. In this procedure, the principle of mainly conducting formal review and supplementarily conducting substantive review should be adhered to. Although the right of habitation is a real right over immovable property, when it comes to review, Article 25, Paragraph 5 of the “Regulations on Objections and Reconsiderations” should be applied, treating it as “other rights” for review. The right of habitation is at risk of being infringed upon during compulsory execution and needs to be protected through the execution relief procedure. For the right of habitation established by contract, if the registration is not completed, the right of habitation shall not be established. At this time, the expectation right of the right of habitation cannot be claimed to exclude execution, and the application scope of the expectation right of real rights to exclude execution should be strictly limited. In the litigation of disputes over the right of habitation contract, the payment judgments made by the court do not have the effect of excluding compulsory execu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ight of habitation by effective legal documents should be narrowly interpreted as only including formative judgments, while China has not yet stipulated the formative claim right for establishing the right of habitation.

Key words: Right of habitation; Execution relief; Objection to the execution subject by a third party; Third-party execution objection lawsuit

社会本位理念下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优化研究

王建国

(河南检察职业学院 检察事务学院,河南 郑州 451191)

摘要:违法行为后果分散化、社会化的利益冲突,不仅需要通过基于社会本位理念的实体法予以确权,更需要构建或完善基于该理念的程序法去高效解决群体性纠纷。构建多元化社会主体共同参与、以“有利的自动授权,不利的被动同意”为特色且代表人处分权能完备的民事公益诉讼机制,以及以“默示加入,明示退出”为特色和以维护实质正义为依归的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金范围确定、分配顺位、归属比例等制度,可进一步优化公共利益保护的事前预防和事后弥补机制,进而强化制度激励效能,增强社会创新发展动力,提升社会整体效率、效益;同时,还能提升民事公益诉讼的社会治理协同效能,切实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关键词:社会本位;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6.008

中图分类号:D925.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6-0054-05

自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1838年在《实证哲学教程》中提出社会学学科构想以来,学界对“社会”的认知始终存在“唯名论”与“唯实论”两种迥异观点。实证社会学派的“唯实论”认为,社会是客观存在的有机整体,是抽象于具体个人、独立存在的更高层次实体。事实上,尽管社会本身无法直接成为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主体,但社会绝非所有单个个体利益的简单叠加,而是真实存在的抽象实体。同时,为了更有效地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也应该基于“唯实论”将社会拟制为法律主体。法律制度的本位理念,是指法律制度以何种逻辑为起点,站在何种角度与基本立场看待利益冲突、设置社会矛盾的解决路径并保障目标实现,且将基本价值、功能与目标作为评价法律制度优劣的标准。换言之,法律部门的本位思想是指体现在这个法律部门中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立场。“社会本位”是“社会”与“本位”结合而成的概念,法律制度的社会本位是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为逻辑起点,站在社会的角度和基本立场构建、完善并评价法律制度。目前,民事公益诉讼存

在程序设置合理性不足、制度实效不佳的问题,其根源在于相关法律制度设计仍基于个体本位或国家本位理念。违法行为后果分散化、社会化的利益冲突,亟需基于社会本位理念的公益诉讼等程序法高效解决群体性纠纷。因此,为充分实现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价值与设计目标,应基于社会本位理念对其程序规则与制度体系进行系统性优化。

一、我国现行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存在的不足

自201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以来,我国已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英烈权益保护、国有财产保护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构建起相应制度框架;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人民检察院办理知识产权案件工作指引》第20条也已初步提出构建知识产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设想。但需要注意的是,民事公益诉讼的相关规定嵌套于私益诉讼法律制度之中,难以脱离私益诉讼所依据的本位理念。这种法律理念的错位,致使制度设置出现偏差,最终导致民事公益诉

收稿日期:2025-09-05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强省项目“河南高等教育强省建设法治保障研究”(2025JYQS0100)

作者简介:王建国(1979—),男,河南南阳人,法学硕士,河南检察职业学院检察事务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经济法学,诉讼法学。

讼的立法目的难以有效实现。

从司法实践来看,我国现行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主要存在以下九个方面问题:一是诉讼主体范围限制过严。制度基本剥夺了公民个人的公益诉讼起诉权,公民仅能通过向检察机关、行政机关举报,或向相关社会组织提出建议、请求提供证据等间接方式介入民事公益诉讼;同时,对社会组织的成立年限等条件限制过严,导致适格诉讼主体相对缺乏。二是诉讼主体资格性质界定模糊。部分法律法规将诉讼资格界定为权利,部分法律法规则将其认定为义务,未结合不同主体的功能定位与特征予以明确区分,造成实践适用困惑。三是诉讼主体起诉顺位不明确。虽然《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检察机关在相关机关和组织之后承担补充起诉义务,但现行制度对优先、劣后起诉权的划分不够严格,加之诉讼资格性质界定模糊,易引发诉权冲突,尤其可能导致相关主体怠于履行诉讼职责。四是诉讼范围界定不清晰。诉讼范围采用“列举+等”的表述方式,其中“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概括式立法,且未对“社会公共利益”作出明确界定,这往往导致司法实践中案件受理范围争议频发,对违法行为的定性也存在分歧。五是诉讼成本保障机制不完备。当前主流观点认为,原告败诉时应采用“财政性资金为主、公益诉讼基金为辅”成本保障模式,具体包括诉讼费减免、司法救助、检察机关“公益诉讼专项经费”等。但在财政紧缺压力日益严峻的背景下,该模式进一步加剧了政府债务风险;同时,公共利益具有区域性特征,若跨区域公共利益侵害案件的诉讼成本由单一地区财政承担,也缺乏合理性。六是胜诉激励机制缺失。胜诉后的成本补偿和精神激励机制不完善,尽管部分地区尝试将被告诉纳赔偿金的较小比例用于社会组织胜诉奖励、线索举报奖励、律师酬金等,但这种粗放型制度设计相较于“合理性审查”的成本补偿制度,科学性与合理性不足。此外,诉讼程序设计未充分考虑制度经济性与效率性,无形之中增加了诉讼“隐性成本”,缺乏有效的“间接激励”效应。七是赔偿金制度及分配、执行机制存在缺陷。惩罚性赔偿金制度未普遍适用于所有公益诉讼案件,且其在公益诉讼基金、受害者赔偿、公益修复等方面的分配比例与方式不够合理,未能充分发挥其公益救济功能。八是诉讼代表人处分权能失衡。“诉讼担当者”理论、公益诉讼成本社会化特性,以及民事公益诉讼源于侵权后果社会化的本质,决定了应对诉讼主体的实体与程序权利处分行为进行严格限制。但现行诉讼规则对调解、和解、诉讼请求变更、不利证据自认等环节限

制过度,且限制性规定多为原则性表述,易被不当利用,既降低了诉讼效率,造成制度不经济,也增加了社会成本。九是社会监督与诉讼程序的良性互动机制不完善。公众参与诉讼程序的便捷性不足,监督制度流于形式;法律制度对社会主体的赋权与赋能不够,导致社会监督效能薄弱,未能形成监督与诉讼程序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二、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优化的现实需求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深入推进,因同一违法事实导致不特定多数人法益受损的事件频发,群体性侵权事件不断呈现扩散性、分散性、公共性与社会性的特征。侵权后果的社会化与责任分配的社会化,使得现行以个人责任追究为基础、基于个体本位理念的诉讼制度——《民事诉讼法》第55条、第56条规定的共同诉讼,以及第57条规定的普通代表人诉讼制度——难以高效化解“小额、大量、分散型”群体性纠纷。被代表集体的相对封闭性与损失的补偿性,导致受害范围广、单笔金额小的受害方缺乏维权动力,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市场自身的修复与调整能力。目前法律法规构建的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以及以特定机关、机构为诉讼主体的公益诉讼制度,仍存在诸多缺陷:公共代理人代理失灵、适用范围狭窄、代表人诉讼权能不足、判决效力扩张被动、代表人激励机制不完善、代表性不足、赔偿金侧重补偿性、具体操作规则不健全等。这些问题严重制约制度价值实现,既无法解决侵权收益与社会成本严重不对称的群体性纠纷,也难以形成对侵害公共利益行为的有效震慑。

近些年来,网络平台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激增,严重损害广大分散科研人员的合法权益。目前,知识产权人维权主要依赖私人诉讼或向行政机关投诉、寄希望于行政执法,但受限于“政府失灵”——执法人员职业素养不足、执法信息不对称、执法能力有限、效率低下等,以及自身维权面临的时间、金钱、机会成本过高等因素,这些手段实践效果不佳。社会化利益冲突的化解,不仅需要基于社会本位理念的实体法确权,更需要构建或完善基于同一理念的程序法。正如博登海默所言:“法律是社会控制的产物,也是社会控制的重要力量,但绝非唯一力量。在任何有组织的社会中,仅仅依靠法律这一社会控制力量显然是不够的。”^[1]完善的公共利益保护体系,必须兼顾司法职能的被动参与和市场主体的主动参与,实现二者协同互补。此外,受我国传统诉讼文化影响,现行公益诉讼制度立法理念未重视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统一性,甚至将二者对立。事实上,基于现代社会生活现象的多样性,不能将公益和私益视为相反的概念,两者应是相辅相成、并行不

悖的概念,不确定多数人的私益可以形成公共利益。因此,优化民事公益诉讼制度,首要任务是转变其本位理念。另外,现行制度未能有效贯彻社会效率与社会效益原则,未通过动态成本分摊实现诉讼规模经济效应,既无法解决同一违法事实引发的重复诉讼,也未实现“高效一次性化解群体性纠纷”的核心价值,导致个体诉讼成本与社会正义矫正成本均未得到有效控制。通过完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将有限制度资源与司法资源公平分配给权利受损个体,使其在节约诉讼成本的同时发挥制度激励效能,已成为当前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新路径。

三、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优化基本目标的确立

基于社会本位理念的法律制度,立足社会整体视角看待问题,以维护社会整体(公共)利益为主导、出发点,并将其作为直接、首要且最终目标。其本质特征与法益保护目标决定了其调整机制应允许甚至倡导社会各类主体积极参与社会治理;调整方法应综合运用公法与私法手段,融合强制手段、自我调节机制与整体平衡协调方法;法律规范则应是授权性规范、义务性规范与禁止性规范的有机统一体。总体而言,现行各类公益诉讼制度的直接与最终设计目标均为维护公共利益,这与“社会本位”理念高度契合。因此,将“社会本位”理念确立为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本位理念,不仅是该制度自身存在与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破解当前制度缺陷的前提与重要依据。在依据公益诉讼的价值追求与本质属性确立社会本位理念后,需以此为遵循明确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优化的基本目标,进而围绕目标推进制度改进工作。

由于公共利益具有层次性与范围性特征,社会本位理念下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优化应实现以下四个目标:一是提高社会整体效率。法律制度资源、司法资源等社会资源的稀缺性是促使人们通过法律制度配置资源以实现社会整体效率,并将效率提升作为正义实现有效途径的根本原因。社会本位理念下民事公益诉讼,应力求通过高效的利益冲突解决机制推动社会整体效率提升,并将这一价值追求视为法律实现正义的有效途径——正如法律经济学奠基人之一理查德·艾伦·波斯纳所言:“正义的第二种涵义——也许是最普通的涵义——是效率。”^[2]社会整体效率的价值追求在部分领域与微观个体效率并不冲突,从长远、宏观视角来看二者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个体效率的提升同样会推动社会整体效率进步。当然,在特定领域,社会本位法律制度也可能通过限制个体效率以实现社会整体效率的提升。二是提高社会经济效益。法律提升社会经济效益的核心路径是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开

创者罗纳德·哈里·科斯的观点,在社会交易费用大于零的情况下,不同的制度设计会导致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产生显著差异,因此经济问题的核心本质是制度问题。囿于人的有限理性和自利本性,社会交易费用不可能等于或低于零,因此优化法律制度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同时,法律制度本身也存在社会成本。正因为如此,社会本位理念下民事公益诉讼应力求立足社会整体利益,开展制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不断完善法律制度,降低自身运转成本与社会交易成本,实现合法利益的充分交换,进而推动社会经济的高效发展。此外,为提升社会整体经济效益,民事公益诉讼应通过制度设计,对社会主体的“正外部性”行为进行正向激励,以更小的社会成本换取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对社会主体的“负外部性”行为进行负向约束,使其承担更多不利后果,通过有效抑制“负外部性”行为,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的提升。三是社会秩序。秩序意指在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中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国家因其合法强制力的垄断性,一直是社会秩序维护的主导力量,但国家本位法所维护的秩序强调国家意志,是统治阶级力求实现的符合其利益目标的秩序,绝不等同于社会本位法维护的秩序。若按照英国政治家托马斯·霍布斯“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并通过颁布法规来管理社会”和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个人和社会只是国家的工具和附庸”的观点制定法律制度,“社会国家化”必将因对个体的过分管制而走向专制主义。按照奥地利经济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的观点,社会存在自生自发秩序与人造秩序,据此可知,国家本位法维护的秩序是为实现预设目的的人造秩序,而社会本位法强调追求自生自发秩序,力求实现的社会秩序具有整体性、宏观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有必要通过法律制度赋权于国家、社会中间层与个人,构建多主体参与的社会治理机制。四是正当程序理念下、程序民主化前提下的实质正义。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将正义区分为社会正义与个人正义,并认为正义首先是社会正义,而社会正义实现的根本途径是正义的制度建构。“对我们来说,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所谓主要制度,我的理解是政治结构和主要的经济和社会安排”^[3],这是对社会制度的道德评价,他同时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在判断社会“制度”的正义问题时,罗尔斯将正义区分为形式正义和实质

正义,要求“相同情况同样处理”的形式正义,无法保证一项制度实现实质正义;实质正义可能要求“相同情况不同处理”,但缺乏程序民主化与透明化作为保障前提的实质正义追求,可能导致专制主义以及权力与资本的勾结问题。社会本位理念下的民事公益诉讼,强调社会各主体多方参与社会治理,这是实体法与程序法民主化的有效路径。其在社会本位理念引领下的制度设计,可通过民主化、透明化的程序,依据“差别原则”实施“权利的倾斜性配置”,从而实现权利分配的实质正义。

四、社会本位理念下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优化建议

基于社会本位理念优化民事公益诉讼制度,首要任务是扩大诉讼原告主体范围,在法院职权主义下建立多元化社会主体参与的民事公益诉讼机制。违法行为后果的社会化,要求必须允许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实现社会成员自治与他治的兼容。一是要赋予个体、更多类型的社会中间层等社会主体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权利,明确规定代表人及其代理律师的资格条件,而非由机关和“半官方”组织“垄断”民事公益诉讼主体资格。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法律应将人员不特定、人数不确定、损害具有扩散性的受害人群体,拟制为一个“默示加入,明示退出”的集体。既然机关、机构可作为这类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那么作为直接或潜在受害人的个体,以及作为个体代表的社会中间层,当然应有权作为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代表——使其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同时,也维护其他权益受损者的合法权益。因为“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4],这种赋权模式强调发挥市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形成强大的社会监控力量,用声誉奖励、经济支持等正刺激方式,释放个体行为的“正外部性”;借助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捆绑模式,避免“集体行动的困境”,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共赢,以最小的社会成本实现社会利益保护的最大化收益。二是要设置严格的司法机制,参照欧盟“预审过滤+动态调整”的诉讼主体管理机制,建立公益诉讼律师库。一旦查实存在滥讼行为或侵害被代理人利益的行为,应立即将其移出律师库,并终身禁止从事民事公益诉讼业务;通过声誉罚、经济罚、资格罚等负向约束方式,限制个体行为的“负外部性”。三是要依据民事公益诉讼目的、相关诉讼主体的性质,以及其与诉讼能力(包括专业知识、诉讼资源等)的匹配度,确立诉讼主体的诉讼顺位。由于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高度重合性,相关行政机关应作为第一顺位主体;鉴于社会组织的非营利性及

行业专业性,相关社会组织应作为第二顺位主体;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作为第三顺位主体。公民是公共利益保护的受益者,应在上述主体怠于履行诉讼义务时,享有公益诉讼的权利——除非在特殊领域,才可将诉权授予个别主体。同时,依据上述主体的性质,法律应将相关行政机关、社会组织、检察机关的民事公益诉讼资格界定为“义务”,而将公民的民事公益诉讼资格界定为“权利”。

低成本、高效率地解决群体性纠纷,是社会本位理念下法律制度的重要依归。基于此,需进一步扩大民事公益诉讼代表人的处分权能。由于公益诉讼中“集体”具有开放性,被代表人之间的协调成本与利益平衡成本较高,且人数越多,不确定性越强,成本越高。因此,应在强化法院监管制度、优化被代表人监督法律程序的基础上,扩大民事公益诉讼代表人的处分权能,确立“对被代表人有利的自动授权同意,不利的需被动同意”的原则,明确在和解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时,仅需法院授权,无需全体被代表人同意的规则,从而减少社会交易成本,提高司法效能。同时,为防止民事公益诉讼代表人滥用处分权能,法律需通过赋权、赋能、程序保障及信息化技术支持等方式,确保社会主体能有效监督其处分诉讼权能的全过程,甚至保障社会主体实质性参与民事公益诉讼的全流程(含事后监督),借助外部约束力推动内部纠错,依托社会力量保障民事公益诉讼公共利益保护目标的实现。

“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5],要在民事公益诉讼中建立体现社会正义价值追求、以公共利益实现为依归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侵权行为危害后果的社会化,决定了必须实施“法律责任的社会化”,而兼具私法属性与公法属性、以补偿性赔偿为基础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可有效实现这一目标——补偿性体现形式公平,惩罚性体现实质公平。基于社会本位理念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其超额赔偿功能本质上是对难以计算的损失的赔偿,包括对个体和社会两方面难以量化的损失的赔偿。在个体方面,一是针对难以量化的精神损害赔偿。尽管司法实践中常对精神损害赔偿进行计算,但该计算方法与结果均以“恢复原状”的补偿性为核心;同时,传统民事诉讼法的“实际损害”标准,也导致完全补偿目的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实现。囿于客观现实的复杂性和人类有限理性的局限性,无论科技如何发达,都难以实现完全客观准确的计量,这使得给予受害人的赔付既无法完全覆盖其经济损失,也难以平复其内心愤恨,进而无法实现社会实质正义,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正如学者谷口安平所言:“通过诉讼达到判决使纠

纷得到解决,指的只是以既判力为基础的强制性解决,这里所说的解决,并不意味着纠纷在社会和心理的意义上也得到真正的解决。当事人对判决的不满,使表面上已解决了的纠纷有可能在其他方面表现出来。”^[6]二是目前财产损害赔偿也同样以“现实损失”的补偿性原则为基础。赔偿范围基本限于“恢复原状”,对受损财产后续处置价值的贬损几乎未作考量。但事实上,财产一旦经过维修,再出售价值远低于未经维修的财产。这一客观事实决定了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必须设置超额赔偿制度。在社会方面,一方面,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的超额赔偿功能,不仅是对不特定多数受害人的超额、超预期赔偿,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对社会公共利益与公共秩序受损的赔偿。即便如此,这种对个人利益受损的超额赔偿与对社会利益受损的补偿,仍属于私法范畴的制度设计——因其核心逻辑仍是“恢复难以观察和计量的受损利益”。另一方面,惩罚性赔偿的另一重要功能是通过经济制裁使危害后果具有扩散性的违法行为“负外部性”内部化,即提高违法行为人的违法成本,使其不法行为无利可图,甚至进一步剥夺其部分合法利益。这种惩罚功能与威慑功能,使惩罚性赔偿制度具备了公法属性。同时,只有将惩罚性赔偿金的用途“社会化”,才能充分体现其制度设计的社会本位理念。可将三倍惩罚性赔偿金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作为不特定多数受害人的赔偿金——由于“默示加入,明示退出”规则的存在,诉

讼前、诉讼中及诉讼后均难以绝对准确地确定受害人人数量与赔偿金额,因此需要设立一项具有预备性质的“补偿资金”,以保障短期内因各种原因未获赔偿的受害人的权利;另一部分划入民事公益诉讼基金,用于在部分胜诉后违法人无赔偿能力的案件中,直接向受害人支付赔偿,或承担特殊公益诉讼案件的诉讼成本。此举可减少政府对公益诉讼基金的拨款——政府财政拨款本质上来来自全体国民的税收,若动用国民税收替侵权人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将严重违背社会正义原则,而社会本位理念下的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可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参考文献:

[1] E·博登海默. 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 邓正来,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357.
[2] 理查德·A·波斯纳. 法律的经济分析[M]. 蒋兆康,译.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31.
[3] 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M]. 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5.
[4]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 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27.
[5]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吴寿彭,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48.
[6] 谷口安平. 程序的正义与诉讼[M]. 王亚新,刘荣军,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1996:48.

(责任编辑 刘成贺)

Research on the Optimization of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ystem under the Social-Oriented Concept

WANG Jianquan

(College of Henan Procuratorial Profession Institute of Procuratorial Affairs, Zhengzhou, Henan 451191, China)

Abstract: The consequences of illegal activities, which are characterized by dispersed and socialized conflicts of interest, not only require the affirmation of rights through substantive law based on a social oriented philosophy, but also demand the construction or improvement of procedural law grounded in the same concept so as to resolve collective disputes efficiently. Establishing a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mechanism featur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diverse social entities, characterized by “automatic authorization for favorable outcomes and passive consent for unfavorable ones”, with comprehensive representative disposition rights— alongside systems for determining the scope, distribution priority, and allocation ratios of punitive damages in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featured by “automatic authorization for favorable circumstances and passive consent for unfavorable ones” and guided by upholding substantive justice, which can further optimize the ex-ante prevention and ex-post compensation mechanisms for safeguarding public interests. This, in turn, strengthens institutional incentives, enhances the driving force for soci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improves overall social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Moreover, it can boos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efficacy of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thereby effectively safeguarding societal public interests.

Key words: social orientation;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punitive damages

抗战时期新疆的共产党人与女性解放述论

贾秀慧

(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抗战时期,新疆作为战略大后方,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传播进步思想、践行革命理想的重要阵地。受党组织派遣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党员,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当地多民族社会实际深度结合,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实践工作。他们积极推动女子教育,创办新式学校,鼓励各族女性学习文化;大力促进女子就业,支持女性进入学校、医院、工厂等工作领域,帮助她们获得经济独立能力;通过组织妇女协会等活动,有效提升了女性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率;推动婚姻制度改革,倡导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从法律和习俗双层面保障女性合法权益。这些扎实的工作促进了新疆各族女性的觉醒与解放,对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强化平等观念、改善社会风气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新疆后续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抗战时期;新疆共产党员;女性解放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6.009

中图分类号:K2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6-0059-07

2023年10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强调:“做好妇女工作,不仅关系妇女自身发展,而且关系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关系国家发展、民族进步。”^[1]2024年9月11日,习近平致上海合作组织妇女论坛的贺信中指出:“妇女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者,在各行各业书写着不平凡的成就。”^[2]2025年10月13日,习近平在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的主旨讲话中进一步强调:“妇女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创造者、推动者、传承者,推进妇女事业发展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追求男女平等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妇女赋权取得显著进步,女性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3]这既是对当代女性贡献的高度肯定,也指明了妇女在推动社会前进中的关键角色。然而,回望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女性长期处于社会底层,遭受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的多重压迫。她们被“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牢牢禁锢,“女

子永远是家庭中的附属品、寄生虫,应该愚昧无知”^[4]这类思想如同沉重的枷锁,束缚着女性的发展与尊严。彼时的女性没有受教育、参与政治活动和社会生活的权利,还被早婚、买卖婚姻、一夫多妻等损害身心健康的婚姻恶习所摧残。新疆各族女性的命运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女性基本相同。

抗战时期(1931—1945年),部分中国共产党人^①陆续来到新疆工作,他们的努力对推动当地女性树立自尊、自立、自强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新疆各族妇女在思想解放、经济独立与家庭地位提升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1937年4月,在苏联的斡旋下,中共中央派陈云作为中国共产党驻新疆代表,与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正式建立了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年10月,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正式成立,这既是该统一战线制度化运行的重要标志,也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系统开展包括妇女工作在内的各项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

这个时期,一方面省政府推行的“六大政策”有

收稿日期:2025-09-12

基金项目:2025年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疆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2025AZD008)

作者简介:贾秀慧(1973—),女,河北定州人,新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近代新疆社会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与实践等。

利于妇女解放、提高妇女地位;另一方面盛世才对早期来疆的共产党人委以重任,允许十月革命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在新疆传播。这些变革举措,推动了新疆社会结构持续调整优化,使封闭落后的面貌逐步转向积极进取的态势。应盛世才的请求,中国共产党开始派遣共产党员赴新疆工作,他们分布在行政、民政、财政、教育、新闻等多个领域。这些共产党员在发动和团结新疆各族人民支援抗战、建设新疆各项事业的同时,积极践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主张女性在政治、经济、教育、婚姻、社会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完全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在共产党员的不懈努力下,新疆各族女性在教育、就业、参与社会活动、家庭婚姻等方面的权利和社会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当前学界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新疆的共产党人和女性解放的研究,多聚焦于政治史、抗战史、教育史等层面,研究内容多是对新疆妇女组织(妇协)、抗战思想宣传、女子教育、女性参与抗战募捐等的梳理与探究^②,缺乏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妇女解放的视角探讨该时期共产党员努力下新疆女性解放的实际成效和经验。笔者拟从这一视角出发,系统梳理《新疆日报·女声半月刊》中有关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文章,挖掘报纸和档案中涉及女子教育、女性就业及女性婚姻自由权的新资料,以期细致地呈现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新疆实践,进一步拓展中共党史、性别史的研究视野。

一、在共产党员主导下,新疆妇女协会积极开展女性解放的宣传活动

1934年3月8日成立的新疆妇女协会(简称妇协)是新疆首个妇女组织,其宗旨为推动广大女性识字、学知识和科学技术,解救被压迫妇女。邱毓芳(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之妻)担任委员长,会员主要为迪化女子小学的教师职工和女学生。凭借邱毓芳的特殊地位,该协会对新疆妇女运动的发展起到一定推动作用,揭开了新疆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篇章,但同时也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反对和打击。1938年至1939年初,沈谷南(化名张奋音)、朱旦华(化名朱家农)、黄颐(化名苏枚)、鄯仪贞(化名鄯念萱)、李涛、申玲、刘勉(化名刘万祥)、熊梅影(化名熊世琦)、任远光、郑瑛(化名李霞)、崔少文、刘锦屏等一批女共产党员来到新疆工作^{[5]4},参与了1938年3月至1940年5月新疆妇协的两次改选^{[6]28}。其中,张奋音先后当选为新疆妇协秘书长、副委员长,朱旦华、刘勉分别担任新疆妇协宣传部正、副部长,沈谷南、朱旦华、刘勉、任远光、崔少文、孙若梅等担任新疆妇协常委。此后,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妇协的

领导力量显著增强。尽管新疆妇协直属邱毓芳领导,存在大量宣传歌颂盛世才统治的行为,但在“向苏联学习”的口号下,共产党员得以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1940年8月,张奋音、朱旦华主导修改了妇协章程。新章程规定妇协的任务是:“为扩大组织加强对妇女群众的领导工作,为使全疆妇女走上自觉与解放的道路,为了在大时代里边使新疆妇女加紧学习努力工作,更为了动员200万妇女们参加抗战建新的伟大事业,以便增强抗战建新的实力。”^[7]新章程超越了以前仅学文化、学知识的局限,强调新疆女性需参与社会劳动与抗战救亡,主张开阔女性的眼界,推动新疆女性实现经济独立并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沈谷南、朱旦华还组织创作了《新疆妇女协会会歌》,制定了妇协的工作制度、活动计划和奖惩条例等。在共产党员的主导下,新疆妇协目标更明确、组织更严密,促进了新疆女性觉醒与妇女解放事业的蓬勃发展。

在共产党员的组织与动员下,新疆妇协至1942年已在全疆各地建立35个分会、14个直属小组,拥有女会员4000人^[8]。新疆各级妇协坚守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营造尊重妇女的良好社会风尚、支持女性教育、动员妇女参与国家政治活动、培养女干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意识形态领域,妇协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宣传教育活动。

(一)依托报纸媒体平台,推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大众化传播

被分配在新闻战线上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支持新疆女性解放运动的发展。1938年,共产党员汪小川^③出任新疆日报社副社长,共产党员李宗林^④担任总编辑,另有王宪唐、王谟、李何等10余名共产党员在新疆日报社负责采稿、编审、出版等工作。新疆日报社部分分社社长、编辑长等职,亦由共产党员担任。在共产党员主导下,《新疆日报》大力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尤其注重普及马克思主义妇女观。1938年10月10日,新疆妇协在《新疆日报》第4版创办妇女专刊——《女声半月刊》,其宗旨为:“使它真正能成为全疆妇女大众说话的园地,真正能担负起提高妇女文化、促进妇女解放的任务。”^[9]共产党员孙若梅、沈谷南先后担任主编,共产党员编辑有朱旦华、黄颐等。据笔者统计,截至1940年7月6日,该刊共刊印27期,成为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传播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有效载体,也是新疆各族女性获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媒介。《女声半月刊》先后刊发了

《妇女真不如男子吗?》《妇女做主人的社会》《私有财产制度与妇女》等文章,系统宣传男女平等、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是妇女解放的首要条件、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等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核心内容。该刊主要撰稿人包括共产党员沈谷南、朱旦华等,他们撰写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文章。其中,沈谷南撰写的文章主要有《募寒运动与新疆妇女》《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妇女》《纪念三八与妇女目前的任务》^[10];朱旦华撰写的文章主要有《走入一九三九年之新疆妇女运动》《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历史意义》《五卅运动和妇女运动》^[11]等。

此外,《女声半月刊》还转载了当时中共中央妇委会委员康克清撰写的《华北敌后的妇女英姿》^[12]一文,向新疆女性介绍抗战敌后战场的女性抗日事迹。同时登载了《苏联航空界之女英雄》《苏联的妇女》《十月革命与妇女》《世界第一个铁路女站长》^[13]等文章,介绍外国杰出女性的事迹,通过榜样示范激励新疆女性奋发有为、自立自强。

(二)开展各类讲座,推动新疆女性精神独立与价值觉醒

共产党员主导下的新疆妇协,积极开办涵盖妇女问题、文学、时政等内容的系列讲座,唤醒新疆女性的独立意识。1938年10月29日,妇协在督办公署西大楼举行讲演会,由共产党员朱旦华主持,邀请杜重远讲《妇女解放问题》、萨空了讲《妇女解放的基本条件》^[14]^[22]、陈纪滢讲《内地妇女运动的情况》;1939年5月7日,邀请著名文学家、共产党员茅盾作《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报告;9月16日,邀请新疆日报社副社长、共产党员汪小川作时政报告,内容聚焦帝国主义战争进入新阶段及其对中国的影响;1940年3月初,妇协又邀请著名学者、共产党员沈志远讲《现代妇女问题和新女性的任务》^[6]^[31]。新疆妇协通过上述一系列宣传活动,开阔了新疆女性的视野,培育了她们的社会责任感。经过广泛的思想宣传与教育,到1943年,新疆广大妇女在思想方面“跳出了落后的、腐败的、依赖的……‘三从四德’的奴隶思想深渊,接受了前进的、向上的、积极的新思想。……每个人都确立下正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把民族解放与自身解放联系起来”^[15]。

二、共产党员引领新疆女子教育的现代化进程

教育不仅能让女性认识世界,还能培养其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精神。抗战期间,来疆的共产党员林为梁(化名林基路)、李云扬(化名李志梁)、陈谷音(女)、陈茵素(女)、申玲(女)、伍乃茵(女)、徐孟秋^⑤等多名共产党员被分配到新疆的教育系统工

作。其中,林基路担任新疆学院教育长、李云扬出任省立第一中学校长、陈谷音在省立迪化师范任教、陈茵素兼任库车县小学校长与教员、申玲担任哈密女校校长、伍乃茵出任疏勒县小学校长、孟一鸣担任新疆省教育厅副厅长。他们深知女子教育对新疆妇女解放和社会发展的意义,对此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

抗战期间,共产党员参与领导的全疆最大群众性政治组织——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简称反帝会),积极支持女子教育发展。1938年,中共党员黄火青(化名黄民孚)被盛世才委任为反帝会秘书长,段进启、韩光、于村等共产党员在反帝会中任职,他们借助该组织“官办组织的合法性来宣传马列主义、抗日思想”^[16]^[39],同时着力“普及各族妇女的民众教育”^[16]^[67]。新疆妇协也积极开展女性扫盲教育活动。

在新疆省政府、进步人士的推动和共产党员的共同努力下,抗战期间新疆女性的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等均获得一定发展,各族女性的文化素质得到显著提高。

(一)女子初、中、高等教育实现历史性跨越

女子初等教育方面,据统计,1941年新疆公立小学的女生人数为21,239人^[17]^[44]⁵,当年全部小学生人数为78,891人,女生占总数的26.9%。

女子中等教育方面,共产党员对新疆女子教育的中心——迪化女中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37年9月,新疆省立迪化女子中学(简称迪化女中)成立。1938年7月,共产党员朱旦华出任迪化女中的教导主任,沈谷南、黄颐等十几名女共产党员陆续在该校从事教学或妇运相关工作后,这所拥有1200多名女学生的学校面貌焕然一新,成为新疆女性解放运动的发源地与中心。朱旦华提出“诚毅团结,勤肃紧张,敏活健壮,精勇创造”十六字校训,并创作了校歌。1940年1月,女中招收新生285名,其中维吾尔族女生50名,自此开启维汉合校模式,方便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在朱旦华等共产党人的引领下,迪化女中多数师生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据统计,截至1941年,全疆中等教育在校生3168人,其中女生861人^[17]^[44]⁵,女生占总数的27.2%。

共产党员对新疆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功勋显著。1942年4月25日至5月5日,新疆妇协召开新疆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会议审议通过成立女子大学的决议。同年7月,共产党员朱旦华牵头起草了创办新疆女子学院的计划,经省政府批准后,8月25

日在迪化女子中学内设立大学部并正式开学^{[5]63}，这标志着新疆女子高等教育的雏形正式形成。1943年4月，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新疆省立女子学院正式成立，这是新疆女子高等教育的肇始。该校办学层次涵盖本科(学制4年)、大专(学制3年)、中专，其中本科有文学、教育、医学三个系；三个大专班为文史、教育、医科；三个中专班是妇产、助产、蚕桑。

(二)扫盲攻坚等社会教育成效显著

女子社会教育方面，共产党员积极贯彻执行新疆省政府的相关扫盲政策。抗战时期，新疆全省人口400万，文盲占90%，识字群体(含学生、公务员、识字商人)仅73万^[18]。1940年，教育厅颁布了《第一期扫除文盲实施方案》^[19]，动员全疆文化教育界力量投身扫盲工作。

为配合扫盲计划，新疆妇协总会于1941年制定《妇协总会拟就妇女识字实施办法》^[20]，新疆各族女性可通过识字班、夜校、民众学校、冬学运动等多种形式实现脱盲识字。在扫盲教育热潮中，新疆女性参与民众学校识字的积极性很高。1939年，迪化53岁妇女韩淑玉(人称“王老太太”)不仅参加民众学校学习，还“随时随地劝导家庭妇女，入民校读书”。她“每次在妇女座谈会上或妇女群众晚会上都有热烈诚挚的演讲，一般妇女同胞受其感动者极多”^[21]。据统计，全疆民众学校女性学员人数从1937年的1085人增至1942年的49339人。

大规模冬学运动也是扫除文盲的有效途径。1939年2月，省教育厅颁布《冬学运动的组织与工作大纲》^[22]，主张通过夜校、识字班、夜学班、家庭学习组、实习班、训练组等形式开展冬学运动。下至无财力就学的儿童，上至63岁的维吾尔族老翁，尤其是广大目不识丁的妇女，均被吸引到冬学热潮中。据统计，1941年3月至6月，全疆共有109,572人参加冬学运动，其中女性25,146人，占22.9%。

总之，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积极配合、全面落实新疆省政府颁布的女性教育发展政策，推动抗战时期新疆女性文化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少数民族妇女受教育人数大幅增加。以少数民族聚居区喀什为例，1941年该地区女学生达31,480人，占学生总人数的46%；女教员380人，占教员总人数的11%。冬学运动中，女性课堂受教者有265,148人，女性街头受教者有600,333人^{[23]5}。

女子接受教育是打破思想束缚的关键。通过各类女子教育的推广，新疆女性获得了更多的知识和技能，自我意识、综合素质及实践能力得到了提升，进而促进了经济独立，使她们在就业、政治、文化等

领域拥有了更多竞争力和话语权。

三、共产党员努力改善女性就业状况，助力女性社会政治参与度不断增强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指出，参加社会劳动是女性解放的重要先决条件。女性只有享有充分的就业会和多样化的就业途径、实现自我经济独立时，才能够掌控个人及家庭所需的生活资料(包括占有、使用、处理和继承这些资料的权利)，才能在社会与家庭中拥有话语权，进而实现女性解放。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内涵，积极倡导女性就业以实现经济独立，主张女性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投身社会和国家管理以实现自身价值。

(一)新疆女性就业遍及各行业领域

基于新疆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女性就业空间得到较大幅度拓展。1936年2月，新疆运输处为扩充市营汽车业务，招收多名女售票员，“要求年龄在16—25岁之间，粗通文字、体格强健、无不良嗜好，待遇特别从优”^[24]。张文英就任女售票员工作后，因做事认真被提升为售票员领班，薪金增至25元以示鼓励^[25]。女性也开始涉足教育、妇运等工作领域。1940年3月，新疆妇女运动的中心——迪化女中的高中班、师范班，学生毕业后，陆续进入全疆各地从事女性教育或妇运工作^{[5]52}。

新疆妇协通过举办干部训练班、职业训练班及创办女子工厂等方式，为各族女性创造更多就业机会。1940年8月，妇协在迪化举办第一期女干部训练班，学员120人；1941年夏，妇协又举办第二期女干部训练班和保姆、艺术、维语速成等训练班，女学员200人。这两期训练班均由共产党员张奋音总负责，任课老师除邱毓芳、李奉兰(女知识分子)外，其余都是共产党员^{[5]12}；1941年，新疆妇协与建设厅、维文会、汉文会等机关和社团组织共同成立了新疆女子实业工厂筹委会。1942年9月，女子实业工厂在红山嘴下设生产部，招收女工50名，开展缝纫、针织、食品等生产工作^{[5]64}，新疆第一个女子工厂正式诞生。

政府部门也开始招收女公务员。1942年3月中旬，新疆省公安局招收了10名女户籍员。1945年2月结业的喀什区警察局户籍训练班73名学员中，包含6名维吾尔族女青年^[26]。在医疗卫生领域，“妇科、产科、小儿科完全是女大夫、女看护、女卫生员负责，而普通医院、药房内，也有很多妇女参与工作。(1942年)省医院有114名女医务工作者”^{[5]210}。

总之，“省政务委员、省政府委员、省设计委员、

县务委员、省参议员内均有女委员、女议员,各行政机关有女科长、女主任、女科员、女书记;公安机关有女警官、女户籍员;交通(邮电)机关有女邮务员、女邮务佐、女报务员、女电话生,等等”^{[23]4}。

可见,抗战时期新疆女性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自我价值得到激发,就业范围已覆盖交通运输业、教育、工厂、邮电、公务员和医疗卫生等诸多领域。经济独立使得女性得以摆脱对男性的经济依赖,更自主地选择生活方式和人生道路。

(二)新疆女性热情投身各类社会政治事务

在新疆省政府的倡导与共产党员的推动下,新疆妇女开始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政治活动。1940年4月,省城迪化及各县举行“四月革命”七周年纪念大会,参加庆祝的各族女性有8.8万多人^{[6]36}。新疆妇协于1942年4月25日至5月5日召开第一届全疆妇女代表大会,这次妇女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新疆唯一的一次女性代表大会。参会女代表400多人,其中有汉族144人、维吾尔族122人、回族25人、哈萨克族32人、乌孜别克族10人、索伦族(今达斡尔族)4人、俄罗斯族19人、蒙古族21人、塔塔尔族14人、满族2人、锡伯族7人、柯尔克孜族12人、塔吉克族1人。共产党员张奋音致开幕词,共产党员毛泽民(化名周彬)作大会报告^{[5]200}。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的召开意义重大,女代表们来自新疆各民族,提供各类提案800余件^{[6]47},全面反映了新疆各族女性的诉求。此次会议正值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广泛动员、团结各族女性抗战建新,激发和凝聚她们的爱国热情,增强新疆各族女性的国家认同。大会最终形成了保障妇女权益的决议案,要求政府明文“规定男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之平等权”,推动女性权益在法律、社会、经济、文化等多个维度获得全面而坚实的保障,成为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的重要基石。1946年新疆省政府颁布《新疆省政府施政纲领》,明确规定:“保障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法律上、教育上、社会上地位之平等。”^[27]

(三)新疆妇女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活动

抗战期间,新疆作为大后方,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新疆省政府的支持下,共产党员参与领导的反帝会成为组织各界人士开展抗战救亡运动的核心力量。新疆妇协积极响应反帝会的号召,动员新疆各族女性踊跃参与了募捐献金、募集寒衣、抗战文艺演出、文化劳军等抗日救亡活动,为中华民族的抗战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新疆妇协向一些行政区发函,号召“妇女响应

募集寒衣之号召”^{[28]133},迅速得到新疆各区县妇女的响应。奇台县女校与公务员家属联合组织妇女寒衣募捐团,在大街小巷进行募寒宣传;伊宁县妇女组织募寒团体,通过劝募和演剧募捐;呼图壁县成立了妇女寒衣会,当场募集省币20余万两;阿克苏县一名维吾尔族妇女捐元宝27个。截至1938年12月,仅迪化市妇女就捐寒衣款省票1490万两,全疆各族妇女累计捐款计省票1亿零700万两^[29]。

新疆妇协督促各妇协分会踊跃开展抗战捐款活动。1939年10月,南疆拜城县新疆妇协第八分会召开全面抗战二周年集会,该县各族妇女“共捐款省票银75万两,共折大洋125元……并捐女衣二件、女帽一顶、金戒指一支(只)”^{[28]100}。

共产党员还组织新疆各族女性开展以救亡图存为主题的抗战戏剧、抗战歌曲等多种形式的抗战文艺活动,对激发爱国热情、鼓舞抗战斗志、推动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1939年1月7日,新疆妇协、迪化女中等单位联合举办妇女群众新年联欢会,演出《船家曲》《防空》等抗战话剧;1月21日,新疆妇协组建数十个歌咏队,挨家挨户教唱抗战歌曲;1940年8月29日,新疆妇协组织各界女性同胞奔赴乾德县(今乌鲁木齐米东区),宣传抗日救国,演出话剧《放下你的鞭子》《沦亡之后》等^{[5]53}。

1942年10月启动的文化劳军运动,新疆各族妇女同样踊跃参与。截至1943年2月,新疆妇协组织各族妇女为文化劳军运动捐款6582.72元。其中迪化女中捐款2412.93元^{[28]262-263}。

四、抗战时期,新疆婚姻制度、婚姻习俗中女性地位的提高

传统的婚姻制度、婚姻习俗中女性社会地位低下。抗战期间,在新疆省政府端正礼俗、倡导健康婚姻形式的过程中,共产党员积极推动取缔早婚及买卖婚姻,救助受压迫妇女,使婚姻缔结与解除自由等理念深入人心,新疆的婚姻制度和婚姻习俗逐渐向文明转型。

(一)反对早婚、取缔买卖式婚姻

在新疆各少数民族中,早婚习俗根深蒂固。鉴于早婚的诸多危害,早在1915年9月11日新疆都督杨增新治新时期便规定:“女子出嫁年龄至少须满十四岁为度。”^[30]但成效不明显。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民法》,规定:男子未满18岁、女子未满16岁不得结婚。

为制定新疆第二期三年发展计划(1940—1942年),1938年新疆省政府成立了由40人组成的设计委员会,其中7名为共产党员,分别是毛泽民、徐孟

秋、王宝乾(担任副委员长)、刘进中、陈培生、李云扬、黄火青(担任设计委员会委员)^{[14]25}。在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的推动下,该计划明确提出:“严禁早婚。本省各族多有早婚陋习,殊与人民健康及民族发展有碍。虽经政府宣传与取缔,但尚未能彻底消除。应动员文化团体等作更深入之宣传解释,以期彻底清除早婚现象。”^[31]新疆妇协于1942年第一届全疆妇女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坚决反对早婚,提请政府明令规定:“女子18岁才能结婚。”^{[5]222}

“本省各族中之婚嫁习俗往往需索多数聘金、贵重礼物以及其他各种不良习惯。”^[31]这种买卖式婚姻将婚姻视为商品交易,严重违背婚姻的本质和道德准则,也损害当事人的尊严和权益。为此,新疆第二期三年计划提出取缔买卖式婚姻。1942年,新疆妇协代表广大妇女向省政府进一步提出取缔婚俗恶习、反对不合理婚姻制度的建议,要求“取缔强迫与包办的婚姻,取缔指腹为婚与幼年订婚,禁止童养媳与过门婚的恶习,禁止纳妾,切实实行一夫一妻制”^{[5]224-225}等。

总之,在新疆省政府强力倡导及共产党员不断呼吁下,一些危害妇女身心健康的不良婚俗逐渐被取缔,有力保障了妇女的合法权益。

(二)救助受压迫妇女,推动婚姻自由观念深入人心

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民法》,首次对婚姻自由、婚姻登记、离婚问题和财产继承作出具体规定,确认了男女双方在婚姻中的平等地位。得益于中央政府的法律保障和共产党推动的社会改革与风俗变革,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等现代观念逐步传入新疆,并被各族民众理解并接受,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边疆社会风气的文明化进程。

新疆妇协一贯主张家庭关系中男女平等,对前来求助的受压迫妇女给予鼎力支持。1938年新疆妇协救济部收容被虐待妇女60多人,1940年收容37人。经过新疆妇协救济部的帮助,29名女子实现夫妻和好或重新组建家庭^{[5]47-53}。

中国几千年的旧式婚姻制度中,男女缺乏婚姻自主权,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是从。而自由的婚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缔结婚姻的自由;二是解除婚姻的自由。民国三四十年代,受开放的社会风气和婚姻自由观念的影响,新疆城市中流行在报纸上刊登结婚或离婚启事。在新疆工作的茅盾曾说:“《新疆日报》所登离婚启事,日有数起,法院判离婚案亦宽,可谓离婚相当自由。”^[32]仅1939年1月5日《新疆日报》第4版就登了两则离婚启事,其中一则写

道:“我俩自结婚来情意不合,□□,双方情愿离异,特此登报声明。离婚人:石光玉、王秀贞。”^[3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持将妇女事业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宏阔实践,妇女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妇女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真正发挥着‘半边天’作用。”^[3]女性与社会的同步发展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内在动力。早在抗战时期,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人便已率先践行这一理念。他们秉持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致力于破除“男尊女卑”的落后观念,不仅大力传播先进思想,更通过推动女子教育、促进女性就业、支持妇女参政议政、取缔迫害妇女的旧式婚姻习俗等一系列举措,推动了新疆女性的解放进程,重塑了当地的社会规范与道德风尚,为新疆地区的文明进步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注释:

- ①1935年5月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派遣俞秀松(化名王寿成)、赵实(化名王宝乾)、张义吾、任岳(化名刘贤臣)、郑一俊(化名郑义钧)、吴德铭、万献廷(化名张逸凡)、赵云蓉(女)、高秀影(女,化名王一)、栾宝廷(化名嵇直)等25名共产党员从苏联来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他们被分配到反帝会、新疆学院、新疆日报社、女子学校等重要岗位。
- ②代表性成果有:张宝裕:《抗日战争时期新疆的妇女运动》,《新疆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张一晓:《抗战时期新疆妇女社会公共舆论表达》,《昌吉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董红玲:《论抗日战争时期的新疆女子教育》,《新疆社科论坛》2018年第4期;王梅堂:《新疆日报的女声半月刊》,《新疆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曹娜:《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研究》,2013年天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③汪小川,化名汪哮春,1938年初至1939年底担任新疆日报社副社长。
- ④李宗林,化名李啸平,1938年初至1939年底出任新疆日报社总编辑。
- ⑤徐孟秋(化名孟一鸣),中共党员,1937年12月至1941年9月担任新疆省教育厅副厅长,1943年叛变。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 组织动员广大妇女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巾帼力量[N].人民日报,2023-10-31(01).
- [2]习近平向上海合作组织妇女论坛致贺信[N].人民日报,2024-09-12(01).
- [3]习近平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N].人民日报,2025-10-14(01).

- [4] 健夫. 写给新妇女们[N]. 新疆日报·女声半月刊(第20期), 1939-12-21(04).
- [5] 乌鲁木齐市党史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乌鲁木齐市妇女联合会. 乌鲁木齐妇女运动资料汇编(1934-1949)[G]. 内部资料, 1989.
- [6] 刘云, 徐霞. 新疆妇女运动史[M]. 乌鲁木齐: 新疆大学出版社, 1999.
- [7] 芳(邱毓芳). 新疆妇协一年来的工作[J]. 反帝战线, 1941(1): 5.
- [8] 社论. 祝妇协总会第八届改选[N]. 新疆日报, 1942-03-11(01).
- [9] 编者的话[N]. 新疆日报·女声半月刊(第3期), 1938-11-10(04).
- [10] 奋音(张奋音). 纪念三八与妇女目前的任务[N]. 新疆日报·女声半月刊(第22期), 1940-03-08(04).
- [11] 华(朱旦华). 五卅运动和妇女运动[N]. 新疆日报·女声半月刊(第25期), 1940-06-01(04).
- [12] 康克清. 华北敌后的妇女英姿(转载)[N]. 新疆日报·女声半月刊(第25期), 1940-06-01(04).
- [13] 世界第一个铁路女站长(转载)[N]. 新疆日报·女声半月刊(第24期), 1940-05-21(04).
- [14]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史工作委员会.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斗争纪事(1933年-1949年)[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5.
- [15] 碧. 十年来的新疆妇女[N]. 新疆日报, 1943-04-12(02).
- [16] 共青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 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 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资料汇编[M]. 乌鲁木齐: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1986.
- [17] 张大军. 新疆风暴七十年(第8册)[M]. 中国台北: 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 1980.
- [18] 尔昌. 扩大冬学运动[N]. 新疆日报, 1941-11-23(03).
- [19] 程东白. 十年来新疆的文化教育事业[J]. 中国国民党新疆省党部新疆月刊社. 新疆, 1943(1): 74.
- [20] 妇协总会拟就妇女识字实施办法[N]. 新疆日报, 1941-01-11(03).
- [21] 女界模范王老太太[N]. 新疆日报, 1939-05-30(03).
- [22] 新疆教育年鉴编辑室. 新疆教育大事记(公元520-1998)[M]. 乌鲁木齐: 新疆教育出版社, 1999: 32.
- [23] 芳(邱毓芳). 十年来新疆的妇女运动(续)[J]. 新疆妇女, 1944: 4-5.
- [24] 市营汽车招女售票员, 待遇特别从优[N]. 新疆日报, 1936-02-20(03).
- [25] 运输管理局提升女售票员, 并增薪二十五元[N]. 新疆日报, 1936-03-24(02).
- [26] 张大军. 新疆风暴七十年(第11册)[M]. 中国台北: 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 1980: 6441.
- [2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民国时期新疆省组织人事制度档案史料选编[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7: 47.
- [2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研究中心, 《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 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各民族民众抗日募捐档案史料[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8.
- [29] 音(张奋音). 募集寒衣运动与新疆妇女[N]. 新疆日报·女声半月刊(第5期), 1938-12-21(04).
- [30] 严禁缠女早婚文(1915年9月11日)//杨增新. 补过斋文牍(辛集二·令文汇编)[M], 辛酉(1921年)三月新疆驻京公寓初版(刻本): 15.
- [31] 设计委员会. 新疆第二期三年计划书[G]. 内部资料, 1941: 6.
- [32] 陆维天. 茅盾在新疆[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6: 161.
- [33] 离婚启事[N]. 新疆日报, 1939-01-05(04).

(责任编辑 谢春红)

Memb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Xinjiang and Women's Emancipation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JIA Xiuhui

(Xinjia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Urumqi, Xinjiang 83001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members of CPC members in Xinjiang activities and contribution from female education, female employment, female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public affairs, and advancement of women in marriage system and custom during perio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se communists disseminated and implemented the Marxist View of Women energetically, promoted women's awakening and liberation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Xinjiang and soci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CPC Members in Xinjiang; Women's Emancipation

胶东抗日根据地公安机关工作探究

刘志鹏,张红鑫

(山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8)

摘要:胶东抗日根据地公安机关是胶东抗日民主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立与发展过程完整反映了战时公安工作的演进轨迹。通过梳理其建制沿革,可见胶东公安经历了多次机构调整,逐步构建起层级分明、覆盖基层的公安体系。在具体实践中,胶东公安机关不断优化案件处置流程,围绕侦查、审讯与监所看押三个核心工作,注重将群众路线与基层联防相结合,不断推进工作规范化与人性化建设,其工作呈现出军事性与社会性深度融合、代行部分司法职权等历史特征。这一时期,胶东公安机关不仅维护了根据地社会秩序与安全稳定,其工作经验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公安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

关键词:胶东抗日根据地;公安机关;锄奸反特;群众路线;规范化建设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6.010

中图分类号:D63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6-0066-06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共中央)为保障根据地治理效能,指示已建立民主政权的各根据地,在其领导的政权体系内设立公安机关。山东响应中共中央的指示,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山东最早的公安局,这一举措成为山东公安发展的重要基点。作为维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民主政权、保障人民群众安危的关键力量,公安机关此后在山东抗战的历史舞台上逐步活跃起来。胶东抗日根据地作为山东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根据地,其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既为初创阶段的公安机关提供了建设保障,也使其发展轨迹完整呈现了战时公安工作的演进逻辑。这一时期积累的战时工作经验,不仅为胶东地区抗战胜利提供了保障,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公安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以往学者对山东公安工作的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政策方针^[1]、锄奸工作^[2-4]、肃托问题^[5]等层面,而专门以胶东抗日根据地公安机关为核心研究主体、深入探讨其运行发展与建设特点的成果相对匮乏。基于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胶东抗

日根据地公安机关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其建制沿革与核心工作实践,探析胶东抗日根据地公安工作的建设特点,以期丰富有关胶东根据地公安机关工作的研究内涵。

一、胶东公安建制沿革

公安机关是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行政机关又承担侦查任务,主要负责维护中共民主政权领导下的根据地的社会秩序,保卫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这些职责通过公安机关的具体工作推进。在公安机关建制之前,中共党内有“锄奸委员会”“社会部”等机构,其核心工作仅限党员参与;公安机关亦是如此,保证中国共产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权。

193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颁布《关于成立社会部的决定》^[6],在延安成立中央社会部,要求各边区行署设公安局或保卫处、各县设公安局;同时决定在党的高级组织内成立社会部,该社会部统筹公安系统工作,协助根据地建立公安机关,并指导已建立的公安机关明确公安保卫的具体任务。遵照这一指示,胶东公安机关在胶东行署、区委的领导

收稿日期:2025-09-06

作者简介:刘志鹏(1980—),男,山东博兴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山东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中共党史、抗日战争史。

下,历经多次体制架构调整,自上而下构建起胶东公安体系的基本架构。

从历史溯源来看,“1938年3—5月,掖县、蓬莱、黄县三县抗日民主政权相继建立,蓬黄掖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3月遂建立公安局”^[7]。此时,胶东抗日根据地出现了最早以“公安”命名的机关,但该机关尚未正式建制,且规模较小,因此,在胶东公安建制前,相关公安事务先后由“军法处”“政治保卫局”“社会部”负责。进入1940年,日军以铁路、公路为网,封锁、分割根据地,导致山东“从分局起,各地均未建立统一的政权领导机关,政权工作零碎、分割、自生、自强,缺乏干部,委托无人”^[8],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亟待推进,公安机关也成为建设重点之一。在胶东区委的带领下,胶东公安机关经历一段曲折发展的历程,逐渐构建起公安体制的层级框架。

中共中央社会部于1940年下半年在党内颁布《公安组织条例》,要求各根据地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并颁布公安组织实施细则^[9]²⁷。时任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以下简称“省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的陈明多次提出要“建立各级公安局之组织,并健全其工作”,“颁布并实行各种进步法令、锄奸条例、公安局工作纲要与组织法”^[10]³⁷⁴。在中共中央、中共山东分局和省战工会的影响下,胶东公安机关于同年10月首次公布了公安局组织条例。1941年3月24日,山东省正式设立省公安处,负责指导全省根据地的公安保卫工作^[11];同年4月,胶东区党委召开第二次锄奸委员会会议,决定成立胶东行署公安局,任命丛烈光为局长。该局下设侦查科、审讯科、秘书室和警卫队。与此同时,胶东各海区也相应组建了专署公安局。自此,胶东行署公安局与下级专署公安局共同构成层级分明的公安系统上层架构,其间社会部和公安局并存^[12]⁴。这是胶东区委、行署推动公安机关从制度设计迈向实体建设的一大步,也是胶东公安机关建制历程中的“第一次调整”。

1942年、1943年,胶东公安机关又经历了“两次调整”,公安体制架构基本固定。1942年,胶东区党委认真贯彻山东分局“将党内社会部与同级公安局合并”的指示^[12]⁴,向各海区下达了社会部和公安局合并的文件,并于同年5月召开了各级社会部与公安局(以下简称“社、公”)合并干部大会,自上而下推进机构合并;针对抗日民主政权尚不健全、敌我斗争复杂的县(市),则暂不撤销社会部,同时明确社会部的一切工作由专署公安局领导。1943年,山东实现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后,12月胶东区召开所属军队锄奸科长和县以上公安局局长干部大会,

针对军队与政府公安力量协同问题,作出“军队锄奸科与政府公安局合署办公”的决定^[12]⁵。1945年5月,为适应根据地发展需要,胶东又组建中海专署公安局^[13],胶东公安机关体制建设逐步走向完善。在各海区县(市)公安机关设置层面,北海、东海、南海、西海地委及掖县、招南县等各县(市)的公安机关的调整,整体与胶东行署公安局、各海区专署公安局的“三次演变”同步推进。

在县(市)以下区、村基层地区,胶东也建立起公安战线上的基层保卫组织。胶东公安基层保卫组织的基础主要源自过去社会部设在党、政机关及军队支部内部的“三级”保卫网员(机关保卫员、组长、网员)。1941年,随着斗争形势变化,这些网员从党、政机关及军队支部内部逐步扩展至地方县属区、村,形成公安基层保卫组织。仅据北海地委社会部一地统计,六个县就有锄奸保卫网员1321名,其中,党政机关112名,地方县区1219名^[12]⁷⁴。后来,随着公安保卫工作由秘密转向公开,胶东区党委遵照上级指示,改革锄奸保卫组织形式,撤销了保卫网员制度,设立区、村两级“公安员”。区公安员由区委委员或区委领导干部兼任,办事机构设在区公所;村公安员为不脱产的基层群众锄奸保卫人员,主要承担基层锄奸、治安维护等工作,由区公安员选拔配备并接受其组织领导^[12]⁷⁵。

抗战胜利后,以区、村公安员为核心的基层保卫组织形式,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县(市)及县以上公安机关根据解放地区的实际需求,开展相应扩建工作,使胶东公安体制能够适应新的形势与任务。

二、胶东公安工作的核心实践

抗战时期,公安机关的性质是抗日民主政权维持治安的机关^[9]¹⁷。彼时胶东公安机关的两大核心任务:一是处理根据地违法犯罪案件,维护根据地治安;二是锄奸反特,镇压反革命分子。公安建制后,胶东公安机关便围绕这两大核心任务开展具体工作实践。

(一) 优化违法案件处理章程

公安建制之初,山东省战工会即制定了公安工作章程,但该新章程需在公安建制实践中试行,且受抗战形势影响,公安机关的工作难以完全依章执行。因此,公安工作实际开展的过程中,为使案件处理更加规范,胶东区党委依据1941年《关于处理案件之临时规定》,明确了关键案件的处置原则:“凡是与托匪和会道门以及涉及统战问题的案件,要先整理材料,经呈报批准方可逮捕,特殊情形下可先行动后报告;所有案件的处理需要及时报告,重要案件必须

经上级批准后方可执行;对可疑分子要先侦查,掌握足够材料并获批准后才可抓捕;案件处理过程中严禁扩大化。”^[14]²⁴²此后,随着根据地治理需求的扩大,公安机关处理的案件类型逐步增多,执法范围的界限也随之明晰。

针对案件上报流程,胶东区公安局还出台文件,对案件请示报告工作作出具体规定。1942年,山东省战工会进一步明确案件分工,将盗匪案件划归各级公安局审理,并制定层级审批流程:由各县公安局直接审理,经县行政委员会决议后,呈专署转报山东省战工会或行政主任公署,再由山东省公安处复审,最终分别提交山东省战工会常会或行署行政委员会决定^[15]。请示报告制度的明确与案件处理归属的明确,直接推动公安机关案件处理流程更加规范化,既为公安人员提供了执法的制度依据,又有利于在依法办案的前提下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二) 侦查工作分层推进、动态调整

侦查是公安机关开展工作的重要手段,也是打击犯罪的进攻性手段。从胶东公安机关侦查部门的演变来看,其机构设置与调整始终围绕职能优化展开。1941年,胶东行政公署公安局成立后,设立侦查科负责相关工作。1943年,军队锄奸科与政府公安局合署办公后,侦查情报工作的职责转由合署后的机关二股承担。除特定调整时期外,胶东公安机关在大部分时间里均设有侦查队^[12]¹²⁻¹⁶。在基层侦查力量建设层面,胶东公安机关依托网员、公安员,构建起深入群众的秘密侦查体系。胶东公安自上而下构建形成一套完整的侦查网络:县及县以上公安机关负责统筹规划与专业执行,基层网员负责信息收集与线索传递。二者协同配合、分层推进,既保证了侦查工作的专业性与系统性,又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全面覆盖,为胶东根据地的锄奸反特工作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从侦查工作的执行内容看,其核心目的是侦查信息、收集材料,为公安机关追捕罪犯、审讯嫌疑人,开展教育改造等后续工作提供支撑。在胶东公安机关的不同发展阶段,侦查工作重心随形势与任务动态调整,始终围绕“党政机关内部侦查”与“社会侦查”展开,且逐步强化群众性侦查情报工作。

胶东公安初创阶段,侦查工作以社会调查为核心,聚焦社会基础情况摸排,很少开展专项侦查;社会部与公安局并存时期,侦查重心转向“整理机关工作”与“清理嫌疑分子”,同时兼顾社会侦查工作。此阶段社会部侦查工作由组织科负责,虽以“反内战”为主方向,但多搜集日常言行记录等琐碎材料,

较少针对重大问题部署专项侦查,整体以积累基础信息为主;社、公合并后,侦查工作经历两轮重心转变:初期以组织整理为核心,后期转向“反内奸、察外奸”专项工作。合并之初,首要任务是将党内保卫网转化为公安侦查网,同步开展审查干部、整顿网员、纠正“不愿做公安工作”意识等工作,此时侦查重心仍在组织整理。后来整风运动兴起,侦查重心正式转向“反内奸”与“察外奸”:一方面整理嫌疑分子名单、布置专项侦查以搜集材料,开展社会统计调查与侦查工作;另一方面将侦查范围延伸至敌伪区,在敌占区建立情报渠道^[16]。此外,遭遇敌人“扫荡”时,公安侦查力量会投入战时戒严工作,开展反敌奸侦查,破获多起奸细组织案件,这也锻炼了侦查工作的灵活性与应急响应能力。

(三) 审讯问案“戒严阶段”到“整改阶段”

胶东公安建制后,公安机关面临的疑犯不仅包括汉奸匪特,还包括一般犯罪案件的嫌疑人,需通过审讯获取口供——这些口供既可辅助定罪量刑,也可作为情报参考。若审讯工作不够成熟,易出现虚假口供,尤其是针对重要犯人,其虚假口供可能造成中共行动失利。胶东公安调任的干部大多有锄奸反特工作经历,因此负责审讯工作的人员延续了对汉奸匪特坚决镇压的态度。若这些人员未能把握审讯工作的力度,易出现“左”的审讯倾向。事实证明,胶东公安的审讯工作确实出现过偏差。

抗战时期,胶东公安的审讯工作可分为“戒严阶段”与“审讯整改阶段”两个关键阶段:第一个是“戒严阶段”,此阶段负责审讯的干部尚未熟悉新建公安机关的审讯要求,有的人还对审讯工作抱有轻视态度。面对与以往不完全相同的疑犯群体,干部们经验严重不足,在讯问过程中采用各类恶劣刑罚手段,完全无视犯人的基本人权。这种不当方式引发诸多问题:多数犯人因无法忍受酷刑,或提供虚假供词,或被折磨至神志不清,导致讯问获取的口供真假难辨,严重影响审讯工作的有效性。中共认识到刑讯逼供的严重危害后,胶东公安的审讯工作进入第二个阶段——“审讯整改阶段”,胶东公安机关随即推进审讯工作整改。整改主要围绕审讯人员培训与工作实操流程规范展开:规定各机关加强审讯人员培训,提升其专业素质与审讯技巧;明确审讯原则,要求审讯人员保持冷静客观,避免主观主义倾向;确立审讯依据,强调以侦查工作为基础,推动审讯与侦查工作有机结合;优化审讯流程,加强工作管理,实现具体操作的正规化^[14]²⁰¹⁻²⁰⁵。

这些针对刑讯问题的整改并非一蹴而就。过去

长期存在的刑讯做法,其负面影响根深蒂固,审讯工作中“神秘化、简单化”的问题难以在短期内彻底根除,且对执行偏差的调整需耗费较长时间,尤其是在转变审讯人员思想认知方面。尽管整改过程存在困难,但在中共的正确领导下,胶东公安机关的审讯工作仍取得显著成效,为后续中共公安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四)推进监所看押工作的人权保障

监所是胶东公安机关对犯人进行看押、服刑监管及教育改造的专门场所,也是胶东公安推行人权保障改革的重要场合,这个监所区别于旧时代的监狱,是维护工农民主政权的工具^[18]。1940年,胶东行政联合办事处规定,由公安局政治保卫队负责看押事宜,明确由其执行羁押任务^{[14]281},由此确立了公安部门在监所看押中的核心地位。后来,监所看押划归各级司法处领导,但因司法干部匮乏,看押犯人的职责仍多由公安政治保卫队长期承担。因此,监所看押工作中针对疑犯人权保障的改进措施,基本由公安机关主导推进。

胶东行署借公安机关之手推动监所工作规范化。1942年8月,胶东通过《各级公安局协助司法机关的几个原则的规定》,从看押人员管理和看押工作处置原则两方面入手:一方面要求看押人员在工作中纠正成见、加强集体教育,禁止变相打骂和施加肉刑,同时改善看押环境;另一方面明确犯人入所后需分类安置,一案共犯需隔屋收押;若房屋有限不便隔押,需加强监视以防止串供^{[14]242-248}。公安机关先从自身工作的基础管理入手,保障涉案人员基础人权,再进一步满足其精神层面需求。在精神层面的权益保障上,胶东公安不仅为犯人购买书报,还在监所开设政治、文化等课程以提升其认知水平,满足其文化需求;在不妨碍看押的前提下,还组织劳动生产,实现“以劳促改”的目标。此外,利用劳动休息时间对收押犯人开展坦白反省教育,明确“坦白从宽”的处罚政策。关于犯人的坦白教育,胶东公安局要求将教育与调查研究相结合,通过小型漫谈会的形式,动员已坦白者分享思想变化历程,引导其他反革命分子主动坦白,挖出隐藏的敌特线索,从而进一步清除内部威胁^{[14]268-270}。在监所看押工作推进人权保障改革的过程中,胶东公安尽可能让疑犯感受到政权治理的公正性与人性化,夯实了民众对民主政权的信任基础,巩固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凝聚力。

三、胶东公安工作实践成效与历史特点

(一)实践成效

公安机关通过体系化运作持续开展工作,在实

践中推动工作章程逐步走向规范化。这些工作联动实施、织连成网,有效支撑公安机关完成各项任务,削弱了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内部威胁,为胶东抗日民主政权在根据地的巩固奠定了基础。

1. 构建全民联防锄奸网络

胶东公安机关借助基层网员、公安员“数量多、隐蔽性强”的优势,深入群众,精准收集各类信息,为锄奸反特工作提供辅助。但在实际工作中,仅靠公安机关自身人力是不够的,且锄奸保卫工作具有复杂性与广泛性,无法依靠公安侦查网络实现根据地全域覆盖。基于此,公安机关决定在基层以“专门工作和群众路线相结合”为方针开展锄奸反特工作,构建群众锄奸网。在机关内部加强宣传教育,增强机关干部人员的防范意识,凝聚更多力量参与锄奸斗争。胶东公安机关在侦查科开展党内“反内奸”、党外“察外奸”工作的基础上,建立基层监督锄奸网络,通过网员、公安员在基层培养积极分子,发起群众锄奸运动;号召群众实行武装自卫,提升自我保护能力,将群众性锄奸教育融入各种群众组织团体,借助冬学识字班、俱乐部等载体,让群众了解如何发现奸细,营造群众参与锄奸反特工作的氛围,使敌特分子无藏身之地^{[19]31-33}。此外,公安机关还强化后勤机关的安全意识:有关大后方后勤物资、机要文件等信息严禁泄露;外来亲属未经审查,机关工作人员不得与其接谈;对往来商人要随时考察,防止个别奸细混入内地侦查情况^{[19]21-22}。胶东公安通过上述举措,将机关力量与群众力量有机融合,构建起全民联防锄奸网络,推动胶东公安工作持续深入发展。

2. 从源头降低根据地犯罪率

战时特殊环境下,社会秩序易受冲击,根据地内盗窃、抢劫、诈骗等危害民众安全的犯罪行为极易发生。在公安工作实践中,胶东公安遵循“从源头降低根据地犯罪率”的思路,通过系列举措减少犯罪的发生;一旦发生犯罪案件,能快速锁定嫌疑人范围、侦破案件,直接打击犯罪行为。公安机关依靠侦查工作强化预防性举措,将降低犯罪率的关口前移。胶东公安机关围绕人员管控与通行规范,依托已建成的公安系统,由基层网员、村公安员牵头,指导民兵与自卫团协同参与,实行“户籍登记”“盘查放哨”“路条”制度,在各村口、乡道加强巡逻和联防,约束群众留宿行为,明确不得留宿未报备人员^{[15]271},推动公安工作从“被动打击犯罪”转为“主动预防犯罪”的转变,通过提前介入,从源头遏制犯罪风险。从实际效果来看,该监控预防机制作用显著,既保障了根据地的稳定,又能在案件发生时帮助公安机关

快速锁定线索、缩小疑犯范围,提升侦破效率。胶东公安机关通过多项工作协同发力,铸牢案件防控的前端防线,不仅保障了根据地民众的财产安全、维护了基层社会治安,更助力根据地民主政权构建起新民主主义秩序,从根源上减少了犯罪诱因,为抗战胜利营造了稳定的内部环境。

(二)核心历史特点

抗战时期是胶东公安机关的初创阶段,其工作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殊性。尽管以今日标准来看,这些做法可能不符合现代公安工作规范,但对于当时急需通过锄奸反特、配合对敌作战及稳定根据地秩序的胶东公安机关而言,这已是能找到的最优实践路径。

1. 军事性与社会性深度融合

抗战时期,中共高度重视公安武装力量建设,在公安机关初设时便明确规定:“配备武装力量”。1942年社会部并入公安局后,相继设立了政卫队、机关警卫连等武装机构。中共山东分局、省战工会对各地委公安局政卫队、警卫连作出明确指示,要求1942年3月前完成政治保卫队的编制补充与队伍健全工作,人员可从军分区抽调,抽调办法由各地自行协商^{[10]264}。据此,胶东区党委决定强化公安武装建设,要求胶东行署及各专署公安局设立一个政治保卫连(100~120人),县公安局设一个政治保卫排(30~50人)^{[14]289}。这支武装力量的职能分为对内与对外两部分:对内承担社会性执法活动,包括看押、押解犯人及机关警卫等核心任务,为管控与打击犯罪行为提供执法支撑;对外可参与军事行动。根据中共山东分局指示,公安系统的警卫连由公安局直接指挥,未经公安局局长批准,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抽调;经局长同意后,可配合军区或主力部队作战。例如,1942年11月,数千名群众和干部被日伪围困于马石山,胶东公安局警卫连三排在指导员王殿元带领下,联合地方干部与民兵展开救援,成功转移部分群众。得知仍有群众未脱险后,王殿元率战士重返马石山。为保护百姓安全,战士们与日军展开殊死战斗,最终十几名战士与敌人同归于尽^[20]。这场战斗既展现了胶东公安机关武装力量的护民情怀与牺牲精神,也印证了其在实战中的关键作用。综上,从胶东公安机关武装力量“对内执法”与“对外助战”的双重职能中,可以看出其军事性与社会性的深度融合。

2. 战时特殊职能拓展一代职司法职权

公安战时工作的发展方向是正规的,但推进过程中出现“异变”在所难免。早期公安机关颁布的

条例多未经过试行,新事物催生新问题,在缺乏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因权责边界模糊,易出现部门职权不清、工作流程不畅等问题。其中,公安机关代行司法机关职权是“异变”的表现形式之一,这种“异变”属于战时司法权的变通模式,多出现于胶东社会部与公安局并存期间。当时各级行政首长兼理公安与司法工作,地委与政府的科处设置也存在交叉情况,甚至许多县由民政科兼理公安局的实际工作。这种人员与职能的交叉,必然导致公安局频繁出现职权被侵占或代行的情况。从工作分工来看,犯人的逮捕、搜查、看押、押解及审讯、死刑执行等事务,本应由公安局协助司法机关办理,但在日军“扫荡”的特殊背景下,若罪犯无法交付司法机关或不符合保释条件,只能由公安局进行全权看押。部分地区甚至由公安机关直接负责审判工作。但综合来看,这是战时司法职权的合理让渡。面对这类以代职司法职权为代表的战时“异变”,中共始终根据战争形势变化调整策略,通过持续优化制度与流程,推动公安工作向正规化方向发展。

四、结语

作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典型代表,胶东抗日根据地孕育的胶东公安机关,在山东公安建设史上极具代表性。抗战时期,在胶东行署的统筹引领下,胶东公安机关始终以锄奸反特、维护根据地社会秩序为核心任务,以服务抗战大局、助力抗战胜利为根本导向。在复杂的战时环境中,胶东公安机关历经探索试错与机制调整,逐步厘清体制架构,依托侦查摸排、审讯问案、监所看押三大核心手段,不断细化办案标准、规范流程环节。同时,胶东公安始终坚守群众立场,与民众紧密协作,在基层构建起全民联防锄奸网络,通过精准把握违法案件“前端预防”与“后端处置”的关键环节,严厉打击各类首恶分子与反动敌对势力,降低了根据地犯罪率。胶东公安机关工作上虽存在不足,但整体呈稳步向好态势,成功实现从早期工作无序、流程模糊到后期规范有序、机制健全的关键转变,持续向“规范化、高效化”的履职状态迈进。胶东公安机关在抗战期间切实保障了根据地党政军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有效稳定了社会治安秩序,更为胶东通过经济发展与军工生产支援山东乃至全国抗战筑牢了安全屏障。这一时期积累的实践经验,如坚持依靠群众凝聚治理合力、通过流程优化提升执法效能、根据实际动态调整基层治理格局等,不仅成为胶东公安自身发展的宝贵财富,更深度融入后续公安工作逻辑,为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公安系统的制度建设与实践开展提供了重要参照,成

为支撑公安事业长期发展的历史基石。

参考文献：

[1]李娜.华北抗日根据地锄奸反特政策研究[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2(S1):154-156.

[2]陈静,孟令择.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公安保卫工作论析[J].党的文献,2017(3):88-93.

[3]宋尚峰.山东抗日根据地锄奸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07.

[4]吴百超.山东抗日根据地反日伪特务斗争研究[D].济南:中共山东省委党校,2021.

[5]张业赏.抗战时期山东“肃托”原因探析[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49-61.

[6]詹林,潘益民.中国近代警察法规编年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0:177.

[7]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山东省志15:公安志[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108.

[8]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4辑)[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162.

[9]化国宇.警察的法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4.

[10]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5辑)[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

[11]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山东历史大事年表(1921—2011):第1册[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7:208.

[12]烟台地区公安处公安史资料征集办公室.胶东公安保卫机关组织机构沿革1938—1949(初稿)[G].内部资料,1982.

[13]烟台地区公安处公安史资料征集办公室.胶东公安保卫事记1937—1949[G].内部资料,1982:8.

[14]烟台地区公安处公安史资料征集办公室.胶东区公安保卫历史文件选编1937—1949(二册)[G].内部资料,1982.

[15]韩延龙,常兆儒.革命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中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890.

[16]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1辑)[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4-6.

[17]抗日战争研究会.抗日游击战争的战术问题[M].东北书店,1947:6-12.

[18]陈连喜.监狱人民警察概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4:24.

[19]烟台地区公安处公安史资料征集办公室.胶东区公安保卫历史文件选编(1937—1949)(一册)[G].内部资料,1982.

[20]烟台地区公安处公安史资料征集办公室.胶东区公安保卫工作重大事件与案例汇编1937—1949(初稿)[G].内部资料,1982:7-9.

(责任编辑 谢春红)

A Study on the Work of Public Security Work in the Jiaodong Anti-Japanese Base Area

LIU Zhipeng, ZHANG Hongxi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358, China)

Abstract: The public security organs in the Jiaodong Anti-Japanese Base Area constituted a vital component of the Jiaodong anti-Japanese democratic regime. Their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comprehensively reflect the evolution of public security operations during the wartime period. By examining their 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ing, it is evident that the Jiaodong public security apparatus underwent multiple institutional adjustments, progressively establishing a hierarchical and grassroots-coverage system. In practical operations, these organs continuously refined case handling procedures, focusing on three core functions-investigation, interrogation, and prison supervision-while emphasizing the integration of mass-line principles and community joint defense. They consistently advanced standardization and humanization reforms, demonstrating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a deep integration of military and social functions and the exercise of judicial authority. During this period, the Jiaodong public security organs not only maintained social order and safety in the base area but also provided significant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ublic security system of New China.

Key words: Jiaodong Anti-Japanese Base Area; public security organs; eliminating traitors and countering espionage; Mass line; standardized construction

家国情怀:抗战诗歌中的黄河书写

李晶柯¹, 吴朋飞²

(1. 河南科技大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河南 洛阳 471023;

2. 河南大学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抗战诗歌中的黄河意象根植于其作为文明之源、精神之魂与家国之象的历史积淀,在战时特殊语境下完成了从自然地理符号到文化政治符号的升华。黄河意象具有三重象征系统:作为“苦难—悲怆的承载者”,它凝聚民族集体创伤;作为“力量—抗争的怒吼者”,它转化为抗战的精神号角;作为“希望—复兴的守望者”,它寄托民族新生的愿景。这三重维度共同构成了“受难—反抗—新生”的完整叙事逻辑,诗歌通过诗学实践将古老文明符号转化为现代抗战图腾,既极大地凝聚了民族认同,为全民族抗战提供了精神动力,也深刻体现了文学在历史建构中的能动性。

关键词:抗战诗歌;黄河意象;民族精神;象征;文化记忆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6.011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6-0072-06

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将中华民族推向了生死存亡的临界点,文学也被赋予了“救亡图存”的紧迫使命。作为最富感召力与传播力的文体,诗歌率先发力,成为鼓舞士气、凝聚人心、塑造民族认同的文体。在这一宏大的历史与文学语境中,“黄河”成为抗战诗歌中最具号召力与共鸣感的象征符号。

诗歌中黄河的象征符号,涉及一场复杂且自觉的诗学建构运动。现有研究对抗战文学的整体思潮、流派以及《黄河大合唱》等经典个案已积累丰硕成果,但或失之于宏观概述,或局限于单篇文本分析,尚未对“黄河”这一核心意象在抗战诗歌中作为系统性、动态演进的象征谱系,展开全面而深入的梳理。本文旨在通过系统考察抗战时期(1931—1945年)新、旧体诗歌中涉及黄河书写的代表性文本,结合意象学、文化符号学与集体记忆理论,进行深入分析。

一、黄河诗学原型的历史积淀

抗战诗歌对黄河意象的成功征用,并非无源之

水。其深层动因在于,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与诗学原型,早已在数千年的文学书写中完成了意义层积,为战时的象征重构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与强大的心理认同基础。这一积淀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文明之源:神圣性与起源意义的建构

黄河作为“母亲河”的初始象征意义,根植于其作为中华文明摇篮的神圣地位。从“河出图,洛出书”的远古传说开始,黄河便被赋予文明肇始与文化启蒙的元典意义。唐代薛能《黄河》中“河源发昆仑,连乾复浸坤”的宏大叙写,以及唐玄宗李隆基“黄河分地络,飞观接天津”的帝王视角,均将黄河视为贯通天地、划分疆域的国家地理坐标与权力象征。这种对黄河源远流长、孕育文明的集体认知,使其天然成为民族生命力的象征,也为抗战时期将其塑造为民族不竭生命力的代表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精神之魂:壮美美学与英雄气质的熔铸

在古典诗词的审美体系中,黄河意象始终呈现

收稿日期:2025-09-11

基金项目: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黄河文学书写中的生态意识与民族精神研究”(22JJJD750022)

作者简介:李晶柯(1995—),女,河南焦作人,博士,河南科技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黄河图像学、艺术学理论。

出雄浑壮阔、咆哮奔腾的“壮美”美学特征。从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宇宙意识，到“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的磅礴气势，黄河被赋予了不可阻挡的伟大力量与豪迈奔放的自由精神。这一美学特质在唐代边塞诗中得到了极致彰显。无论是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的苍凉意境，还是王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丽图景，黄河都与保家卫国的战争场景紧密相连。刘希夷“军门压黄河，兵气冲白日”的刚健，李益“黄河东流流九折，沙场埋恨何时绝”的沉郁，更使黄河超越了单纯的地理界限，升华为戍边将士英雄气概与民族不屈不挠精神的诗意载体。这为抗战诗歌将黄河“咆哮”隐喻为民族怒吼，提供了直接且深厚的美学范本。

（三）忧患之思：民生关怀与治理实践的见证

黄河的“母亲”角色具有双重性：她既孕育文明，也因水患带来深重灾难。历代诗歌中对黄河水患的书写，构成了其意象中深沉厚重的忧患意识与民生关怀维度。从杜甫在“三吏三别”中对黄河沿岸民生疾苦的深切体察，到苏轼在《河复》中对率民抗洪卓绝实践的记载，诗人笔下的黄河成为检验国家治理能力与社会稳定的试金石。宋元以降，此类书写愈发深刻，如金代刘迎《河防行》、清代赵然《河决叹》等作品，皆以写实笔触描绘决堤后的惨状，字里行间饱含对黎民百姓的深切同情。这一“灾难叙事”传统，使得黄河意象天然关联着民族的苦难记忆和坚韧品格，为抗战时期书写民族创伤、激发同仇敌忾之情，埋下了深刻的历史伏笔。

（四）家国之象：政治疆域与故国情怀的寄托

黄河在历史上早已成为家国情怀与政治认同的核心象征，这一点在王朝更迭与民族冲突时期尤为凸显。杜甫《黄河二首》将破碎的河山与黄河紧密关联，使其成为故国沦丧的痛切标识。至宋代，面对与辽、西夏的对峙及后续宋室南渡，黄河更从地理屏障彻底内化为中原故土、北方家园的精神符号。陆游诗句“三万里河东入海”中的“河”，即指黄河，它承载着沦陷的壮丽河山与遗民的血泪期盼；其“铁马冰河入梦来”的慨叹，更是将黄河与恢复故土的军事理想深度融合。至此，黄河已不再是单纯的物理河流，而是凝聚民族尊严、历史记忆与统一愿景的文化政治符号。

古典诗歌中的黄河，已然形成集神圣起源、壮美精神、忧患意识与家国象征于一体的意蕴丰厚的意象系统。抗战时期的诗人们，正是立足这一深厚文化积淀，面对亡国灭种的现实危机，对这一传统意象

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升华，将其蕴藏的历史文化能量瞬间激活，进而锻造出抗战诗歌中那个既能承载全民族苦难，又能激发全民族怒吼的全新黄河象征。

二、从自然到象征：黄河意象的战时激活与转化

抗战时期黄河意象的爆发式生成与核心地位的确立，最直接的催化剂是严峻的战争现实。全民族抗战的洪流，将黄河从一条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之河，瞬间推至生死存亡的前沿，其自然地理属性被赋予了尖锐、紧迫的政治与军事意义，进而完成了从文化符号到国家命运象征的关键转变。

（一）战时现实的触发：从地理屏障到国家命运共同体

1. 军事命脉与战略屏障：空间功能的战时重塑

在战争的视角下，黄河的空间功能发生了根本性双重重构，成为维系抗战命脉的关键地理枢纽。

首先是“不可逾越的天堑”——黄河作为战略防御的实体屏障。随着华北、中原主要城市的相继沦陷，黄河天险成为阻隔日军机械化部队西进、保卫关中乃至西北大后方的最后一道天然防线。其汹涌的水流与险峻的峡谷，被军事战略家与诗人共同想象为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黄河南岸与西岸的坚守，直接关系到整个抗战大局的稳定。因此，诗歌中“保卫黄河”的口号，绝非空洞抒情，而是对一项具体且严峻的军事任务的文学转译。黄河被赋予的“不可逾越”的政治意义，正根植于其作为实体军事屏障的空间功能，它象征着民族生存空间的底线与不可侵犯的民族意志。

其次是“流动的生命线”——黄河作为后勤补给的核心动脉。与此同时，黄河并未完全隔绝两岸。在其蜿蜒河道上，潼关、风陵渡等一系列重要渡口与陇海铁路相接，构成了连接西北大后方与华北、中原敌后战场的战略交通走廊。战争所需的兵员、武器、粮食等通过这条“流动的生命线”源源不断输往前线。这使得黄河在空间上呈现出矛盾的统一：它既是分割敌我的界线，又是联结我方的纽带。这一双重属性使黄河意象在诗歌中超越了单纯的防御性，更增添了韧性、活力与内部联结的深层意涵，成为中华民族血脉相通、命运与共的生动写照。

2. 创伤之地与悲壮抉择：黄河意象的象征性凝聚

战争不仅借助了黄河的防御功能，更将其卷入了空前的民族灾难之中，其中最为惨烈的莫过于1938年的花园口决堤事件。这一事件极大地丰富并深化了黄河的象征意蕴，集中体现为“创伤性地景”的生成与“悲壮”美学范畴的确立。

黄河“创伤性地景”的生成。花园口决堤，是国

民政府“以水代兵”、阻止日军进攻的无奈之举。这一决策在军事上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其后果是灾难性的——滔滔黄河水夺淮入海,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三地大片土地,导致数十万百姓溺亡、上千万人流离失所,形成了广袤的“黄泛区”。此举使得黄河从保护性象征,瞬间转变为灾难的直接施加者。地理意义上的黄河,由此成为中华民族在战争中承受巨大创伤与牺牲的最触目惊心的“地景”。它凝聚了战争的全部残酷性、政府决策的两难性,以及普通民众所承受的极致苦难。

黄河“悲壮”美学范畴的确立。花园口事件在诗歌书写中,催生了一种极为复杂的“悲壮”美学。诗人们面对此抉择,情感呈现出撕裂状态:既有对阻敌战略的某种理解,更有对罹难同胞的深切悲悯。黄河之水在此不再是纯粹的“力量”象征,而是混合着鲜血、眼泪与泥土的悲怆之流。它迫使文学直面战争的伦理困境,将民族的悲怆与不屈的意志交织在一起。这使得黄河意象摆脱了单向度的赞美,承载了更为深沉、更具批判性的历史反思,成为民族命运中悲壮抉择的永恒象征。

战时现实从两个向度触发了黄河意象的激活:一方面,通过其军事—经济空间功能的重构,将黄河提升为关乎国家存亡的战略实体;另一方面,通过花园口事件带来的巨大创伤,将黄河与民族的极致苦难和战争伦理紧密捆绑。正是这种“屏障”与“动脉”、“保护”与“灾难”的矛盾统一,为抗战诗歌中的黄河意象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现实张力与情感深度,使其最终完成了从自然之河到民族精神诗性象征的彻底转化。

(二)民族危机下的文化认同

抗战时期黄河意象从自然景观向民族精神象征的集中转化,并非偶然的文学现象,而是空前民族危机下由内在心理需求、特定地理政治格局与有意识的文化生产三者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结果。这一转化过程,彰显了文学在历史关键时刻参与民族国家建构的强大能动性。

1. 建构民族认同核心图腾的迫切需求

面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一空前严峻的生存危机,如何将四万万凝聚为团结抗战的“命运共同体”,成为最紧迫的时代课题。这需要一个能够超越地域、阶级、党派乃至教育背景,为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感知、认同并为之振奋的文化图腾。这一图腾必须具备以下特质:①历史的深邃性:能唤起族群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归属感;②情感的普适性:其形象能激发最广泛的情感共鸣;③象征的包

容性:能承载从苦难到希望、从悲怆到力量的复杂民族情感;④视觉与力量的震撼性:其物理形态本身就能赋予人信心和力量。

2. 西北文艺场的形成与意识形态的重塑

象征的建构需要特定的社会空间与生产机制。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政治与文化地理格局发生巨变。1935年,中共中央及红军长征抵达陕北,此后陕甘宁边区成为敌后抗战的指挥中枢;几乎同时,随着平津沪宁等文化中心相继沦陷,大批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和青年学生大规模“西迁”与“北上”。这一历史性空间位移,使原本处于文化边缘地带的西北地区,一跃成为抗战文艺新的中心,形成了以陕甘宁为核心、辐射国统区西北全域的“大西北抗战文艺带”。

这一特定的文化生成场域,为黄河意象的集中书写与象征转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知识分子们从书斋走向黄河岸边,亲身体悟其壮阔气象与沿岸人民的坚韧品格。在此,地理(黄河)、历史(抗战)与政治(救亡)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交织。这一场域的文化生产已不再是单纯的审美活动,而是深刻参与国家意识形态重塑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宏大工程。

3. 文化场域理论视角下的象征生产

运用皮埃尔·布尔迪厄的文化场域理论^[1]可更清晰地剖析这一转化过程的内部机制。抗战时期以西北为中心的文艺场,是一个由多种力量共同构建的权力场域。

其一,行动者。包括国家政治力量(如中共中央宣传部、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民间文艺社团(如各类抗敌宣传队、西北战地服务团)以及作为文化个体的著名诗人、艺术家(如光未然、艾青、冼星海等)。其二,资本与博弈。在这个场域中,各种力量争夺文化领导权与话语定义权。其共同目标是实现最有效的政治动员,而达成此目标的最佳路径,便是寻找并锻造最具凝聚力的文化符号。

在此背景下,作为物理空间的“黄河”被迅速征用,进入这一充满张力的文化场域,成为被激烈言说与赋义的“话语建构场所”。文化生产者(诗人、音乐家等)在此场域中,并非进行纯粹的风景描绘,而是履行“符号创业者”的职责。他们通过特定的诗学策略,将黄河这一地域自然景观与全民族的苦难、抗争与复兴希望相交织,系统地将其建构为充满感召力的象征性意象。这一被生产出的黄河象征,将抽象的国家、民族概念具象化,成为凝聚战时集体记忆、强化国族认同的超级文化标识。

因此,黄河意象在抗战诗歌中的象征转化,是其

作为潜在图腾的内在资质,与抗战时期特定西北文艺场域及其意识形态生产机制相遇的必然产物。这是在民族存续压力下,由历史、地理、政治与文学共谋完成的文化象征实践,最终使黄河从一条地理之河,升华为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血脉中的精神“护国河”。

三、抗战诗歌中黄河意象的核心象征及其诗学呈现

(一)苦难叙事的悲怆性表征:作为民族创伤载体的黄河

在抗战初期的历史语境下,诗歌中的黄河意象首先表现为民族集体苦难的象征性容器。这一维度的书写,绝非消极的悲观主义,而是直面现实创伤的深刻美学实践。其核心在于,通过将黄河的自然属性与民族的生存危机相联结,完成从物理河流到民族悲情载体的诗学转换,以其沉痛、悲愤的情感基调,奠定抗战诗歌现实主义的坚实基础,并为后续的抗争叙事积蓄了必要的情感势能。

1. 感官化的意象系统:苦难的具身化呈现

诗人通过构建多层次、感官化的意象系统,使抽象的国难变得可感、可触。

(1)听觉意象:民族的集体悲鸣

诗歌中反复出现“呜咽”“哭泣”“悲鸣”等听觉意象,通过拟人化修辞将黄河的自然声响转化为民族的集体哀歌。如《黄河吟》^[2]中“滔滔以逝”“奔怒浪,巨响如惊雷”的描绘,其壮阔声势之下蕴含的是“吁嗟乎今成灾!吁嗟乎吾民哀!”的悲怆内核。河流的咆哮在此不再是纯粹的自然现象,而是内化为民族痛苦的交响。

(2)视觉意象:血泪的具象化流淌

黄河固有的浑浊特质,被赋予深刻的象征意义。“浑浊的泪水”“挟沙”的浊流,成为民族苦难的视觉隐喻。更进一步,河水与“血”的意象融合,使黄河化为一条流淌在祖国躯体上的“血水”之河。这种意象在报刊舆论中得到强化,《时代》画报对黄河决口后“户舍尽化为墟,一片汪洋”^[3]的摄影记录,将“浑浊的波涛”与“灾难与不幸”的直观画面烙印在民众心上。

(3)触觉意象:淤塞的苦难与倾泻的灾难

“淤塞的泥沙”既是对黄河自然属性的写实,亦被隐喻为民族历史负担的沉滞与现实的窒碍。艾青在《北方》中的名句——“而万里的黄河/汹涌着浑浊的波涛,给广大的北方/倾泻着灾难与不幸”^[4],通过“倾泻”这一极具动感和力量的动词,将黄河之水定义为灾难本身的洪流,传达了苦难的无可逃避性与压迫感。

2. 苦难的政治化:诗歌与公共舆论的互文建构
黄河的苦难叙事,深度植根于战前及战时的社会现实,并与公共舆论场域形成紧密的互文关系,使其超越单纯的哀悼,具备了尖锐的社会批判性。

(1)民怨的诗歌载体:从天灾到人祸的问责

1933年黄河大决口作为一个重大社会灾难事件,成为诗歌与报刊共同书写的焦点。《黄河吟》中“治水人何在?肉食者鄙不成才!”^[2]的厉声质问,与《聊斋》杂志中《黄河何以决口》一文对当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犀利讽刺,“竭力防堵舆论决口”而致“黄河堤岸不暇顾及”^[5],形成了强烈的互文效应。诗歌在此发挥了其社会功能,将自然灾害转化为对政治无能的有力控诉。

(2)责任的公共追问:象征意蕴的深化

《华年》周刊发表的《黄河决口的责任》一文,明确指出黄河之灾“固在天灾的肆虐,而同时人谋的不臧,亦不能轻易放过”。这种将自然灾害与国家治理责任相联系的认知,为诗歌中黄河的苦难意象注入了深刻的政治内涵。它表明,黄河的“悲鸣”不仅是自然之哀,更是政治失序与社会不公的象征。报刊通过摄影(如《图画晨报》的“孤岛”村庄)与评论构成的“图像—文字”叙事,共同将“黄河决口”建构为一个凝聚着民众怨愤与政治批判的综合性符号,为诗歌的苦难书写提供了丰厚的现实土壤与意义支撑。

3. 情感基调与诗学功能:共情与救亡的基石

此维度下的黄河意象,通过将民族的苦难浓缩、具象于一条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母亲河上,诗人成功实现了与最广泛民众的情感共情。这种共情,并非导向绝望,而是通过对共同苦难的体认,唤醒个体对民族命运的责任感。艾青笔下“悲哀的”北方与“倾泻着灾难”的黄河,正是在描绘深重苦难的同时,于一片灰暗之中埋下了要求变革与反抗的种子。因此,作为“苦难—悲怆的承载者”的黄河,构成了民族情感叙事的出发点:它通过真实的痛感,完成了抗战动员最原始也最深刻的情感积累,为向“力量—抗争的怒吼者”的象征性转折提供了内在的逻辑必然性与强大的情感动力。

(二)力量书写的抗争性转化:从自然咆哮到民族怒吼

在抗战诗歌的意象谱系中,黄河最富感染力与主导性的维度,无疑是从悲怆的承载者升华为力量的咆哮者。这一象征维度的确立,标志着民族集体心理发生了决定性转折:从被动承受苦难的悲情中挣脱,转向主动发出抗争的怒吼。黄河意象由此化

身为一个觉醒的、暴怒的巨人,其磅礴的自然伟力被隐喻为不可阻挡的民族反抗洪流,为全民族抗战提供了雄浑的美学象征与强大的精神动力。

1. 意象的转变:从“呜咽”到“咆哮”的审美嬗变
诗人通过一系列充满动感与力量的意象,彻底重构了黄河的审美形象,完成了其象征意义的核心转化。

其一,听觉意象的转换。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光未然在《黄河大合唱》中那石破天惊地宣告:“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此处的“咆哮”,已不再是《黄河吟》中与“哀哉”相伴的悲鸣,而是充满攻击性与威慑力的“战叫”。它如同进军的号角,瞬间点燃全民抗敌热情。与之相呼应的“狂涛”“巨响如惊雷”“激流”等意象,共同构成了一片声音的暴力海洋,象征着被压迫民族最终爆发的惊天怒吼。

其二,视觉与触觉意象的巨人化塑造。诗歌中的黄河被赋予“巨浪”“火的河”等形体与特质。魏巍在《黄河行》中写道:“黄河,我的母亲,我看见,从你的身上,奔出一扑扑火流。”^[6]这里的黄河,不再是倾泻灾难的浊流,而是喷薄着复仇烈焰的巨大生命体。这种从“水”到“火”的意象转换极具创造性,将黄河内蕴的毁灭与重生之力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其炽热感仿佛能灼伤读者的灵魂。

2. 叙事动力的转换:民族心理的觉醒与升华

黄河诗歌呈现出从“哀兵”到“雄兵”的情感逻辑。苦难叙事并非终点,而是力量的积蓄。黄河诗歌发出全民族抗战的怒吼,“自从东洋兵马到/杀人抢掠放火烧”^[7]“奏起忿(愤)怒与噪声的交响”^[8],民族的悲愤在临界点转化为决绝的反抗。黄河这位“饱经风霜的苦难者”,由此蜕变为“发出抗争号召的怒吼者”:“不管男女老幼/不管黑夜和白昼/我们在这里防守,防守/黄河岸是我们世居的乡土”^[9]。魏巍《黄河行》(1937年)、光未然《黄河大合唱》、石夫的《散步在黄河边》(1941年)等诗歌,通过刻画黄河的船夫、前线的群众与战士,将诗歌“变成一颗颗的炸弹,炸毁敌人的巢穴”^[10],以火热诗情激发全民族的危亡意识与救亡行动。这一形象转变外化了民族心理从“忍受”到“觉醒”、从“悲愤”到“反抗”的升华过程,为全面抗战提供了内在的情感合法性。

诗歌塑造了英雄主义的集体群像。诗歌将黄河的怒吼与具体的抗战英雄事迹相结合,使象征落地为可感的现实。如野邓在《老黄河》^[11]中歌颂“平型关,阳明堡”留下的“英雄的血迹”,或是众多诗篇中刻画的渡河北上、杀敌报国的士兵与志士形象。黄河的咆哮,于是成为这些前线将士英雄气概的宏

大回声,是全体军民共同谱写的战斗交响曲。

3. 地缘政治的象征:从自然天险到精神国防线

“不可逾越的天堑”之颂。诗歌反复强调“黄河是中国的天险/鬼子不能越过黄河边”^[12],将黄河的自然险要升华为民族生存的保障与国家尊严的象征。咏青在《黄河》中直接呼喊:“黄河/你要站起来”,“你要做大中华的国防线”^[13]。他将黄河主动人格化为奋起、捍卫家国的巨人,其物理屏障作用被赋予了崇高的精神防御意义。

“渡河”行为的仪式化。与防御相辅相成的是对“渡黄河北上抗战”这一行为的反复歌咏,将渡河这一军事行动塑造成具有仪式感、奔赴光荣战场的象征性行为。高咏《过黄河》(1940年)、坚白《渡黄河》(1940年)、果军《黄河边上行》(1940年)等诗歌,刻画了士兵、爱国志士渡黄河杀敌报国的无畏精神。黄河成为考验勇士、分隔和平与战争的界河,渡过它,便意味着投身神圣的民族解放事业。此维度下的黄河意象,奠定了雄壮、激昂、刚健的情感基调,实现了从“哀兵”到“雄兵”的情感升华。

黄河意象的诗学功能在于动员与赋权。诗人通过精心的意象营造与形式创新,成功地将黄河自然原始的“暴力”(咆哮、巨浪),美学地转化为革命的“暴力”。这种转化,为全民族的武装抵抗提供了强大的合法性论证与精神驱动力。

(三)希望的守望者:文明延续与民族新生的象征表达

在抗战诗歌的宏大叙事中,黄河意象不仅承载着历史的苦难与现实的抗争,更肩负着照亮未来、指引方向的精神使命。作为“希望—复兴的守望者”,黄河超越时空的局限,以其亘古不变的流淌与深厚的文明底蕴,构建起关于民族新生的预言。这一维度将残酷的战争置于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审视,为饱受创伤的心灵提供了终极的精神慰藉与胜利的坚定信念。

诗人通过挖掘黄河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塑造了一系列充满希望的意象,使其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精神桥梁。在最黑暗战争岁月里,诗人们反复呼唤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摇篮”这一原始意象。光未然在《黄河大合唱》中深情咏叹——“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是在民族危亡之际对文明生命力的重申。面对强敌,这一呼喊唤醒了一个沉痛而坚定的集体认知:一个孕育了五千年灿烂文明的民族,其生命根基绝不会被轻易斩断。黄河的千古长流,本身就是文明不朽、血脉相承最直观、最有力的证明。

抗战诗歌中,黄河意象的三重象征维度并非彼此

割裂、孤立存在。在众多杰出的诗作,尤其是在《黄河大合唱》这样的经典中,三者常常水乳交融、相互依存,构成一个完整的“受难——反抗——新生”叙事结构。苦难是怒吼的起因,希望是怒吼的归宿;没有对苦难的深刻呈现,抗争便失去了正义性与迫切性;而没有对希望的坚定守望,抗争则可能陷入纯粹的悲情与绝望。黄河意象正是在这三重维度的交响与递进中,获得了无比丰富的艺术张力与思想深度,完整而动人地演绎了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从觉醒、抗争到迈向光辉未来的完整心路历程,使黄河母亲“成为凝聚民族共识、传达人民心声最强有力的存在”^[14]。

四、结语

从文学史的更长视角来看,抗战诗歌对黄河意象的书写,是对中国古典诗歌意象一次成功的现代性转化。它既激活了“黄河”母题中积淀的壮美、忧患与家国情怀等传统意蕴,又为其注入了抗争、民主与民族解放的现代性精神。这场轰轰烈烈的符号生产运动,不仅为那个伟大时代留下了最为激昂深沉的文学见证,也深刻参与了现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与淬炼。它雄辩地证明,在特定历史关头,文学绝非无力的回声,而是能够成为参与历史、塑造现实的能动力量。本文以“抗战诗学”为理论视角,对黄河意象从三重维度及其生成机制进行剖析,指出战争、文学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黄河的波涛

已然远去,但抗战诗歌所铸就的“黄河精神”早已融入民族的血脉,成为中国文化记忆中一座不朽的美学丰碑与精神灯塔。

参考文献:

[1] 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 [M]. 包亚明,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 冉耳. 黄河吟(歌曲)[J]. 民间周报,1933(25):2.
[3] 佚名. 时代[J]. 1934(5):2.
[4] 艾青. 北方[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70:1-8.
[5] 佚名. 谈话室:黄河何以决口[J]. 聊斋,1933(9):2.
[6] 魏巍. 黄河行[M].//魏巍. 魏巍诗选.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5:5-6.
[7] 黄诚. 黄河谣[J]. 青年生活,1939(4):16.
[8] 柳倩. 怒吼吧,祖国,这是你的时候了[J]. 东方文艺(上海),1936(3):62.
[9] 窦隐夫. 守黄河[J]. 战歌(云南),1938(2):38.
[10] 黄光. 黄河水灾感赋[J]. 国专月刊,1935(3):72-73.
[11] 野邛. 老黄河[J]. 奔流文艺丛刊,1941(5):36-37.
[12] 影痕. 黄河的激流[J]. 诗星,1942(2):53.
[13] 咏青. 黄河[J]. 文艺(武昌),1938(5):66.
[14] 韩子勇. 黄河、长城、大运河、长征论纲[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21:48.

(责任编辑 谢春红)

Patriotic Consciousness: The Yellow River in the Poetic Discourse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LI Jingke¹, WU Pengfei²

(1.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uoyang, Henan 471023, China;
2. Key Research of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The image of the Yellow River in poet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between 1931 to 1945 is rooted in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s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the soul of the national spirit, and the symbol of homeland and the nation. Within the unique context of the war, it underwent a transformation from a natural geographical entity to a cultural and political symbol. This paper elucidates the threefold symbolic system of the Yellow River imagery: as the “bearer of suffering-sorrow”, it embodies national trauma; as the “roaring force of resistance”, it transforms into a spiritual rallying cry for the war; and as the “guardian of hope-revival”, it conveys the vision of national rebirth. These three dimensions collectively form a complete narrative logic of “suffering-resistance-rebirth”. Through poetic practice, the ancient symbol of civilization was transformed into a modern totem of resistance, significantly consolidating national identity, providing spiritual motivation for the national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profoundly demonstrating the agency of literature in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Key words:poet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Yellow River imagery; national spirit; symbolism; cultural memory

流动·混杂·共情:近年来美国华裔电影中的情动景观

林 萌¹,徐若寒²

(1.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2. 中国传媒大学 戏剧影视学院,北京 100024)

摘 要:在德勒兹的理论中,“情动”的生成不仅涉及身体(即具身经验)在感知中的表达,也暗含着行动的潜能。近年来,美国华裔电影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女性身体景观,影片借助“变身神话”,在情动中以“前语言状态”直视女性感觉化的身体流变。女主人公通过情动场域的内外互动,在“文化杂糅”的身体与身份维度中展开青春萌动、主体身份探索、亲子边界重塑等一系列行动。相较于早期的华裔叙事,《青春变形记》《瞬息全宇宙》等影片尽管仍会依照好莱坞的某种叙事惯性,将戏剧冲突聚焦于家庭内部,尤其是“母女之间”,但借助情动视域下的“身体转型”与“共情叙事”,这些影片也建立起了超越个体与族群界限的共通感,呈现了美国华裔电影情感表达的新可能。

关键词:美国华裔电影;情动;身体;共情叙事;文化杂糅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6.012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6-0078-06

近年来,《别告诉她》(*The Farewell*, 2019)、《真心半解》(*The Half of It*, 2020)、《功夫》(*Kung Fu*, 2021)、《青春变形记》(*Turning Red*, 2022)、《瞬息全宇宙》(*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2022)等美国华裔影视作品频频亮相,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引领着好莱坞华裔影视创作的新浪潮。这批作品不仅展示了创作者们的文化交织经历——其中很多导演、编剧和制片均有华裔背景,同时也凸显了好莱坞对华裔故事的多元解读。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明显的身份杂糅之外,女性身体的凸显更是构成了上述影片共有的独特景观。尤其是在《青春变形记》和《瞬息全宇宙》中,影片通过女性身体的情感波动与奇妙变化,成功地捕捉和呈现了情感的强烈程度与力量,深入挖掘了超越个体、族群的普遍情感共鸣。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美国华裔电影的创作新方向,也为全球观众带来了全新的情感体验。

一、“流动”的身体:华裔电影里的“变身神话”

德勒兹(Gilles Deleuze)指出,所谓“情动(affect)”,即“存在之力(force)或行动之能力(puissance)的连续流变”^[1]⁸。德勒兹的情动理论建立在“世界历史的转折处”,基于人自身的体验性,他认为人的存在是“通过事件,它进入了一种生成,一种虚拟性的实际化”^[2]。而情动作用于这一过程中,聚焦于生命流动的维度。这是一种对身体感觉变化的强调,涉及身体或具身经验在感知层面的表达,而非进入意识、转化为理性思维并语言化后的身体变化。语言化意味着社会化,意味着接受社会符号体系的宰制,人根据规则行事,成为同一的个体;而前语言化也即前社会化,是进入理性前的状态,显示出“类似意愿或意志的效果与力量,即暂时没有进入‘话语’与‘表象’领域的流动性现象与力量”^[3]。因此在情动的视域下,人的存在处于流动和持续生

收稿日期:2025-10-18

基金资助: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文化挪用视域下中国故事的影视传播研究”(2022-ZZJH-55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文化挪用与西方文化身份理论研究”(22YJC751016)

作者简介:林萌(1989—),男,河南焦作人,文艺学博士,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后,河南大学文学院校聘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大众流行文化、媒介文化、影视理论与批评。徐若寒(2000—),女,河南郑州人,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艺术学(戏剧与影视学方向)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北美亚裔影视文化。

成的差异中,当其流动起来,此时作为生命本身的身体并非空白或零度,而是满溢着各种强度的实体,暗含了行动的潜能——主体所拥有的观念在流动时不断发生变化,身体也在与其他身体的接触中产生交互,变成释放创造力和多样性的场所,冲破并瓦解因被捕获而停滞、僵化、重复的生命图像,“让它摇晃、破裂、敞开,生成新的、流动的生命图像”^[4]。作为载体,身体自然地处在人存在的“生成”中,而“生成”的过程本身蕴含着不同身体彼此交互的意味,因此身体在与他者身体的接触中打破边界,无限毗连,最终向他者生成。

作为第一部以华裔女性为主角的皮克斯动画工作室(Pixar Animation Studio)作品,《青春变形记》围绕进入青春期的华裔少女小美(Mei)展开,在独特的“兽形”外观中,影片通过“变身神话”带领主人公拥抱身体的流变——将青春期的每一次情绪流变都具象化成“红熊猫”的“变身”,成长之路与“变身”从不可控到可控的过程形成同频共振。《青春变形记》一方面以“红熊猫”的“变身神话”象征自我意识和原始欲望的展现,另一方面也希冀透过这一表象,呈现出女性青春期时的身体与心理的双重变化。情动作用于小美变身时不可言喻的身体起伏,或是隐秘与尴尬,或是朦胧与波动,在快乐与痛苦两极间游走——这皆是处于前语言状态的生命力流变,推动小美一步步实现了转化和超越。尽管身体反应不可言说,但正是情动使小美真实地直面身体之感受,接纳自我真实之存在。

这一“变身—红熊猫”的身体景观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成”,借助于情动将“他者”纳入主体本身。影片伊始,小美日复一日的生活是有迹可循的,她的生命空间以“孝顺”父母为核心展开,体现出好莱坞电影中典型的华裔叙事。与此同时,随着年龄的变化,她也面临着在自我空间内纳入一个“全新”世界的困惑,朋友、偶像、男孩等熟悉的具象存在,组合成一种奇特的青春新感受。在对戴文(Devin)心生情愫后,小美不由自主地创作了自己的“少女画作”,描绘她和戴文的恋爱场景,并在兴奋情绪的推动下“越画越变态”,最终被母亲发现,以至于母亲采取“过度保护”的行为(质问戴文)。彼时,小美身体内在涌现出了巨大的尴尬与恐慌,情绪不断翻涌,她潜意识里的梦境也呈现出种种杂糅的景象。在这样一种身体感觉的流变中,梦醒后的小美“变身”成了李氏家族传说中的“红熊猫”,脱离了其原本的“完美状态”,爆发出未曾感受过的情绪。小美最初将处于“红熊猫”状态的身体视为不可控的“诅咒”,只有当她平心静气地感受身

体流变时,才能再次从“红熊猫”变为人类。

“变身—红熊猫”暗指青春期主体对内在自我的探索,这首先呈现为对情绪的尝试性掌控。情动将小美带离“正常”状态,呈现出全新的生命状态和形象,并以此挑战小美在原有华裔家庭代际关系中的封闭性。情动并非一种静止或固定的状态,在经历了“变身—红熊猫”的情动后,小美的身体首先处于一种“反击”状态:她迫切地想要祛除“红熊猫”体征,表现出对“非人化”身体的排斥——这是理性、规则、秩序的一面在发挥作用。但当她发现以“红熊猫”的形象面对朋友,情感的共通和音乐的共振并未因“变身”造成彼此关系的改变时,小美也开始对外在未知事物展开探索,推动身体内外的交互——表现为情感、能量、秩序重建的尝试。随后,她不再被“红熊猫”的野性所驱使,反而选择不通过仪式将“红熊猫”驱逐出身体。小美决定和它建立一种新的联系——拥抱身体及其流变,体会自身的感受,并与之融为一体。正如德勒兹所言:“感受(affect,即情动——引者注)不是从一种体验状态向另一种体验状态的过渡,而是人的一种非人类的渐变。渐变是一种极度的毗邻性,发生在两个不相似的感觉的彼此相拥之时,能够明确表达这一内容的只能是感受。这是一个不确定的和模糊的地带。”^[5]至此,小美得以回归“原始”、回归欲望的源头,感受到生命力的蓬勃、充盈与愉悦。她会伴随pop音乐随心舞动,在圆月下一次次跳跃,在跳跃中变身,展示自己如何轻松地控制身体的流变。pop音乐作为一种西式/美式文化,成为触发情动的某种契机,东方身体与西式文化就此显现出一种“文化居间”的融合。

而《瞬息全宇宙》则在“文化居间”中呈现为一种分裂。电影的主人公伊芙琳(Evelyn)能穿梭于多元宇宙,其身体正是实现这一行为的平台,而“随机算法算到的随机事件”则是她触发身体间达成空间跳跃的节点。这种契机具象化为一瞬间的(欲做某事的)念头流动,它能将伊芙琳的身体带离原有生活秩序,进入前语言状态的“不确定的和模糊的地带”,借此创造新的身体景观,如功夫巨星、铁板烧大师、戏曲演员等等。但这又构成了另一种“生成”——不是融合而是分裂的、能够跨越一切界限的各种新主体。与《青春变形记》中的小美聚焦于情绪控制、流露及身心与中西关系融合的情动不同的是,伊芙琳的情动更聚焦在(欲做某事的)念头的持续生产、分裂,并表现为强有力的实践。它在电影中通过影像被直观呈现,主体身份也随之流动、开

放,呈现鲜明的他异性(alterity):不同宇宙中的“伊芙琳们”,尽管拥有同一具“身体”,但却是相对于彼此的“他者”。伊芙琳所做的正如德勒兹借对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的阐释所言:“他从未追问我们应该做什么,而是始终追问我们能做什么,什么是我们的能力所及。”^{[1]13}

在电影的第一部分“Everything”里,伊芙琳的原有身份在快节奏的情节和配乐中被说明——她是经营着一家洗衣店的华裔中年女性,也是一个母亲、一个妻子和一个女儿。影片开头不断旋转的洗衣机,不仅象征着伊芙琳交错、枯燥又囊括全部(everything)的身份与生活,也可以被理解为当代社会中个体孤独而繁杂的心境。这位中年女人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为生活琐事焦头烂额,大脑处于“快要爆炸”的状态。而就在这个临界点,她进入电梯的一瞬间,伊芙琳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狭小的空间中,她被来自阿尔法(Alpha)宇宙的“丈夫”威蒙德(Waymond)告知自己就是“the one”(救世主)。随后她接通了某种科技装置,碎片式地回顾了自己迄今为止的生活,包括每一次选择、每一次开心、每一次难过等,光怪陆离的体验激活了她的身体,令她从预定之事(见审计员)中逃逸。进而,伊芙琳完成了第一次尝试/跳跃,她以最简单却不合常规的“鞋子倒穿”方式进入了另一个宇宙,这是影片中她对自己刻板、反复的人生的逃脱(以“换种方式不走原路”作为隐喻)。影片的节奏也逐渐紧凑,而这种紧凑不仅表现为开头的“密集”,更是情绪的不断“刺激”,这些“刺激”带动了念头的流动,“情动”的生命力也由此体现。

二、“混杂”的身体:文化杂糅下的复杂主体

在电影《瞬息全宇宙》中,伊芙琳通过一种技术装置和特定的身体动作跨入平行宇宙。然而,技术装置只是一个触发机制,真正的宇宙跳跃与身体的行为密切相关。要完成宇宙之间的转变,必须采取某种实际行动,如划伤自己、向审计员表达情感,甚或尿裤子。更为关键的是,这些行动必须是真心实意的,不能单纯地“假装”。每次宇宙跳跃后,角色们都会体验到其他宇宙身体的附加特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获得了一个全新的身体。相反,他们的新身体仍然受到原始身体及其环境的影响,产生一种新旧结合的复杂情感、记忆和技能。这种融合与《青春变形记》中展示的完全不同,更为复杂,因为平行宇宙带来了多重身份的碰撞。在影片中,伊芙琳的“丈夫”警告她,尽量利用其他宇宙的能力,而不是完全沉浸其中。伊芙琳曾经体验过作为功夫明

星的宇宙,并渴望再次回到那里,但被其丈夫阻止——因为过于沉醉其中可能会导致身份混淆与意识冲突,最终因意识碎裂而死亡。

情动集中关注人的生命体验,聚焦于“特定时刻进入具体关系网格中的状况”^[4],以及此时人身体内杂糅的主体经验。伊芙琳的身体原本就夹杂在多重“困局”之中,税务审计、洗衣店事务、春节聚会筹办、女儿的性向认同等问题,每一个困局都勾连起她在生活里的不同身份与位置。经历宇宙跳跃后,伊芙琳对自己为何成为“the one”深感疑惑。威蒙德的答复颇为出人意料,他告诉她,选择她的原因,是因为她是最不完美的那一个。然而,正是由于她在某些方面的“无能”,使得她在其他方面展现出了惊人的“潜能”。身体的流动为伊芙琳开启了新的可能性,她开始探索自身的情感深度,挖掘出隐藏的潜力。这种潜力让她在一个宇宙中是平凡女子,在另一个宇宙中却成为功夫巨星、铁板烧大师,甚至戏曲名角。可以说,多元宇宙是伊芙琳情感和欲望的真实投射。身体在这些宇宙间的流动,仿佛是在不同的生活场景中不断探索自己的极限。但在这种情感和潜能的交织中,主体的认知与意识成了一个难题。《瞬息全宇宙》提出了一个观点,即在接触其他宇宙时,应仅吸收其技能,而避免其意识的侵入。相反,乔伊(Joy)作为多宇宙知识和能量的综合体,虽掌握了强大的力量,却在道德和信仰上偏离了人性,成为影片中的反派,追杀各个宇宙的伊芙琳。

事实上,《瞬息全宇宙》还在潜文本中演绎了一场华裔后代在多重文化干扰中困惑与挣扎的文化寓言。女儿乔伊的叛逆恰来自她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信息过载造成了意识紊乱与“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所谓“文化休克”主要用来“描述人们在遭遇缺乏熟悉的文化符号和行为的异文化时,可能表现出的种种焦虑迹象”^[6];但它又不仅可以描绘跨文化情形,在宽泛意义上,还形容了人们遭遇新领域与新环境时,那种无助、茫然、焦虑乃至愤怒的心境。时刻被新知识与信息冲击的乔伊,加之青春期固有的对规则的反叛,以及亚裔/同性身份的边缘处境,便陷入了这种心境。她在格格不入与无所适从间失去了目标,也失去了随之而来的欲求感。无欲无求(乔伊的口头禅是“全无所谓”(nothing matters),便无法触发情动,只能陷入黑洞。《瞬息全宇宙》展现出族裔身份的重要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它提供了一种文化根基,进而带来了身份根基与主体根基。正如伊芙琳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功夫、戏曲)化险为夷,族裔身份也让她的行动具有意义框

架下的目标性和欲求感——哪怕这种意义框架在影片里显得过时、欲求显得可笑——这种悖论也暴露出好莱坞带有偏见的叙事惯性。

《青春变形记》则以另一种视角展现族裔身份的价值。作为生活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第二代华裔女性,小美的文化身份具有复杂性:在影片中,她在两种文化之间不断地变换角色,试图在家庭与社会中寻找真实的自我。在家庭内部,小美与父母建立了良好的亲子关系,她认同中国传统文化,接受其历史与传承。如影片一开始,小美便表示“孝文化”未曾困扰她,反而与父母相处得愉快又和谐;她也每天主动参加“家族祠堂清洁日”活动。但家庭内部的平衡,在小美的身体因情动发生“变身”后被打破。当小美在情动的作用下完成“向内转”,开始重塑自我,也出现了“叛逆”的一面——挑战母辈权威的束缚,打破施加于女性的规范。就此,小美不仅呈现出了女性青春期的身体困境,也展现出某种主体缺失与随之而来的探索。她在探索自我世界的同时,还面临着对亲子关系的二度认识与重建。小美一直深爱自己的母亲,但在主体选择上,却无法同时满足母亲的期许与自我的期待:前者需要达到高标准以获得认可,后者则在异质文化中生成了满足个体生命内在的追求。因此,小美与母亲在影片伊始呈现的母女关系,转化为后续青春期带有痛感的互动、冲突——亲子关系的无边界感加剧了青春期的成长痛,这种因探索新世界而与母亲“割裂”的痛苦,尽管尖锐、鲜明,却也是一种独特且必要的成长体验。因此,小美的身体虽在流动中不断生成,但其成长目标的明确,以及以族裔文化为基座的主体性,令她在情动中融合他者建立了新的身体及其感受,在异质文化的冲击中完成过渡。

显然,伊芙琳文化身份的复杂程度远高于青春期的她,比起后者在中西两种文化里的身份切换与融合,伊芙琳还被生活裹挟在多重异质(难以融合)的社会身份状态里。在复杂的位置中,她也被自身认为的“正确”绑架,被外界定义的“成功人生”困扰,被“东亚女儿”的“噩梦”笼罩。而在获得了穿梭宇宙的能力后,伊芙琳虽依旧坚持一些原有的目标性和欲求感,但情动的力量就在于,旧有的生命图像总被“生成”的激情所瓦解。经由跳跃点产生的情动,伊芙琳拥有的观念随着身份分裂成不同宇宙的形态,并与其他身体在接触中产生的交互而不断变化。小美在“生成”中冲破规则场域,重新探索主体内外的世界;伊芙琳则在“生成”中打破固化的生活秩序,在情动中与“她宇宙”连接,成为释放创造

力和多样性的载体。

三、“共情”的身体:重建华裔电影的情感认同

在由正邪两方的母女关系构建的“她宇宙”中,阿尔法宇宙中的乔伊作为大魔王,不断追杀各宇宙中的伊芙琳,其背后的真实目的是希望母亲能理解自己。这一真相在两者都变成石头的形态时被乔伊揭示。石头,象征着冷静与客观,暗示只有在沉着冷静的状态下,人们才能真正理解自己的欲念与行为。当情绪激动时,人们往往会做出非理性的选择。这也解释了为何乔伊追杀了无数宇宙中的伊芙琳,但其真实意图却从未被揭示——在情感的风暴中,真正的动机被无法“言说”地忽略。不过,“石化”后伊芙琳与乔伊之间理解的深化与和解的达成,靠的也不仅仅是理性的分析,更是相似状态下心灵的贴近,更容易分享彼此的体验与情感,进而真正地沉浸于对方的世界,实现感同身受。电影中的这一情节,与其他影片形成了有趣的对话。如《青春变形记》,影片中的母女也经历了由冲突到和解的过程,她们的和解同样建立在深层的共情之上,建立在母亲变成熊猫后,两人对青春体验产生的共鸣。不同的身体带来了相似的体验与情感,它们在两具身体间自由流淌,让理解与接纳成为可能。

在好莱坞的华裔乃至更广泛的亚裔叙事中,“母女由冲突到和解”的叙事模式十分常见。早在1993年的《喜福会》中,便能看到这一模式的影子。在该片中,父亲不再作为家庭中的传统权威来展示(并非不存在),相反,他在家庭结构中几乎处于“缺席”状态,退居幕后,而母亲成为家中关系的主导。由此,传统的父权结构转移到了母亲身上,与此同时,母女之间的冲突也开始上升为主要的叙事焦点,超越了传统的父子冲突。一些学者敏感地观察到:“华裔母女冲突”已经成为继“东方美人”之后,美国社会理解或构想“他者”“中国文化”以及华裔美国人的又一主要路径。^[7]而经由这条捷径所达到的目的,首先表现为对蓬勃发展的女性主义运动的迎合;其次,选择母女而非父子,也在文化政治的意义上,大幅压缩和简化了“与人物相勾连的社会关系”,“移民所面对的诸多问题,如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公共暴力等,都被一概简化为家庭内部问题”^[7]。这既与母亲被刻板化的家庭角色(主内)有关,也与男性被设想为社会秩序化身的文化寓言(主外)有关,进而这些电影就此回避了美国在政治与文化政策、社会风气上的弊端,片面突出了中国文化在家庭教育上的问题,加深对中国文化的偏见。在这一点上,《青春变形记》与《瞬息全宇宙》延续了好莱坞的

这种叙事惯性,显示出保守的一面,但它们也并非没有突破。

这两部影片的创新之处在于对情动的展现。情动通过身体化的叙事、“身临其境”感的营造,在表达跨文化议题的同时,也试图最大程度地剥离附着在身体之上的社会性因素,以实现跨越族裔叙事和影片内外的普遍性共情。当然,这种“剥离”并非无视、不考虑或绕过社会;恰恰相反,它在充分考量这些因素的基础上,采用一种指向未来的方法论,涉及生成中尚未被固有话语统辖的内容,进而显示出突破刻板压抑的活力。德勒兹的时代正处于去殖民化的热潮中,他基于权力微观的背景,将斯宾诺莎对“情动”的阐释关联至社会权力场域,他认为“情动”作为“非理性”的力量存在,有助于消解符号的意识形态结构作用。情感或爱在精神分析学的语境中具有从社会秩序中“破茧而出”的激进意义。这些“非理性力量”“完成着对人的理性(精神)、理智(脑)以及由此搭建起来的冰冷秩序的反拨”^[8]。《瞬息全宇宙》中女儿乔伊所遭遇的“文化休克”便不仅仅是单纯的跨文化问题,更是当今时代各种资讯冲击下年轻人的共同症候——“空心病”。与此同时,这些影片共有的家庭叙事实际上也探讨着“代际冲突”和解的同构性困局。跨越“重重宇宙”才能达到的理解反映的不仅是个体化的焦虑,更是群体性的焦虑,这是人类业已僵化的相似生存状态。在看似俗套的家庭叙事中,电影试图寻找的是“弥合的介质”——情动,以弥补人与人的裂缝。它们试图透过文化差异的缝隙,从被叙述对象的身体出发,在不同身份形成的交叉中,建立起超越个体界限、族群界限的共通感,这种共通感搭建起融会贯通的媒介,将普遍性容纳其中,也将其他族裔的故事呈现在银幕上,推进在文化上建构“认同”的可能。

这种对“交叉”或“杂糅”的强调还放大和引申出了另一种更具普遍意义的“身体转型”。《瞬息全宇宙》呈现的交互式叙事,是元宇宙(metaverse)、后现代特质在电影中的新颖尝试。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强调:赛博格(cyborg,即人机一体)是基于跨越一切界限的新主体,以“无边界”打破传统的二元对立与中心主义,这“构成所有历史转变之可能性的中心”^[9]。《瞬息全宇宙》实际上就将“赛博格化”的身体推至了前台,展现一种人类的共同境遇。无论是影片中被作为跨越介质的“戴耳机(跳跃宇宙的辅助技术工具)的身体”,抑或是女儿乔伊在“无所不能”的虚无身体中试图寻找相同感受者的叙事线,都看重着“身体的接触”,强调用

身体的接触以进一步推动心灵的接触。如何在当下及未来的技术化困境中生存?影片试图告诉我们:用真实的身体对抗话语的虚无,捍卫非理性的情感,而不仅仅是坚守于理性意识、逻辑、结构之上。

人类在面对“事件”时,情动使身体、神经状态先做出反应,然后才是进入语言状态的理性意识。身体景观的展露也指向人类“结实的存在”——穿梭在不同宇宙间的是身体而非意识。“赛博格”突破了“身体”的界限,德勒兹借用阿尔托(Antonin Artaud)的“无器官身体”(body without organs)也表达了他对身体作为“有机体”的否定,他倾向于将身体逐渐转向碎片化形态和“无器官身体”。对于后者来说,“身体”已不再是被“组织体”捕获、限制的有机体(有中心及结构性),反而可以通过去中心的器官达成欲望潜能的实现。《瞬息全宇宙》中,人物的宇宙跳跃往往发生于用身体(器官)做出本不会做的事情(绕过基于社会理性的整体判断)。在《千高原》里,德勒兹和迦塔利认为:传统意义上的身体往往被视为“器官的组织体”,而非将器官看作单独生产“事件”的机器。在此基础上,“无器官身体”是欲望的内在领域,欲望的一致性平台。德勒兹和迦塔利用人的“面孔”举例,以表达“无器官身体”不是无法达到的、理想的状态,而是物理实体。例如,脸上实际上并非完全限于自身的组织功能,反之人类用它来传递情感、进行交流,甚至当作审美对象。而这正是基于面部被“从组织体的底层中移除”,从而使其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被使用。由此发现,“无器官身体”是在不被组织体结构捕获前的身体,具有身体本身的潜能。^[10]在《瞬息全宇宙》中,伊芙琳面对敌人攻击时需要完成的跳跃点是发自内心地对其说出“我爱你”,这对于来自东亚的女性母亲来说,如此外放、自然地传达爱意的确不简单,但在危险来临的那一刻,伊芙琳还是照做了。此时她的身体机能聚焦于“嘴”,身体变为“无器官身体”,在呼喊中释放、实现了自身的潜能。情动所强调的,就是超越传统的新关系、新结构、新形态。在此背景下,《青春变形记》与《瞬息全宇宙》等影片中对于身体叙事的尝试,其力量已超越“尝试”本身。《别告诉她》《真心半解》等华裔电影,也从“极限”“生死”“性别”等角度涉及对当代人身体的探索,呼唤跨越族裔的沟通与共情。

四、结语

德勒兹的“情动”强调一种实际性身体的社会性力量,原初于身体的主体性是宽广的,作为生命力象征的情动能够对抗符号化的权力,生命之流可以

超越社会秩序。身体在与他者身体的接触中打破边界、无限趋近,最终向他者生成。《青春变形记》中的“变身”可视为特殊的“生成”,其特殊之处在于,“变身”将“身体感受”具象化,使小美超越了自身的固有特性、状态,将“红熊猫”纳入身体之中,达成“人一动物”的多重互动,由此进一步探索自我的存在。《瞬息全宇宙》中的“变身”则是元宇宙、后现代特质在电影中的新颖尝试:通过展现某类“赛博格化”的身体和“无所不能”的身体,打破传统的二元对立与中心主义,生产出一种追求普遍性的人类共情。这都是其在原有好莱坞华裔电影主要展示跨文化(冲突)议题之外借由身体与情动所作的突破与尝试。

《青春变形记》《瞬息全宇宙》等影片在“共情叙事”中纳入普遍性,经由电影媒介影响,用以搭建更有力的生命图像,冲击传统叙事的局限;而当下“游牧式”的受众,亦未尝不能从电影文本的“共情叙事”中诱发情动、获得生命的力量,并将其延伸到所处的环境和各类关系中。尽管《青春变形记》与《瞬息全宇宙》并非尽善尽美,仍保留了好莱坞的某些固有偏见,“共情叙事”也还依赖个体觉醒而非结构性变革,但至少,它们在尝试中预示了一种变革的可能。

参考文献:

[1]德勒兹. 德勒兹在万塞讷的斯宾诺莎课程(1978—1981)

记录[A]. 姜宇辉,译//汪民安,郭晓彦主编. 生产第11辑·德勒兹与情动[C].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3-22.

[2]贝克曼. 吉尔·德勒兹[M]. 夏开伟,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103-104.

[3]张锦. “情动”与“新主体”:德勒兹与福柯——一种朝向未来的方法论[J]. 东南学术,2020(5):206-214.

[4]葛跃. 德勒兹的情动理论与生成文学[J]. 文艺理论研究,2021(4):109-116.

[5](法)德勒兹,迦塔利. 什么是哲学[M]. 张祖建,译.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451-452.

[6]朱燕. 跨文化交际中文化休克的心理分析及对策[J]. 求索,2007(9):160-162.

[7]齐仙姑. 被复制的母女关系和被私域化的华裔美国电影[J]. 电影艺术,2022(5):48-53.

[8]林萌. 小·人·物:近年来现实主义电影中小人物症候透视[J]. 文艺研究,2019(7):112-123.

[9](美)哈拉维. 赛博格宣言:20世纪80年代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A]. 严则胜,译//汪民安主编. 生产第6辑·“五月风暴”四十年反思[C].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91.

[10]SMITH D. What is the Body without Organs? Machine and Organism in Deleuze and Guattari[J]. Continental Philosophy Review,2018,51(1):95-110.

(责任编辑 林川)

Flowing, Hybridity and Empathy: The Affect Spectacle of Chinese-American Films in Recent Years

LIN Meng¹, XU Ruohan²

(1.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2.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In Deleuze’s theory, “affect” involves not only the expression of the body and embodied experience in perception, but also implies the potential for action. In recent years, Chinese-American films have provided a unique landscape of female bodies, using the “transformation-fable” to directly visualize the sensuous transformation of female bodies in a “pre-linguistic state” through affect. The heroines form a series of actions such as adolescent budding, identity exploration and reshaping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in the body-identity of “cultural hybridity” through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teraction of affect. Compared with the early Chinese-American narratives, although films such as *Turning Red* and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still follow a certain narrative pattern of Hollywood, and keep the dramatic conflict within the household, especially between “mother and daughter”. However, with the “body transformation” and “empathetic narrative” under the perspective within the affective field, these films also build up a sense of commonality that cuts across individual and ethnic boundaries, and present a new possibility of emotional expression in Chinese-American films.

Key words: Chinese-American films; affect; body; empathetic narrative; cultural hybridity

《彩云追月》的创作特征与演奏诠释研究

——基于民族音乐元素的钢琴化重构

刘 玥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音乐舞蹈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钢琴曲《彩云追月》是中西音乐文化交融的典范之作,其创作特征与演奏诠释对中国钢琴音乐的民族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王建中的《彩云追月》为研究对象,剖析作品中的民族音乐元素与演奏技术难点。通过梳理历史背景与改编逻辑,从调式保留、织体重构、结构扩展等剖析创作手法,探讨五声调式与现代和声的融合路径。结合演奏实践,提出分级训练方案以突破技术瓶颈。《彩云追月》通过钢琴化重构既保留了传统音乐的意境,又拓展了钢琴的表现力,为中国钢琴音乐的民族化发展提供了重要范例。

关键词:彩云追月;钢琴改编;民族音乐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6.013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6-0084-07

引言

《彩云追月》作为中国钢琴改编曲的经典之作,承载着20世纪中叶中西音乐文化交融的历史印记。王建中以广东音乐为蓝本,通过钢琴语汇重构民族音乐意象,实现了从线性旋律到立体音响的跨越。本文结合音乐本体分析与演奏实践,探讨创作逻辑与演奏难点,希望对中国音乐研究感兴趣的爱好者及研究者提供一些建议。

一、《彩云追月》创作背景与音乐本体分析

(一) 历史溯源与改编特征

《彩云追月》作为中国传统民族乐曲之一,其变化多样的音乐旋律,体现出以“月”为主题的民族色彩,在动静结合的音乐旋律中,展现彩云与月的唯美境界。《彩云追月》创作于1935年,由任光同、聂耳共同创作。随着西方乐器——钢琴的引进,著名音乐家王建中于1975年改编了钢琴曲《彩云追月》。改编过程中突破性地运用“钢琴化民乐”思维:

调式创新:保留原曲A宫五声调式(宫、商、角、徵、羽 A、B、C#、E、F#),通过附加音和弦(如九度叠加)增强音响张力;

织体重构:开头左右手形成的纵向八度模仿弹拨乐器,十五连音模仿古筝长刮奏,颤音模仿吹奏乐器。第5—7小节模仿竖琴音色,右手主题旋律长音模拟云锣音色,形成“点线交织”的空间感(见谱例1);

谱例1:

结构延伸:将原曲从45小节扩展至71小节,通过插部与变奏增强戏剧对比。

《彩云追月》以广东音乐风格为基调,整体节奏感悠扬、婉转且富有抒情性,具有浓厚的民族特点。王建中先生将传统音乐元素保留下来,并融入了西方探戈节奏(如谱例2第38—39小节左手部分),使《彩云追月》在旋律和声、曲式、音色上均实现了创新突破,体现出钢琴改编曲目特有的民族色彩与中西融合的文化内涵。

收稿日期:2025-09-05

作者简介:刘玥(1993—),女,河南郑州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音乐舞蹈学院助教,研究方向:钢琴演奏。

Moderato Chiaramente

谱例 2:

表 1 乐曲结构布局

段落	小节范围	调性布局	主题特征
引子	1—9	A 宫	散板节奏,模仿箫声的空灵
呈示段	10—21	A 宫→E 徵	主题 A:五声音阶级进
中段	22—37	#F 羽	主题 B:跳跃音型与复调
再现段	38—57	A 宫	主题 A 变奏,织体加厚
尾声	58—71	A 宫	引子材料再现,渐弱收束

(二) 曲式结构与主题发展

全曲为带引子与尾声的三部性结构(见表 1):

主题 A 与主题 B 动机对比详见谱例 3:

谱例 3:

主题A动机

主题B动机

主题 A 与主题 B 的动机对比:

主题 A 动机(10—13 小节)以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为基础,采用“上行模进”的展开手法,首句以徵音为起点,通过级进与跳进结合形成波浪状旋律线,具有江南丝竹的婉转特质。第二句通过装饰音(如波音)模仿笛子的音色,形成“问—答”式对话结构,体现民族音乐的“留白”美学。

核心动机:以“徵—羽—宫”三音组为骨架,辅以四度跳进(如宫—徵)强化调性归属感。

主题 B 动机在 22—25 小节中出现,虽延续五声调式,但通过节奏压缩与音程扩张实现动机变异,与主题 A 形成鲜明对比。主题 B 的旋律线条更加跳跃,节奏感更强,且音乐情绪更为活泼明快。与主题 A 的五声音阶不同,主题 B 在旋律中加入了更多的装饰音和变化音,使得音乐色彩更加丰富。此外,主

题 B 的左手伴奏部分采用了更为复杂的和声进行,增强了音乐的层次感。

从音乐风格上看,主题 A 与主题 B 虽然同属于中国民族音乐风格,但两者在音乐情绪和表现手法上存在显著差异。主题 A 以宁静、悠远的氛围为主,旋律线条流畅,节奏平稳;而主题 B 则更加活泼、明快,旋律线条跳跃,节奏感更强。王建中的改编策略既保留了原曲的岭南音乐韵味,又通过钢琴化的音响重构,为中国钢琴音乐的民族化探索提供了典范。

二、民族音乐元素的钢琴化呈现

(一) 音响意象的跨媒介转译

音色模拟:

高音区颤音模仿竹笛泛音(如谱例 4:第 15—18 小节);

谱例 4:



左手持续低音模仿扬琴的音色;

节奏隐喻:

切分节奏象征“云月追逐”的动态(如第 23—24 小节附点节奏与切分节奏交替,如谱例 5);谱例 5:



散板引子构建“夜月朦胧”的意境空间。

(二) 五声调式的现代拓展

通过“调式交替”与“非三度叠置和弦”打破传统和声框架:

纵向结构:在 A 宫调式中嵌入 B 羽调式和弦(谱例 6:第 28—29 小节),形成色彩性碰撞;

谱例 6:



横向进行:主题发展采用“鱼咬尾”式衔接,保留广东音乐的即兴特征。

三、《彩云追月》技法分析

(一) 作品整体分析

钢琴曲《彩云追月》全曲再现单三部曲式, A 调、4/4 拍,中板。在钢琴弹奏过程中,演奏者需注重指法编排,进而呈现出不同音乐演奏效果。其中,第 1—9 小节为引子,在演奏过程中,应体现节奏鲜明、旋律流畅、音色清澈的特点。

在 p(弱音记号)的范围内,体现出曲目的连贯性,呈现出欢快的演奏特点;在钢琴弹奏指法上,采用左手 54321,右手 12345 的按键顺序弹奏,保障音

准和流畅性;在民族音乐特色呈现下,体现五声音阶的阶梯式特点,使其音色更为清澈、干净。同时,以颤音作为引曲主题,呈现出民族音乐节奏平缓、旋律流畅的意境之美。中段绚丽、恢宏的色彩,给人以陶醉、神往的艺术享受,使听众在神往、流动的音乐中,将丰富的和声旋律体现得淋漓尽致,使音乐更加唯美、轻盈。音乐主题部分采用八度旋律和弦构成,增添了乐曲的动感性。在伴奏部分五连音的琵琶基础上,加上柱式和弦演奏技艺,使《彩云追月》增添了节奏的动力性,将整首曲子推向高潮。另外,曲子尾声和引子相得益彰,通过力度、速度的递减,使其流动性和悠扬性特征呈现出来,为音乐艺术发展提供

充足空间。

(二)演奏技巧的系统化解析

1. 触键技术与音色控制

意象化触键:

“云”主题:指尖轻触键面 1/3 处,利用手腕平移产生缥缈音色;

“月”主题:指腹深触键,配合前臂重量传递明亮质感;

装饰音处理:

颤音(tr)以慢起渐快方式演奏,模仿古筝“吟揉”效果(如谱例 7 第 2 小节);

谱例 7:



在探戈节奏和五声音阶的修饰下,整首作品突出了颤音的表现力。在颤音演奏中,应注重指尖力度,将按键音的旋律密集度呈现出来,进而提升演奏的精确性。

通过右手旋律演奏颤音和五连音节奏,体现出演奏力度的变化特征,将月亮在云彩中穿梭的意境呈现出来,进而体现出节奏处理的流畅性,体现音乐

的艺术魅力。

波音(mordent):《彩云追月》中,很多乐段应把控演奏力度,且呈现表演风格,使其兼具柔和性与悠扬性,让人们可以跟随音乐意境感受云端的柔软,给人一种朦胧、温柔的感觉。同时,在演奏段应体现其音色控制的清晰特点,使其呈现天空意境之美,彰显《彩云追月》的旋律柔和、节奏舒缓的特点。(见谱例 8)

谱例 8:



滑音(glissando)采用半踏板辅助,避免音响断裂。

八度处理:演奏《彩云追月》时需保持精准性和流畅性,确保节奏稳定、力度均匀与旋律连贯。小拇指和大拇指在触键的过程中,应控制力度“恰到好处”,要保证手腕比手掌稍低一些。当演奏速度提升时,应挥动手腕和肘部,将云层的强度和追月的场景展现出来。

2. 踏板的动态分层

基础层:延音踏板以 1/2 深度保持和声底色;

色彩层:弱音踏板局部介入,塑造“月色穿透云层”的明暗对比(见谱例 9:第 40—43 小节);

谱例 9:



结构层:乐段转换时彻底更换踏板,确保声音清晰度。

在《彩云追月》主题部分演奏中,其情绪较为激烈,声音力度需相对增强,且要统一音量和音色,在三个旋律中体现其相同特征。比如:左手探戈节奏的强烈力度与右手旋律的灵动线条形成对比,体现出《彩云追月》的整体旋律特征。在间奏部分,通过曲谱中表情符号的差异,使其在强弱对比,力度不一的艺术情境中,呈现出主题音乐的艺术魅力,精准传递主题内涵。主

题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存在差异,其接触力度也都集中在指尖,当肘部打开后需精准完成琶音、穿指、跨指的演奏保证钢琴曲《彩云追月》主题重复、力度加强,使整个作品高潮、低谷相得益彰,触键之间强弱有序、高低错落,呈现出音色处理的艺术价值。另外,在音色处理过程中,演奏者向听众传递作品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使听众在欣赏钢琴曲《彩云追月》中,能够被其中变化莫测、形式多样的意境内涵所吸引,通过艺术欣赏过程感受“彩云是如何追月”的,让人们在西方乐器

的演奏下,体悟东方美学特性,感受《彩云追月》的民族色彩和音乐文化。

钢琴曲《彩云追月》调式繁简得当,在钢琴上选择了我国五声调式体系,突出中国乐器的音色特点,使节奏上张弛有度,突出各种音乐的个性特点,使作品的整体意境得以完整呈现。钢琴曲《彩云追月》的旋律简单纯粹、线条流畅典雅,抒发了浓厚的音乐情感和文化内涵,汇集了民族色彩和民族韵味,深受民众喜爱。《彩云追月》作为民族钢琴曲发展的先驱性、代表性曲目,受到我国音乐人的一致推崇,为后续钢琴曲广泛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同时,在钢琴演奏过程中,注重各个声部之间的融合性,使线性音乐价值呈现出来,进而使创作手法和技术手段融为一体,彰显音乐的意境和魅力,使作品结构更为紧密。在钢琴独奏曲《彩云追月》中,更加注重用钢琴丰富的音色去模仿不同的民族乐器,表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

四、演奏实践中的难点突破

钢琴曲《彩云追月》以其独特的民族音乐语汇与钢琴化音响重构,对演奏者的技术驾驭能力和艺术感知力提出了较高要求。本章结合演奏实践,系统阐述不同难度层级的技术难点及针对性解决方案,旨在为演奏者提供科学有效的训练路径。

(2) 节奏变体训练

练习目标:解决跨指与穿指中的流畅性问题。

方法步骤:将原谱中的五连音、六连音、十五连



(3) 节奏嵌入与音乐性融合

练习目标:避免机械化跑动导致的音乐表现力缺失。

表2 技术难点分级训练

难度等级	技术类型	针对性练习方案
初级	五声音阶跑动	反向琶音练习
中级	复调声部平衡	分声部弹奏 + 渐强渐弱维度控制
高级	多踏板协同	分段录音对比 + 视觉化踏板谱例

(一) 初级难度: 五声音阶跑动

1. 技术难点解析

《彩云追月》以五声调式为核心,旋律线条多采用级进与跳进结合的波浪式音阶跑动(如主题 A 第 10—21 小节),右手需通过连贯的级进音阶表现云月交错的流动感,其难点在于音阶跨度大、指法转换频繁,演奏者需在快速跑动中保持音色的均匀与颗粒性。

2. 针对性练习方案

(1) 反向琶音基础训练

练习目标:强化手指对五声音阶音程关系的肌肉记忆。

方法步骤:以 A 宫五声音阶(A-B-C#-E-F#)为基础(如谱例 10),分别练习上行与下行的单手琶音,速度控制在 $\text{♩} = 60 - 80$ 。通过分解和弦训练强化手指独立性。练习时需注重手腕的横向移动,避免触键僵硬。

谱例 10:

音、分解和弦琶音(如谱例 11)的均匀节奏改为附点或三连音节奏,增强手指对不规则节奏的适应能力。

谱例 11:



方法步骤:

(a) 在音阶练习中随机加入装饰音(如波音、颤音),模仿民族乐器的即兴韵味。

(b) 使用“弹性节奏”处理:在乐句结尾处稍作渐慢(rit.),模拟广东音乐的“气口”呼吸感。

(二) 中级难度: 复调声部平衡

1. 技术难点解析

中段(第 22—37 小节)的复调织体要求左右手

声部在动态对比中保持线条清晰。右手主题 B(可参见谱例 3) 的跳跃音型与左手连绵不断的琶音旋律,以及左手演奏旋律声部时,右手繁复地分解和弦琶音背景若声部平衡不当,会导致声部混杂。

2. 针对性练习方案

(1) 分声部独立强化训练

练习目标:确保各声部旋律线条的完整性。

方法步骤:

(a) 单独练习右手主题 B 突出装饰音的颗粒感与节奏重音。

(b) 左手探戈伴奏部分采用“断奏强化练习”:以半拍为单位重复弹奏和弦,强调节奏重音与弱拍的虚实对比;单独练习左手琶音,强调低音线条的连贯性。

(c) 双手合练时,采用“动态分层法”——右手以 *mf* 力度演奏,左手以 *p* 力度衬托,通过渐强渐弱的力度维度模拟声部对话。反之亦然,当左手处于旋律

位置时,以 *mf* 力度演奏,右手以 *p* 力度衬托,跟随音乐起伏,通过 *pp*→*mp*→*mf*→*f* 的力度变化加强手指控制。

(三) 高级难度:多踏板协同

1. 技术难点解析

全曲尾声(第 58—71 小节)需同时运用延音踏板、弱音踏板以营造“月色渐隐”的明暗对比。踏板切换不当易导致和声浑浊或音响断裂。

2. 针对性练习方案

(1) 分段录音对比

将尾声分为 4 个小段落(每段 4 小节),分别录制踏板使用效果,通过听觉对比优化踏板切换时机。

(2) 视觉化踏板图谱

绘制踏板踩放时间轴(如谱例 12)将抽象听觉转化为视觉信号。红色标记表示延音踏板踩下,蓝色标记表示弱音踏板介入。

谱例 12:



速切换,确保高音区泛音清晰。

谱例 13:



音阶跑动,声部平衡与踏板协同融为一体,通过力度从 *pp* 到 *f* 的渐强推进展现“云月相逐”的动态张力。

谱例 14:

(四) 综合训练与艺术表达

技术练习需最终服务于音乐表现。以第 50—55 小节的高潮段落为例(谱例 14)演奏者需将五声



技术难点的攻克并非机械重复的结果,还需要演奏者在技术精准与意境营造间取得平衡。本章通过分级拆解技术难点,提出了兼具系统性与实操性的解决方案,从反向琶音的基础训练到多踏板的协同控制。期待这些策略能为演奏者提供有效参考。

《彩云追月》有众多版本,无论是歌曲、民族管弦乐,还是钢琴独奏曲,每个版本都有与众不同的魅力。王建中改编的钢琴独奏版可以说是经典之作,既很好地保留了广东音乐的特色,又发挥了钢琴这件乐器的优势,将高音区轻盈剔透的音色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们的脑海中自然浮现出圆月在云间穿梭的美好场景。

结语

《彩云追月》的成功改编证明,民族音乐元素的钢琴化重构需兼顾文化基因与乐器特性。对此,演奏者需以“文化阐释者”的视角,通过技术解构与意境再造实现艺术升华。本文提出的演奏策略与教学方法,可为同类作品研究提供参照。在《彩云追月》

的演奏中,听众能够清晰感受到传统文化元素。音乐专业演奏者在音乐艺术上须具备创新和挑战的意识和能力,既让中国音乐被更多人熟知,也促进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 [1] 王建中.《王建中钢琴作品集》[M]. 上海音乐出版社, 1995.
- [2] 武丽娜. 钢琴曲《彩云追月》的音乐分析[J]. 北方音乐, 2015(1):45-48.
- [3] 吴书凡. 浅析钢琴曲《彩云追月》的作品分析[J]. 明日风尚, 2018(14):291.
- [4] 曹源. 钢琴曲《彩云追月》的艺术特征及演奏技巧分析[J]. 大众文艺, 2023(7):102-104.
- [5] 李明远. 中国钢琴音乐文化传播研究[M].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20.

(责任编辑 林川)

Colorful Clouds Chasing the Moon: Research on Creative Features and Performance Interpretation

—A Piano Reconstruction Based on Ethnic Musical Elements

LIU Yue

(School of Music and Dance,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00, China)

Abstract: As an exemplary work integrating Chinese and Western musical cultures, the piano piece *Colorful Clouds Chasing the Moon* hold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nationalization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iano music. This study focuses on Wang Jianzhong's adaptation of *Colorful Clouds Chasing the Moon*, and analyzes its incorpo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al elements and technical challenges. By examining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adaptation rationale, the research dissects the compositional techniques through modal retention, textural reconfiguration, and structural expansion, exploring pathways to fuse the pentatonic scale with modern harmonic frameworks. Combining performance practices, a graded training protocol is proposed to address technical bottlenecks. The piano-oriented reconstruction of *Colorful Clouds Chasing the Moon* not only preserves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musical aesthetics but also expands pianistic expressiveness, offering a significant paradigm for the nationalization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iano music.

Key words: *Colorful Clouds Chasing the Moon*; piano adaptation; ethnic music

思政课教师践行立德树人思想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

谭笑风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郑州 450044)

摘要:立德树人思想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华,深刻彰显了思政课育人的理论价值、实践价值与时代价值。思政课教师要坚守“六要”中“政治要强”的根本素养,深刻认识到立德树人本领的锤炼是一个全面系统的过程,秉持久久为功、笃行不怠的理念,持续将学习思考与理论研究、教学改革紧密结合。从实践维度来看,思政课教师要以立德树人为核心目标,强化“以生为本”与“大思政课”理念,锤炼过硬素质,创新并拓展育人路径,通过多主体协同协作,推动立德树人价值更好落地见效。

关键词:立德树人;思政课教师;核心要义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6.014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6-0091-05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2月全国高校党建工作会议上强调:“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要坚持立德树人,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强化思想引领,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1]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高度,对“要办成什么样的大学、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为谁培养人才、怎么样培养人才”等一系列问题作出了阐释说明,确立了思政课“立德树人”的价值目标,为高等教育指明了办学方向,为思政课教师指明了教育方向。2024年5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学校思政课建设推进会上进一步作出重要指示,“新时代新征程上,思政课建设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必须有新气象新作为”,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2]。在新时代,从“立德树人”教育思想的价值维度出发,如何深度审视高校思政课教师视角下的“立德树人”思想,进一步推动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落地落实,需要深思。

一、立德树人教育思想的理论渊源及主要内涵

(一)立德树人教育思想的理论渊源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角看,“立德”“树人”两个概念在先秦时期初步形成,儒家学说始终将“德行”置于首位。《大学》提出的“三纲领”和“八条目”,阐述了个人德行养成的重要性,明确了个体德行养成与成才的关系,其价值内核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通。此后,两汉时期的“三纲五常”、宋明理学、中国传统文化近代转型中的先进思想等,也为立德树人思想的生成奠定了价值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人的全面充分发展,提出教育是使人得到全面发展的唯一方法,揭示了个体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并主张“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3],为当代中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立德树人思想提供了重要启示与指导。

(二)立德树人教育思想的主要内涵

“立德”“树人”两个词汇最早以独立形式出现

收稿日期:2025-10-20

基金项目:2024年度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思政专项)“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优化路径研究”(ZGJG202460B)

作者简介:谭笑风(1972—),男,河南永城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副校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于我国先秦时期。《左传》中提及“立德”，描述了人生的“三不朽”境界^[4]；《管子·权修》中提及“树人”，指明了人才培养是一项艰巨的长期任务^[5]。在时代更迭中，“立德”和“树人”逐渐结合成为一个完整的新词汇，被应用于教育理论领域与实践领域。2000年起，“立德树人”便以整体性新名词的形象进入人们视野。2006年8月29日，胡锦涛同志强调，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6]。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指出“育人的根本在立德”，特别强调“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7]。对于培养什么样的人，总书记强调，“育新人，就是要坚持立德树人、以文化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8]。

二、立德树人教育思想的价值意蕴

（一）理论价值

第一，有利于进一步充盈、完善新时代高质量、高素质人才培养的理论体系。人才培养是教育事业发展中核心、最根本的问题，也是对我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性问题的深入思考。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共同遵循，既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明确解答，又通过引导和推动各学校持续转变、优化人才培养目标、理念、模式与方法，助力形成更为系统完善的人才培养理论体系。

第二，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德育理念与教育思想。我国的道德教育始终顺应不同时期的国情及社会发展需求作出调整，明确相应的目标、内容与方式方法。新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教育事业现状，结合历年教育事业经验，从德育工作的目标、方法、价值意蕴及内容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与论述，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立德树人以培育德才兼备的人才为核心，相较于以往的思想论述具有创新性与进步性，是经进一步深化、升华后的教育思想，能够有效创新并充实德育理论。

第三，有助于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马克思倡导人的个性自由而充分地

发展。立德树人思想正是基于这一理论产生，在原有理论上实现了创新与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注入了新鲜的发展活力，赋予其丰富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二）实践价值

首先，立德树人教育思想能够进一步深化并推动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创新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北大师生座谈会上提出，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9]。该思想明确了立德树人在教育事业中的根本地位。立德树人是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方向指引，为我国教育改革工作提供了新思路，促使教育工作者在实践中深入思考教材改革、课程改革、评价改革等一系列关键问题，进而让具体改革工作契合新时代教育变革要求，办出人民真正满意、放心的教育。

其次，立德树人教育思想可以促进中国教育高质量发展。新时代背景下，人民对教育发展的标准与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国将立德树人提升至国家战略地位，这能够有力回应“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教育根本问题。在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教育思想的过程中，需推动教育内涵发展与质量提升，满足人们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培育出兼具崇高品质与知识技能的高素质人才，为国家和社会建设注入力量。

最后，立德树人教育思想有助于促进青少年学生的人格完善与道德品质提升。立德树人明确指出教育工作要以人为核心，阐明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发展人、完善人的道德。这一思想能让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更清晰地认识到教育过程和人才培养过程中德行培养的重要意义，进而推动教育者自觉肩负起铸魂育人的责任，引导学生在正确思想引领下沿着正确方向成长，不断提升青少年的个体综合素质。

（三）时代价值

一方面，立德树人思想能提升国家人才储备质量。人才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立德树人强调德育为先，破除了原先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等“顽疾”。它注重学生科学文化、心理、身体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从多维度推进人才建设，为我国培育更多高素质创新型、复合型人才提供支撑，进而增强我国高科技竞争力。另一方面，结合中国传统德育在培育个人品德、改善家庭教育、优化社会风气等方面的重要价值，这对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均具有重要意义。

三、思政课教师把握立德树人思想价值维度的理论向度及基本原则

(一)思政课教师要坚持“六要”中“政治要强”的根本素养

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对思政课教师提出了“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7]的“六要”嘱托。在这六项素养要求中,政治素养被作为首要核心素养予以强调。无论治党治军还是办学治校,思想政治建设都是首要任务,是党的基础性建设,必须常抓不懈。

高校思政课教师应对自身核心素养要求保持清醒认识,尤其要筑牢政治根基。检验思政课教师的政治标尺,首先看政治信仰是否坚定,关键看是否坚定“四个自信”、捍卫“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意识形态问题以及学生的各类疑问,能否作出坚定有力、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答疑解惑,而非相反;其次看观察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否正确,即能否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思考问题、推进教学,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培育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根本要求是真学真信、学懂弄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深刻把握人类社会规律、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成逻辑与演变规律。

(二)思政课教师提高立德树人本领锤炼是一个全面系统的过程

课程体系设置以哲学、逻辑学等课程的逻辑思维训练为先导,以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的教育教学理论培养为基础,以“四史”系列课程学习为核心——通过“四史”学习深化对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改革开放、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成逻辑和发展规律的认识;通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等课程强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知;同时涵盖经济理论、文化素养、国际政治等方面的根本性、原生性、内在性理论认识与把握,确保思想政治教育人才培养形成闭环。

这些课程设置仅为思政课教师的基础性能力培养。一名优秀的思政课教师,不仅需要接受严谨、全面、系统的专业课程训练,还需在某一领域开展专门性研究。具体来看,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等方面;中国共产党研究应包括中共党史、党的建设等方面;近现代中国史研究应包括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

究、当代中国史研究等方面;此外还涉及思想政治教育、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领域。诸多课程与研究方向共同构成培养合格思政课教师的“四梁八柱”,再辅以某一专业方向的深耕,让思政课教师培养更具定力和底气。

(三)思政课教师要坚持久久为功、笃行不怠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读书学习的重要性,并分享了自己的学习感悟,强调“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尖锐指出领导干部要改变“追求享乐、玩物丧志,不好读书;热衷应酬、忙于事务,不勤读书;浅尝辄止、不求甚解,不善读书;学而不思、知行不一,学用脱节”^[10]的现象。这种现象和问题在思政课教师身上也有所体现,总书记的要求与激励同样适用于思政课教师培养。

对于思政课教师而言,读书学习面临着“学什么、怎么学”的问题。关于学习,可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立足教材本身学。要讲好自身承担的教学任务,既要深入、全面研读所授课程的最新版本,又要前后联系对照前一版本,在相互对应中研读差异,思考内容变化的源流逻辑及核心要义;既要立足本门课程学习,又要跳出单门课程,关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下简称“马工程”)相关教材,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道德与法治》以及《形势与政策》等,形成交叉融合、相互促进的关系。学《原理》之思,明《纲要》之史,正《概论》之道,行《德法》之实,实现哲理、学理、道理三者融会贯通,助力大学生形成思想政治体系的整体性构建、系统性认知、问题性探索与扎实性实践。

二是回归经典著作学。马列经典著作是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源头活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中国革命、建设事业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往开来、不断取得胜利的科学指南。思政课教师要深刻认知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建构中国事业发展的内在逻辑,形成自身的认识体系和教育体系,在为大学生答疑解惑时,真正从哲理、道理、学理上讲清楚,做到由内而外的真懂、真信、真用。

三是结合党政大政方针学。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大政方针政策是思政课教师的重要任务之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就是要确保大学生群体与党中央同心同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形成合力,进而在未来工作岗位上担负起重要的历史使

命。这就要求思政课教师及时、全面、准确地学习领会党的大政方针政策,把握其中蕴含的核心要义,并以“润物无声、如盐入水”的方式融入思政课堂,贯穿于思政课教学全过程。

(四)思政课教师要不断把学习思考与理论研究和教学改革紧密结合起来

数智技术具有极强穿透力,能与诸多专业、多门课程形成合力、实现共振,但如何将其与思政课程深度融合,同时引入 OBE 理念,开辟教法、学法、评价新范式的新时代,是一项难题,更是加强思政课教学改革、提升思政课教育教学效能的应有之义。教育部副部长吴岩在谈及教学改革时指出:“教学改革改到深处是课程、改到痛处是教师、改到实处是教材。”^[11]对于思政课而言,课程设置、教材使用均由中央统一规定,思政课教师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好相关要求,备好课、上好课。而要做好这一点,就需要思政课教师在教育理念、教育方法上做文章、下功夫。这既是教学中的痛点、难点,也是上好思政课的关键所在。思政课的理论与教学研究,对于提高思政课教学质量、增强思政课育人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不仅能为思政课提供重要理论支撑,还能不断丰富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更能从理论视角解读思政课相关热点问题的产生原因及应对策略,提升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思政课教师把握好“立德树人”思想价值的实践向度

(一)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目标及理念引领

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强化“立德树人”的目标理念。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将学生全面发展与高质量人才培养作为落脚点,把大学生培养成“完整的人”。第二,树立“以生为本”的过程理念。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将学生置于核心位置,切实了解学生的道德需要、健康需要、知识需要与审美需要,从学生具体情况和发展现状出发,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挖掘学生内在潜力,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助力学生成长成才。第三,形成“大思政课”的建设理念。“办好思政课关键在教师”,高校教师应将“大思政课”建设理念入脑入心,以现实社会生活为素材开展思政教育活动,达成思政课“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12]

(二)以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为重要支撑

首先,要加强对思政课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师德师风建设,提升其思想政治素质。高校应定期组织专题培训活动,向教师传递正确价值观,明确职

业道德规范要求,强化教师师德师风,提高其德育能力与道德修养,打造一支又红又专的高质量教师队伍。其次,教师是与学生接触交往较为频繁的主体,其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学生的思想行为。因此,教师个体要秉持终身学习理念,持续自我反思、自我学习、自我提升。^[13]高校教师要在“六要”指引下,树立正确的政治观、价值观,坚定理想信念,同时要广泛涉猎多学科、多领域知识,夯实知识储备、完善知识体系,培养自身大局意识、全球视野及人文情怀。最后,学校要建立健全教师评价、监督与反馈机制,既要以严格的态度和规范的手段加强教师管理,又要给予教师相应的人文关怀和福利激励,做到刚柔并济,推动教师队伍良性发展。

(三)以创新及拓展育人路径为重要手段

一是结合思政教学材料与课程内容,选取当下热门议题、国内外重大事件作为讨论主题,通过组织学生围绕议题展开辨析、讨论、撰写论文等方式,辅以教师的适当引导,拓展思政课堂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式。二是向学生推介、分享相关政治理论读物,如党的会议报告、政府工作报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等,同时在教学实践中,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拓宽学生政治视野,增长学生见识。三是开展学科知识竞赛,如“传统文化知识竞赛”“国情知识竞赛”“时事政治知识竞赛”等,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提升立德树人的教学实效性。四是组织学生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遗址、纪念馆、博物馆等场所,让学生近距离感悟革命先辈的优秀品质与爱国情怀,推动学生学习并传承其精神内核。五是紧跟时代脉搏,运用虚拟现实(VR)、人工智能(AI)等新技术,打造沉浸式学习环境,让学生身临其境地体验思政课内容,更深刻地理解和掌握党史、国史相关知识。

(四)以多主体协作育人为重要支撑点

首先,高校思政教师可与其他课程教师、教育工作者开展合作,及时了解学生思想变化与心理动向,开展针对性强的思政教育工作。例如,思政课教师可加强与辅导员、学生处、团委及其他课程思政教师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感知学生心理发展态势,掌握学生心理需求,进而在思政课中给予针对性帮助。通过教师间的紧密协作,进一步拓展思想政治教育 with 立德树人的实施空间,凝聚立德树人合力。其次,思政教师可加强与家长的合作。通过与家长沟通交流,溯源学生性格、心理的形成背景,更深入地把握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从而对症下药,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同时给予学生充分的尊重与关心,促进学

生身心健康发展。最后,高校可与政府、企业携手合作,共同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学校、社会企业及组织机构可就德育形成共识,将学生道德教育置于首位并贯穿教育全过程,通过组织协同集结各方力量,整合形成德育合力,创设立德树人教育新格局,在德育育人资源、载体、内容上实现全方位贯通与升级。

五、结语

立德树人思想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华,深刻彰显高校思政课的育人目标。高校思政课是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更是实现立德树人目标的重要路径。思政课教师作为立德树人的关键主体,要自觉扛起立德树人使命,明确立德树人本领的锤炼是一个全面系统的过程。教师需坚守“六要”中“政治要强”这一根本素养要求,在久久为功、笃行不怠的理念指引下,将学习思考与理论研究、教学改革紧密结合,以身作则,通过持续提升自身思政素养与教学能力,提高思政教育质量水平,让立德树人理念真正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坚持立德树人思想引领加强改进高校党建工作[N]. 人民日报,2014-12-30.

[2] 习近平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EB/OL]. 新华网,(2024-05-12)[2025-09-26]. <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40511/b174a400101947d09>

cafc09aba2a9e9c/c. html.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9.

[4]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18:939.

[5] 耿振东. 管子译注[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22.

[6] 胡锦涛. 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努力办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N]. 光明日报,2006-08-31(1).

[7] 习近平.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J]. 求是,2020(17).

[8]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N]. 人民日报,2018-08-23(1).

[9]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考察时强调抓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根本任务 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N]. 人民日报,2018-05-03.

[10] 习近平. 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N], 学习时报,2009-05-18.

[11] 李一陵. 用一流教材培养一流人才[EB/OL]. 人民网,(2023-12-12)[2025-09-30]. <http://opinion.people.com.cn/BIG5/n1/2023/1212/c223228-40136969.html>.

[12] 杨晓慧.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建设的主要成就、重要经验和创新向度[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4(3): 4-10.

[13] 路丙辉. 养课:思政课教师提高教学实效性必须练就的功夫[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4(3): 19-29.

(责任编辑 许峻)

The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for Teacher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Implementing the Principle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TAN Xiaofeng

(School of Marxism,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e principle of establish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on people draws on the best elements of both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Marxist theory, profoundly demonstrating th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practical value, and contemporary releva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achers who instruct relevant courses must possess “strong political conviction”, a fundamental quality of the “six requirements”, fully understand that improving the ability to implement moral education and talent cultivation is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process that needs long-term efforts, and constantly integrate learning and thinking with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teaching reform. From a practical perspect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eachers should take moral education and talent cultivation as their goal, strengthen the concepts of “student-centered” and “Gre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and cultivate strong personal qualities, so as to innovate and expand educational paths, and promote better realization of the value of moral education and talent cultivation through multi-subject collaboration.

Key words: the Principle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teacher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core implications

基于“四全培育”框架的高校教师协同育人 能力提升整合路径研究

罗亚莉

(西南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401120)

摘要:高校教师“全周期、全方位、全类型、全手段”四全整合培育,是新时代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对师资力量的内在需求。全周期培育构建“新手教师—熟手教师—专家型教师”协同能力全链条培育体系,纵向筑牢教师育人根基。全方位培育聚焦“双读懂+双特色”的协同育人能力双元建构,横向拓展教师育人能力提升维度。全类型培育强调在集体备课、观摩研讨、教研融合中,增强高校教师协同育人凝聚力、教学实践力及教研成果转化力,赋能教师多维成长。全手段培育从国家—地方—学校层面整合“线上+线下”培育路径,推动教师课程育人理论—实践—评价的“融合+创新”,搭建教师育人能力培育的立体架构,全面提升高校教师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实效。

关键词:全周期;全方位;全类型;全手段;协同育人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6.015

中图分类号:G64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6-0096-06

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时代语境下,需将高校教师课程育人意识与能力提升作为核心目标,搭建“全周期、全方位、全类型、全手段”深度整合的四全培育路径体系。以强化教师协同育人能力为导向,通过系统性规划与实施,有力推动高校教师在课程育人领域的专业成长与能力进阶。

这一体系中,全周期培育依据教师从新手到专家的职业发展轨迹,纵向全程筑牢教师协同育人能力的成长根基。全方位培育围绕“双读懂+双特色”,横向拓宽教师育人视野与能力维度,与全周期培育纵横交错,拓宽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能力的发展空间。全类型培育以集体备课、观摩研讨等形式为载体,从凝聚力、教学实践力、成果转化力三方面发力,深挖课程育人潜能,推动教师多元发展。全方位培育整合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资源,打

通理论、实践、评价等关键环节,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模式,搭建立体化培育架构。四全培育层层递进、相辅相成,精准回应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对教师课程育人能力与水平的内在需求,通过多层面系统化培育措施,有效促进课程育人质量的整体提升。

一、全周期培育:高校教师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能力的长效培养

全周期培育即坚持系统思维,关照高校教师职业发展全过程,将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价值理念及教学能力素质要求,贯穿于高校教师职业成长发展的分层分类培训规划中,形成可持续的教师培训长效体系。“教师的成长发展贯穿教师整个职业生涯,这一发展过程并不是时间上的简单延续,而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1]。一名教

收稿日期:2025-10-11

基金项目:教育部2024年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基于胜任力模型的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素质能力提升研究”(24JDSZK081);重庆市教委2023年度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项目“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衔接机制构建研究”(23SKJD022);重庆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4年度一般规划项目“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思政课教师岗位胜任力模型建构及应用研究”(K24YG2030131)。

作者简介:罗亚莉(1975—),女,重庆人,博士,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师从初入职场、适应教师岗位要求,到发展为熟手教师、再成长为专家型教师,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体系化的系统培训和持续的实践经验总结。这就要求“根据教师在不同成长阶段、不同发展层次呈现出的不同特点和不同需求,精准施策,‘靶向’培养,将分散化、零碎化的培养举措整合集成、协同发力”^[2],构建“新手教师——熟手教师——专家型教师”全链条培育体系,遵循教师职业发展路径持续提升其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能力。

(一)筑牢新手教师协同育人能力根基

聚焦课堂教学实践全流程,构建“协同备课——说课诊断——课堂观察——比较反思”的系统性培训模式,推动新手教师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能力的专业化转化。备课环节,建立双主体协同备课机制,组织经验丰富的老教师与新手教师共同研讨,剖析教材内容,从专业知识的逻辑架构出发,探寻与思政元素的契合点,避免育人元素的机械堆砌。说课环节,新手教师阐释教学思路,老教师从专业知识讲授的准确性、思政元素融入的合理性、教学方法的有效性等多维度给予点评与建议,优化教学设计方案。课堂教学中,搭建双师协同育人场域,资深教师全程参与,从专业角度审视课堂教学,及时交流反馈并指导调整教学方案,让新手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强化职业价值感。比较反思层面,组织新手教师走进其他优秀教师课堂,为其提供学习他人、反思自身的成长契机。

通过这种全程陪伴与精准帮扶,以及专家、同伴之间的深度互动,将孤立的 Teaching 行为串联为系统化的协同育人能力培养链,帮助新手教师在知识点传授中有意识地融入价值观教育,初步树立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意识,解决从教初期的适应性问题,奠定新手教师站稳红色讲台的坚实基础。

(二)推动熟手教师协同育人能力进阶

一方面,突破固化思维,拓展课程育人结构化认知。熟手教师在积累一定教学经验后,往往会形成相对稳定的教学模式,但固化的“知识传授者”角色易使其陷入惯性思维,导致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停留于表层融合。这种表层困境的本质,是育人逻辑的认知偏差——将专业知识与思政教育割裂为“先讲知识、后补情怀”的两段式结构,这种机械叠加难以触发学生的价值共鸣。突破这一瓶颈的关键,在于通过系统性培训升华其育人认知框架:建立全课程育人视角,重新定位课程思政的育人逻辑,理清“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的内在逻辑链;主动整合跨学科资源,强化教学设计的

结构化思维,实现专业教育与价值引领的深度耦合,推动熟手教师协同育人能力升级。

另一方面,传帮带新,传承教育智慧以促进专业成长。传帮带职业新人是熟手教师的重要职责,凭借多年教学经验,熟手教师在指导新手教师的过程中,能深化对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理念及方法的理解。在此过程中,熟手教师不仅助力新手教师快速成长,自身也会持续反思教学行为,其协同育人能力在传承与交流中不断提升——从个人的育人实践,拓展到引领新教师共同成长,既壮大了协同育人队伍,也为自身专业发展注入动力。

(三)驱动专家型教师迈向协同育人新高度

专家型教师是骨干教师进一步成长的进阶方向,是“具有高尚精神境界、高超教育教学能力、卓越研究创新能力的引领示范者”^[3]。从协同育人视角来看,专家型教师应具备教学、育人与科研复合能力,在课程建设、学术研究、团队协作及人才培养领域造诣深厚,通过创新实践与经验共享发挥多维度示范引领作用。为助力骨干教师成长为专家型教师,需持续开展针对性培训:围绕优秀教师成长路径,开展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教学创意设计、教法改革等理论解读与互动研讨,坚持教研并行,提升骨干教师协同育人综合能力,推动其成长为专家型教师,引领红色讲台建设。

从骨干教师到专家型教师的蜕变,本质上是从“教学实践者”向“教育思想家”的跨越,需通过“理论——实践——反思”进阶培训实现:在理论研修中深化课程协同育人认知,构建学科知识与价值目标的融合逻辑;在实践创新中依托跨学科教研共同体创新育人模式,推动教学从知识传递向价值浸润升级;在反思优化中总结提炼教学经验、形成育人理论,开发具有学科特色的课程协同育人实施策略。以此突破经验局限,以创新性协同育人范式回应育人实践需求,成长为兼具课程设计创新力与学科思政研究力的专家型教师。同时,需创设良好的教师育人能力协同发展生态,以名师工作室、教研共同体等为载体,发挥专家型教师的带动作用,放大优秀经验的辐射效应,凝聚协同育人引领力,带领更多教师共同成长。

二、全方位培育:高校教师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能力的二元建构

全方位培育即围绕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助力高校教师精准解读课程教材、精准把握学生思想动态,结合学校及区域发展实际构建特色育人模式,促进教师协同育人能力全面提升。因此,需

结合思政课教师与专业课教师在协同育人中存在的问题和短板,一方面紧贴课程教育教学需求,坚持问题导向,科学制定培训方案,帮助教师读透教材、读懂学生,增强课程吸引力;另一方面结合学校特色及区域特色,提升教师对思政元素的挖掘、梳理与融入意识和能力,形成“双读懂+双特色”的课程育人能力双元建构格局。

(一)建设“读懂教材+读懂学生”的协同能力培育

在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方面,通过系统培训,一方面提升教师读懂教材的能力:读懂教材整体结构的搭建思路,理清教材编写的价值逻辑,领会课程的学理基础,理解教材的核心概念,把握教材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及知识背后潜藏的价值要素。“只有吃透理论、啃透教材、讲透内容,不断深化对教学内容的逻辑起点、逻辑层次、逻辑联系、实质核心的认识”^[4],才能帮助学生抓住事物的根本。同时,需培养教师敏锐的政治素养,引导其时时关注国内外政治动态,全面学习、深刻领会党中央最新会议精神,将其有效融入教材相关知识点,及时向学生传递正确的政治信息,解决好教学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统一的问题。另一方面提升教师读懂学生的能力:准确掌握学生基本学情,是高校教师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的必修课。培训中,需教给高校教师与大学生沟通交流、收集信息的方法,通过课间交流、课堂互动、课堂小调查、课后反馈等形式,把握00后大学生作为“网生代”的认知特点、学习风格、行为习惯;了解不同年级大学生的成长需求、不同专业大学生的学习重点,知晓青年大学生的所思所想所感。唯有懂得学生、理解学生,才能贴近学生思想实际,理直气壮地传播主流意识形态,把大是大非问题讲清楚、讲透彻。

(二)基于“学校特色+区域特色”的协同能力培育

其一,基于学校特色的教师协同育人能力培育。学校特色是长期积累形成的独特校园文化,根植于学校的地域文化、历史传统或学科优势,通过校史教育、典型人物宣传、特色课程等具体方式呈现。不同高校应结合自身优势,有侧重地打造凸显学校特色的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能力培育模式,帮助教师树立与学校定位契合的教育价值观,提升协同育人能力。清华大学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教师发展中心,共同策划“课程思政1+X”系列培训活动,涵盖学校政策、院系方案及教师实践方法等内容,面向教师开展专项培训^[5]。此类专项活动

中,学校会融入独特文化进行宣讲、示范与交流,帮助教师从多视角认识和感受立德树人与教书育人的魅力,将“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育人理念贯穿始终,全方位赋能教师成长。复旦大学以“标杆带动骨干、骨干带动全体”为原则,构建校院两级课程思政分类培训指导机制,形成并推广“集中研讨提问题、集中培训提素质、集中备课提质量”的“三集三提”教师培训组织方式,充分发挥教研室、教学团队的集体智慧,彰显“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治学精神。正是学校特色的育人精神与文化氛围,激励教师在课程中融入人文关怀与学术坚守,深化育人内涵。

其二,基于区域特色的教师协同育人能力培育。立足区域发展实际,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培训体系,发挥辐射带动效应,引领高校教师持续提升育人素养与能力,推动区域内全体教师协同育人能力整体提升。例如,少数民族聚居区以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高校,可积极开展结合本民族文化的课程思政建设,挖掘开发民族文化资源,将具有民族特色的风俗习惯、思维特点、语言方式等融入课程教学,同时深入剖析中华民族在悠久历史演进中形成的精神内涵,增强民族地区大学生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认同感。红色文化资源丰富地区的高校,则着力开发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弘扬革命精神,培育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时代新人。富有区域特色的教师协同育人能力培训,应顺应协同育人对高校教师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引导教师结合不同专业课程特点,优化协同育人的思路、方法与路径。

三、全类型培育:高校教师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能力的三力赋能

全类型培育强调在经验交流、学术研讨、教学观摩、竞赛比拼等活动中打磨锤炼,引导教师充分挖掘教学内容中蕴含的育人资源,因地制宜选择适配的教学方式方法,全面提升教师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凝聚力、教学力及教研成果转化力。

(一)集体备课:多要素组合效应提升教师协同育人凝聚力

其一,集体备课助力教师构建课程纵横关联,提升知识融通能力。集体备课为教师搭建交流平台,促使其在思维碰撞中精准洞察不同课程间的内在联系,显著提升知识融通力,有力推动协同育人成效升级。一方面,通过集体备课帮助教师建立不同课程之间的横向联系:不同课程依据授课性质与定位明确授课主线,从多元视角和维度开展思政教育或思

政元素融入建设,构建系统全面、相互配合的育人体系。另一方面,通过集体备课帮助教师建立同一专业不同年级课程之间的纵向联系。“任何专业在纵向上能够充分挖掘和运用各类课程思政资源和思政元素,按照年级学段进度和人才培养过程,实施由浅至深、由点至面的课程体系设计,而不是思政内容的重复性建设、价值引领的反复性贯穿,导致出现拥堵问题、重叠问题和漫灌现象。”^[6] 思政课教师与专业课教师在集体备课中培育主体间协同性,推动不同课程教师教学合作关系建构,共同备教材、备学生、备教法,实现资源共享、经验共累、教法共创,以集体智慧克服个人备课的单一性与片面性。

其二,集体备课推动多元主体协作,凝聚教学提质合力。基于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视角,集体备课的核心功能在于发挥不同课程教师的集体智慧,通过相互学习、相互启发,形成多元备课主体的强大合力,提升课程价值塑造效果。一方面,思政课教师需在集体备课中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加强与课程教师的交流沟通,帮助他们解决思想困惑,指导他们快速掌握思想政治教育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尤其是关于政治理论素养的内容,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从而有效提升课程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素养”^[7],助力专业课教师提升提炼专业知识体系中思想价值与精神内涵的能力,推动专业课教师与思政课教师同向同行。另一方面,其他课程教师也需在集体备课中向思政课教师剖析学科专业特点,讲解学科专业发展史、知识技术变迁史,将专业课中的思政元素转化为思政课的新鲜素材;在思政课教学的学理逻辑和话语表达体系中融入专业术语与专业特质,让专业课的思想火花照亮思政课堂,助力思政课教师围绕不同专业育人目标、结合专业特色设计教学,把思政课讲出专业韵味。

(二)观摩研讨:示范模仿效应增强教师协同育人教学力

其一,观摩示范提升教师协同育人教学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推进中,始终存在思政教育融入课堂教学难的问题,这与教师课程育人积极性不足、缺乏直接感官经验而不知如何有效融入教学直接相关。通过开展跨学科示范公开课,打破学科专业壁垒,促进多学科教师深度对话与知识融通,以多维视角与学科知识交叉为切入点,营造开放共享的教学研讨与反思氛围,提升教师教学水平与能力。思政课教学中,可采用跨学科双师同堂方式开展公开示范观摩课,由思政课教师与专业课教师共授一课,在思政课中融入专业特色——如中医

专业思政课融入中医药文化、建筑专业思政课融入中华传统建筑文化等。这种结合高校学科专业特色、寓价值引领于知识传授的积极探索,能打造具有示范效应的思政金课,强化教师教学协同性。

其二,交流研讨碰撞激活教师育人新思路。“不同专业背景的教师通过公开观摩课不但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其他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和研究进展,扩充更新知识点,而且通过课后的交流可以对知识点进行多侧面多角度的讨论和串联”^[8],进而重构课程理论知识,结合学科专业挖掘课程思政要素,形成课程育人逻辑链,激活教师协同育人新想法、新思路。一方面,示范教学后的同行专家点评对观摩教师具有引导作用。可邀请教学督导、教学名师、骨干教师等担任点评专家,从政治引领、思路引航、知识引导等角度分析示范课的原生态场景,让观摩教师清晰认识到示范课教师如何在思政课中结合专业知识、在专业课中融入思政点展开教学;深入领悟思政课或专业课中“知识与价值相统一”的教学设计及如何随教学进程逐步落地,理解教学设计背后的教学理念,以积极引导激活其教学设计思路。另一方面,观摩课后的研讨交流营造了良好的教学反思氛围,进一步提升了观摩教师的现场学习能力。“良好的现场学习能力表现为专注力、捕捉力和转化力”^[9],观摩课现场及课后研讨交流均是提升教师现场学习力的重要环节。围绕示范观摩课的教学目标、重难点、逻辑思路等展开研讨,在思想碰撞中分析领悟执教者教学设计背后的理论依据、教学理念及思政要素与专业知识相结合的课堂呈现方式等。研讨交流不断强化每位参与教师的现场思考力、领悟力,提升现场学习能力,最终激活协同育人新思想。

(三)以研促教:教研并举聚力效应赋能教师教研成果转化力

其一,以研促教要求教师将“研”与“教”深度结合,推动教研融入课程育人教学活动全过程。教学研究并非独立于课堂之外的专业研究者的专属活动,而应围绕课堂教学展开。随着协同育人不断深入,新问题、新挑战持续涌现,这就需要在协同育人实践中培养教师的问题意识与实践探索意识:在课程育人教学实践中勤于思考,找准协同育人关键点,梳理困惑并将共性问题归纳提炼为系列教学研究主题,实现“在教学中思考、在思考中研究”。让教研活动成为联结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建设目标与课堂教学的桥梁。“教师只有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和解决教学问题,致力于科研能力的

培养和提高,才可能具备学者型教师的素质”^[10],进而持续审视自身教学理念与方式方法,找准教学与教研的结合点,将“研”融入教学活动全过程,通过教学研究促进教师协同育人教学的改进与创新能力提升。

其二,以研促教要求教师将“教学研究”与“成果转化”紧密结合,提升协同育人教研成果的教学转化能力。教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并实际运用于教学,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过程。教师的成果转化意识与能力、健全的评价监督体系、有效的激励机制等,均是影响成果转化的重要因素。在协同育人教学研究中,需强化教师的总结提升意识,将教学研究实践凝炼为教研成果,推动教研成果与教学实践深度融合。凡是符合教学实践要求、具有创新性、可操作性与应用性的成果,均应积极转化为教育教学资源:将协同育人中的示范性课程、典型案例等教研成果转化为课程内容、教案与讲义;还“可以转化为教育决策方案、教育思想、教育观念、课程、教材、教学软件以及教育技术和教育实践工作者的行为”^[11],全面提升教师协同育人素养与能力。

四、全手段培育:高校教师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能力的多维推进

全手段培育主张从国家——地方——学校不同层级出发,通过线上与线下多种方式的融合,探索各具特色的培育路径,实现理论——实践——评价层面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力求高校教师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培育成效达到“深度与广度的统一、速度与时效的统一,以坚定教师课程育人的立场,形成独特的育人风格”^[12]。

(一) 国家——地方——学校三级“线上+线下”全手段培育

国家层面,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发,依托全国高校思政课教研系统和网络教育宣传云平台,运用先进数字化技术,构建规模宏大的优质线上学习资源库,为高校教师提供随时可获取的海量学习素材,满足不同学科背景教师的差异化需求,发挥数字资源对教师育人能力提升的支撑作用。线下则通过大规模集中研讨班、专家讲座等形式,汇聚全国优秀教师与专家,聚焦多课程协同育人核心议题,涵盖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的融合机制、教学方法创新应用策略等关键问题,借助深度交流与思想碰撞,推动高校教师理论认知与教学实践的深度融合。

地方层面,应以国家政策为导向,结合本地实际开展高校教师培训活动。一方面,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教育云平台,整合本地优质教学实践案例,挖掘

地方文化与思政教育的融合点,帮助高校教师将区域性思政元素嵌入教学实践,增强课程的地域契合度,激发学生情感共鸣。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地缘优势,组织区域性教师培训活动,邀请本地教育专家、学科骨干等打造高效培育课堂,结合本地学校协同育人的成败案例,引导教师剖析关键因素,在思维碰撞中深化对协同育人的认知。同时,引入项目式学习,让教师分组完成从调研、策划到成果展示的全过程,在实践中掌握协同育人的方法与技巧。以多元开放理念创新培训范式,可为教师协同育人能力培训提供贴合本土、操作性强的新范本。

学校层面,各高校立足本校办学定位、学科布局、师资结构等实际,开展形式多元、层次丰富的教师协同育人能力培训。一方面,充分利用校园网络平台,构建教师专属学习社区,上传校内优秀教师的示范课视频、教学反思、教学素材等,供教师结合自身教学实践及专业需求随时学习借鉴。另一方面,结合学校特色开展周期性校内培训,探索契合本校实际的校本协同育人培训模式。以周期性校内培训为基础,可依据教学周期与教师成长规律,系统规划协同育人培育主题,将培训与学校资源、育人目标深度融合,结合不同院校特色设计培训内容,实现学校特色与育人效能的双向赋能。

(二) 理论——实践——评价三层“融合+创新”全手段培育

理论层面,通过多学科知识融合与创新性理念引入,帮助高校教师精准把握协同育人的核心内涵与理论逻辑。多学科知识的创新融合能够打破学科壁垒,使思政教育不再局限于单一理论框架,而是从多维度、多角度为教师呈现知识体系,拓宽其视野、深化其对课程育人内涵的理解,构建更具深度与广度的协同育人认知框架,全面提升教师对课程育人的理解层次。

实践层面,通过教学案例分析、课堂模拟教学、跨学科课程设计等实践形式,助力高校教师将协同育人理念及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教学能力。案例分析能让教师从过往经验中汲取养分,明确不同场景下的育人重点;课堂模拟教学为教师提供实操机会,帮助其及时优化教学方法;跨学科课程设计则促使教师突破学科界限、整合多元知识,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提升协同育人实操能力,推动思政教育融入各门课程的各个教学环节。

评价层面,建立多维度、全过程、动态化的评价体系。既从理论掌握维度考察教师对思政与专业融合的理解深度,也从教学技能维度评估教师课堂上

“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相融合”的实施水平,还从学生成长维度关注其对学生思想素养与专业能力提升的实际影响。同时,将多维评价贯穿培训前的基础能力测评、培训中的实时表现监测及培训后的长期教学跟踪,形成静态评估与动态监测相结合的评价方式。

五、结束语

全周期、全方位、全类型与全手段培育,共同构建起高校教师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能力的完整培育体系,四者紧密关联、层层递进。通过对高校教师协同育人能力进行全程化、常态化、规范化的“四全”培育,既在强化教师课程育人意识中提升协同能力,又在持续提升育人能力中深化协同意识;并在对青年学生进行价值塑造的教学实践中,固化“四全”培育成效,联结思政课教师与其他课程教师形成协同育人教师团队,增强高校教师协同育人的主动性、持续性与行动力,切实推动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迈向新高度。

参考文献:

[1] 叶颖. 不同成长阶段教师专业发展的现实困境与对策: 基于 TALIS2018 上海数据结果的实证分析[J]. 上海教育科研,2020(9):59.
[2] 郭永存. 新时代地方高校教师职业生涯“全周期”培养体

系的构建[J]. 煤炭高等教育,2019,37(3):7.
[3] 陈静静,许雨思,谈杨. 专家型教师的理想指标、发展历程与关键动力:基于扎根理论的模型建构[J]. 教师教育研究,2024,36(1):67.
[4] 董佳. 讲深讲透讲活:提升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教学能力[J]. 教学与研究,2022(5):26.
[5] 李斌锋. 新时代高校构建课程思政培训体系的路径探析[J]. 北京教育(德育). 2024(4):43-47.
[6] 石岩,王学俭. 新时代课程思政建设的核心问题及实现路径[J]. 教学与研究,2021(9):93.
[7] 王学俭,石岩. 新时代课程思政的内涵、特点、难点及应对策略[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1(2):55.
[8] 夏蓉,车念聪,王蕾. 跨专业公开观摩课对教学反思的作用[J]. 医学教育管理,2021,7(2):190.
[9] 李政涛. 现场学习力:教师最重要的学习能力[J]. 人民教育,2012(21):46.
[10] 易魁,许俊. 两会精神为路标的以研促教教学改革理念研究:源起、特征与体系构建[J]. 高教学刊,2019(16).
[11] 安文铸. 教育科学学引论[M].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7:226.
[12] 罗亚莉. 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衔接机制[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9):145.

(责任编辑 许峻)

Integrating the Four-Comprehensive Cultivation Framework to Enhanc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al Competence Among University Faculty

LUO Yali

(School of Marxism,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proposes a “Four-Whole Cultivation” framework (whole-process, whole-coverage, whole-type, whole-means) to address the synergy between ideological-political courses and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education. The whole-process dimension establishes a career-stage progression system from novice to expert teachers, vertically reinforcing pedagogical foundations. The whole-coverage approach combines dual literacy (student cognition & disciplinary mastery) with dual strategic foci (disciplinary features & ideological elements), horizontally broadening educational perspectives. Whole-type cultivation integrates collective lesson design, peer observation, and translational pedagogy research, enhancing collaborative capacity. Whole-means cultivation innovates multi-level hybrid learning systems and three-dimensional integration mechanisms, constructing an omnidirectional capacity-building architecture. This framework aligns with the socialist educ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emphasizing professional competency and ideological literacy.

Key words: Whole-process; Whole-coverage; Whole-type; Whole-means;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融媒体时代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政教育 创新路径研究

韩燕飞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传媒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剖析融媒体时代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价值意蕴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依托融媒体数字平台,打造多元化传播矩阵,深挖思政育人要点,创新话语表达方式,不断增强大学生认同感与参与感的实践策略。

关键词:融媒体;习近平文化思想;高校思政教育;创新路径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6.016

中图分类号:G641;G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6-0102-05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文化工作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1]。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融媒体为高校开展思政教育带来了新的契机与挑战。基于此,在融媒体背景下,深入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涵精髓,提炼思政育人核心要点,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全过程,既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题中之义,也是一项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时代课题。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价值意蕴

(一)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定文化自信、“两个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及“让人民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等重要论述,无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为大学生思政教育提供了丰厚的理论滋养

和根本遵循。融媒体时代,习近平文化思想借助新媒体形态,以故事化叙事、情景化体验的方式生动呈现,将抽象的理论概念转化为直观可感的教育内容,为大学生思政教育注入了鲜活活力。

(二)有利于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

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的教育模式,不仅有助于提升全社会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能净化社会风气、完善思想道德教育分众化精准化机制,为文化强国建设夯实基础。习近平文化思想为高校思政教育提供了坚实的文化支撑,而融媒体技术的互动特性与精准推送功能,进一步放大了思政教育塑造个体价值观、凝聚社会共识的双重功能,提升了思政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三)助力大学生全面发展

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观与价值观,提升文化修养和人文素养,以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应对学习生活

收稿日期:2025-09-17

基金项目:2024年度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重点项目(思政课类)“‘融媒体+’背景下中原优秀传统文化驱动高校思政育人创新发展研究”(2024SJGLX1007);2024年度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重点项目(本科教育类)“‘融通’跨界‘实战’——新闻传播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2024SJGLX0208);2024年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资助项目“融媒体时代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ZGJG202462B);2024年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融通’跨界‘实战’——新闻传播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ZGJG202407A)

作者简介:韩燕飞(1985—),女,河南武陟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传媒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新媒体传播。

中的各类挑战。融媒体平台搭建了开放多元的学习交流空间,通过线上道德模范事迹展播、虚拟文化体验、沉浸式红色教育等创新形式,实现启发式、体验式教育,有效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协调发展。

(四)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为“七个聚焦”之一,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为新时代文化建设与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高等教育在高水平人才培养中发挥着龙头作用,2024年12月印发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对“新时代的文化使命”作出新表述,要求在赓续历史文脉中推进文化创造。融媒体技术的普及应用,使习近平文化思想能够更广泛地覆盖大学生群体,有效激发青年学子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强化其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引导他们主动投身文化建设实践,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实现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二、融媒体时代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机遇与挑战

(一)机遇:丰富宣传方式、优化传播布局

1. 融媒体丰富了宣传方式,使习近平文化思想展示更加多元、直观

融媒体技术的兴起,让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呈现更具立体多元性。相较于传统媒体枯燥单向的理论灌输,融媒体拥有传播内容丰富、传播形式新颖、传受双方实时互动的优势,让理论传播更具吸引力与时效性。当前,5G、大数据、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技术赋能的融媒体,让传播场景愈发立体化、可视化,受众可在沉浸式体验中兼顾感官享受与精神追求。例如,可借鉴敦煌博物院“数字敦煌”项目的实践经验,其通过高分辨率扫描、三维建模等技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资源库访问量已突破2300万次,覆盖全球78个国家^[2]。此外,还可制作系列短视频,将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故事化、情景化方式呈现,让文化思想更具象,方便学生记忆与理解。

2. 融媒体优化了传播布局,使习近平文化思想传递更加精准、高效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守正创新,最终要落实到大学生这一受众群体^[3]。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需深入探究大学生群体特征,才能有的放矢地传播。大学生使用网络过程中,大数据算法可通过分析其上网痕迹,精准把握其上网习惯与需求偏好,完成“精准画像”。例如,依据画像结果可为不同年级、专业的学生定制个性化学习内容:给理工科学生推送科技创新相关案例,给文科类学生推送文化艺术类相关案例。总之,融媒体优化了传播布局,使理论传播摆脱了全覆盖、填鸭式的传统模式,能够通过算法推荐标签,推送契合大学生喜好的内容形式,实现习近平文化思想传递的精准化与分众化。

(二)挑战:信息混杂、思政融入效果差

1. “信息茧房”制约“国家主流思想”传播

融媒体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在提升信息生产与传播效率、优化视听体验、促进人机交互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但也引发了“信息危机”。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能迅速生成海量信息,导致网络舆论中混杂着理性与非理性的各类声音,使大学生易受不良思潮影响,严重干扰其正确价值观的形成。另一方面,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算法推荐得到广泛应用。算法推荐虽能精准捕捉网络受众的兴趣与需求,却也让受众陷入“信息茧房”,大学生倾向于接触自身感兴趣的领域,无形中屏蔽了国家主流思想,影响其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全面理解与深入思考。

2. 教育主体权威性面临挑战,思政融入效果差

互联网的交互性与平等性,改变了传统媒介时代师生间知识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削弱了教育主体的权威性,使高校教育与管理的话语权威面临挑战。一方面,部分高校未真正吃透“融媒体+教育”的核心实质,存在将思政教育内容简单“搬运”至不同媒体平台的现象,既降低了思政教育的吸引力与感染力,也导致融媒体阵地建设相对薄弱。另一方面,信息技术迭代迅速,既熟练掌握网络技术又具备丰富思政教育经验的复合型人才相对匮乏,造成教育内容与学生实际需求脱节,难以实现有效的价值引领。

三、融媒体时代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创新实践

(一)整合资源:打造多元化传播矩阵

1. 发挥高校党委统揽全局作用,把准融入式教育的正确方向

高校党委应从全局层面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前瞻性规划,明确各类思政教育平台的功能定位与总体目标,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贯穿融入全过程,确

保思政教育工作有规可依、有序推进。坚持以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以师生需求服务为基础,以促进师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抓实教育教学各环节,将用习近平文化思想强化思想引领作为首要政治任务^[4]。同时,整合校内宣传思想工作力量,打破职能分割、队伍分散、内容单一的传统模式。党委宣传部、学生工作处、团委、马克思主义学院及其他二级学院应协同联动、各司其职,共同扛起思政育人政治责任^[4],通过多方通力协作,凝聚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强大合力。

2. 充分发挥教育主客体的主导性、主动性与创造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价值遵循,广大教师尤其是思政课教师,要走在前、学在前,先学一步、学深一层,真学真悟这一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以深厚的文化功底感染学生、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引领学生,切实发挥思想引领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教学实践中,要立足学生成长规律,优化课程设置、丰富教学方式,结合网络传播特征与新媒体技术优势,打造沉浸式、参与式教学场景,让教育过程“寓教于乐”,不断增强课堂亲和力和感染力。

高校要主动构建网络育人新格局,有意识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校园网络文化传播骨干队伍,积极吸纳在网络空间有影响力的师生“网络大V”加入。通过加强政治理论培训与网络传播能力培养,提升其政治素养与理论水平,确保这支队伍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传播中发挥正向引领、积极发声的重要作用。

3. 搭建高校思政融媒体平台,抢占舆论主阵地

随着数字化浪潮的加速演进,新闻传播格局与舆论生态发生深刻变革,互联网已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核心阵地。大学生作为互联网原生代群体,其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深受网络环境影响。在此背景下,高校必须主动顺应媒体融合趋势,将数字化战略纳入思政工作顶层设计,通过搭建一体化思政融媒体平台,牢牢掌握舆论传播的主导权与话语权。

一是整合全域资源,凝聚传播合力。高校思政融媒体平台建设绝非单一模块的升级,而是需系统谋划、协同推进的系统工程。近年来,各高校已逐步完成宣传载体的多元化布局,实现了从传统单一媒

体向报、台、网、频、微、端等媒体的转型,构建起全方位覆盖、全天候延伸、多领域拓展的新媒体传播矩阵^[5]。但不容忽视的是,当前多数高校仍存在“资源分散、各自为战”的突出问题:宣传部与二级学院、职能部门的宣传平台缺乏有效联动,各类网站、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等载体自成体系,既造成内容重复建设、传播效能衰减,也增加了统筹管理的难度。对此,高校应建立以党委宣传部为核心的“中枢调度机制”,依托现有平台资源组建统一思政融媒体中心,通过制定协同传播规范、建立内容共享库、完善约稿联动机制,打破部门壁垒实现资源通融。例如,清华大学整合校内媒体资源打造“思政课+融媒体”项目,江苏财会职业学院成立涵盖30家媒体平台的新媒体联盟,均通过资源整合实现了“一题多态、全域传播”的放大效应,显著提升了思政内容的覆盖面与影响力。

二是深耕数字技术,提升精准育人效率。高校需以“四全”媒体发展理念为引领,加大网络建设经费投入,借助新兴技术赋能思政传播形式创新,构建“技术+内容+互动”的全链条育人生态。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立足大学生认知特点与接受习惯,将智能技术深度融入内容生产、传播分发、互动反馈等全流程。在内容创作层面,可运用VR/AR技术打造沉浸式思政课堂,通过虚拟仿真场景让学生“身临其境”感受红色历史与时代精神;在传播分发层面,借助大数据分析与用户画像技术,实现思政内容的分众化推送与精准传达,推动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型;在互动体验层面,引入AI主播、智能机器人等新型载体,通过线上问答、实时互动等形式增强参与感,让主流价值观在“指尖互动”中入脑入心^[5]。例如,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搭建“数智辅导员3.0平台”,通过沉浸式党史课、数字书签等项目实现技术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部分高校参与教育部“学术MCN机构”建设,借助短视频、互动直播等形式推动优质思政资源“破圈”传播,均取得了良好育人成效。

(二)精准分析:深挖思政育人要点

作为上层建筑的核心组成部分,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精神支撑,指引文化繁荣与国家发展同向同行。高校作为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阵地,肩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思政教育是落实“以文铸魂”育人目标的关键举措。因此,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把深邃理论转化为学生听得懂、乐于学的话语体

系,是提升融入实效性的核心所在。在具体实践中,应遵循“两点论、重点论”相统一的原则,以“三全育人”理念为引领,充分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精准把握大学生思想动态与兴趣偏好,深度挖掘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思政育人核心元素,找准理论内涵与青年需求的契合点。既保持理论的政治性与学理性,又增强内容的吸引力与感染力,真正实现“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引导青年学生坚定文化自信、筑牢精神根基,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坚定“文化自信”

深度挖掘中华文明的辉煌历史,引导学生探究其背后的哲学思想与文化逻辑;同时结合传统节日复兴、国潮兴起等社会热点和文化现象,培养广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使他们习得传统文化相关技艺,不断提升个人素养与文化气质,并主动思考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践行文化自信。例如,设计 H5 互动页面,融入动画、音效等趣味元素,让学生通过选择不同的文化元素生成个性化的“传统文化优秀传承者”证书,鼓励他们分享到社交平台,既满足其分享需求,也增强传统文化的传播力。

2. 坚持“两个结合”

选取生动具体的案例,系统展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通过设置线上讨论等丰富形式,启发学生深入思考两者结合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例如,邀请艺术专业师生绘制图文漫画,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述“两个结合”的相关故事,让抽象的理论具象化,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其核心内涵。

3. 秉持“七个着力”

系统讲解“七个着力”的核心要义,深入剖析每个着力点的重点任务与实践难点,帮助学生建立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整体认知与深刻理解,助力学生做好宣传阐释工作。结合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和全球文化发展趋势,引导学生展望“七个着力”在未来可能催生的深远变革与积极影响,进一步激发他们的时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具体可通过创新传播形式深化认知,例如采用微短剧等青年喜闻乐见的形式,生动讲述“七个着力”背后的理论渊源与实践故事,加深学生的理解与认同。武汉大学举办的“思政教育短视频大赛”颇具示范意义,学生以团队形式参与创作,作品内容涵盖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解读、基层实践案例等多元维度,大赛有效激发了学生的创造力与参与热情,优秀作品在校园内广泛传播,不仅丰富了思政教育的载体,更显著提升了教育的实效性与感染力。

4. 担负“新的文化使命”

结合高校文化志愿服务、文化交流活动等载体,阐释国家文化战略内涵与文化遗产创新的时代价值,进一步增强大学生的文化使命感与责任担当。例如,可发起“我为文化代言”等社交媒体话题,邀请大学生分享自身对文化遗产创新的思考与实践行动,鼓励其主动传播优秀文化、扩大文化影响力。

同时,高校应依托校园网络文化品牌,营造浓郁的校园网络文化氛围。深度挖掘校园文化内涵,以丰富多元的文化活动为依托,找准习近平文化思想与校园文化的契合点,精心打造校园网络文化精品内容。始终坚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党的二十大精神,不断凝聚思想共识、汇聚青春力量。

(三) 技术赋能:创新内容呈现形式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对象是大学生,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能否取得好的效果,关键在于是否尊重大学生主体性、能否增强大学生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情感认同。

1. 聚焦优质内容供给

内容为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有效传播与所选题材质量密切相关。要注重传播内容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努力推出更多有温度、有高度,且易于学生接受、乐于传播的融媒体作品。例如,大型通俗理论节目《中国智慧中国行》,将理论巧妙融入故事,用通俗化语言生动解析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深入阐释了“第二个结合”的重大原创性贡献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伟力^[9]。高校应站在学生视角,让理论阐释更具感召力,采用大众化表达方式,使党的创新理论潜移默化走进学生心间。当代大学生习惯通过 B 站、抖音等视频平台获取信息,高校可借助微短剧热潮,强化内容包装、善用视觉元素,打造系列微短剧作品,引发学生共鸣。

2. 聚焦数字化技术革新

技术为内容传播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助推习近平文化思想“飞入寻常百姓家”。通过 AR、VR、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内容传播实现了沉浸式、互动式呈现,创造出身临其境的体验,让大学生能更加直观、深刻地理解中国文化的魅力与价值,进一步提升了理论传播的实效。例如,人民日报新媒体中心在党的二十大召开之际,综合运用多种新媒体技术,将新时代 10 年祖国的发展变化融入《新千里江山图》的创作中。该作品以中国名画《千里江山图》为创意蓝本,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重要论

断的深刻内涵阐释得淋漓尽致,为广大网民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10]。高校需善用不断涌现的新技术,主动适应时代变革,比如开发数字虚拟人、AI 微视频、AI 智能问答等产品,满足当代大学生追求新奇体验的需求。例如,浙江大学在相关实践中,通过 VR 技术让学生身临其境地体验历史事件、探访文化遗址等,助力学生深化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解。这种沉浸式学习体验极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显著提升了思政教育的实效。

3. 聚焦创新话语表达方式

融媒体时代,大学生习惯于碎片化阅读,青睐简短、高概括性的内容,热衷直播、短视频等形式。因此,需要通过调整优化传播内容生态,对理论话语方式进行创新性表达,更好地把学生想听的和我们想讲的结合起来,把抽象的理论与具象化的载体结合起来,同时开展互动式线上讨论,增强大学生的理论认同感。例如,被誉为“有理论深度、有实践温度”的理论对话节目《马克思是对的》,以青年人关心的问题为切入点,通过对话访谈、经典诵读、新媒体技术呈现等多元形式与受众互动,既强化了代入感,又增添了历史厚重感,有效激发了受众参与热情,增强了理论吸引力^[8]。因此,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传播过程中,一方面要善用网言网语,贴合大学生语言习惯,以幽默通俗的“软表达”解读复杂理论,让理论更接地气;另一方面要善于讲故事,采用情感化叙事,通过“小切口”透视“大主题”,借助沉浸式情景演绎传递深邃理论内涵,引发学生情感共鸣。

四、结语

理论传播不应流于空洞说教,而应依托具体载

体,寻找传受双方“共通点”,使受众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大学生是否对中华辉煌文明怀有由衷的自豪感,能否自觉担负起“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新时代文化使命,是衡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在高校思政教育实践中成效的关键所在。融媒体时代,高校应持续创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融入形式,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行稳致远提供更为坚实的文化支撑。

参考文献:

[1] 新华社记者. 思想旗帜引领方向 实干笃行开创新局 [N]. 人民日报,2023-10-10(1).

[2] 王心怡. 数字技术赋能习近平文化思想传播的路径探析 [J].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24(4).

[3] 刘燕茹,洪涛. 大数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三维审视[J]. 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

[4] 韩燕飞. 融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宣传矩阵建设研究:基于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的实践研究[J]. 中州大学学报,2022(5).

[5] 徐小添. 高校融媒体平台建设探讨[J]. 西部广播电视,2024(9).

[6] 刘亚,涂博文. 融媒体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传播研究[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3(18).

[7] 田俊荣,路畅. 人民日报:锚定数字化战略,打造新型主流媒体[J]. 新闻战线,2023(5).

[8] 陈晓宏,叶泽平. 融媒体时代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形势、要求与途径[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24(7).

(责任编辑 许峻)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ve Paths of Integrating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Converged Media Era

HAN Yanfei

(Schoo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value connotation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integrating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thought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within the era of media convergence, this study proposes practical strategies that rely on digital media platforms to construct a diversified communication matrix, delve into key ideological and educational elements, and innovate discourse expression, thereby continuously enhancing university students' sense of identification and participation.

Key words: media convergence;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nnovative strategies

基于新标准的逆向工程与3D打印实践教学改革探析

王凤梅, 邬向伟, 赵佳旭, 李鹏飞, 孙 瑞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工程训练中心,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 要:针对工程训练实践教学中存在的多项目教学内容单一、融合度不高等问题,我校构建了以新职业标准为导向、课赛融合驱动的“逆向工程与3D打印”工程训练创新项目,为机械类学生制定了“三级技能型”和“增材制造技术应用初级”课程标准。通过循迹小车车轮的设计制造实践与校内竞赛,学生在省赛和国赛中的获奖率提高至80%。该项目显著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锻炼了其工程思维、创新能力、设计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初步验证了该模式在培养高新技术复合型人才中的有效性。

关键词:逆向工程;3D打印;实践教学;新职业标准;课赛融合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6.017

中图分类号:G642;TP391.7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6-0107-07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逆向工程与3D打印技术作为智能制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航空航天、医疗、汽车、消费电子和文物保护等众多行业得到了广泛应用^[1]。这一技术浪潮对高校人才培养,特别是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实践教学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与更高的要求。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相继发布了《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22年版)^[2]和《增材制造工程技术人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23年版)^[3],这些新职业标准为3D打印领域的人才培养提供了明确的岗位技能规范和能力评价依据,是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无缝对接的关键指引。

反观当前高校工程训练的实践教学,普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教学内容仍以单一、孤立的技能点训练为主,未能形成以完整产品为导向的综合能力培

养链条;二是新兴的3D打印与传统制造等项目之间融合度低,未能体现现代制造业多技术融合的特点;三是教学评价体系与产业标准脱节,难以客观衡量学生的综合工程素养。在此背景下,开展基于新标准的逆向工程与3D打印实践教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通过“课赛融合”模式,将新标准内化于教学过程,以真实竞赛项目为载体,旨在破解上述难题,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更能系统性地培养其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创新能力与职业素养,为新时代卓越工程师的培养提供可借鉴的路径。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近年来,国内外高校逐步开展了逆向工程与3D打印相关实践课程,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国内,众多高校积极探索创新教学模式与方法。杜平等^[4]致力于构建多元化的3D打印综合实践教学平台,但未涉及逆向工程与多技术协同训练;糜娜等^[5]探索了线上线下协同教学与前沿技术融入课

收稿日期:2025-10-19

基金项目:2024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项目“基于国家标准的工程训练3D打印与逆向工程的实训教学创新研究与深化改革”(ZGJG202420B);2024年度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黄河文化育人专项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传承黄河文物之‘杜岭方鼎’在3D打印实践教学中的开发应用”(ZGJG202448HJB);2024年度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黄河文化育人专项系列项目“高校黄河文化有机融入机器人原理课程教学的系统设计”(ZGJG202435HJB)。

作者简介:王凤梅(1986—),女,河南省项城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工程训练中心讲师,主要研究3D打印技术和逆向设计。

堂的模式,虽提升了教学时效性,但缺乏与职业标准的对接机制;周琴等^[6]通过引入正逆向装配体设计,提升了学生的参与度与成功率;魏青松等^[7]构建了“课堂—实验—科创”三位一体的多维教学模式;本校前期工作^[8]则基于新职业标准,初步建立了“五级—四级—三级”技能型课程体系。

国外研究同样注重实践与创新。AMM Sharif Ullah 等^[9]开发了面向工科类本科生的三层次项目式 3D 打印教学法;Sergei Chekurov 等^[10]针对增材制造的设计课程进行了长达五年的教学评估与迭代;Chong S 等^[11]提出了一种将工业 4.0 集成到工程教学中的混合学习模型,该模型包括传统的在线学习和翻转课堂方法,将新兴技术与教学方法相结合,以适应工业发展的需求。

尽管已有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有两点关键不足:首先,多技术深度融合不足。工程训练是一门涵盖传统与先进制造技术的综合性课程^{[12][13]},但现有教学模式往往使 3D 打印项目处于“信息孤岛”状态,未能与车、铣、钳、铸、数控加工、三维检测等项目形成有机联动,限制了学生系统性工程思维的培养。其次,教学评价体系创新不足,多数仍依赖于终结性的考试分数,缺乏基于职业能力的过程化、综合性评价机制。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研究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确保研究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在文献研究方面,全面梳理国内外逆向工程与 3D 打印实践教学相关文献,分析已有研究成果与不足,明确研究方向与重点。通过对杜平、糜娜、AMM Sharif Ullah 等学者研究的分析,了解当前教学模式在平台建设、技术融合、课程设计等方面的进展与局限。这不仅为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也有助于避免重复研究,使研究更具针对性。

案例分析也是本研究的重要方法。以本校工程训练实践教学为案例,深入剖析逆向工程与 3D 打印项目在教学目标、教学设计、教学实施、考核方案等方面的具体做法与实施效果。通过展示循迹小车车轮的设计制造过程,包括三维数据采集、逆向建模、3D 打印与后处理等环节,直观呈现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实践操作与技能培养情况。同时,分析学生在参与校内竞赛以及校外竞赛中的表现,以具体数据和实例说明课赛融合教学模式对学生能力提升的促进作用。

实践调研同样贯穿研究始终。在教学实施过程中,通过与学生交流、观察学生实践操作、收集学生作业与作品等方式,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困难与反

馈意见。在期末向学生征集教学改进意见和建议,定期开展师生座谈会,这些实践调研为教学持续改进提供了依据。通过与学生的互动,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如某些教学环节难度设置不合理、部分学生对理论知识理解困难等,进而有针对性地调整教学设计。

本研究具有以下创新点:体系创新,构建了“标准引领——项目贯穿——竞赛驱动——多元评价”四位一体的实践教学新范式,实现了新职业标准与教学全过程的无缝对接;内容创新,以“循迹智能小车”这一综合性产品为纽带,深度融汇逆向工程、3D 打印、特种加工、数控加工、三维检测等多个工程训练项目,打破了项目壁垒,实现了从“单一技能训练”到“综合能力构建”的转变;评价创新,摒弃“唯分数论”,建立了以新职业标准为核心的过程化考核方案,将职业道德、设备维护、团队协作等隐性素养纳入评价体系,实现评价的全面性与科学性。

二、教学改革的目标和思路

(一)教学改革的目标

在工程训练的整体框架下,逆向工程与 3D 打印实践教学目标的设定紧密围绕毕业要求与新职业标准,旨在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与专业能力。本教学改革旨在达成三个维度的教学目标。

知识—能力维度:学生能够深入理解 RE/AM 原理、工艺与应用;熟练掌握三维扫描、逆向建模、设备操作、后处理等核心技能,达到新职业标准中“三级技能型”与“技术应用初级”的能力要求。

过程—方法维度:通过完整的项目实践,培养学生系统性的工程思维、跨学科知识整合能力及创新性问题解决方法。

情感—素养维度:强化学生的质量意识、安全规范意识、环保理念与团队协作精神,培育学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与职业责任感。

(二)教学改革的思路

本教学项目以竞赛小车为核心载体,构建了一套全面且富有创新性的教学思路,旨在通过多项目融合、思政元素渗透以及能力培养导向,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因此,本项目的总体设计遵循“成果导向(OBE)”理念,其核心框架与实施流程如图 1 所示。该框架清晰地展示了以竞赛小车为载体的闭环教学过程:起点(标准与项目导入),将新职业标准与“循迹小车”项目任务同步引入;核心过程(多项目融合实践),学生依次或并行开展逆向工程(三维扫描、建模)、3D 打印(工艺规划、打印后处理)、传统加工(车架制作、后轮加

工)、质量检测与装配调试等一系列实践活动;驱动与检验(课赛融合),以校内竞赛作为项目成果的展示与检验平台,并将竞赛表现纳入课程评价,形成学

习——实践——竞赛——反馈的强化循环;终点与新起点(评价与持续改进),通过多元评价体系评估学习成果,并收集反馈用于教学方案的迭代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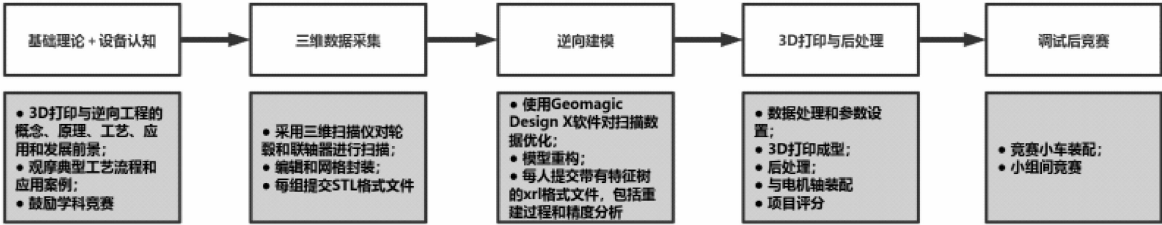


图1 项目实施流程

三、教学改革实施路径与核心举措

(一) 重构教学内容:构建“三模块、四层次”的递进式教学体系

1. 基础认知——从原理到感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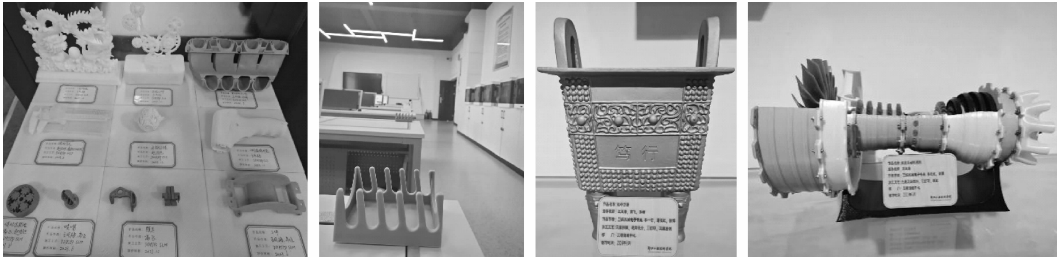
在教学实施的初始阶段,基础理论与设备认知至关重要。3D打印和逆向工程的基础理论讲授涵盖多个关键方面,从概念、原理、特点、工艺种类、典型应用、就业现状到发展前景和挑战等方面逐一讲授^{[14][15][16]}。

在讲解这些理论知识时,结合实验室现有的3D打印设备和三维扫描设备,帮助学生建立宏观认知。实验室拥有SLA设备,其高精度的打印效果可展示给学生,使学生了解激光立体光固化工艺的优势;FDM设备操作简单,学生可亲自操作,感受熔融沉

积成型技术的原理和过程;SLS设备和SLM设备,展示了烧结和熔化工艺在制造金属零部件方面的能力;Polyjet设备则体现了高分子喷射技术的多材料打印特性。三维扫描设备方面,通过现场演示其对物体进行扫描的过程,学生能更清楚地了解逆向工程中数据采集的原理和方法。结合典型产品,如师生逆向设计和打印的工业产品、工艺品、手机收纳架、杜岭方鼎、航空发动机等作品,讲解3D打印和逆向工程在实际应用中的成果。通过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学生不仅能掌握基础理论知识,还能对3D打印和逆向工程技术有更深入的认识,为后续的实践操作奠定坚实的基础。图2和图3为实验室的部分硬件设备和打印产品。



图2 实验室的3D打印设备



(a)工业产品和工艺品(师生作品) (b)手机收纳架(学生作品) (c)杜岭方鼎(师生作品) (d)航空发动机(学生作品)

图3 师生逆向设计和打印的部分作品

此模块改变“先讲后做”的传统模式,推行“案例引领、虚实结合”的沉浸式认知方法。教师扮演“技术导师”与“行业分析师”角色。亮点在于将设备认知与行业应用前沿直接关联,使学生不仅了解

“设备如何操作”,更理解“技术为何有用”“在何处能用”,快速建立宏观技术图谱,激发学习内驱力。

2. 核心技能——从模仿到创新

此模块是技能养成的关键,本项目精心设计了

“任务驱动、精度管控、创新引导”三层次训练法。

(1) 三维数据采集(精准复现)

以小车轮毂/联轴器为对象,实物如图 4a 和图 4b 所示。教师指导学生完成三维扫描的全流程。

改革亮点在于引入偏差分析作为数据质量的客观评判标准,要求学生提交的 STL 扫描文件 1(见图 4c 和图 4d)必须“特征清晰、光顺无缺”,培养其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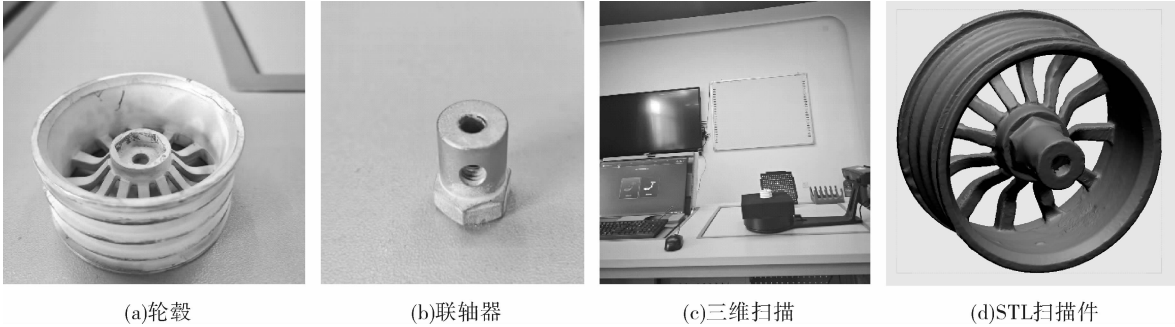


图 4 轮毂和联轴器的实物图和扫描图

(2) 逆向建模与再设计(从“形似”到“神似”)

这是本模块的核心创新点。轮毂和联轴器的一体化逆向设计工艺流程详见图 5 所示。要求模型完整度高,产品一体化设计,平均误差小于 0.30mm。逆向建模后要求每位学生提交带有特征树的 xrl 格式文件 2。教师教学重点并非软件命令操作,而是

基于 Geomagic Design X 的“逆向建模思维”。引导学生分析产品原始结构(如轮毂的回转体特征、联轴器的配合公差),并鼓励在保证功能(如与电机轴的过渡配合)前提下,进行结构轻量化或个性化设计。此举将简单的模型重建提升为蕴含工程思维的创新设计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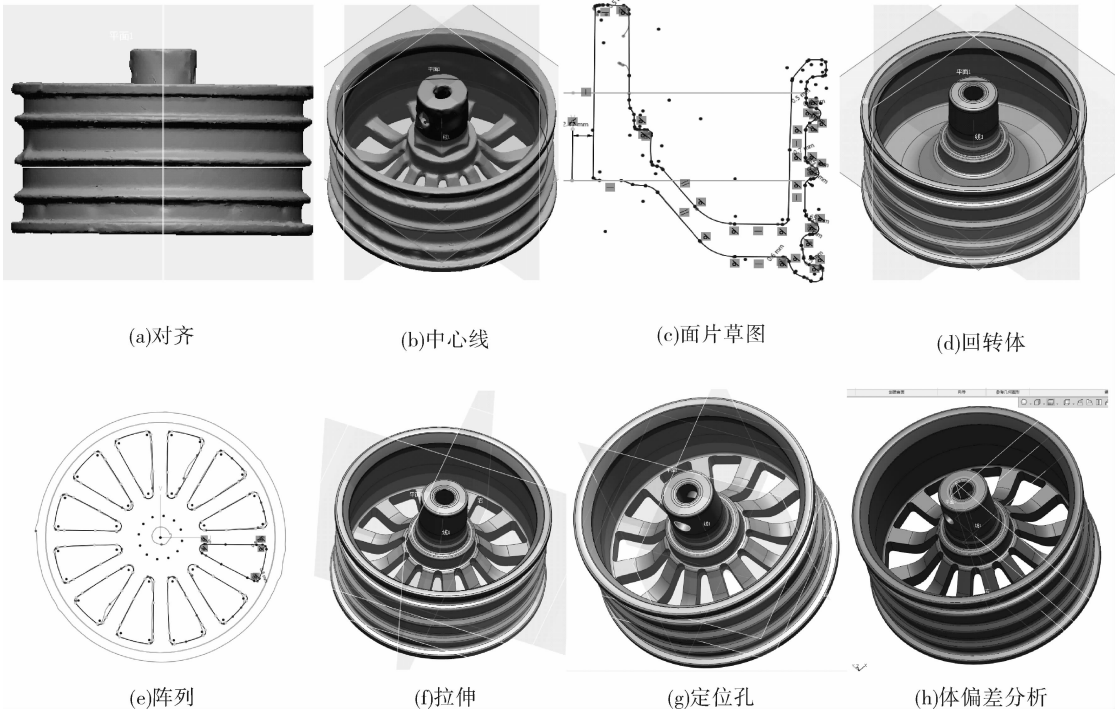


图 5 轮毂和联轴器的一体化逆向设计工艺流程

(3) 3D 打印与后处理(工艺实现与质量意识)

教师指导学生将数字模型转化为实体零件,图 6 为打印后的一体化结构车轮和装配后的效果。改革亮点在于强调“工艺链”概念,即从模型切片参数优化、支撑设计、打印成型到后处理抛光、装配调试的全流程质量管控。学生在此过程中深刻理解“设计—工艺—性能”的相互关系,建立起完整的产品

制造观。
3. 综合创新——从单一技能到系统集成
本模块旨在打破项目壁垒。学生将自己制造的车轮,与通过激光加工(车架)、铸造/数控加工(后轮)等传统项目制成的部件进行集成(如图 7),并通过嵌入式开发实现循迹功能。教师的角色转变为项目总师,引导学生解决跨技术领域的接口、匹配与系

统优化问题,实现从掌握单一增材制造技能到具备多技术融合的系统工程能力的跃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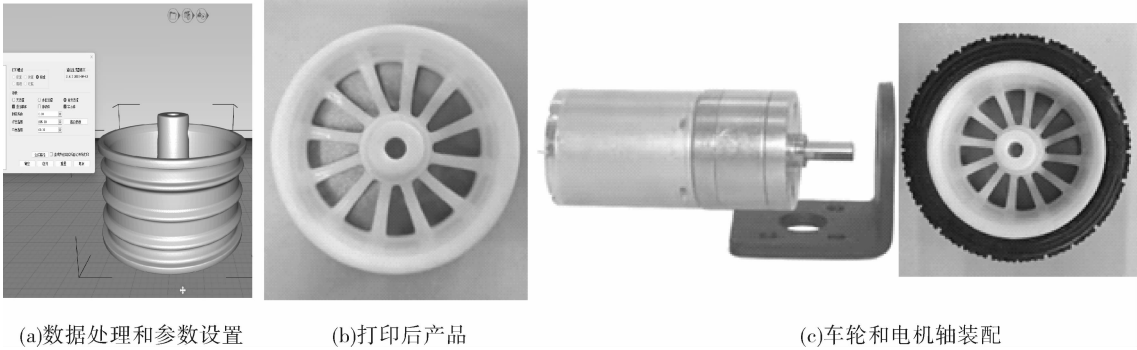


图6 轮毂和联轴器的打印件和装配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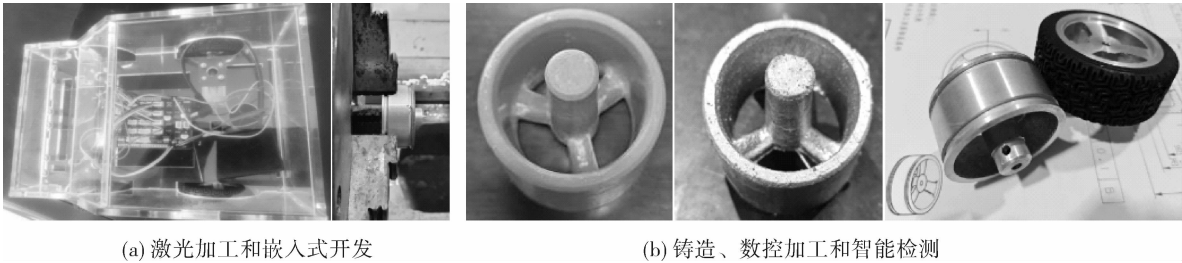


图7 循迹小车加工项目

(二) 创新评价机制: 创建“标准对接、过程量化”的综合素养评价体系

考核方案是教学评价的重要依据,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效果。为克服传统评价的弊端,本项目还创建了一套与职业能力直接挂钩的过程化考核方案。

直接对标两大新职业标准:《增材制造工程技术人员国家职业标准》“增材制造技术应用初级”的考核权重:设计产品与处理数据(25%)、应用工艺与生产运维(25%)、后处理与检验产品制造质量(25%)、职业道德(5%)、基础知识(20%);《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三级技能型”的考核权重:数据处理与参数设置(20%)、设备检

查调试(10%)、增材制造成型(30%)、后期处理(10%)、设备维护与保养(10%)、职业道德(5%)、基础知识(15%)。

将以上两大考核权重分解,融入本课程考核中,将技能分数精确分配到数据采集、逆向建模、3D 打印等环节,并设定了如“模型平均误差 < 0.30mm”等量化指标,使教学评价与职业能力要求同频共振;将以往被忽略的设备操作规范、工具摆放、场地整洁等工程素养(占10分)纳入考核,使工匠精神、职业规范的培养可衡量、可引导;考核成绩综合了教师评价、小组互评及竞赛评委打分,全面反映学生的个体贡献与团队协作能力。具体细则如表1所示。

表1 考核细则

名称	分值(分)	分值项(分)	细则
技能训练	70	产品三维数据采集:10	封装点云数据的合理性5分+封装点云数据的光顺性5分。 备注:每组提交 STL 格式文件1;要求封装点云数据完整,特征不缺失,缺失1处扣2分,提交的数据特征清晰,光顺性好。
		逆向建模:20	模型的完整性及合理性10分;模型精度对比5分;创新性5分。 备注:每生均提交 xrl 格式文件2,包括重建过程和精度分析;要求模型完整度高,平均误差小于0.30mm;整体拟合不得分。
		3D 打印与后处理:30	产品质量及完整性20分;小车和电机轴装配良好,满足功能要求10分。
		设备操作规范:10	设备操作规范10分。
实训纪律	20	实训纪律:20	平时出勤10分;课堂表现10分。
工程素养	10	工程劳动:10	耗材工具摆放整齐5分;设备干净、场地整洁5分。

(三) 深化课赛融合: 打造“教学——竞赛——孵化”一体化育人闭环

本项目将竞赛从课程“甜点”提升为教学“主菜”,构建了驱动学习的核心引擎。

竞赛不是课程的附加项,而是教学过程的自然延伸与成果检验。校内竞赛不仅评价小车的性能,更关注其设计创新性与团队协作过程。优秀团队被选拔并辅导参加更高层次的省赛、国赛,将课程学习

延伸到课外创新活动,形成了“教学——竞赛——孵化”的良性人才孵化链。实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创、以赛促优”的良性循环。

通过循迹小车嵌入式开发项目进行调试,实现小车的自动循迹功能。调试完成后,以小组形式组织竞赛。评委老师根据竞赛评分标准进行打分。评分标准综合考虑小车的性能、创新性、团队协作等方面。小车的性能包括循迹的准确性、速度、稳定性等;创新性体现在设计思路、结构优化、功能拓展等方面,鼓励学生在设计中采用新技术和方法,提高小车的性能和竞争力;团队协作考查小组成员之间的沟通、配合和分工。竞赛成绩被纳入工程训练总成绩中,这一举措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的积极性。

(四) 建立持续改进机制:形成“评价——反馈——优化”的教学质量提升螺旋

持续改进机制是保证教学质量不断提升的关键,本实践课程以 OBE(Outcome - Based Education) 教学理念为指引,始终将学生的学习成果作为教学改进的核心依据,建立了基于 OBE 理念的常态化持续改进机制,确保教学改革永葆活力。

在期末,向学生征集教学改进意见和建议,这是获取学生反馈的重要途径。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广泛收集学生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式等方面的看法和建议。定期开展师生座谈会,为师生提供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在座谈会上,学生可以详细阐述自己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教师则可以深入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学习情况。

结合学生建议,充分分析实践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不足。通过持续改进,逐步实现模块化设置和自主选择,实现“一院一方案,一生一课表”的个性化培养。

四、教学改革成效分析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学生在工程思维、创新、设计、自主学习等能力方面得到了显著提升,在省赛和国赛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在最近的省级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中,参与本项目的学生获奖率大幅提高至 80%。在竞赛作品中,学生设计的循迹小车展现出了出色的工程思维。在车轮设计上,学生不仅考虑了车轮的基本结构和功能,还运用逆向工程与 3D 打印技术对车轮进行了创新优化。通过对车轮的三维数据采集和逆向建模,学生发现原有的车轮结构在高速行驶时存在稳定性问题。于是,他们运用所学知识,对车轮的轮辐结构进行重新设计,采用了更合理的力学分布,提高了车轮的稳定性。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学生工程思维的提升,他们能够从工程

实际出发,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在创新能力方面,学生在竞赛中展现出了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部分学生在循迹小车的设计中,创新性地加入了智能避障系统。他们通过学习和研究传感器技术,将超声波传感器和红外传感器应用到小车中,使小车能够在行驶过程中自动检测前方障碍物,并及时调整行驶方向。这种创新设计不仅提高了小车的性能,还展示了学生在跨学科知识融合和创新应用方面的能力。

五、结束语

基于新标准的逆向工程与 3D 打印实践教学的课程融合改革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果。通过构建以新职业标准为导向、课赛融合驱动的“逆向工程与 3D 打印”工程训练创新项目,成功解决了传统工程训练实践教学中存在的多项目教学内容单一、融合度不高等问题。

在教学目标设定上,结合 12 条毕业要求及新职业标准,针对机械类学生制定了“三级技能型”和“增材制造技术应用初级”的课程标准。在教学设计与实施方面,构建了科学合理的教学流程,从基础理论与设备认知入手,通过现场参观实验室和观摩案例,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在产品三维数据采集、逆向建模、产品 3D 打印与后处理等实践环节,以任务为导向,分组协作,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考核方案以新职业标准为基准,采用过程化考核,全面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果和能力提升情况。工程训练竞赛的组织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创新能力,学生在竞赛中不断挑战自我,提升了综合能力。

教学改革的实施效果显著,学生的省赛和国赛获奖率提高至 80%。通过问卷调查和师生座谈会等方式收集的学生反馈表明,大部分学生对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竞赛环节表示满意,认为教学改革对自己的学习和成长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充分验证了基于新标准的逆向工程与 3D 打印实践教学的课赛融合改革在培养高新技术复合型人才中的有效性,为高校工程训练实践教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未来,我们将进一步探索:将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新兴技术融入 RE/AM 教学项目,保持教学内容的前沿性;深化校企合作,引入企业真实项目作为课程设计题目,推动产学研用紧密结合;完善线上教学资源库,支持学生的个性化与泛在化学习。

参考文献:

[1]王磊,卢秉恒.我国增材制造技术与产业发展研究[J].

- 中国工程科学,2022,24(4):202-211.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6-20-99-00[S]. 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22.
-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增材制造工程技术人员:2-02-38-11[S]. 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23.
- [4] 杜平,汤彬,张秀海,等. 3D 打印综合实践教学平台建设[J]. 实验科学与技术,2023,21(06):146-151.
- [5] 糜娜,杨琦,郭佳肆. 高校工程训练 3D 打印模块教学改革探究[J]. 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5).
- [6] 周琴,吴志超,罗龙君,等. 基于正逆向设计结合的 3D 打印实践教学[J].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24,43(2).
- [7] 魏青松,李继康,闫春泽,等. “新工科”下 3D 打印前沿学科三位一体多维度教学模式研究[J]. 实验技术与管理,2020,37(9):10-14.
- [8] 王凤梅. 基于新职业标准的 3D 打印与逆向工程实训教学探索[J]. 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23(12):149-152.
- [9] AMM SHARIF ULLAH, TASHI, AKIHIKO KUBO. Tutorials for Integrating 3D Printing in Engineering Curricula[J]. Education Sciences,2020,10(8):194.
- [10] CHEKUROV S, WANG M, SALMI M, PARTANEN J. Development Implementation and Assessment of a Creative Additive Manufacturing Design Assignment: Interpreting Improvements in Student Performance[J]. Education Sciences,2020,10(6):156.
- [11] CHONG S, PAN G-T, CHIN J, et al. Integration of 3D Printing and Industry 4.0 into Engineering Teaching[J]. Sustainability,2018,10(11).
- [12] 李双寿. 新时代新业态新工科工程训练教学体系创建[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3(1):33-36.
- [13] 崔二娟,吴亚辉. 新工科背景下 3D 打印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J]. 实验科学与技术,2020,18(5):115-118.
- [14] 史玉升,闫春泽,周燕,等. 3D 打印材料[M].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
- [15] 魏青松. 增材制造技术原理及应用[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 [16] 纪红. 逆向工程与 3D 打印技术[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147-165.

(责任编辑 许峻)

Analysis and Exploration on the Reform of Practical Teaching of Reverse Engineering and 3D Printing Based on the New Standards

WANG Fengmei, WU Xiangwei, ZHAO Jiaxu, LI Pengfei, SUN Rui

(Engineering Training Centre,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To address issues such as fragmented project content and low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in traditional engineering training programs, an innovative “Reverse Engineering and 3D Printing” engineering training project has been constructed. Guided by new occupational standards and driven by a competition-integrated curriculum, this project develops a “Level IV Skill Certification” and “Primary Application of Additive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curriculum framework specifically for mechanical engineering students. Through the design, manufacturing, and on-campus competitions of line-following robotic vehicle wheels, the project has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 efficacy in stimulating student engagement (evidenced by an 80% achievement rate of provincial-level awards or higher in competitions) and cultivating engineering thinking,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design proficiency, and self-directed learning skills. Preliminary results valid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model in nurturing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 equipped with advanced technical competencies.

Key words: reverse engineering; 3D printing; practical teaching; new occupational standards; lesson and race integration

黄河流域古代军事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 价值与路径研究

——以古代郑国军事文化为例

罗 强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特殊教育学院, 郑州 450044)

摘 要:黄河流域古代军事文化除了具有军事文化的基本特征外,还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其蕴含的创新精神、爱国情怀等与高校思政教育在本质逻辑上高度一致。高校可以从推进黄河古代军事文化“三进”工作,创新课程思政及思政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营造良好校园文化氛围,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促进区域古代军事文化与高校思政教育的有机融合,增强思政教育的吸引力与实效性,培养学生崇高的爱国情怀、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关键词:古代军事文化;思政教育;郑国;爱国主义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6.018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6-0114-04

黄河流域古代军事文化是在长期的军事实践中形成的,具有浓郁黄河文化特色的亚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校思政育人工作实践中,可以充分利用黄河流域军事文化这个生动载体,丰富、拓展高校思政教育内容与渠道。

一、郑国军事文化特点

(一)重视军事力量建设及战略调整

郑国东迁中原后,始终保持着较强的军事力量,不仅与晋、楚等大国交战互有胜负,甚至能使诸侯联军畏其威名,不敢轻易越境。这种强大的军事实力得益于其对军事力量建设的重视,以及独特的寓兵于民制度和训练方式。在不同时期,郑国总能认清自己,在斗争中保持冷静,并及时调整战略定位。由强盛时期的战略进攻,到中期的一边倒战略,以及后期的在晋楚间待时而动的摇摆战略,都使郑国在诸侯争霸中免受了重大威胁,显示出高超的军事智慧。

(二)崇礼尚德

春秋时期,礼制日渐衰微,但郑国依然保持了对礼仪的重视,有着浓厚的崇礼尚德思想。这种思想体现在郑国军事文化中。在郑国的军事交流辞令

中,礼仪规范被反复强调,尊卑有序、谦恭谨慎成为其军事交流的重要原则。“以军礼同邦国。大师之礼用众也;大均之礼恤众也;大田之礼简众也;大役之礼任众也;大封之礼合众也”^[1]的理念成为郑国展开相关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同时,郑国军队内部的日常管理和对外作战中,也广泛存在尊礼尚德思想。如鲁襄公二十五年,郑国军队攻入陈国都城后,没有掠夺财物、杀掉俘虏,而是遵照礼法“子展命师无入公宫,与子产亲御诸门……子展执紼而见,再拜稽首,承饮而进献。子美入,数俘而出。祝衮社,司徒致民,司马致节,司空致地,乃还”^[2]。这种思想使得郑国军队在战斗中能够保持高度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也避免了敌对国家的激烈报复。

(三)善于战术创新

郑国重视军事行动的创新,善于根据对战双方特点与实际需要运用不同的战术。如鲁隐公五年四月,为抵御“卫人以燕师伐郑”,郑国改变了春秋时期崇尚对阵双方正面对决的传统战术,秉承“以正合,以奇胜”理念,“祭足、原繁、泄驾以三军军其前,使曼伯与子元潜军军其后”这一对传统战术的扬弃

收稿日期:2025-07-20

基金项目:2025年度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春秋时期郑国军事文化研究”(2025-ZDJH-578)

作者简介:罗强(1975—),男,河南正阳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特殊教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是传统文化及思政教育。

与创新出乎燕国军队的意料,最终“郑二公子以制人败燕师于北制”^[2]。桓公五年秋,周王率领王师及陈、蔡等诸侯军队伐郑。针对传统车战不够灵活,容易被敌人中间穿插的弱点,郑国又一次大胆战术创新,在繻葛之战创造了“鱼丽之阵”,以“先偏后伍,伍承弥缝”的阵法弥补了这个缺陷,最终大败诸侯联军,开启了郑国小霸诸侯的伟业。

(四) 严格军事纪律与监察制度

郑国军队之所以能够保持强大的战斗力,得益于其具有严谨的军事纪律和完善的监察制度。军队内部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各级将领需严格遵守军令,士兵则需服从指挥,不得擅自行动。同时,郑国还设立了军事监察系统,对于对外军事行动,司马都会作为执法者参与其中,确保军纪严明,提高军队的作战效率。

(五) 文化底蕴与军事思想深度融合

郑国军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其深厚的文化底蕴。郑国地处中原腹地,黄河文化的长期滋养使郑国文化氛围非常浓厚,重视文化学习,尊重文化风气传承不绝,公卿大夫也常会引用诗歌、谚语以明志。如鲁昭公六年,郑子产替丰施归州田于韩宣子,为表明归田的正当性,引用谚语“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在郑国的军事辞令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大量引用经典、运用比喻修辞的方式。如鲁襄公八年楚国入侵郑国,面对危局何去何从,郑国执政者内部产生严重分歧,各位卿大夫引经据典陈述己见。子驷引用《周诗》“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兆云询多,职竞作罗”,子展引用“杖莫如信”证明自己的观点。这种方式不仅体现了郑国文化在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也展现了郑国军事文化的独特魅力。

二、黄河流域军事文化在地方高校思政教育中的价值

高校思政教育的根本目标在于“立德树人”。而包括军事思想文化、军事战略文化、军事谋略文化、军事道德文化、军事科技文化、军事制度文化、军营文体文化等在内的军事文化^[3],蕴含着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纪律教育等多方面思政资源,兼具传统文化及军事内容的双重特点。这些特征与青年学生崇拜英雄、渴望建功立业的情感追求不谋而合,与党和国家对不断开创新时代思政教育新局面的要求高度契合,在高校思政教育中能够发挥不可或缺的价值引领与精神感召功能。^[4]

(一) 增强思政教育的实效性

思政教育是关于人的教育,是关于思想素养的教育,需要重视教育对象的身心特点、认识规律与情

感需要开展教育活动。当前,高校思政教育普遍存在过于重视书本理论讲述、形式僵化等问题,对青年大学生的吸引力不足。而黄河流域军事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区域特色的教育资源,贯穿了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奋斗史,有着丰富的真实案例与曲折动人故事,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可以极大丰富思政课堂内容,也可以使课堂更加生动有趣,增强教育的实效性。比如以弦高犒师为例,引导学生认识到,在面对国家危难时,个人应不惜牺牲自身利益,舍小家为大家,树立远大的爱国主义情怀。在讲述创新意识时,我们可以结合郑国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战略定位,分析其不断调整的内在原因,以及调整所带来的作用,引导学生明确创新是发展的源泉,树立创新意识。

(二) 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

数千年的黄河流域军事文化中,爱国是主流。无数的军事活动都充满着对国家的热爱,对民族的自豪之情。深入挖掘和有效利用这些资源,将其融入思政教育中,可以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培养宏大的历史观,让他们更加全面地了解黄河流域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传统,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地处四战之地的郑国,全面参与并见证了春秋及战国初期的历史活动,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兴衰沉浮的缩影。通过系统了解郑国的军事活动及其背景,学生可以进一步拓宽历史视野,加深对相关历史知识的理解,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提升对复杂问题的辨析能力。

(三) 培养学生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和团队精神

“万夫一力,天下无敌。”黄河流域军事活动中许多战斗的胜利,如武王伐纣、商汤灭夏,皆源于集体智慧与团队协作。而太行抗战、挺进中原等众多的军事故事也向我们展示出黄河流域文化中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精神品质,最终凝聚成蕴含丰富军事文化和团队精神内涵的黄河流域军事文化。将其融入高校思政教育,有助于引导学生树立热爱集体、团结同学的集体主义观念,培养学生的意志品质和团队协作精神。

(四) 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

批判性思维在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中均具有重要价值,可以帮助人们从多个角度分析问题,识别问题的本质,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从而在复杂的环境中作出更明智、更科学的决策。黄河流域军事文化中同样蕴含着丰富批判性思维元素,深入挖掘、利用这些资源,可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比如,教师以郑国入许后,面对唾手可得的许国领

土,没有直接占有,而“使许大夫百里奉许叔以居许东偏”“使公孙获处许西偏”为例,可以引导学生结合郑国国内不稳、王室猜忌、诸侯不睦等背景讨论郑庄公如此处理的原因,启发学生看待问题不能只看表象,而要辩证分析,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三、黄河流域军事文化与高校思政教育融合的路径

(一)推动黄河流域军事文化高校“三进”工作

1. 融入黄河文化专题课程

为传承发扬地方文化,不少黄河流域高校都结合地方文化特色开设了黄河文化专题课程。黄河流域军事文化作为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流域内高校应根据自身特点和教学需求开设相应的军事文化专题或者课程。通过系统讲授、讨论及实践教学,使学生全面了解黄河流域军事文化的内容、特点及时代价值。例如,可以开设“地方军事史”“地方军事人物传”“地方军事遗迹(遗址)故事”等课程,引导学生自觉传承黄河军事文化,领悟军事故事背后的文化内涵、教育意义。

2. 融入课程思政体系

黄河流域高校还应将区域内军事文化融入现有的课程思政及思政课程体系中。一方面要挖掘区域军事文化内涵,能够加强思政教育课程的文化可读性,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5]。使课程思政内容更加生动、具体和富有感染力。另一方面要通过设计案例教学、情境教学等教学模式,将流域内军事文化中的军事典故、军事名人轶事与专业授课内容有机融合,实现专业教育与思政育人同向同行。例如,在讲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时,可以引入当地革命斗争的历史背景和英雄事迹;艺术类专业学生写生课程,可以结合当地军事文化中的故事开展思政教育,使学生了解本地军事典故以及影响,并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其中蕴含的文化精神。

3. 融入社会实践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黄河流域军事文化存量丰富、真实可见、影响深远,体验黄河流域军事文化,是提升对黄河文化的认同感、接受度的重要路径。在社会实践中融入黄河军事文化,是提高黄河文化的接受度与影响力的重要形式。区域内高校在各类社会实践中可以从多维度、多形式融入黄河军事文化,一方面可以组织学生参观黄河流域的军事基地、纪念馆等,直观感受黄河文化的魅力。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志愿服务、走访当地民众等,切身感受军事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深远影响,在参与中增强国防意识和爱国情怀。

(二)创新教学方法与手段,提升思政教育效果

1. 采用多元化教学模式

在黄河流域军事文化与思政教育融合的过程中,高校可以采用多元化教学模式。除了传统的讲授式教学外,还可结合当地教学资源,开展案例教学、现场教学、专题讨论、体验式教学等多种方式。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参与度,让学生深刻体会黄河流域诸侯国军事力量的无穷魅力,提高教学效果。此外,可以利用军训及军事理论课程,开展模拟军事训练等活动,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2.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广泛应用,为黄河流域军事文化与高校思政教育的融合效果提升提供了机遇。高校可以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传播黄河军事文化,开展教学活动,以此提升黄河流域军事文化与思政教育融合的效果与质量。同区域院校也可以联合开发相关资源,建立黄河流域军事文化数字资源库和在线学习平台,为学生提供丰富的电子图书、视频资料等学习资源;同时,还可以利用青年崇尚个体自由和个性表达的特点,借助微博、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传播军事文化创新成果,促进军事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三)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学水平

1. 培养提升师资队伍素养

高校应加强对相关课程教师的培养和管理工工作,打造一支具备丰富军事文化专业知识和教学能力的专业师资队伍。但相关教师主要从事专业教学,对军事文化,特别是黄河流域军事文化并不熟悉。课程讲授往往以出版社提供的教材与教案为主,缺乏对黄河流域军事文化的全面认识,不利于将黄河文化融入教学,也不利于借助黄河流域军事文化开展思政教育。为提高专业师资队伍的军事文化素养,一方面可以组织相关教师参加培训、进修和学术交流等活动,提升他们对军事文化的认识和理解,领悟其中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鼓励教师积极参与黄河流域军事文化的研究和传承工作,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此外,还要建立激励机制和考核机制,激发教师借助黄河流域军事文化开展思政教育的热情和创造力。

2. 引入外部专家资源

在加强内部师资培养的同时,地方高校还应积极借脑引智,引入外部专家资源。可以聘请社会上具有丰富黄河流域军事文化知识的军事专家、相关

历史学者等作为兼职教师或客座教授来校授课,向学生传授相关知识;还可以在相关时间节点邀请具有丰富军事文化经验的英雄模范人物来校进行军事文化交流活动,增强对学生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四)营造良好校园文化氛围,强化教育效果

“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利用有利形势,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利用军事文化资源开展思政教育中,积极的环境营造必不可少。“七一”“八一”及抗战胜利日、烈士纪念日等关键时间节点自身都带有明显的军事文化和思政教育属性。利用这些优势,举办军事知识竞赛、红色歌曲演唱比赛、军事题材文艺演出等丰富多彩的校园军事文化活动,营造浓厚的军事文化氛围。此外还可以内部挖潜,组建以退役大学生为核心的军事文化传播团队,建立军事文化社团或兴趣小组等学生组织,为传播黄河流域军事文化知识,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养提供更多平台。

(五)注重实践教育环节,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学校可以定期组织学生到当地的革命遗址、纪念馆、军事博物馆等场所进行实地参观和考察活动。通过亲身感受和体验革命历史和军事文化的魅力,增强学生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通过了解和学习英雄人物的事迹和精神品质,培养学生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和团队协作精神;通过观察和思考军事设施和装备的发展变化,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科技兴军意识。此外,还要结合青年人的认知特性,将传统军事文化与青年亚文化的个性和创新等优势进行融合衔接,为中国军事文化注入新的元素和生命

力,推动中国军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6]

黄河流域军事文化作为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及优秀代表,在地方高校思政教育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和重要意义。通过深入挖掘和有效利用这些资源,可以丰富思政课堂内容、增强教育实效性、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和团队精神以及创新思维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地方高校应高度重视黄河流域军事文化的挖掘和利用,积极构建校地合作机制、开发专题教学课程、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以及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推动黄河军事文化与地方高校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与发展,为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为培养五育并进、全面发展的青年提供支撑和保障。

参考文献:

[1] 孙怡让. 周礼正义[M]. 北京:中华书局,2000:162.
[2] 杜预. 春秋经传集解[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3] 刘志富. 当代中国军事文化发展论纲[M]. 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11:95.
[4] 宋梅,张晓丽,郝文慧. 基于军事文化导向的军队院校“大学英语”教学实践[J]. 教育教学论坛,2023(25).
[5] 周霞. 区域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创新发展路径[J].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1):84-88.
[6] 卞天歌. 双向破圈:军事文化与青年亚文化的融合传播实践[J]. 军事文化研究,2023(2):83-88.

(责任编辑 许峻)

Research on the Value and Path of Integrating the Ancient Military Culture from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Taking the Military Culture of Zheng State as an Example

LUO Qiang

(School of Special Education,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e ancient military culture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not only ha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military culture, but also has distinct regional features, and its innovative spirit, patriotic feelings, etc. are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essential logic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Universities can promot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regional ancient military culture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by incorporating military culture into textbooks, classrooms, and students' minds, innovat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means, creating a good campus cultural atmosphere,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taff. This will enhance the attractiveness and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ultivate students' noble patriotism, perseverance, and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ies.

Key words: ancient military cultur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cient Zheng State, patriotism

等离子体银纳米材料的合成及光电化学性能研究

张文敏¹, 刘子玥², 张琳¹, 张栋奎¹, 孙亚豪¹
(1.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2. 华南农业大学 食品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2)

摘要:贵金属纳米颗粒因其特殊的结构特征,在光照激发下展现出独特的局域表面等离子共振(LSPR)现象。本研究利用还原硝酸银方法得到组成相同但形貌不同的等离子体银纳米线(Ag-NWs)、银纳米球(AgNSs)和银纳米片(AgNTs)等三类材料,并对其进行了光学性质和形貌的表征和分析。分析结果发现,上述三类材料的固体紫外-可见吸收峰位置分别在377、412、547 nm,且形貌相对均一。同时,测试和探究了等离子体银纳米结构分别在最优吸收波长光照条件下的电催化析氢活性。结果显示,银纳米片的电催化活性的电流增加量要大于银纳米球,银纳米球大于银纳米线,即(AgNTs > AgNSs > AgNWs),并测试和分析了等离子体效应对光波长的依赖性和响应性,这一结果为等离子体效应增强光电催化活性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

关键词:银纳米结构;等离子体效应;光谱分析;光电催化;析氢反应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6.019
中图分类号:TB3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6-0118-06

纳米材料是指至少有一维尺度处于1~100 nm范围,或由纳米单元作为结构基元所构成的材料。其特有的小尺寸效应、表面效应、量子限域效应及隧穿效应,赋予其在光、电、磁及催化等领域独特的性能优势^[1-3]。早在中世纪,人们便对纳米粒子的光学行为产生兴趣。1908年,Mie通过求解Maxwell方程组,首次对球形纳米颗粒的光吸收与散射行为给出了严格解析,奠定了金属纳米结构光学性质及表面等离子共振效应的理论基础^[4-5]。当入射光频率与金属纳米颗粒表面电子集体振荡频率相匹配时,光子能量被纳米颗粒所吸收,导致表面电子跃迁至高能态,与此同时,在纳米颗粒表面形成所谓的“热电子”与“热空穴”,这一现象即为等离子体效应^[6-7]。在可见光区域,Au、Ag、Pt等贵金属纳米颗粒是能产生等离子体效应的主要纳米粒子。其中,银纳

米颗粒因其局域表面等离子体共振吸收和散射均位于可见光区,制备方法简便且稳定性良好等优点,成为表面等离子体光/光电催化体系中研究最为广泛的材料之一^[8-10]。这种等离子体效应,不仅取决于金属的种类,也与其微观形貌密切相关。依据Mie理论,纳米颗粒的LSPR吸收还受周围介质折射率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因此,通过调控银纳米结构的尺寸与形貌,可实现其对等离子共振效应的精准调控^[11]。随着合成方法的不断优化,研究形貌对LSPR的影响成为可能。在光照激发下,纳米结构表面电子发生集体振荡,产生可分离的“热电子”和“热空穴”,其中高能“热电子”可参与还原反应,而“热空穴”则具备温和的氧化能力^[12,13]。基于此,本实验系统测试和探究了组成相同、形貌各异的银纳米结构的 optical、morphology 及 electrochemical 性能。

收稿日期:2025-06-25
基金项目:202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离子体热载流子和热效应增强MOFs电催化行为研究”(22302180);2025年度河南省科技攻关项目“新型COFs催化剂的合成及其在CO₂催化转化中的关键技术研究”(252102230148);2022年度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高层次人才项目“等离子体热载流子和热效应增强MOFs电催化行为研究”(22109)。
作者简介:张文敏(1989—),女,河南郑州人,博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纳米材料合成、光电催化分析等相关研究工作。

1 实验部分

1.1 实验试剂

实验所用试剂列于表 1。

表 1 实验所用试剂信息

试剂名称	纯度	生产商家
硝酸银 (AgNO ₃)	优级纯	阿拉丁试剂有限公司
柠檬酸钠三水合物	优级纯	阿拉丁试剂有限公司
聚乙烯吡咯烷酮 (PVP)	优级纯	阿拉丁试剂有限公司
乙二醇 (EG)	优级纯	阿拉丁试剂有限公司
乙醇 (ETOH)	优级纯	阿拉丁试剂有限公司
硼氢化钠 (NaBH ₄)	优级纯	阿拉丁试剂有限公司
氯铂酸钾 (K ₂ PtCl ₆)	优级纯	阿拉丁试剂有限公司
过氧化氢 (H ₂ O ₂)	优级纯	阿拉丁试剂有限公司
浓硫酸 (H ₂ SO ₄)	分析纯	国药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浓硝酸 (HNO ₃)	分析纯	国药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浓盐酸 (HCl)	分析纯	国药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1.2 实验仪器

主要仪器设备见表 2 所示。

表 2 实验所需仪器设备列表

设备名称	型号	生产商家
电子天平	BEC-124	上海恒平天平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数显磁力加热油浴锅	DF-101S	河南省予华仪器有限公司
超声波清洗器	KQ-5200E	昆山美美超声仪器有限公司
高速台式离心机	HT165	湖南湘仪实验室仪器开发有限公司
玻璃仪器气流烘干机	C 型	河南省予华仪器有限公司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Carry 60	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扫描电子显微镜	S-4800	日本日立电子电气公司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OL-2010	日本日立电子电气公司
电化学工作站	CHI6601	上海辰华仪器有限公司

1.3 材料的合成

在合成实验前,所有用到的玻璃器皿均需要用王水(浓盐酸:浓硝酸体积比=3:1)浸泡过夜,随后以二次水超声清洗四次备用。

银纳米线、银纳米颗粒和银纳米片的合成均以 AgNO₃ 为原料,分别以乙二醇、柠檬酸钠三水合物、硼氢化钠为还原剂制备得到,对应详细合成步骤如下。

银纳米线 (AgNWs) 的合成: AgNWs 的制备方法是依据参考文献并作适当改进^[14]。合成过程中,在 PVP (M_w ~ 40000, 0.1 M) 和 Pt 种子共同存在下,以乙二醇还原 AgNO₃ 制备得到。具体步骤如下所述: 将 15 mL 乙二醇溶液在 170℃ 的油浴锅中持续加热搅拌 2 h, 随后快速将 4.5 mL 0.1 mM K₂PtCl₆ 的乙二醇溶液注入上述正在加热的 EG 溶液中, 溶液迅速变为浅棕色, 表明 Pt 种子的生成。5 min 后, 将含 18 mL 0.05 M AgNO₃ 与 PVP 的混合液以 0.5 mL/min 的速率滴入种子溶液中。反应体系在 170℃ 维持 40 min, 以确保 AgNO₃ 完全被还原。反应结束后, 所得产物用 ETOH 离心洗涤 3 次, 二次水离心清洗 2 次, 最终将反应产物分散在 40 mL 的二次水中备用。

银纳米颗粒 (AgNSs) 的合成: 合成和处理方式依据参考文献并经过适当改进^[15]。在合成过程中加入 5 mL 质量分数为 1 wt. % 的柠檬酸三钠溶液对硝酸银进行还原, 最后将胶体分散在 20 mL 二次水中备用。

银纳米片 (AgNTs) 的合成: 参照 Zhang 等人的制备方法^[16], 反应溶液的总体积是固定在 25.0 mL。将 50 μL 0.05 M 硝酸银、0.5 mL 75 mM 柠檬酸三钠与 60 μL 30 wt. % H₂O₂ 的溶液混合于 24.14 mL 二次水中, 室温下剧烈搅拌, 使其混合均匀。随后迅速注入 250 μL 0.1 M NaBH₄ 溶液。溶液在约 3 min 后由深黄色转变为蓝色, 标志银纳米片的形成。需要注意的是, 反应过程中表面活性剂种类与浓度对银纳米颗粒的最终形貌具有调控作用。

2 结果与讨论

本实验对制备得到的 AgNWs、AgNSs 和 AgNTs 进行紫外-可见吸收光谱 (UV-vis)、电子扫描显微镜 (SEM) 和透射电子显微镜 (TEM) 光谱测试及形貌分析; 并利用电化学线性扫描伏安曲线 (LSV) 探究了形貌不同的三种等离子体银纳米结构分别在最优吸收波长光照条件下的电催化析氢活性 (HER) 及等离子激元效应对光波长的依赖性和响应性。

2.1 材料的表征与分析

利用 UV-vis, SEM 与 TEM 对制备得到 AgNWs、AgNSs 和 AgNTs 进行系统表征。如图 1-3 所示为紫外-可见吸收光谱表征结果。从图中可以看出, 三者的 LSPR 吸收峰位置分别在 377, 412 和 547 nm 处, 并将各银纳米结构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的吸收峰位置进行统计 (表 3)。SEM 和 TEM 形貌表征结果如图 4-6 所示, 组成相同、形貌不同的三种银纳米结构分别为线形、球形和三角片状, 且相对均一。分析图 4a, 4b 可得, 银纳米线呈线性, 长度不等, 粗细均匀, 在离心清洗过程中, 银纳米线会互相碰撞缠绕, 部分颗粒断裂形成长短不一的银纳米线。从图 5a, 5b 观察可得, 银纳米颗粒在形貌上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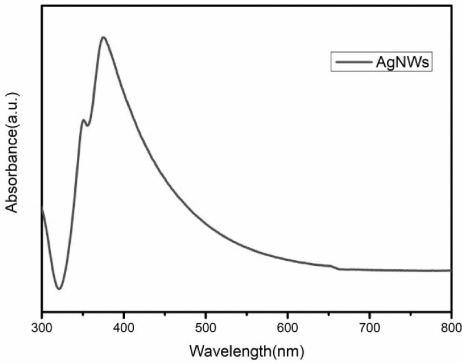


图 1 银纳米线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图

球形,尺寸在 50 nm 左右,形貌相对均一。同时,从图 6a,6b 中观察到银纳米片呈正三角形,边长在 500 nm 左右,厚度与大小相对均匀。由光谱图可以看出不同形状的银纳米结构的紫外-可见吸收峰位置不同,由 SEM 和 TEM 图像可知三种纳米结构的存在形貌上的区别。结合以上表征结果可得,成功合成了具有不同等离激元效应的银纳米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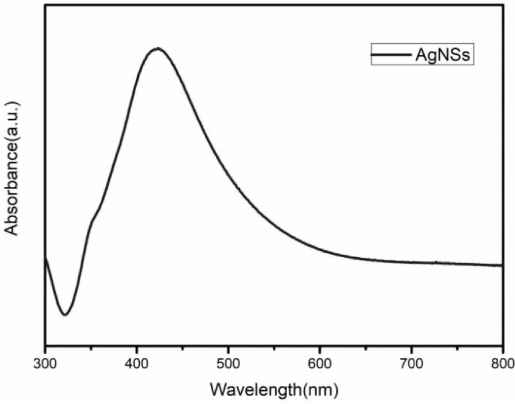


图 2 银纳米颗粒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图

2.2 AgNWs、AgNSs 和 AgNTs 的电催化析氢性能测试及结果分析

本实验中采用三电极体系,玻碳电极(GCE)为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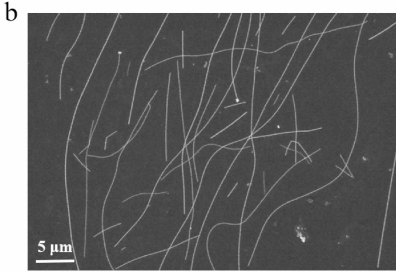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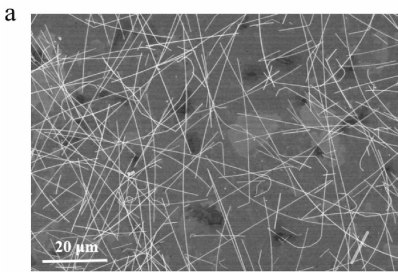


图 4a-b 银纳米线的 SEM 和 TEM 图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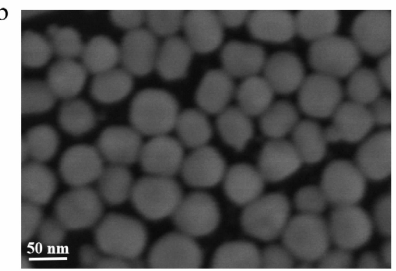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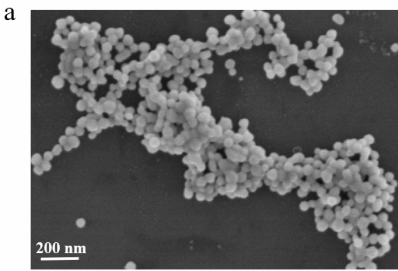


图 5a-b 银纳米颗粒的 SEM 和 TEM 图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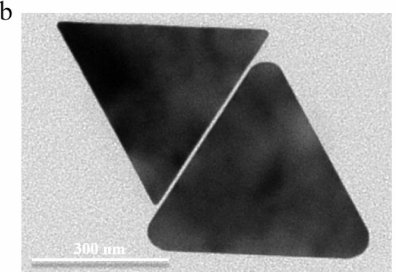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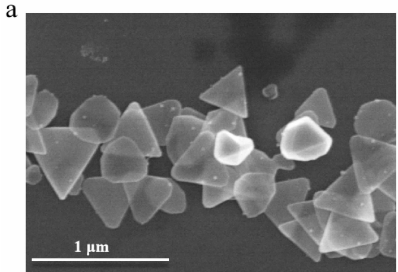


图 6a-b 银纳米片的 SEM 和 TEM 图像

作电极,Ag/AgCl 电极作为参比电极,碳棒作为辅助电极,电解质溶液为 0.01 M HCl,图 7 为实验装置示意图。需要用到的设备包括不同波长型号的紫外线灯,用于定量测试与分析等离激元效应对银纳米材料电催化活性的影响,并探究等离激元效应对纳米颗粒结构的依赖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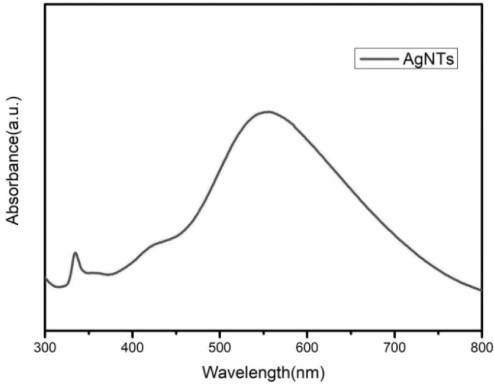


图 3 银纳米片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图

表 3 三种形貌不同银纳米结构的紫外-可见吸收峰

序号	名称	紫外-可见吸收峰的位置 (nm)
1	AgNWs	377
2	AgNSs	412
3	AgNTs	5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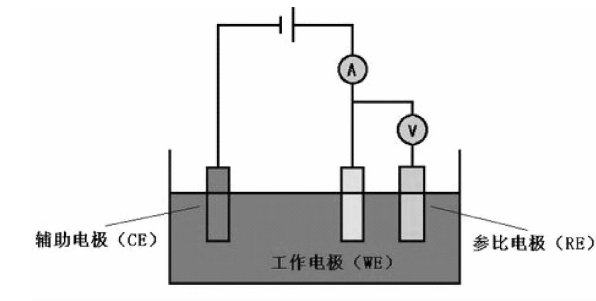


图7 传统三电极体系工作原理图

图7为传统三电极体系工作原理图。首先采用直径为3 mm 的玻璃碳电极为工作电极体系,在电解质溶液为0.01 M HCl 中测试,分析 AgNWs、AgNSs 和 AgNTs 作为电极材料的电催化析氢性能。取 5 μL 银纳米结构胶体溶液样品滴涂在 GCE 表面,作为工作电极,晾干后连接在电路中进行电解水析氢反应,观察记录反应过程中电流随电压的变化情况,测得有银纳米材料参与电催化反应的实验数据,本组作为没有紫外光照参与的参照组。图8-10 记录了以上三种不同的银纳米材料在10 mV/s 扫描速率下的线性扫描伏安图谱(Linear Sweep Voltammetry, 简称 LSV)(没有 iR 校正)。在无光照条件下,三种银纳米结构以电流密度为 $1\text{ mA}/\text{cm}^2$ 为标准,与可逆氢电极(RHE)相比,起始电位分别为 -599 、 -585 、 -574 mV 。如表4 所示,当 AgNWs、AgNSs 和 AgNTs 分别在其 LSPR 最优吸收波长(365、420、532 nm)的光照条件下,其 HER 活性显著提高,起始电位 AgNWs 从 -599 mV 降低到 -555 mV ,正移 44 mV, AgNSs 的起始电位从 -585 mV 降低到 -515 mV ,正移 70 mV, AgNTs 的起始电位从 -574 mV 降低到 -484 mV ,正移 90 mV,这些结果证实了等离激元效应增强了银纳米结构自身的 HER 电催化活性。此外,实验中还对比了 AgNWs、AgNSs 和 AgNTs 在 -700 mV (vs. RHE)、最优吸收波长光照条件下对自身的 HER 催化电流的增加值(图11),其电流密度提升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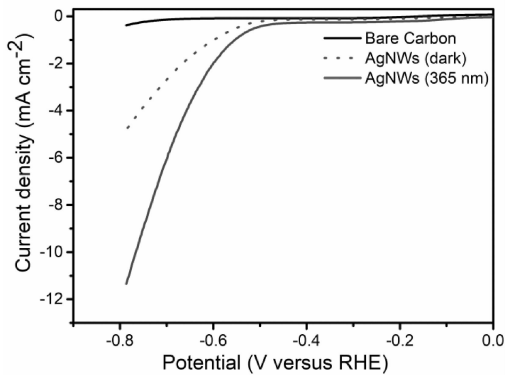


图8 365 nm 光照和不光照条件下,银纳米线 HER 的线性扫描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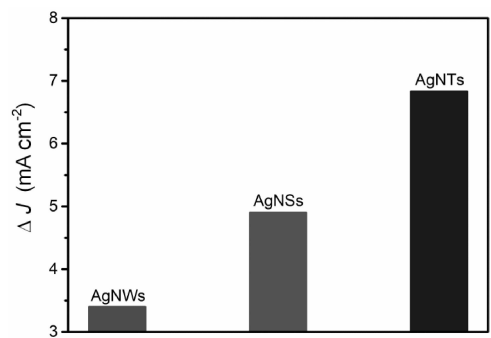


图9 420nm 光照和不光照条件下,银纳米颗粒 HER 的线性扫描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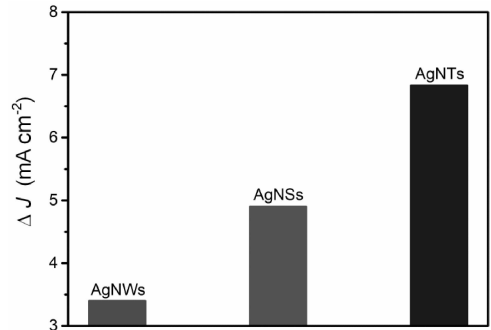


图10 532nm 光照和不光照条件下,银纳米片 HER 的线性扫描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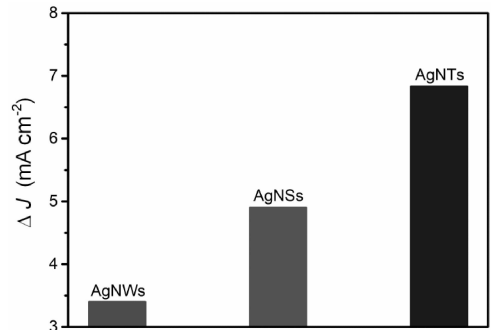


图11 光照和不光照条件下 AgNWs、AgNSs 和 AgNTs 的电流密度增加值

表4 三种不同的银纳米结构光照和不光照条件下起始电位正移值

序号	名称	起始电位正移值(mV)
1	AgNWs	40
2	AgNSs	70
3	AgNTs	90

序是 $\text{AgNWs} < \text{AgNSs} < \text{AgNTs}$,表明了等离激元效应具有明显的结构依赖性^[17]。

为了进一步验证等离激元效应对光的响应特性,以 AgNTs 为例,在 532 nm 光照、不光照、 -600 mV (vs. RHE) 条件下进行 $i-t$ 测试和分析(如图12)。结果显示其电流密度随光照开关呈现快速可逆变化,而玻璃碳电极本身响应微弱。此外,通过测试和分析在 -700 mV (vs. RHE) 下 AgNTs 的 LSPR

对 HER 活性的影响,可知 AgNTs 的 HER 活性增强程度与其吸收光谱趋势保持一致(图 13)。在 532 nm(532 nm 接近 AgNTs 的 LSPR 中心 547 nm)的波长光照下,电流密度提升最为显著。上述实验现象说明 HER 活性的提高归因于 AgNTs 的等离激元效应的激发^[18-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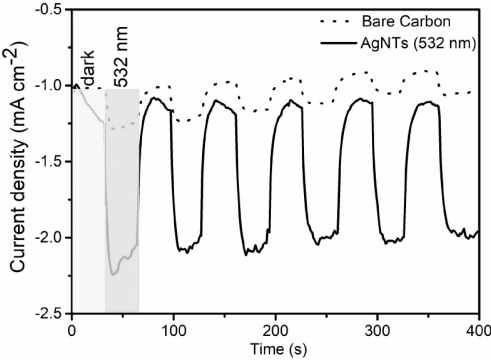


图 12 532 nm 光照下,AgNTs 纳米颗粒 HER 的 i-t 曲线图

3 结论

本研究通过调控还原剂的种类,利用乙二醇、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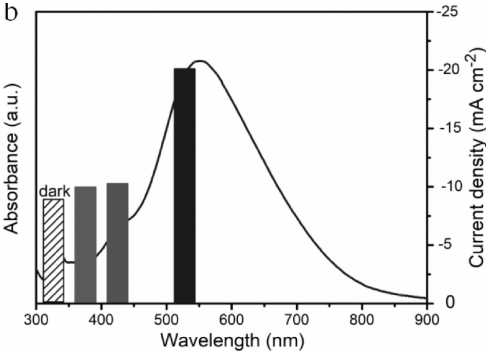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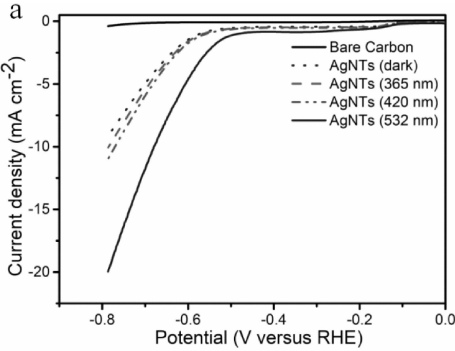


图 13 AgNTs 纳米颗粒在不同光波长下的 (a) LSV 和 (b) 对光波长的依赖性。

参考文献:

[1] KELLY K L, CORONADO E, ZHAO L L, et al. The optical properties of metal nanoparticles: the influence of size, shape, and dielectric environment[J].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B, 2003, 107(3): 668-677.

[2] AMENDOLA V, MENEGHETTI M. Size evaluation of gold nanoparticles by UV-vis spectroscopy[J].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C, 2009, 113(11): 4277-4285.

[3] 徐伟. 银纳米结构可控合成及其光学性质研究[D]. 南京: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6.

[4] LIZ-MARZAN L M. Nanometals: formation and color[J]. Materials Today, 2004, 7(2): 26-31.

[5] ALZOUBI F Y, AHMAD A A, ALJARRAH I A, et al. Localize 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 of silver nanoparticles using Mie theory[J]. 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 Materials in Electronics, 2023, 34(32): 2128-2135.

[6] MUKHERJEE S, LIBISCH F, LARGE N, et al. Hot elec-

tron do the impossible: plasmon-induced dissociation of H₂ on Au[J]. Nano Letters, 2013, 13(1): 240-247.

[7] BARNES W L, DEREUX A, EBBESEN T W. Surface plasmon subwavelength optics[J]. Nature, 2003, 424(6950): 824-830.

[8] 李志航, 宁洪龙, 李晓庆, 等. 基于多成核机制的银纳米线制备研究[J]. 材料导报, 2019, 33(S1): 303-306.

[9] 陈俊龙, 李志航, 梁宏富, 等. 银纳米结构可控合成与应用研究进展[J]. 东莞理工学院学报, 2020, 27(05): 70-77.

[10] GHOBAD T G U, GHOBADI A, OZBAY E, et al. Strategies for plasmonic hot-electron-driven photoelectrochemical water splitting[J]. Chem Photo Chem, 2018, 2(3): 161-182.

[11] NJOKI P N, LIM I-I S, MOTT D, et al. Size correlation of optical and spectroscopic properties for gold nanoparticles[J].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C, 2007, 111(40): 14664-14669.

- [12] WANG C, NIE X G, SHI Y, et al. Direct plasmon – accelerated electrochemical reaction on gold nanoparticles[J]. ACS Nano, 2017, 11(6), 5897 – 5905.
- [13] CREEL E B, CORSON E R, EICHHORN J, et al. Directing selectivity of electrochemical carbon dioxide reduction using plasmonics [J]. ACS Energy Lett, 2019, 4(5), 1098 – 1105.
- [14] SUN Y G, MAYERS B, HERRICKS T, et al. Polyol synthesis of uniform silver nanowires: a plausible growth mechanism and the supporting evidence [J]. Nano Letters, 2003, 3(7): 955 – 960.
- [15] PYATENKO A, YAMAGUCHI M, SUZUKI M. Synthesis of spherical silver nanoparticles with controllable sizes in aqueous solutions[J]. The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C, 2007, 111(22): 7910 – 7917.
- [16] ZHANG Q, LI N, GOEBL J, et al. A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synthesis of silver nanoplates: is citrate a “magic” reagent[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2011, 133(46): 18931 – 18939.
- [17] BURDA C, CHEN X B, NARAYANAN R, et al. Chemistry and properties of nanocrystals of different shapes [J]. Chemical Reviews, 2005, 105(4): 1025 – 1102.
- [18] ZHANG P, FUJITSUKA M, MAJIMA T. Hot electron – driven hydrogen evolution using anisotropic gold nanostructure assembled monolayer MoS₂ [J]. Nanoscale, 2017, 9(4): 1520 – 1526.
- [19] ZHANG W M, WANG S S, YANG S Y A, et al. Plasmon of Au nanorods activates metal – organic frameworks for both the hydrogen evolution reaction and oxygen evolution reaction[J]. Nanoscale, 2020, 12, 17290 – 17297.
- [20] 王振林. 表面等离子激元研究新进展[J]. 物理学进展, 2009, 29(3): 287 – 324.
- [21] 邵磊, 阮琦锋, 王建方. 局域表面等离子激元[J]. 物理, 2014, 43(5): 290 – 298.

(责任编辑 李玉玲)

Study on Synthesis and Photoelectrochemical Properties of Plasmonic Silver Nanostructures

ZHANG Wenmin¹, LIU Ziyue², ZHANG Lin¹, ZHANG Dongxi¹, SUN Yahao¹

(1. School of Materials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2. College of Food Science,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2, China)

Abstract: Noble metal nanoparticles exhibit distinct localized 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 (LSPR) under light irradiation due to their uniqu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In this work, plasmonic silver nanowires (AgNWs), silver nanospheres (AgNSs), and silver nanosheets (AgNTs) with the same composition but different morphologies were obtained using the reduction of silver nitrate. The optical properties and morphologies of these materials were characterized and analyzed.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olid-state UV-visible absorption peaks of the three materials were located at 377, 412, and 547 nm respectively, with relatively uniform morphologies. Additionally, the electrocatalytic hydrogen evolution activity of the plasmonic silver nanostructures under optimal absorption wavelength illumination conditions was investigated. The findings revealed that the current increase in silver nanosheets was greater than that in silver nanospheres, which in turn exceeded that of silver nanowires, demonstrating a hierarchy of electro catalytic activity: (AgNTs > AgNSs > AgNWs). The study also analyzed the plasmon effect's dependence and responsiveness to light wavelengths, providing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enhancing photoelectrocatalytic activity through plasmon effects.

Key words: silver nanostructures; plasmonic effect; spectral analysis; photoelectrocatalysis; hydrogen evolution reaction

基于深度学习的郑州地区降水预测分析

李兴业¹, 李顶顶¹, 刘松¹, 李沂衡²

(1. 保利长大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 广州 510640;

2.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土木与环境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近年来,随着深度学习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在气象预测领域的应用逐渐受到关注。本文结合了时间序列预处理与模型参数优化,构建了一种精确的降水预测模型。首先,以经验模态分解(EMD)方法为先导,有效将降雨及水位变动数据分解成不同频率的时间序列。此分解过程不仅降低了数据的非平稳性,同时也提高了预测精度。然后运用郊狼优化算法(COA)进行细致的超参数筛选,确保长短期记忆网络(LSTM)模型达到最佳性能。在此基础上,成功构建了EMD-COA-LSTM耦合模型。为了验证模型的可靠性,运用LSTM、EMD-LSTM、COA-LSTM及EMD-COA-LSTM四种降水预测模型,对河南省郑州地区的降雨量进行了深入预测与对比分析。实验结果表明,EMD-COA-LSTM模型在降水预测方面展现出可靠的预测性能,为气象与水文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与视角。

关键词:深度学习; EMD; COA; LSTM; 降雨预测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6.020

中图分类号:P412; TP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6-0124-05

1 引言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日益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在全球各地,从城市到乡村,从干旱地区到洪涝灾区,都需要精确而高效的气象和水文预测来指导决策,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精准预测降水量、水位变动等关键气象与水文数据,对于有效规划城市基础设施、防范洪涝灾害、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然而,传统的气象与水文预测方法在面对复杂多变的数据时,往往存在预测精度不高、响应速度慢等问题,难以满足现代社会对高精度预测的需求。

近年来,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智能算法具有较强的自主学习、推断和记忆能力,在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和气象预报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相对于传统的机器学习方法,深度学习能够自动地从原

始数据的低级属性中更好地进行特征挖掘和特征表示。特别是在气象与水文领域,深度学习和时间序列分析技术日益受到学者广泛关注。时间序列预处理作为一种重要的数据预处理技术,可以有效降低数据的非平稳性,提高预测精度^[1]。如经验模态分解(EMD)等,能够有效将复杂数据分解成不同频率的成分,降低数据的非平稳性,提高预测精度。同时,深度学习模型,特别是长短期记忆(LSTM)神经网络模型能精准地预测时间序列,有效解决了一些神经网络中出现的梯度爆炸/梯度消失问题。凭借其强大的序列数据处理能力,已有学者将深度学习应用于气象预报时间序列预测任务中。例如,Lim Bryan等^[2]比较了不同深度学习模型在时间序列预测任务中的性能和优劣,并对深度学习在时间序列预测中的应用进行了全面概述,介绍了循环神经网络(RNN)、长短期记忆网络(LSTM)和变分自编码

收稿日期:2025-06-20

作者简介:李兴业(1992—),男,广东广州人,硕士,保利长大工程有限公司工程师,主要从事道路与桥梁施工方面管理工作。

通信作者:李沂衡(2000—),男,河南商丘人,硕士,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土木与环境学院教师,主要从事岩土隧道和气象降水方面的研究。

器(VAE)等模型在处理时间序列数据,特别是在气象数据分析时的应用。Haggag M 等^[3]使用深度学习的方法,结合卷积神经网络(CNN)和循环神经网络(RNN),以及自注意力机制,来构建预测气候诱导灾害的模型。该模型更全面地理解气候系统的复杂性,并更准确地预测气候诱导的灾害。模型在大量历史气候数据上进行训练,通过优化算法调整参数,以最小化预测误差,从而实现对灾害风险的有效评估。沈皓俊等^[4]利用长短期记忆(LSTM)网络,针对中国夏季降水进行了预测分析,对比了逐步回归、BP神经网络和LSTM网络在夏季降水预测上的表现。实验结果显示,LSTM网络在预测中国夏季降水方面更为有效。

综上所述,深度学习方法在气象预测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关于经验模态分解(EMD)与郊狼优化算法(COA)结合长短期记忆网络(LSTM)的组合类型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因此,本研究采用1951—2014年郑州市气象观测站提供的逐月降水数据,包括月降雨量、日降水量 ≥ 0.1 mm日数、最大日降水量及降水距平百分率等指标。数据来源于河南省气象局,经过严格的质量控制,剔除明显错误和异常记录,并对缺测值采用线性插值方法进行合理填补,以保证数据连续性与完整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结构化的降水预报网络,首先通过经验模态分解(EMD)方法将降雨及水位变动数据分解为多个不同频率的时间序列,以揭示数据内在规律、降低非平稳性,从而提高预测精度;随后运用郊狼优化算法(COA)对LSTM模型的超参数进行精细化调整,以确保模型在面对复杂数据时达到最佳性能;最后对比EMD、COA、LSTM及其组合方法的预报准确率。

2 方法与资料

2.1 EMD-COA-LSTM方法简介

经验模态分解(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简称EMD)是一种自适应的信号时频分析方法,通过将复杂信号分解为一系列固有模态函数(IMFs),提取不同时间尺度的特征,对于处理非线性和非平稳的气象数据尤为重要,具有很高的信噪比。郊狼优化算法(Coyote Optimization Algorithm,COA)则是一种基于群体智能的优化算法,通过模拟自然界的协同进化过程求解复杂优化问题,在气象预测中可用于优化预测模型的参数和结构。长短期记忆网络(Long Short Term Memory,简称LSTM)是一种特殊的循环神经网络,通过门控机制和记忆单元捕捉长时间依赖关系,对于时间序列气象数据的建模和预测具有显著优势。本文提出的EMD-COA-LSTM模型,其

创新之处在于将信号分解、智能优化与深度学习三者有机融合,构建一种结构化的降水预测框架,与单一LSTM模型相比具有明显优势。首先,通过EMD对原始降水序列进行多尺度分解,有效克服了非平稳性对预测的影响,提升了模型对降雨波动特征的捕捉能力;其次,引入COA算法对LSTM中的超参数(如学习率、隐藏层单元数等)进行自适应优化,避免了人工调参的主观性和耗时性问题;最终,通过LSTM网络对分解后的各IMF分量分别进行预测并重构输出,充分发挥其处理长时序依赖问题的优势。

2.2 数据收集与分析

通过收集1951—2014年的郑州地区月降雨量、日降水量 ≥ 0.1 mm、日数、最大日降水量和降水距平均百分率的变化数据,发现天气变化基本以每年为周期波动。月平均降水量52.8 mm,月最大降雨量为376.3 mm,集中在6~9月份,最小为0 mm,主要集中在12月到次年2月份。日降水量 ≥ 0.1 mm日数的每月最大值22 d,最小值0 d,平均为6.7 d。最大日降水量的最大值189.4 mm,最小值0 mm。每月降水距平百分率最大值为541%,最小值为-100%,平均为0.6%。郑州最大日降水量的累积频率,基本呈现以0为中心的正态分布,0 mm左右出现的次数基本与月降雨量相当约260次;第二高部分的0~25 mm频数直接下降到70次左右,相比月降雨量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减小;日降雨量100 mm以上的累积频率约为0.02,可以忽略不计。

2.3 统计分析

上文主要是针对曲线的定性分析和累计频率的简单分析,这里采用基于Tensorflow平台和LSTM深度学习方法对以上数据进行分析预测。本次计算的参数选择中,隐藏层设置为两层,每层神经元数量分别为64和32;激活函数选用ReLU;训练轮数设置为200;批量大小为16;测试集比例为0.2;损失函数采用均方误差(MSE);优化器选用Adam,初始学习率为0.001。为避免过拟合,在每层LSTM后加入Dropout层,丢弃率设置为0.2。以上参数通过初步试验及优化算法确定,以确保模型具备良好的预测性能与泛化能力。

本部分中将既有统计分析指标(决定系数 R^2 、均方误差MSE、平均绝对误差MAE、均方根误差RMSE、等级指数RI、等级距离指数RD')和提出的分析指标(综合指数CI)和曲线下面积应用于郑州地区的降雨预测^[5-6],得到的结果如图1、图2、图3以及表1、表2、表3所示。由图表可知,EMD-COA-LSTM方法明显优于其他方法,但另外三种方法的优劣差别

不大,需要采用统计指标进行更进一步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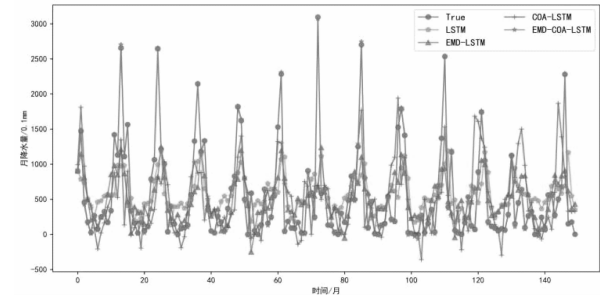


图1 郑州 1951—2014 年的月降雨量预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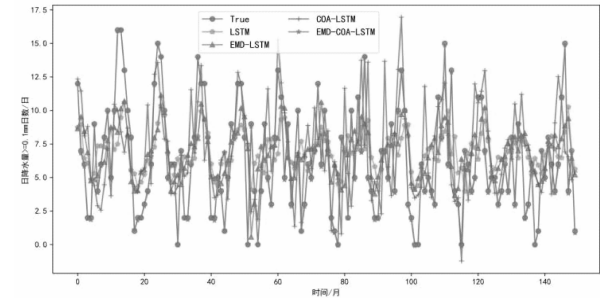


图2 郑州 1951—2014 年日降水量≥0.1 mm 日数预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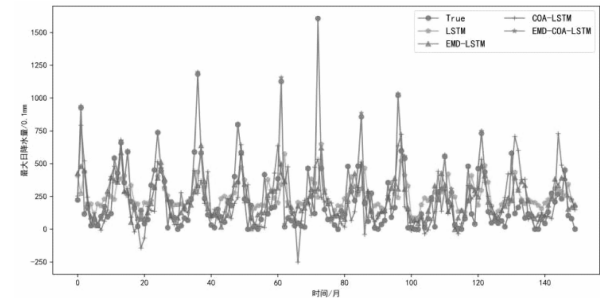


图3 郑州 1951—2014 年最大日降水量预测

对于郑州地区 1951 ~ 2014 年的月降雨量预测 (表 1), LSTM、COA - LSTM、EMD - LSTM、EMD - COA - LSTM 方法的决定系数 R^2 分别为 0.27、0.30、0.39 和 0.98,很明显 EMD - COA - LSTM 方

表 1 郑州地区 1951—2014 年的月降雨量预测

统计参数	LSTM	COA - LSTM	EMD - LSTM	EMD - COA - LSTM
决定系数 R^2	0.27	0.30	0.39	0.98
均方误差 MSE/mm ²	3.24e5	3.08e5	2.70e5	368.80
平均绝对误差 MAE/mm	417.11	403.86	361.77	16.32
均方根误差 RMSE/mm	569.01	554.55	520.03	19.20
相对误差的均值 μ	0.12	-3.68	-0.03	0.05
相对误差的标准差 σ	0.92	32.11	1.73	2.50
等级指数 RI	1.04	35.79	1.76	2.50
等级距离指数 RD'	0.93	32.32	1.73	2.50
综合指数 CI	8.22	74.30	9.53	7.56
曲线下面积/mm ²	2.78e ⁶	2.77e ⁶	2.47e ⁶	1.10e ⁵

从日降水量 ≥ 0.1 mm 日数预测结果 (表 2),可以得到 EMD - COA - LSTM 方法远远优于其他方法,这里对比分析剩余三种方法。虽然从决定系数 R^2 、均方误差 MSE、平均绝对误差 MAE、均方根误差 RMSE 和均值

法远远优于其他方法,说明不同组合优化后的结果,是可以明显提升预测精度的,再加上另外三种方法的决定系数较为接近。为了更准确地对比三种方法,使用不同的统计指标进行分析。对常作为损失函数的均方误差 MSE、平均绝对误差 MAE 和均方根误差 RMSE 来说,虽然 MSE 的值均为 3×10^5 附近,而后两者均为 400 和 550 左右。就大小排序而言,MSE、MAE 和 RMSE 与 R^2 呈反相关,也就是决定系数越小,损失值越大。

准确度 (Accuracy),指在一定实验条件下多次测定的平均值与真值相符合的程度,以误差来表示。精确度 (Precision),是指得到的测定结果与真实值之间的接近程度,以偏差来表示^[7]。在准确性方面 (K 与 1 或 RE 与 0 接近程度),三种方法 (以下未特别声明时,三种方法指的是 LSTM、COA - LSTM、EMD - LSTM 方法) 中,EMD - LSTM 方法得到最优结果 ($\mu = -0.03$),COA - LSTM 最差 ($\mu = 3.68$)。在精确性方面 (标准差 σ 与 0 的接近程度),LSTM 方法仍然最佳 ($\sigma = 0.92$)。类似地,对于 RI 值,排序一致 ($RI_{LSTM} = 1.04$ 最小)。然而,就统计指标而言,RMSE 和 RI 都具有某些缺点,前者主要突出显著的误差 (即准确度较低) 且未包含精度,后者考虑准确度和精确度,但未赋相等的权重。相比之下,对准确度和精确度赋予相等权重的 RD' ,可以作为更好的指标,用于评价不同公式的适用性。对于 RD' ,三种方法中分析郑州地区降雨的最佳方法是 LSTM 方法 ($RD'_{LSTM} = 0.93$)。对于提出的综合指数 CI,三种方法中分析郑州降雨的最佳方法是 LSTM 方法 ($CI_{LSTM} = 8.22$)。但从曲线下面积、图 5、图 6 中的月降雨量相对误差累积曲线和距离累积曲线来看,预测最差的模型反而是 LSTM (面积 $L_{STM} = 2.78e^6$)。

μ 的结果来看,EMD - LSTM 方法最好,COA - LSTM 略次于 LSTM 方法。从 σ 、RI 和 RD' 和 CI 的指标结果来对比,结果则相反,LSTM 表现最佳 ($RD'_{LSTM} = 0.53$ 以及 $CI_{LSTM} = 3.26$),COA - LSTM ($RD'_{COA-LSTM} = 1.03$ 以及

$CI_{COA-LSTM} = 4.34$) 略优于 EMD - LSTM ($RD'_{EMD-LSTM} = 1.32$ 以及 $CI_{EMD-LSTM} = 4.63$)。

表 2 郑州地区 1951—2014 年的日降水量≥0.1 mm 日数预测

统计参数	LSTM	COA - LSTM	EMD - LSTM	EMD - COA - LSTM
决定系数 R^2	0.17	0.08	0.26	0.98
均方误差 MSE/mm^2	12.70	14.11	11.37	0.02
平均绝对误差 MAE/mm	3.02	3.07	2.81	0.13
均方根误差 $RMSE/mm$	3.56	3.76	3.37	0.14
相对误差的均值 μ	0.09	-0.04	0.01	0.03
相对误差的标准差 σ	0.52	1.03	1.32	0.23
等级指数 RI	0.62	1.07	1.33	0.23
等级距离指数 RD'	0.53	1.03	1.32	0.23
综合指数 CI/mm^2	3.26	4.34	4.63	1.05

对于最大日降水量预测结果,可以得到 EMD - COA - LSTM 远远优于其他方法,这里依然对比分析剩余三种方法。虽然从决定系数 R^2 、均方误差 MSE、均方根误差 RMSE 的结果来看,EMD - LSTM 方法最好,LSTM 略次于 COA - LSTM 方法;考虑到有两种方法的 μ 绝对值相差不大 ($\mu_{EMD-LSTM} = -0.03$, $\mu_{COA-LSTM} = 0.02$),从 σ 、RI 和 RD' 和 CI 的指标结果来对比,LSTM 表现最佳 ($RD'_{LSTM} = 0.95$ 以

及 $CI_{LSTM} = 7.63$), COA - LSTM ($RD'_{COA-LSTM} = 3.57$ 以及 $CI_{COA-LSTM} = 12.56$) 略逊色于 EMD - LSTM ($RD'_{EMD-LSTM} = 3.12$ 以及 $CI_{EMD-LSTM} = 11.57$)。

对于降水距平百分率(限于篇幅,未显示)而言,虽然其他方法的预测性极差(应该是因为数据规律性和周期性较差),EMD - COA - LSTM 方法依然能得到极佳结果(决定系数 $R^2_{EDM-COA-LSTM} = 0.98$, $\mu_{EMD-COA-LSTM} = 0.01$, $CI_{EMD-COA-LSTM} = 2.03$)。

表 3 郑州地区 1951—2014 年的最大日降水量预测

统计参数	LSTM	COA - LSTM	EMD - LSTM	EMD - COA - LSTM
决定系数 R^2	0.16	0.28	0.35	0.98
均方误差 MSE/mm^2	5.88e4	4.99e4	4.52e4	45.21
平均绝对误差 MAE/mm	173.69	156.99	141.55	4.46
均方根误差 $RMSE/mm$	242.50	223.40	212.56	6.72
相对误差的均值 μ	0.14	0.02	-0.03	0.07
相对误差的标准差 σ	0.94	3.57	3.12	0.35
等级指数 RI	1.07	3.58	3.15	0.35
等级距离指数 RD'	0.95	3.57	3.12	0.35
综合指数 CI/mm^2	7.63	12.56	11.57	2.40

图 4 和图 5 为郑州地区月降雨量相对误差累积曲线和距离累积曲线,其中距离指的是每点到对角线也就是完美曲线的垂直距离。由图可知,最有效的方法是 EMD - COA - LSTM 方法,EMD - LSTM 次之,预测最差的模型是 LS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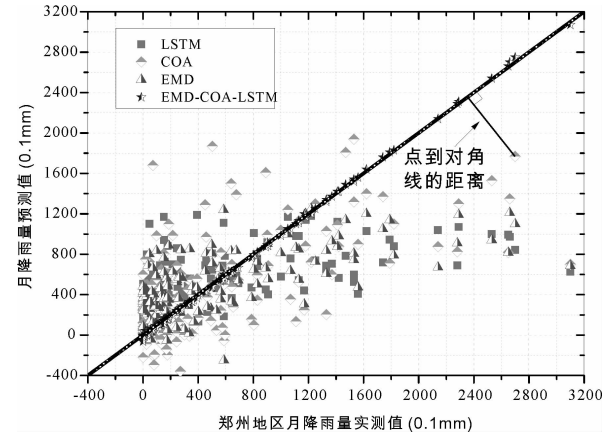


图 4 郑州地区 1951—2014 年月降雨量预测值与实测值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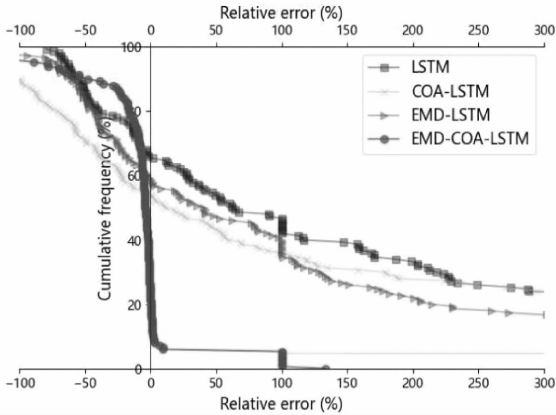


图 5 郑州地区月降雨量相对误差累积曲线

综上所述,对于郑州地区降雨量预测,最有效的方法是 EMD - COA - LSTM 方法;但单独使用 EMD - LSTM 或 COA - LSTM 优化时,未必一定得到较好的优化结果。同时由以上分析可知,对于波动较大的降雨曲线,MSE 和 RMSE 与 R^2 得到的结果需要进一步验证,尤其相差不大时;建议增加等级指

数 RI 和等级距离指数 RD'以及综合指数 CI,并结合相对误差累积曲线和距离累积曲线进行对比分析。

4 总结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 EMD、COA 与 LSTM 三者相结合,构建了一种 EMD – COA – LSTM 耦合模型。通过对河南省郑州地区降雨量的预测与对比分析,EMD – COA – LSTM 在对是否降雨的分类预测上能够表现出较好的效果。该模型不仅充分利用了时间序列分析和深度学习的各自优势,而且通过精细化调整超参数,进一步提升了模型的预测精度和稳定性。但单独使用 EMD – LSTM 或 COA – LSTM 优化时,未必一定得到较好的优化结果。对于波动较大的降雨曲线,MSE 和 RMSE 与 R^2 得到的结果需要进一步验证,尤其相差不大时;建议增加等级指数 RI 和等级距离指数 RD'以及综合指数 CI,并结合相对误差累积曲线和距离累积曲线进行对比分析。

参考文献:

[1]任利强,贾舒宜,王海鹏,等. 基于深度学习的时间序

列分类研究综述[J]. 电子与信息学报, 2024, 1 – 23.
[2] LIM B, ZOHREN S. Time – series forecasting with deep learning: a survey [J].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A: Mathematical, Physical and Engineering Sciences, 2021, 379: 20200209.
[3]HAGGAG M, SIAM A S, EL – DAKHAKHNI W, et al. A deep learning model for predicting climate – induced disasters[J]. Natural Hazards, 2021, 107: 1009 – 1034.
[4]沈皓俊, 罗勇, 赵宗慈, 等. 基于 LSTM 网络的中国夏季降水预测研究.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2020, 16(3): 263 – 275.
[5]SESTI N, GARAU – LUIS J J, CRAWLEY E, et al. Integrating LSTMs and GNNs for COVID – 19 Forecasting [EB/OL]. arXiv, 2021.
[6]李悦, 崔玉杰. 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的预测及影响因素分析[J]. 低碳经济, 2020, 9(1): 1 – 9.
[7]季长清, 高志勇, 秦静, 等.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图像分类算法综述[J]. 计算机应用, 2022, 42(4): 1044 – 1049.

(责任编辑 李玉玲)

Rainfall Prediction in Zhengzhou Region Based on Deep Learning

LI Xingye¹, LI Dingding¹, LIU Song¹, LI Yiheng²

(1. Poly Changda Engineering Co. , Ltd. ,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0, China;
2.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Environment,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Zhengzhou, Henan 450046,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deep learning techniques has drawn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their applications in meteorological prediction. This study integrates time series preprocessing with model parameter optimization to develop an accurate precipitation prediction model. Specifically, the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 (EMD) method is employed to decompose rainfall and water level fluctuation data into multiple intrinsic mode functions (IMFs) of different frequencies. This decomposition not only reduces the non-stationarity of the data but also enhances prediction accuracy. Subsequently, the Coyote Optimization Algorithm (COA) is applied for meticulous hyperparameter tuning to ensure optimal performance of the Long Short-Term Memory (LSTM) network. Building on this, a coupled EMD-COA-LSTM model is constructed. To validate its reliability, four prediction models: LSTM, EMD-LSTM, COA-LSTM, and EMD-COA-LSTM were compared through an in-depth predictive analysis of rainfall data from the Zhengzhou region in Henan Province. Experimental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proposed EMD-COA-LSTM model achieves reliable predictive performance, offering a novel methodology and perspective for research in meteorology and hydrology.

Key words: deep learning; EMD; COA; LSTM; rainfall prediction